

HUANG HUA GANG

2003 年 第 4 期

總第 7 期

黃 花 崗

文 歷
化 史

季
刊

- 特稿：廣東石壁三村聯名上書
- 保共改良二十五週年祭
- 黃花崗雜誌展開大論戰
- 黃花崗雜誌舉辦《走向共和》賞評會
- 歷史劇《走向共和》劇中人孫文台詞摘錄
- 一個跨文化的傳播者——法國學者論孫中山
- 中共第一號戰犯——民族英雄蔣介石
- 偉大的民族英雄——蔣介石
- 花園口掘堤真相解密
- 恐怖堡壘——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 並非一個人的遭遇



長篇歷史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劇照選登



孫中山領導的第一次廣州起義雖然流產了，但卻開始了中國人民“走向共和”的第一步——歷史劇《走向共和》旁白



李鴻章赴日本馬關談判，雖遭日人刺殺，卻仍然在談判桌前據理力爭，並當場斥罵日本“終是個蕞爾小國”，頗為不恥。



康有為在得知光緒皇帝召見、志得意滿之時，突然轉臉對弟子梁啟超說：“馬上給徐勤發電，必須與孫文劃清界限。”



孫中山一共發動了十次起義以追求共和。這是他親自參加鎮南關起義、並置身於炮火之中的畫面。右為起義領袖黃興。



大清王朝的皇親國戚、五虎之一的安徽巡撫恩銘告訴志在大清憲政的徐錫麟說：“立憲全是假的，抓權才是真的……”



袁世凱在慈禧太后問他何種立憲為好時，他回答說：“共和憲政是不要爹媽的憲政，君主憲政是有爹有媽的憲政……”

黃花崗

歷史文化季刊

二零零三年 第四期 (總第7期)

Huang Hua Gang Magazine

(ISSN 1534-2662)

Issue No. 07
Published
November 27, 2003

Huang Hua Gang Magazine is published
by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Inc.
New York
USA

website: <http://www.huanghuagang.org>
or <http://www.huanghuagang.com>
eMail: hgang2001@hotmail.com

Subscription Hot Line: 718-898-9100

Postmaster

Please send address change to:
P. O. Box 425
New York, NY 10163

Copyright: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訂閱本刊請來電: 718-898-9100

或來信:

《黃花崗》雜誌社
P. O. Box 425
New York, NY 10163
USA

主辦者 中國現代史研究中心
出版者 《黃花崗》雜誌社

名譽董事長 周祥(已故)

董事長 周光亞
副董事長 馬佩華、周美娟、姚鑫華、路人
董事會幹事 孫雲

社長 馬佩華
副社長 易丹軒

主編 辛灝年

主編助理 李剛博士
特邀編審 吳學燦、李勇、王友琴教授

編委會名譽主任 孫國棟教授

編委會名譽編委 王德耀、成其林、黃玉振、李勇、向厚祿
黃其柱、黃偉悌、麥青芬、趙增義、孫國欽、韋峰、于京山
張學海、陳慶國

編委: 丁抒 王友琴 尚戎 劉國凱 丁毅 楊海平
陸耘 邢錚 楊三民 高陽 余建文 南明 辛華
陳維健 嚴青 陸中原 周健 宮晨 陳一如 楊柳春
林牧晨 王平 宋子明 吳學燦 翟心海 孫雲 林才君
辛政 高優 夏雲 葉寧 賴安志 應易中 魏玲
魏碑

本刊法律顧問: 海明威律師事務所 律師: 葉寧

黃花崗雜誌 第7期 (增刊) 2003年 第4期

Huang Hua Gang Magazine November 27, 2003

特稿

- 廣東石壁三村聯名上書 石壁三村村民 20
她仍將母儀中華 本刊 4
《中國民主革命之路》一書選載 王炳章 26
保共改良二十五週年祭 辛灝年 5
黃花崗雜誌展開大論戰 孫雲、應易中 29
黃花崗雜誌舉辦《走向共和》賞評會 本刊記者 32
《走向共和》再現中華民國開國史 邱紹環 32
紀念辛亥革命 賞評長篇歷史劇《走向共和》 史靜 33
紐約學者品評《走向共和》 陳裕光 35
欣賞《走向共和》 觀眾談古論今 明報 34
討論電視劇《走向共和》 僑報 35
我看《走向共和》電視劇目 李勇 36
中國熒屏的一道異彩 陳破空 39
孫中山的終生追求是什麼？ 曉黑 40
《走向共和》與《誰是新中國》 莊思明 40
悉尼走向共和座談會發言摘要 秦晉 41
晚清民初新聞自由之回顧 翔帆 44
寧仲康將孫先生手著的三民主義文獻整理成書 本刊記者 62
辛灝年應邀赴紐約和休士頓僑社講演 本刊記者 57
辛灝年即將應邀赴舊金山等地評講《走向共和》 本刊記者 108
辛灝年為謝辭德國、澳洲和台灣講演邀請致歉 本刊記者 108
中華民族民族意志的沉淪 (下期續載)

新聞發佈會

《走向共和》賞評會報導

《走向共和》賞評會發言

新聞追蹤

本刊新聞

驅除馬列

國民革命與中華民國 專欄

大 論 戰

- 中共第一號戰犯——民族英雄蔣介石 胡志偉 64
偉大的民族英雄蔣介石 龍勝熊 66
關於蔣介石與毛澤東的一個比較 周亞輝 71
關於拙作《痛說》一文所起事端的情況通報 朱有道 71
不廢萬古江河流——為朱有道先生辨誣 潘仁泉 72
關於拙著《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的嚴正聲明 楊天石 75
辛灝年為何陷入四面楚歌？ (轉載) 辛明 83
辛灝年“必然”陷入四面楚歌… 陸耘 86
斯大林不是民族英雄，而是民族罪人 辛明 88

孫中山與三民主義研究	歷史劇《走向共和》劇中人孫文台詞摘錄	陸 耘	46
	一個跨文化的傳播者——法國學者論孫中山	曉 黑 譯	50
	三民主義《政治五原則》	段正坤	52
國民黨抗戰研究	花園口掘堤真相解密	熊先煜 羅學蓬	96
	淞滬鏖兵	石懷瑜	101
	國軍臨沂血戰日寇——《血淚年華》選載之二	張育明	104
共產革命與馬列中國 專欄			
	恐怖堡壘——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樊一弓	109
	殘暴的壽陽事件	王雨峰	119
中華文明與世界文化 專欄			
	論《禮》九章（上）	謝選駿	58
	為什麼要探討中華王道文化？（下期預告）	孫 雲	
中國知識分子反思 專欄			
馬列中國的知識份子	並非一個人的遭遇（上）	王友琴	129
	現代棄婦怨——《王若望自傳》第三部連載	王若望	120
跨時代的中國知識份子	吳宓與季羨林的死與生（下期預告）	李 勇	
台港海外的知識份子	貳臣傳——香港名報人傳（上篇）	段千木	137
理論探討 專欄			
社會主義研究	從社會主義到法西斯主義（下期預告）	陳禮銘	
民族問題研究	聯邦地方分離主義 versus 中國民族統一主義下期	孟德聲	
中國國際關係研究 專欄			
中俄關係記實	黃沙俄匪中華血（下期預告）		
	蘇軍佔領東北以後（下期預告）		
時代與文學 專欄			
文藝評論	從唐弢不完成《魯迅傳》說起（下期預告）	陳光華	
作品	抗戰詩抄	力揚等	63
	古體詩兩首（90、100）	流浪者	
世界華人 專欄			
華僑人物	《周祥自傳》之三	周 祥	90
中華自由論壇 專欄			
	大陸《民間故事》連載（外一篇）	申 雪	107
	魔鬼辭典（下期預告）	金海濤	
《黃花崗》雜誌 公告欄			
	本刊董事會第七次財務公告		43
	本刊榮譽訂戶		49
	《黃花崗》雜誌、《誰是新中國》訂單		144

本期義務編稿：吳學燦 王友琴 辛灝年 本期義務校對：應易中 本期義務排版：李剛 辛灝年

她
仍
將
母
儀
中
華



蔣夫人為抗日軍人縫征衣

《黃花崗》雜誌悼蔣夫人宋美齡女士

她去了，留下了三個世紀的艱難腳印；
她去了，帶走了可憐故土的幾多深情；
她去了，身後依然舒卷著抗日的烽煙；
她去了，國會山莊裡還在迴旋著——
一個中國女人的美麗嗓音……

百年痴情，哪管是南京還是西京；
兩口棺木，雙雙翹首金陵；
安息吧，中華民族的一雙好兒女；
祇等中國終於走向了共和，
祇待復辟永遠變成了昨天……

辛註：本期付梓之時，驚聞蔣夫人仙逝夢中。小詩一首，以為心祭。

“保共改良”二十五週年祭

—— 評歷史連續劇《走向共和》的美學價值 ——

辛灝年

獻詞：獻給偉大的共和革命——辛亥革命九十二周年

祭解：問曰：保共改良未死，何以言祭？

答曰：保共改良必死，共和革命必再。當此方死方生之際，為促其早死，乃為之祭。

前言：

一位近代史學者在看完了長篇電視歷史劇《走向共和》之後，曾興奮地評價說：《走向共和》不啻為——

專制中國的一道閃電，
共和思想的一片霞光；
痛斥改良的一陣狂飆，
呼喚革命的一聲驚雷……

是的，當此中共北京洋教專制復辟政權——依然在拼命效法著大清慈禧皇太后“假改革、真保權”的——“愚民之術”時，《走向共和》的播放和傳播，和它始被中共“刪除革命、祇播改良”，終被中共徹底禁播禁售的“必然命運”，雖然突顯了中共專制統治者的心慌意亂，卻在海外為驚醒人心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特別是在國內，它實已成為號召再造共和革命、推翻專制復辟的驚天之雷……

它形像地告訴了我們：歷史竟是如此驚人的相似。

它藝術地回答了我們：何為專制改良？何為專制復辟？誰才是中華民族的新中國？誰才要真正地“走向共和”？

上篇：

一、《走向共和》形像地揭開了“保清改良”和“保共改良”已死和必死的歷史之謎

然而，何為“保清改良”？一言以蔽之：為確保大清皇權統治的一切改良，均謂之“保清改良”。質而言之，就是“專制改良”。

然就大清朝推行專制改良的進程而言，又有兩個不同的歷史階段。第一階段是謂變法以保大清江山，即為鞏固王朝統治而推行的專制行為之改良；第二階段則是變制先保大清皇權，就是“藉預備立憲以保皇權統治”的改良，其本相，乃是立憲為假，保權為真。

長篇電視歷史劇《走向共和》的編導們、演員們，正是以此作為探索歷史的根本軌跡，將晚清一代有血有淚的“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和晚清朝野用情用命的“改良和革命”，入理入境地表現得至深至美。真實的歷史和藝術的再現，深邃的思想和精湛的表演，由此而撼動人心，由此而發人深省，更由此而達到了相當的真理境界和藝術境界，從而將藝術形像對於歷史生活的審美關係，也就是“個別概括一般”的藝術哲學，而不是“個別表現一般”的哲學思考，推升到了一個歷史性的、甚至是“近乎完美”的價值高度。

鏡頭之一：

從改革派大臣到割地賠款大師——李中堂在劇中

《走向共和》的鏡頭，一開場便準確地將焦距對準了李鴻章——這一位顯赫中外的大清朝改革家，卻又將他心血費盡的變法實踐，及其必然失敗的痛心結局，展現在一幕又一幕令人傷心慘目的畫面之上：

……

他曾冒天下之大不諱，設立“海防捐”，以為北洋水師籌措軍費，但是李中堂“賣官”斂來的七百五十萬兩白花花的銀子，卻祇能為太后修園慶壽，而“在昆明湖的湖水裡打了水漂”；

他曾為祇有三發炮彈的“定遠艦”籌措彈費，以備在即的與日海軍大戰，但是，祇需一個南洋奸商為兩朝帝師、軍機大臣、戶部尚書翁同龢出版了一本字帖，戶部僅存的六十萬兩白銀，便為王爺宦官等大小官僚藉為太后修園慶壽之名，貪污瓜分殆盡；

為了北洋水師的軍費，軍權在手、大權在握的他，曾從英國帶回來“腳癢水”、甚至掏出銀票三千兩，以賄賂當朝太監李蓮英，以動太后之顏，卻徒招閹宦之辱；

為說動太后同意他與洋人創辦合資銀行，以解北洋之急，他，一位年逾七十的大臣，居然為太后調飲咖啡，竭盡鞠躬盡瘁之形，然而，祇為“婦人一念”，竟然前功盡棄……

此後，中日甲武一戰，他的北洋水師終於全軍覆沒，割地賠款更使得大清朝顏面喪盡；他積極和艱難

推行改革開放的巨大成果，他所深懷的富國強兵之願望，頓時化為一片烏有……

李中堂，這個在敵國的眼裡雖然“才高勝夷”、卻“生不逢國”的大清宰相，這個走在王朝末世和專制末路之上，曾深懷“富國強兵”之願，籌劃“和戎變法”之策，著眼於“師夷長技以制夷”之術的改革派大吏，這個曾首造了“開國門、學科技，制長艦、造火器，建設經濟特區、開放通商口岸，採取官辦、商辦、官督商辦，施行外資、民資和施行中外合資……”的大刀闊斧改革家，其下場，就是這樣地功勞喪盡，苦勞寒心，徒能做一個在談判桌前冒死與敵國討價還價的“割地賠款大師”，一個不僅僅被眾口一詞詆罵為“賣國賊”的李二先生，和一個祇能在自己



李鴻章抽下流坯自嘲：你又要去賣國嘍……

的庭園裡，以抽打“下流坯”來自罵“賣國”的羞憤老人……雖然，他那祇能夠為大清朝做一個“裱糊匠和裝潢大師”的改革開放理論，實在將他對大清朝必將敗亡的認知，早已經沉沉地壓迫在他痛苦、並且是無望的心底……

鏡頭之二：

是“大人物”，也是小人——康有為上場之後

幾乎是在展現李鴻章悲劇命運的同時，《走向共和》的編導們，卻又力求深刻地塑造了繼改革開放的實幹家李鴻章之後，呼喊變法最響、變法失敗最速、卻又保皇最烈、反對革命最劇的落第舉人——康有為。

康有為一出場，便言詞尖利，神情倨傲，面對著同樣來京參加科舉考試的未來狀元張謇，他那不可一

世的神采，實在很難在觀眾的心裡留下“崇高”的形象。

康有為再出場，卻是在他落第歸家之後，草堂授徒之時。他的狂狷之態雖然未因科考落第而有絲毫改變，但是，他那痛徹心脾的自白，卻將一位“一心要考進滿清專制體制內去改良大清政治而不得”的傳統型知識份子，表現得準確而又深刻。

因皇帝召見，而使得康有為仕途有成，抱負有望。然而，他在對天長笑、快心快意之時，竟能夠豪情一收，臉色沉重而又神情詭異地對弟子梁啟超告誡說：“必需與孫文劃清界限……”——保皇改良派的忠君心態，勢利之情，陰鷙之心和反對革命之堅決，豈但是盡收觀眾眼底，而且令百年之後的海外知情人“心神黯然難已”……

他終於能夠施展自己要拯救大清朝的抱負了。朝堂之上，面對滿堂昏潰庸碌的朝臣，他敢言殺；變法之際，眼看后黨將成為變法的阻礙，他敢倒后；然而，變法失敗之時，他卻不敢像譚嗣同那樣，“手持歐刀向天笑，功罪留於後人論”，卻是在對“皇上啊，皇上……”的一聲聲做情作態的哀嚎中，溜之不及，逃無蹤影……

但是，康在獨自逃往海外之後、華僑難解真情之時，他又假托自己身藏光緒皇帝的“衣帶秘詔”，既要保大清皇上，又要救大清皇上，更要鼓吹非光緒皇帝不可的大清朝君主立憲，其“為虎作倀，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之清廷為猶甚……”（孫中山語）。電視劇《走向共和》更用它極富洞察力的藝術處理，將康有為一邊能夠“慷慨流涕哭保皇”、一邊卻能夠“轉臉命梁去斂錢”的兩面性格刻畫得入骨三分。而當康有為竟能對那幾個“演戲本為稻粱謀”的演員們說，“你不過是一個戲子，能夠演我這樣的大人物，還不滿足”的話時，面對著“這位大清朝不要、卻偏要大清朝”的保皇派“大人物”，一個驕狂刻薄酸吝之徒，一九八九之後的海外觀眾，自然祇能是“欲笑不能”……特別是在檀香山那同一個戲台上，當這些演員轉而演出了另一齣“贊革命而貶保皇”的大戲之後，孫中山先生對這些戲子的平等、同情和傾囊相贈的感人情形，就更將孫、康這兩個人格修養、政治背景完全不同的近代人物，對比得涇渭分明。難怪國

學大師章太炎曾揮筆斥康是一個“利祿熏心，為一時之富貴，而甘冒萬億不諱言而不辭的市儈……”

《走向共和》的編導們，不獨對孫康二人及其所代表的歷史和政治內涵，表達了他們鮮明的政治傾向性，猶站在歷史的高度之上，用孫中山先生對李中堂說的話，深入地概括了康有為變法的淺薄內容和缺少見地：“康先生想做的事，中堂大人已經做到了，但康先生不想做和不敢做的事情，中堂你也很难做到……”，可謂一針見血。



康有為說服已經遜位的大清朝前攝政王復辟

電視劇還用康有為夜訪分手弟子梁啟超的晦暗畫面，描繪了這個從共和革命前的保皇改良派終於墮落為共和革命後之“保清復辟派”的政治歸宿；更將他身著陳舊的大清官服、俯伏在遜位清廷那冰冷大殿上的醜態，為觀眾留下了一聲不屑的長嘆；證明了所謂“保皇改良”實質上就是“保清改良”之本相。祇不過，他們保皇的目的，是想保住大清的江山不被太后所葬送；是祇希望由大清皇帝自己來實行君主立憲，而不被“共和革命”推翻——這，才是康黨保皇和形形色色保皇派的根本追求。

鏡頭之三：

一代女政治家，一個冥頑難化的末代君主——戲說慈禧

隨著歷史人物的陸續登場和劇情的深入展開，大清王朝的改革開放，終於因為菜市口的刀光血影，大連灣和膠州灣相繼為德國及日本所佔，特別是西太后挾光緒西逃八國聯軍的淒慘命運，還有就是一百七十四位大清官員因洋人逼迫而不得被誅殺的曠古之恥，方使得因李鴻章的“賣國談判”才揀回了一條老

命的慈禧太后，在回鑾之後，乃決心：不用康梁，卻要推行康梁的新政；大力改革，定要超過康梁的變法。從而將“變法以保大清江山”的第一階段專制改良，推向了又一個、也是最後一個高潮期。

在這個改革開放的高潮期內，西太后在終於認定“祖宗之法可以變、但三綱五常決不可變”的前提下，推行了一系列的新政。在《走向共和》那一個又一個動人心魄的歷史鏡頭之下，她興學堂，傳西學，“不廢洋人愛古人”，確實為後來的中國留下了不應磨滅的歷史成就，卻因篤信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又將她合理的變法，限死在她那“君為臣綱”的“幾個堅持”之下，從而杜絕了制度性變革的歷史可能。

她開言路，允辦報，開啓了中國民間新聞出版事業發生發展的先河期，但是，祇因她又立下了“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的又一個“堅持”，近代中國民間報業的命運，蓋因她“一個人高興，一國人才才能高興”，而命途多舛。

她試法制，辦警局，雖有心改革，卻無心變制。所以，新政中的大清江山，仍然是愛新覺羅的一姓江山；所以，她的法制，便仍然是滿清貴族一家一姓的法制。所以，它的警察局，雖敢待小民如虎狼，卻祇能望王公大臣、貝勒爺們而興嘆。

她練新軍、立軍部，雖然有強國之心、分權之能，祇因他寵信首鼠兩端的袁世凱，竟為袁練就一支近代化的私家之軍，不獨促成了大清江山之迅速覆亡，特別是製造了辛亥之後的長期復辟混戰。

特別是她廢科舉，改官制，雖為已經落後的中國科舉考試制度劃下了歷史的句號，卻又為集中皇權、強化專制、賣官鬻爵和官場腐敗，實質是盡情地玩弄改革，打開了花樣百出的門路，提供了更加廣闊的舞台，從而拉開了滿清王朝統治和大清改革開放的最後一幕：新政改革大家袁世凱在法制改革的試點——天津那個嶄新的“法院”裡，為未來的攝政王所表演的那一套“新法制大堂審案”，實在是將慶王父子和袁世凱一伙丑惡以極的貪污賣官罪行，進行了最巧妙但卻是最時髦的掩護……自稱甘為大清皇太后一條“惡狗”、敢於直言相諫的忠臣岑春宣，終於滿面淚水地冒死對西太后說出了“新政的黑暗和腐敗的加劇”，

從而為徹底失敗的王朝新政，做了一個最為誠實的交待……



岑春宣向西太后說立憲是假的、新政更腐敗

歷史劇的鏡頭，就是這樣地將西太后的新政，錯落有致、而又準確深刻地搖動在觀眾的眼裡和心裡，更將老太后“拍龍案而大怒，迸老淚而哀號”的無可奈何情景，絲絲入扣地表現在風雨如晦的“大清朝”朝廷之上：“段芝貴賣妓買官，袁世凱通賄弄權，載振攜妓為妾，奕劻收賄賣官……上下左右，宮裡宮外，串通一氣，枉法徇私，折騰得滿世界都知道。讓洋人看我們大清的立憲，是個什麼東西！”

然而，這段話固然表現了她椎心、甚至是絕望的痛苦，但是，後來，她那一句“現在祇剩下我們自家人了，可以隨便說說話了”的親情，自然還是讓她的皇子龍孫們有恃而無恐；而她那一句“大清的江山是我的，也是你們的”話，就更祇能使她在清代的江山社稷和清的天皇貴胄之間，難以抉擇了……因為，沒有了她的那些不爭氣的八旗子弟，江山還是清代的嗎？然而，徒有著這一群不爭氣的“八旗子弟”，清代的江山又焉能“千秋萬代永不變色”？

鏡頭之四：

“立憲全是假的，抓權才是真的”——王朝如此告白

如果說西太后的新政製造了大清朝改革開放的最後高潮期，那末，為救大清，為“籠絡人心”，更為保住愛新覺羅的大清江山，與太后新政互為推動、相互交織的，便是大清朝的“高喊立憲和預備立憲”，從而敷演出了一場“假立憲和真保權”的連台大戲，

雖然“一唱三嘆，光彩照人”，卻是“假戲真做，令人扼腕”。

在《走向共和》的歷史鏡頭之下，其第一台大戲，就是在大清朝、保皇黨、直至部份民間知識份子高喊君主立憲的激情聲中，清政府終於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然而，五大臣遊盡歐美和日本歸來時，向老太后報告的立憲好處，竟然是“皇權永固、內亂可彌、外患漸輕”；五大臣和太后在內廷與自己一家人討論立憲的結果，便是“祇要君主立憲，絕不要共和立憲”；而當老太后問及袁世凱，究竟是要日本的實君立憲好、還是要英國的虛君立憲好時，袁世凱則以他獨到的“爹媽君憲論”，雖然哄得老太后對做有實權的“君憲之爹”頗有心儀之想，但卻對光緒猶在而“爹媽難定”，心懷憂戚，從而為大清朝的君主立憲留下了“預備立憲”的“假戲”。

其第二台大戲，就是預備立憲這一齣假戲的熱鬧登場。蓋因“一人高興，才能一國高興”，故而當皇帝猶在、太后專權之時，為太后之終身權力計，立憲祇能預備，不能真行；祇因為民間有所謂“七十三、八十四，今年不走明年去”之說，所以，已經七十三歲高齡的老太后，才在袁世凱知情懂意的諫言之間，為立憲定下了十二年的預備期。因為，待到老太后歸天之時，“她老人家也就管不了身後的滔天洪水了”（劇中人袁世凱語）。



徐錫麟在酷刑之下高喊：凡搞假立憲，必來真革命！

其第三台大戲，則是日俄戰爭的結果，乃是蕞爾之邦的立憲國日本，打敗了老大的專制國沙俄。於是，朝野之間要求立憲變制的呼聲日益洶洶。當此之時，為“籠絡人心”計，大清朝乃不得不縮短預備立憲的年限，從十二年到九年，再從九年縮短為六年；

為“保大清皇權”計，則面對堅決要求從速立憲的洶湧輿論，終於由滿清貴族“五虎”之一的安徽巡撫恩銘說出了“立憲是假，抓權是真”的肺腑之言，雖然為自己招致了殺身之禍，卻在太后死前死後都不能改變“假立憲、真保權、以苟延江山一統”的專制欲望，甚至假預備立憲之名，設立了兩度“皇族內閣”，雖要“永固皇權”，卻終於“葬送皇權”，大清朝旨在“萬代千秋永不變色”的江山，蓋因武昌城頭的一聲槍響，而傾刻覆亡了……

走出鏡頭、回到當今：

保共改良之必然，與“保趙、保胡”改良之種種……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一旦我們“走出鏡頭，回到當今”，就會發現，歷史竟是如此驚人地相似，當今就是歷史的可怕再現。甚至，要想瞭解當今，祇需一賞該劇。這才恰恰是《走向共和》播出後，“大共朝”朝野震撼不已、“馬列國”人人心領神會，舉國上下鞭撻笑罵之聲不絕於耳之所由來。

然而，要想真正瞭解歷史劇《走向共和》的歷史和現實意義，要想真正比較“大清朝”的改革開放和“大共朝”的開放改革，為何如此驚人的相似，和它們雖然是“蕭條異代”、卻又並非“如出一轍”的緣由，就必需瞭解中共北京政權的根本性質和政治特徵，否則，我們不但難以理解這番歷史的“輪迴”慘劇，甚至不能理解“大共朝”較之大清朝更無可能改良成功的命運。

那末，中共北京政權的根本性質和特徵是什麼？答曰：**第一是洋教政權**，因為它實行的是馬列洋教統治，建立了一家“教政合一”的政權；**第二是專制政權**，因為它已經在中國大陸實行了長達五十四年的殘酷專制統治；**第三是一個“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全面復辟了專制制度的復辟政權**，它在中國人民“走向共和”的艱難反復歷程中，實現了專制統治和專制制度的全面復辟和超級復辟。

至於它的特徵，則全世界凡是有專制歷史、並且出現過專制復辟的國家、民族和地區，所共有的四大特征，即：**強行思想統治、強化專制權力、歸復等級制度、厲行專制鎮壓**——“中共北京洋教專制復辟政權”委實是一條不缺，惟有過之而無不及。

祇有在我們明確了中共政權的上述性質和特征之後，我們方能夠明白，為何“大共朝”和大清朝在推行專制改良的思想和手段上乃是驚人的相似？為何“大共朝”在專制改良的深度和廣度上祇能遠不及大清朝？為何今日的改革開放之難、甚至是今日中國要“走向共和”，竟然較之昨日大清朝要“走向共和”更難、甚至是難於上青天？

因為，當今中共改革開放的事實是：

大清朝做過的，他們倒是部份地做過了。特別是李中堂的“外需和戎、內需變法”，也就是既要“以夷制夷、拉夷打夷”，更要“開國門、學科技，制長艦、造火器，建設經濟特區、開放通商口岸，採取官辦、商辦、官督商辦，吸引外資、民資和施行中外合資……”——無非如此而已。

大清朝敢做的，他們卻不敢做。尤其是慈禧太后敢於開放言論，允許民間辦報辦刊以宣傳西方的精神文明，直到大清王朝敢於廢除滿族貴族特權等等，中共豈止是不敢為之，甚至還要在世界已經成為“地球村”的今天，以所謂“反對西方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為名，恪守那個恰恰是來自西方的反動思想——馬克思主義，固守所謂的“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放手大幹“掛羊頭、賣狗肉”的形形色色勾當，直至以擴大中共馬列黨族貴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等一切特權，變“理應是讓權、分利於民”的改革，為“奪民之權、劫民之利”的瘋狂腐敗，來為它的專制改良“保航開道”……

大清朝不敢做的，中共倒是敢做得很。因為西太后祇敢在菜市口砍掉六顆敢言敢行變法、特別是敢於“倒后”者的頭顱，並且是在政治改革一百日之後；鄧小平則敢在整個北京城屠城，更敢在全中國傾巢鎮壓所謂參加動亂和暴亂的人民，並且是在政治改革根本就沒有發動之前。至於他們對一切和平異議者與反對者的驅逐和鎮壓，則為大清朝廷不敢幹也不會想……

大清朝和“大共朝”乃有著一個共同的“專制改良綱領”，那就是：大清朝要的是“保清改良”，“大共朝”要的是“保共改良”。稍有異趣的是：大清朝的海外“保”派，為保清，而誓死“保皇反后”；大共朝的海外“保”派，則先要“保趙反鄧”、後要“保江反李”，繼而要“反江保朱”，而

今，卻又在嚷嚷著要“保胡溫而反江澤民”了……就“從一而終”的中國傳統道德而言，顯見得是“今人不及古人忠”也……。

自然，如果要當真比較大清朝的“保清改良”派和“大共朝”的“保共改良”派，比較這兩代“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隔代“保清、保共”黨人，他們雖然“都是人家不要的，卻偏偏是要人家的”被遺棄者和被放逐者；但當代的保共黨人，在“保”的理論建設上，還是要比前代高明得多，也複雜得多。因為：

“共產黨是打不倒的，共產黨是無人能夠取代的，共產黨裡面有的是健康力量”——是他們的思想前提和感情基礎。

“告別革命卻不說要告別那一家的革命，否定革命卻不否定自己曾跟著共產黨革了別人一輩子的命，反對革命單單祇要反對孫中山倡導的共和革命和推翻了滿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則表達了他們的愛恨情仇，與共產黨一樣至為明確。

“祇允許說‘結束’一黨專政、絕不允許說‘推翻’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祇敢低吼反對專制、卻絕不允許別人高喊反對共產黨專制。

“在共產黨仍然迷信暴力、並正在用暴力鎮壓人民之時，卻念經一樣地天天嘶喊著‘和平理性非暴力’，以公開為共產黨拉‘偏架’。

“敢於無情地批判與否定中華民族及其民族文化，卻絕不批判與否定馬列黨族和馬列文化；直到為了追尋真正馬列主義天堂和真正的社會主義道路，甚至要未雨綢繆地為共產黨、或勸共產黨改名更姓，以為共產黨‘延年益壽’，以寄望中共自己改良成功，以期待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在中國‘千秋萬代’”……就更是將當今‘保共改良’的思想和行為表現得淋漓盡致……

然而，大清朝祇敢在專制改良中腐敗，“大共朝”卻敢在專制改良中腐爛；大清朝雖然運交王朝統治的末代和專制制度的末路，“大共朝”卻命逢復辟王朝的末世和國際共產專制復辟勢力的全面崩潰……；大清朝曾遭遇列強的欺侮和凌辱，“大共朝”則欣逢列強要和它做生意、搶市場……但，西太后說過“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鄧小平也說過“中國是塊肥肉，你不來自有人來”——他們雖

然一個儒雅，一個惡俗，卻都道出了他們要賴“列強以苟延性命”的秘方。祇是前代的列強用堅船利炮驚醒了清國人民的愛國之心，當代的列強則將人權民主之普世理念，挾裹在進口商品的集裝箱內，引發著中國人民的民主自由之想。更那堪當今的越洋飛機又要比當年的越洋海船要快得太多。因此，由“時移代遷”所帶來的國際環境的改善，國內民智的復甦，終究要使得保共改良和保清改良一樣，落得個“流水落花春去也”的共同命運……

歷史劇《走向共和》非但不著當代世事之一字，非但意味深長地以“張勳復辟了滿清”為“終”，將故事嘎然“終場”在“蘇共建立中共”之前，卻通過歷史的畫面和藝術的形像，親快仇痛地引發了全中國、甚至是全世界華人對他的唏噓感嘆，或者是滿腹驚惶，直至將前後兩代“保清改良”和“保共改良”之已死和必死的黯淡歷史、傷心前景、及其燭影斧聲的歷史“謎底”，全然地揭開在我們國人的心頭。它所激發的歷史創傷和現實創痛，實令人噓呵難止，心神難寧。這究竟是藝術的魅力，還是思想的力量，抑或僅僅是它足以撼動人心的悲劇美，才震撼了中華兒女之心，驚斷了馬列子孫之夢呢？

下篇：

《走向共和》藝術地再現了中國共和革命的輝煌歷史、反復歷程及光明前途

可以說，歷史劇《走向共和》的觀眾，祇需憑心而觀，誰都能看得出：正是大清朝的專制改良，才為她帶來了這樣四個惡果：一是專制強化，二是腐敗加劇，三是人心轉向革命，四是王朝危如壘卵。而對這家末世王朝和那個末路的君主專制制度而言，其致命的一擊，卻是孫中山所倡導的“共和革命”。歷史劇《走向共和》，正是嚴格地以真實的歷史為藍本，實事求是地將專制改良之不能救大清，唯有孫中山的革命才能從根本上推動中國“走向共和”的真理，形像地、藝術地、活靈活現地再現於我們這個“保共改良”的時代。而《走向共和》對中國共和革命勝利發端的熒幕再現，則主要是以孫中山先生倡導和發動共和革命的艱難歷程、初造成功和反對專制復辟之三大

歷程為軌跡，從而將一幅幅歷史的畫面交融在當代的人心之中，展現著共和的魅力，激發著革命的思想，凝聚著反復辟的意志，催動著全中國人民的迅速覺醒和徹底覺醒……這才是她深刻難掩的美學價值、即認識意義。

鏡頭之一：

倘若固守專制，那就祇有推翻它

《走向共和》的編導們，因深知要“走向共和”，就必需先有共和的思想；要發動共和革命，就必需先有共和革命的理論；要建立一個真正共和的新中國，就必需先有革命建國的藍圖。而孫中山先生的可貴之處，就是他擁有著“融東西方之進步文明為一體的共和革命理論和民主建國綱領”。所以，他倡導和發動的革命，才能夠因共和思想的潤澤人心，而築起人心的基礎。這不僅在“保清改良乃為天下共擁、反清革命卻遭天下共棄”的艱難發軔之初，是為必需；而且，在辛亥之後中國人民屢遭專制復辟之苦的混亂歲月之中，尤為重要……

當落第舉人康有為，正在對他的門生們高聲大叫著“無論怎樣忍羞含辱也要考進那個專制體制裡面去”的時候，年輕的孫中山，他的話，卻如沖出山林的一泓清泉，震響在這個專為培養未來保皇改良派的“萬木草堂”裡：“若是大清皇帝識大體、知潮流，和平遜位，贊成共和，那是最好的。倘若固守專制，那就祇有推翻它，我們創造一個共和國……”他還這樣地表達了自己的嚮往：“无君之共和，才是最純潔的憲政，也是我煌煌华夏，最終要確立的國體……”

他的話，雖然明確而且徹底，但對於那些一心要寄命於大清朝的知識分子來說，卻是“荒唐而且可怕”。那末，什麼是共和呢？孫中山說得好：“在現代的共和國家里，‘共’，就是說國家權力是公有的，國家的治理，是我們所有國民共同的事業。‘和’，就是合羣力而治國，就是民主啊……”

在美國舊金山那一處被遺棄的廠房裡，就是在那個連屋頂和牆壁都空空如也的廢墟之上，劇中人孫中山又是這樣明白曉暢地向當地華僑講述了他的三民主義理論：“民族主義就是民有主義，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二人所可獨佔；民權主義就是民治主義，

天下者人人皆有治之之責，亦應負治之之責；民主主義就是民享主義，天下既為人人所共有，那天下之利權，亦自當人人所共享……”——這樣的主義，它會“過時”嗎？這樣的主義，竟會像極個別號稱是“民運人士”者所糟蹋的那樣——“就是專制主義”嗎？應該說，孫中山先生對共和革命和民主建國之最為突出的貢獻，就是他創立了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學說，並且，必將惠澤百代而難衰……

而當辛亥革命首造成功之後，不論是在南京那個樸素的臨時大總統府裡，還是後來在北京由袁世凱專為歡迎他而設的豪華國宴上，抑或是在其後一個又一個反對專制復辟的歷史戰場上，“他”，曾面對著“走向共和”的偉大歷史鏡頭，不止一次地諄諄告誡說：“共和革命分三期而行：軍政期、訓政期、憲政期……我們共和國所言的訓政，和帝制時代乃至專政時代的訓政是截然不同一樣的。須知共和國的皇帝是國民；以五千年被壓迫的奴隸，一旦站立起來讓他們做皇帝，那是定然做不好的。比如說，未來的內閣總理也罷，未來的大總統也罷，他們都是代表國民來行政的，他們就能一下子做好這個代表嗎？我看不一定。所以也必須訓政……”孫中山的這一革命歷程思想，不僅向我們告誡了共和革命所必有的艱難歷程；告訴了我們“訓政絕不是專政、更不是專制復辟”的正確道理；而且告訴了我們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國民黨和蔣介石推行訓政的歷史正確性和現實必要性，和正因訓政不足，訓政未果，才造成了赤禍蔓延中華的曠古之難；特別是告訴了我們，在歷經了“馬列黨族”長達半個世紀的專制復辟統治之後，在中華的好文明和世界的好文化已經被中國的馬列子孫破壞了和隔絕了五十餘年之後，意在完成共和的“訓政”，對於“再造共和革命、推翻專制復辟、重續共和民國、實行三民主義”，該是具有著何等的重要意義……

當《走向共和》的鏡頭對準著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的國會議員大選之時，足以令人莞爾一笑、甚至使得百年後某些“人士”要尷尬一笑的是，中國國民黨在江蘇常州鄉下的那一場競選活動和競選演說，實在是將百年“國情不宜民主論”，斥之於不堪一擊之間——且看劇中的這一段對白：

孫中山：蕭鄉長，……如果有人告訴你，因為你的孩子不識字，就不需要上學堂，你怎麼說？

蕭鄉長：胡說八道，正因為不識字，才要上學堂。

孫中山：“對呀，所以有人說，老百姓的素質低，不可實行民權，這就跟孩子不識字就不用上學堂一樣荒唐可笑。”……



蕭鄉長和村民聽孫中山、宋教仁談民主、說競選

還需要作進一步的“解釋”嗎？還需要將當今那些保共改良派們的胡說八道，再拎出來辯論一番嗎？所有看不起孫中山先生、蓄意貶低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理論、對百年前中國共和之成就一百個看不上眼的形形色色“人士”們，難道還要沿著百年前無知的國情論，為確保大共江山，而繼續地來抵制、謾罵和反對當代中國共和革命的再生和再起嗎？來繼續地阻擋中國大陸人民對於民主共和的痛苦追求和萬難追求嗎？

正因為《走向共和》的編導們，在中國大陸民間已經歷時二十年的歷史反思成就中，汲取了智慧，他們才會在孫中山領導的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之後，在劇中用深情凝重的旁白說道：“孫中山領導的第一次廣州起義雖然流產了，但卻從此開始了走向共和的第一步……”——歷史的評價，該是何等的準確和明確。

也正是因為《走向共和》的編導們衷心地贊成孫中山倡導的共和革命，他們才會一次又一次地用劇中的旁白，根據孫中山先生的原話，將近代中國共和革命“從天下共棄而終於走向天下共擁”的必然歷程，解說得明白曉暢、鏗鏘有力；更將一個不畏生死的共和革命領袖在戰場上的英勇行為，表現得極其地動人心魄……

孫中山先生不僅是一個共和革命的思想家和理論家，而且是一個共和革命的實踐家和參加者。歷史劇《走向共和》實為他曾首先倡導和親身參加中國的共和革命，留下了如許精彩動人的藝術畫面。這對激發當代中國共和革命的再起，推動中國人民實現“完成共和”的偉大歷史使命，該具有著怎樣的號召力量和榜樣力量！

鏡頭之二：

革命保皇決分兩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

毋庸諱言的是，歷史劇《走向共和》，說到底，就是一部“歌頌共和革命、反對保清改良”的長卷史詩。而“革命不是要來的，乃是被逼上梁山”的歷史真理，則為她表現得準確而又深刻。然而，革命為誰所逼？答曰：一是“假改革真保權”的大清朝，二是“改良為保大清”的形形色色改良派。其中，祇是因為康有為的保皇改良，聲勢最先，勢頭最劇，名氣最響，欺騙最廣，其“助紂為虐、反對革命，較之滿清王朝為猶勝”，所以，倘若不堅決反對之，則革命便無由可起。所以，因大清朝之一意的“真保權假改革”所製造的瘋狂政經腐敗，雖為發動“共和革命”的根由所在；但，祇因深黯“革命黨何以生？生於政治腐敗”的康、梁保皇黨，仍然要拼命地反對革命，甚至成了“梁山下”的攔路之虎，所以，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之必須和堅決要反對保皇黨，也就理所當然。

歷史劇《走向共和》，祇因抓住了這樣一個要害，才將孫中山為發動共和革命而要堅決反對保皇改良的思想和行為，和那些終以淋漓的鮮血來肯定了孫先生“先見之明”的原改良派人士們要堅決“棄改良而從革命”的重大轉變，聲彩並重、凌厲入心地表現在歷史的畫面之上。

“單單是引進鐵路、火車、電報、電話等物質文明的措施，祇會給國內的貪污腐敗、敲詐勒索打開更加廣闊的門路……。”歷史劇雖然沒有將孫中山先生對大清朝改革開放“成果”的早期判斷，表現在劇中；但對孫中山在檀香山不聽其兄之勸，“非要與保皇黨過不去”的行為，賦予了濃墨重彩——他，孫文，和顏悅色地就嘲笑了那個祇花了兩千美元就向康

有為買到了大清朝二品頂戴的“改良之母”，而非“革命之母”；針鋒相對地在同一家戲院裡演出了“反保皇、擁革命”的大戲，更以自己對“戲子”們的無私之德和同胞之情，對比了康有為的私欲和狂妄；聲色俱厲地批評了宣傳共和革命的報紙——《檀香山新報》的主持人們，將共和革命的輿論陣地輕而易舉地就為保皇派所佔領，並口若懸河地當場口述了那一篇批判保皇派“自欺欺人”的著名檄文——他說：“天下事，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夫革命與保皇，理不相容，勢不兩立，而康有為以一人而持二說，首鼠兩端。其革命屬實，則保皇之必偽。其保皇之屬實，革命之說必偽矣。彼輩保皇為真保皇，所言革命為假革命。革命保皇決分兩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東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倒滿而興漢，保皇者志在扶滿而成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馳，互相衝突，互相水火，非一日矣……”

特別是當日本留學生、立憲改良人士徐錫麟，因乃師梁啟超的鼓勵，而要回國效命於大清朝“專制體制內”的立憲改良“大業”時，孫中山先生則苦心相勸，明確指出了清之立憲乃是欺騙國人而已，猶如當時的法國報紙所言：“清政府之立憲，實乃清太后愚民之術……”



孫中山告訴徐錫麟大清立憲是一個騙局，徐不聽……

如果說，孫中山的規勸對一心要回到大清專制體制內去效命的徐錫麟，並無咫尺之功，但回國之後的徐錫麟，卻因目睹政治腐敗，改革盡偽，特別是在他的恩師、大清朝五虎之一的安徽巡撫恩銘，親自對他講出了“立憲全是假的、抓權才是真的”這樣一個“改革真相”之後，徐乃翻然一變，從一個真心實意

的大清立憲改良派，變成了一個決心以命相效的共和革命烈士……

正是在這個“棄改良而從革命”的關鍵發展上，歷史劇《走向共和》，乃用著相當的篇幅和濃郁的悲劇氣氛，表現了和烘托了徐錫麟這個原改良人士刺殺恩銘的重場大戲，更用著那一番長鏡頭，將徐在大堂慘遭酷刑受審時的悲壯之情和英勇氣概，刻畫得令人肝膽俱碎——滿身鮮血的徐錫麟，他那“我佩服孫先生有先見之明”的痛心呼喊，他那“凡搞假立憲，必來真革命”的絕命呼喚，豈止是震撼了刑堂，更震撼了欺盡人心的大清朝廷，猶將他流下的無量鮮血，塗畫出了那一番革命必將取代改良的壯麗前景……

史載，殘酷的滿清政權不僅處死了先為保清改良家、後為共和革命家的徐錫麟，而且將他破腹挖心，甚至吃掉了他的心肝兩臟……。猶如當時《河南》雜誌所嘆：“嗟夫，預備立憲者，尚不如直其名曰預備殺人流血之直接了當也……”

史載，另一位原立憲改良派、青年壯士吳樾，與徐一樣，不僅棄改良而從革命，而且因執行刺殺清出國考察五大臣的使命，而英勇獻身——在歷史劇《走向共和》的屏幕上，那一節節豪華車廂的轟然被炸，和五大臣被炸傷後的一群狼狽之像，豈但是大快人心，而且同樣是宣告了：唯有發動共和革命，才是走向共和的人間真理……

《走向共和》傳播海外之後，雖然立即就有保共改良人士為密切配合中共的禁播禁售，而攥文老調重彈地指斥“孫中山太莽撞，破壞了大清朝和平改良的可能和前景”，然而，歷史劇《走向共和》卻用徐錫麟、吳樾等原改良人士以鮮血記錄著的歷史，還有就是恩銘和岑春宣們或得意、或痛苦的“自白”，將他們對“大共朝”懷著種種私欲的“忠心”，消音在當代中國共和革命必將再起再勝的“風聲鶴唳”之中……

鏡頭之三：

要警惕“新瓶裝舊酒”。因為一不留神，它就……

中國共和革命的艱難，不僅在於她初造成功之前，有著兩個明確的死敵，一為滿清王朝的殘酷鎮壓，二為保清改良派的助清為虐；而且在她初造成功

之後，還必然要遭遇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瘋狂反撲、甚至是專制復辟的成功。睿智的共和革命家孫中山先生，非但“慧眼識大勢”，而且能夠在專制復辟一旦來臨之際，就能明確、徹底、乾脆、果決地立即豎立起“再造共和革命、反對專制復辟”的大旗，豈但是要迎頭痛擊旨在復辟專制的種種舊勢力，而且開啓了中國人民反對形形色色專制復辟的歷史先河。以至直到今天，當我們已經深蹈專制復辟幾逾半個世紀之時，再來重溫孫中山先生在辛亥之後的復辟歷程，其意義，豈是“三言兩語”便能道盡的……

在南京的那個小咖啡館里，真正做到了“天下為公”、並且就要讓出臨時大總統職位的孫中山先生，當他和自己的戰友黃興、宋教仁、議員羅文、女記者田沫談心時，他就已經明確地說出了這樣的世紀性預言：“……如今專制方死，法制方生，一不留神，舊制度，它就很容易復辟……”因此，他才希望女記者能寫一篇要警惕“新瓶裝舊酒”的文章……其後，他更在南京國民參議會開會之間，向他的戰友們激越地談到了警惕和反對專制復辟的三大法寶……



孫中山告訴隆裕歷史上從來沒有這樣善待前朝的革命

在上海孫中山先生的住所，在那個飄滿輓聯、滿地皆是宋教仁遺物和遺著的房間裡面，因宋教仁被袁世凱暗殺而猛醒的孫中山先生，乃在痛悔交加之際，力斥黃興等人的糊塗，決心發動二次革命，要像當年推翻滿清王朝那樣，反擊袁世凱的復辟。彼時，他那滿面的痛惜淚水，近乎歇斯底里的痛苦形狀，特別是當黃興告訴他，身為國民黨員的雲南都督蔡鍔將軍因要“求穩定而決定暫緩起兵反袁”時，他那一聲“穩到袁世凱稱帝——”的痛苦嘶叫，豈但是對袁氏必然稱帝所發出一聲霹靂般的預驚，而且，也將編導演

員們的一把“辛酸之淚”，潑灑在當今那個必須實行“穩定壓倒一切”的可憐國土之上，從而使國人發出一聲聲會心、痛苦、卻又是掙扎般的嘆息……

此後，歷史劇的電視畫面上，終於出現了袁世凱復辟帝制的“輝煌景像”，出現了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並遭遇失敗的淒涼畫面，出現了孫、黃因被袁世凱通緝而再度逃亡海外、並遭遇袁世凱派人暗殺的驚險鏡頭……然而，偉大的共和革命家孫中山先生，非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且在反對專制復辟的戰場上，越戰越勇——中華民國的“護國戰爭”，為他所發動；中國人民的“護法運動”為他所領導……《走向共和》的編劇、導演和演員們，就是如此傾情地將孫中山先生最後的人生歷程，藝術地和動人地勾勒在中國人民反對形形色色專制復辟的戰場之上……

鏡頭之四：

他有“革命之母”，更有一個哥哥叫“革命牛”

孫中山先生雖有一句名言，謂“華僑是革命之母”，但是，在歷史劇《走向共和》的劇情發展中，卻一再地和動情地表現了孫文的胞兄孫眉對弟弟從事革命的傾心支持。

在那廣闊而又美麗的牧場上，因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而逃往南洋的孫中山，雖然滿臉鬍茬，衣冠不整，但他那一聲歡快的、卻又是深情無限的叫喊——“哥——”，確乎已經將觀眾的心喊出了一片神往之情……

在日本中山學堂裡面，當孫中山正在對華僑青年講授我們中國人應當追求自由、民主與平等的共和革命道理時，他的哥哥——孫眉，卻拎著一隻不小的皮箱，從檀香山趕到日本，悄悄地站到了教室的窗前一——皮箱裡裝滿的，竟是他未到開春季節就賣掉兩千頭小牛犢所換來的錢，以用作弟弟發動共和革命的經費……

在沒有了牛、連兩千九百畝的牧場也為弟弟的革命變賣一光之後，還是在檀香山他哥哥的家裡，“色厲內親”的哥哥，最終還是將藏在褲腰帶裡的那一千美元掏出來交給了弟弟，這可是他最後一點做生意的本錢了。然而，《檀香山新報》——一份就要痛斥保皇改良的著名華文報紙，就這樣地誕生在海外……

孫中山辜負了他的哥哥嗎？“辜負”了，因為，辛亥革命成功，當有人從廣東拍來電報，要他任命其兄為廣東省長時，孫中山親自拍電“否決”了……

然而，孫中山當真辜負了他的哥哥嗎？當然沒有！因為，哥哥所支持的共和革命，初造成功了！因為，他的弟弟，在革命的十六番寒暑間——坐輪船，便將朋友為他買好的上等艙票換成了最下等的；住旅館，則站在華僑已經為他租定的二十美元一天的豪華旅館櫃台前，要求退錢，轉而去住一美元一天的小旅社；他的哥哥將大把大把的錢給了他，可是他常常都是一文不名，甚至連喝一杯咖啡都要賒賬；特別是當他與宋家的慶齡終於結成連理之時，他祇能從自己當年送給那個小慶齡的鋼筆帽上，褪下那一個小小的金屬環，來作為他贈送給新婚妻子的戒指……。但是，當華僑劇團演出結束後，他不僅將所有捐款都付給了演出了革命戲劇的“革命同志”——他是這樣地稱呼他們，而且祇因捐款稀少，自己又身無分文，而當場取下腕上的手表，將它也送給了演員們……歷史劇《走向共和》就是這樣地根據歷史的記載，將我們前一代共和革命領袖的志氣和操守，深情地、並且是用心地展現在當代的觀眾面前；更將共和革命領袖與共產革命領袖的“深溝巨壑”，甚至是與前代保皇改良黨人、以及當代保共黨人的巨大差異，不著痕跡地對比在“劇情和畫面”之間，令人充滿景仰，亦令人“痛定思痛”……



孫中山的哥哥親自將賣牛的錢送給在日本的弟弟

鏡頭之五：

他終身“倡革命而講法制，搞政治卻不搞陰謀”

歷史劇《走向共和》對孫中山及其共和革命的刻畫與表現，非但正確，而且深刻；非但藝術，而且動人。原因何在？就是因為歷史劇有著睥睨山河般的美學氣概，因而，她才能將過往的歷史和當代的現實，哪怕是海外的現狀，都能夠鑄入在多彩的畫面之間和準確的焦距之內，從而在祇表現歷史、不表現現實的內容框架之下，將眾多因現實而製造的“歷史問題”，構入鏡頭之中，去澄清真相，去還原歷史，一去當代保共改良派們對歷史的侮辱，特別是他們對前代共和革命領袖孫中山的種種誣蔑，從而淨化了歷史的烽煙，清掃了現實的征程……

因為，一九八九之後，當國人尚在“痛定思痛”，當華僑還在“莫衷一是”，當早已覺悟者和正在覺醒者，還來不及對那個敢於用人民鮮血來洗刷自己罪惡的洋教專制統治者喊一聲“革命”時，一批又一批否定辛亥革命、誣蔑孫中山的“檄文”，不僅在國內，特別是在海外紛紛出籠了。雖然這些“檄文”，大多出自當代保共改良派的手筆，其水平、其氣派，無法與前代的康、梁相比，但他們在製造海外華僑的思想混亂上，在劫殺國內民眾的革命志向上，卻端的是有一番“貢獻”……

可以想像的是，歷史劇《走向共和》，就是因為對他們在海內海外的這一番表現和“貢獻”，深所瞭解，所以，才將他們在海內外對孫中山先生的種種誣蔑，逐一地進行了形像地、也就是藝術的否定。這既是藝術的獨特功能所在，又是毫無輿論自由的中國藝術家們被“逼上梁山”的又一個成果。由是，歷史劇《走向共和》乃針對著一九八九之後海內外保共改良志士們誣蔑孫中山先生的幾件大事，諸如“辛亥革命是無理性的暴力革命”、“孫中山勾結日本賣國”、“孫中山私吞革命經費”、“孫宋婚姻是不端行為”、“孫中山號召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是違反法制”、特別是“他要中華革命黨黨員按指模、效忠他個人就是專制主義”等等，俱根據歷史的事實，一一地將它們再現和辨識在電視畫面之上，從而將是人不是神的孫中山先生，及其親切、動人的偉大人格力量，高度藝術地再現在當代華人的眼前……

在南京的咖啡館裡，著名記者田沫，當著孫中山先生的面，稱辛亥革命“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驚人革命”；而在北京遜位王朝那冰冷而又淒涼的大殿裡，

孫中山面對著前清隆裕太后對他的感激，告訴她說：

“共和國能夠順利建成，清王朝能夠全身而退，這在世界歷史上都是沒有先例的……在世界歷史上，從專制到君憲也罷，從專制到共和也罷，國變之後，還能如此尊重禮遇前退位者，唯我中華民國也！”十五年來已經否定夠了辛亥革命的當代保共改良派們，祇要你們因此而想起一九四九年之後，在那個所謂的共和國的屠刀之下，由你們所衷情的共產革命和洋教政權，該已經壘起了怎樣的“尸骨之山”，你們還有什麼臉面來否定百年前的那一場偉大的和“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驚人革命”呢？

孫中山被日本驅逐的鏡頭，令人悵罔……祇因為日本要與正在高喊假立憲的大清國“維持邦交”——“勾結日本”的謠言遂不攻自破。

對孫中山為何要接受日本賠禮式的捐款，一群革命黨人似乎“義憤填膺”，但黃興卻更加激動地告知他的黨人，“孫先生一家對革命的捐贈何止千萬，要說他貪污革命經費，我寧死也不能相信……”黃興似乎在告誡他不肖的後人：“對孫先生，千萬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孫中山面對著那個正在為他洗衣服的年輕女孩子，竟然不知是誰。然而，這個後來做了他政治秘書的女孩子，在孫先生說他祇是自己的政治秘書、而不是生活秘書的時候，卻火辣、羞澀甚至嬌嗔地對先生說道，“我願意……”。後來，祇因孫先生身處紅袖愛慕之下卻悻然不解那一個“情”字，才鬧得年輕的宋慶齡在眾目睽睽之下，負氣轉身而去，卻到底還是沒有忍住那早已在湧溢著的滿心淚水了……因革命而生愛情，因愛情而助革命，又豈止是當今那些“假作正經正也假”的保共黨人所能體會、理解於萬一的！

中華革命黨的入黨宣誓，顯然是《走向共和》的編創者們所蓄意安排的一場重頭戲。自謂腦袋祇有“一根筋”的革命領袖黃興，不僅對入黨要按指模、要宣誓忠於領袖強烈不滿，而且義氣非常，幾乎大打出手……然而，含著眼淚的孫中山卻在說理和辯解中堅持不讓半步……而今，近一百年過去了，反思當年，從民主理念和革命理性上來看，孫中山的做法自然是錯誤的。但是，如果將時空拉回到辛亥之後和袁世凱復辟專制之時，因國民黨人革命志氣全消，個個貪戀權位，在十位國民黨都督中竟然就有九個不敢響

應本黨領袖發動二次革命以起兵反袁的號召；而在北京國民黨站絕對優勢的國會中，居然無人敢於挺身而出地公開反對袁世凱緊鑼密鼓地復辟步伐……此時流亡日本的孫中山，為嚴肅黨的紀律，強化黨的集團作用，才像他後來含淚向宋慶齡解釋的那樣，他祇是在施行一條不得已、並且是不能說明的“策略”……對此，我們是否也能夠對之有所體諒呢？更何況，孫的做法，就共和革命和民主憲政的意義上來說，雖然是絕不容許的，正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不相信任何個人是我們建立共和民主制度的前提”。這是一個深具**普遍性**的真理，確實違反不得。但是，就孫中山先生的**特殊性**來說，對於這個已經真正做到了“天下為公”、已經在袁世凱誓言“絕不使專制政體再行於中國”之後，就將自己開國的大總統職位讓給了袁的共和革命領袖來說，我們對他在萬般無奈之下所採取的上述做法，是否也可以因時因地地“予以諒解”呢？因為，我們應該相信他的人格，應該相信共和制度一旦建立，他就會服從制度本身的必然性。更何況，“孫中山先生畢其一生，都是一個既幹革命有堅持法制、既搞政治又絕不搞陰謀的真正民主政治家”呢？在《黃花崗》雜誌於紐約舉辦的《走向共和》賞評會上，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年輕歷史學博士，就曾這樣地為孫先生作過辯解……。這與那個畢生都與孫中山先生相左的改良派和復辟派人士——劇中人楊度對孫中山的評價——“他以一個誠字凝聚人心，又以一個公字號召天下，才使得成百上千的精英願意跟著他去革命——”，確乎相得益彰。也許，這樣的辯解和褒獎，對於某些曾參加洋教政黨和跟著專制政權“無法無天”過的保共改良派來說，是否也同樣是難以理解，或要一如既往地“拒絕理解”呢？

至於為保共改良派們所指責的，孫中山發動反袁復辟的革命是“違反國家法制”，我想，歷史劇《走向共和》也已經在劇中不厭其精地作了鮮明回答；而我們已經深蹈專制復辟半個世紀的痛苦人民，對這樣的荒唐指責，祇能徒生厭惡而已。

歷史劇《走向共和》就是這樣地將我們對孫中山及其共和革命的認識，開掘到了一個相當的美學深度。這個深具美學意義的深度，不僅讓我們瞭解了歷史，而且讓我們理解了歷史，更讓我們在過往的歷史

生活之中，採擷到了藝術形像的內在美感，把握到了藝術形像的概括力量……

走出歷史，回到現實：

評《走向共和》的美學價值

馬克思主義的徒子徒孫們，特別是前蘇維埃俄國的馬列子孫們，曾為“絲毫不解美學”的馬克思主義，製造了一個所謂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而中國的幾代“馬克思主義文藝家”們，猶將這個由前蘇俄製造出來的“馬克思主義藝術哲學”，當成了洋教專製復辟政權“統領文藝戰線、專制文藝創作”的法寶。而這個法寶的哲理基礎，便是“個別表現一般”的傳統哲學概念，而不是“個別概括一般”之獨特藝術哲學。因為，在哲學裡，“個別表現一般”，“個別是為現像，一般是為概念”；在美學裡，則“個別是為形像，一般是為生活”。所以，在美學裡面，“個別與一般的關係”，就是“形像對生活的審美關係”，而不是“現像對概念的證明關係”。沒有美學的馬克思主義，之所以成了所有馬教專政國家的“美學祖宗”，一方面是因為至今為止，東西方的文藝理論家們一直都在沿用著其哲學母體的概念，卻未能建立獨特的美學概念，從而用哲學的思考代替了美學的思考；一方面則是馬克思主義者們用思想獨裁藝術，用概念約束創作，從而將活生生的文藝創作，特別是複雜生動的藝術形像，全部變成了對馬教的“神聖證明”。藝術之花必然因此而枯萎，文藝創作亦不過成了用文藝方式對統治思想所進行的證明或表現。藝術的死亡乃屬必然（說明2）。

然而，一個不可否認的狀況是，二十餘年來，除掉那些實際上已經成為專制統治勢力之一部分或“寵物”者外，中國藝術家們在被獨裁統治所允許的最大自由範圍內，已經在實踐中，對所謂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所謂的毛澤東文藝思想，一直在進行著不斷的突破和否定。雖然成就不菲，但祇因缺少理論建樹，還因為身在濁世，世俗的欲望太高，而沒有產生本質上的提升。但是，一部歷史劇《走向共和》的製片、編劇、導演、演員、甚至是所有參加了創作的藝術家們，卻以其破釜沉舟的決心，攻陷堡壘的膽略，非為追名逐利的創作，和對歷史與現實的深刻洞察、

明確愛憎，不僅使自己獲得了半個世紀以來不曾有過的成功，還在藝術創作上為我們在美學領域的撥亂反正，提供了全新的實踐基礎。

因為由歷史劇《走向共和》所塑造的歷史人物形像，雖然仍為“個別”，雖然祇是一群“個別的形像”，但是，它卻以真實的歷史生活為藍本，更以今人對歷史的思考和對現實的認識為基礎，從而將往日的烽煙和今日的血淚，還有民族的反思和人民的企盼，全部鑄入了一群歷史人物活靈活現的藝術形像和複雜迭宕的性格命運之中。因此，由他們所創作出來的藝術形像，也就是歷史人物的熒幕形像，就不再是為了“表現概念的個別現象”，而且是對“包含著歷史生活與現實生活諸內容在內的藝術群像”。這個歷史生活，就是百年中國“走向共和”的艱難歷程和反復歷程；這個現實生活，則是與歷史之驚人相似的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而一旦對歷史劇《走向共和》對於歷史生活和現實生活的審美關係，有了正確的把握與瞭解，我們再來揭開歷史劇所包含的廣闊內容，所概括的複雜思想，也就不再是難事了。雖然本文暫且只能從美學認識的角度、而非美學欣賞的角度來探討它的認識意義，即美學價值——亦即種種的思想啓示。

歷史劇《走向共和》之第一個至為重要的啓示，就是歷史劇的劇名“走向共和”所昭示的偉大歷史意義。這個偉大歷史意義就是，他將中華民族自晚清就已經開始為“走向共和”所作的慘淡追求和血淚奮鬥，直到中國人民必將由自己來最後地“完成共和”的漫長歷史進程，作了一個形像的、並且是高度的概括。從而告訴了所有的中國人，這是世界的、也是我們自己的必然歷程，更為我們自身所責無旁貸。雖然它誠如劇中人孫中山先生所述：文以為，共和之路還很長，还很艱難。而孫先生的預言，不僅是在他的時代如此，即便是在我們的時代，也同樣如此。

歷史劇《走向共和》之第二個至為重要的啓示，就是“走向共和”的歷程，乃是一個民主力量和形形色色專制勢力必然要進行著反復較量的歷史過程。在這個過程裡，專制復辟既具有必然性，又具有成功性，還具有形形色色的特殊性。而不論它具有著怎樣的性質，它都不過是“走向共和”歷程中的一次又一次反復而已。所謂共和之路還很長，就是共和革命將必須與專制復辟進行較量，還必須與形形色色的專制

復辟——哪怕是革命名義下的專制復辟，進行反反復復的較量，直到最後地戰勝專制復辟，才能最後的“走向共和”，即“完成共和”。

歷史劇《走向共和》之第三個至為重要的啓示，就是它用歷史的事實，連續劇的劇情，特別是孫中山先生具有歷史意義的告誡，告訴了我們，正是某些從舊專制體制裡面走出來的舊官僚，才最能夠“翻雲覆雨”……革命前，為保清保皇而祇想推行專制改良、猶要打擊共和革命的，是他們；革命初造成功之後，變色龍似地從改良翻然一變而要做革命元勳的，也是他們；而當革命一旦遭遇專制復辟的危險之時，轉臉便要“助復辟而滅共和”的還是他們……一九一一年前後，康有為們已經將他們的行為提供給了歷史；一九八九年前後，歷史亦正在將它的後證提供給我們……顯然，這實在是關乎到當代中國人民不僅要“走向共和”、而且要“完成共和”的巨大歷史教訓，豈能夠“坐視而不顧”？

歷史劇《走向共和》之第四個至為重要的啓示，就是該劇對保清改良的深刻批判和堅決否定，對共和革命的一往來情和無限向往。因為它揭示了為保清而進行的改良，不論它的成就有多麼巨大，不論它所高喊的口號有多麼的動聽，更遑論它在一步步的專制改良和改良專制中，又曾怎樣地在預防著革命，殘酷地鎮壓著革命，然而，革命還是在該來的時候就來了。反之，則可以說是：正是旨在預防革命的改良，才招致了革命的必然爆發……所以，它才特別是對一九八九以來海內外、特別是海外形形色色保共改良勢力之最為有力的反擊，更因為這個反擊來自於國內，她的力量也就為當今海外保共改良勢力所無可抵禦，甚至反而能夠讓我們看到某些人“從改良轉向革命的”可能性，這自然為國內的人民所歡迎……

歷史劇《走向共和》之第五個至為重要的啓示，就是她預言了當代勢將爆發的中國革命，將豈止是一場民主推翻專制的共和革命，而且是一場中華民族誓言要驅除馬列洋教的民族革命。雖然她必須追求和平的方式，但絕不放棄任何革命的形式。而中共五十餘年來遠遠超過滿清專制荼毒的種種血腥手段和欺騙行徑，所早已激起的人心覺醒，所能夠激蕩的革命風暴，勢將從政治、思想、經濟和文化等一切方面埋葬那個已經侮辱、虐待和瘋狂毒殺了我們民族國家五十

餘年的洋教專制復辟政權。因為，非如此，我們就絕對沒有可能重新開始“走向共和”，直至最後地“完成共和”。

歷史劇《走向共和》之第六個至為重要的啟示，乃是指出了當代中國的共和革命與辛亥革命的歷史傳承性；指出了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革命建國道路，非但沒有過時，而且恰恰是我們今天必須奮鬥和建設的方向；它甚至啟迪了我們，必須正視當代共和革命所帶來的震撼、所製造的變局、所可能產生的流血或混亂……雖然它們全為中共在政治、經濟、思想和文化上所一手製造，所長期造就，但卻要我們的人民用理性之手去完成……這個理性，就是孫中山先生的軍政、訓政和憲政的思想，以及這個科學思想在當代“法制化”的實現……



孫中山先生在袁世凱為他舉行的歡迎國宴上談訓政

歷史劇《走向共和》之第七個重要的啟示，就是她熱情甚至是深情地肯定了辛亥革命的偉大成果——中華民主共和國，即中華民國；就是她熱情並且是深情地肯定了中國國民黨在孫中山先生領導下，為使中國“走向共和”所作出的艱難奮鬥，所流過的無量鮮血；就是她熱情特別是深情地一再表現了，正是孫中山先生和他的革命，才是真正地要“走向共和”的，才是要走向“真共和”的，才是要把我們的國家真正建設成為一個民主共和的現代中國的。所以，“誰是新中國”這一二十世紀的“天問”（說明 3），便在《走向共和》那一幅幅璀璨畫面上，得到了解答和證明。所以，我們才敢說，“還我民國，再續共和”，乃具有著的歷史的完全正確性；我們才敢說，中國國民黨的奮鬥，一旦拋開了要推進全中國《走向共和》的歷史使命，它就“不再是中國的國民黨”了……。



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國民黨成立大會上致詞

而孫中山先生在歷史劇《走向共和》裡所一再高喊過的“中華民主共和國萬歲”，所一再呼喚過的“民國的前途是光明的”，所一再指出的，“我們本來是共和國，可怎麼一次又一次地出現了封建主義、專制主義的東西，這個問題不解決，專制復辟，就是必然的，共和國就永遠是一個泡影……”，就實在為我們推翻專制復辟，重建中華民國，增添了無窮盡的力量……

總之，歷史劇《走向共和》，她對驚醒當世人心，批判“保共改良”誤國，號召“再造共和革命”以推倒當代“共產革命名義之下的瘋狂專制復辟”，將起到的歷史性影響，委實難以預估。當此之際，自鄧小平決策“改革開放”以來，已經推行了二十五年“保共改良”的中共洋教專制復辟政權，猶將何去何從，雖全在彼一念之間，但是，不管他一念為何，是已經太遲的民主改革，還是決心殘酷地鎮壓即將到來的共和革命，其“保共改良”之必死，其保共鎮壓之必敗，則為天地人心之無疑。這，才是本文雖意在評論歷史劇《走向共和》的美學價值，卻命題謂“保共改良二十五週年祭”的由來。

作者說明：

- 1、本文所引，均出自歷史劇《走向共和》或《誰是新中國》一書上卷第一章“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發端”。
- 2、這是本文作者於八十年代從事美學研究的心得，曾在國內大學或文藝界講演，均極受歡迎，即將成書出版。
- 3、《誰是新中國》一書被一些朋友稱做二十世紀的天問。參見中國社會民主黨成立宣言等。

廣東省石壁三村

聯名上書

徵集聲援者簽名

上書人：石壁三村村民

編者的話：務必請讀者讀一讀這篇“上書”。它會幫助你了解當今的中國農村，理解中國改革開放的現狀，明白“村選舉”的真相……還有，就是當代中國農民的痛苦，哪怕是在富饒美麗的珠江三角洲……

對社會各界朋友的呼籲

一、素不相識的社會各界朋友們，我們石壁三村 2236 名村民都渴求你們的簽名聲援，期盼你們將簽名發到我們村民的信箱：shisancun@hotmail.com，期盼你

們留下真實姓名、省份、國籍、職業。我們將於 11 月 1 日，委託《中國人權》網站 (www.hrichina.org) 公佈所有村民簽名和聲援者簽名。

二、我們希望你們將本呼籲書廣泛轉載、黏貼、推薦、傳閱（須註明「原載《黃花崗》雜誌第七期（2003 年 10 月），網址：www.huanghuagang.org」，我們由衷地感激你們。同時，我們特別感激辛灝年先生及其主辦的《黃花崗》雜誌對我們村民這次基層維權的大力支持，希望社會各界都能夠將中國的基層問題作為關注重點，這些問題才是覆蓋面積最廣大、危險程度最激烈的國難啊。

朋友們，你們誰也無法想象，身處素以「富饒」聞名的珠江三角洲的我們，這些年來竟是如此貧窮、如此悲慘！這次全面檢舉邵永標一千人等，是我們決心最大、意志最堅、人心最齊的一次。以下便是我們的呼籲書原件（遞交給中共中央、廣東省、廣州市的紀委、反貪局、公安、檢察、媒體等）。

【呼籲書原件】

呼籲：將不法分子繩之以法，救 2236 名村民於水火——廣東省廣州市番禺區鍾村鎮石壁三村村民全面檢舉村委書記邵永標一千人等

廣東省廣州市番禺區鍾村鎮石壁三村村委書記邵永標說過：「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層層有知己。」其目無國法黨紀、徇私舞弊、以權謀私、黑賭嫖娼、欺下瞞上、濫賣亂佔耕地以及與眾幹部奸商狼狽為奸、蠅營狗苟的醜陋之舉，在石壁三村誰人不知？誰人不曉？哪個村民不知道邵永標是「左手拿著大哥大，右手拿著方向盤，沒錢就找銀行貸，還錢就找下一屆」？哪個村民不知道在這樣一個村委書記的「領導」之下，我們已經變成了「有田無田種，有地無地耕，有廠無廠進」的三無人員？

今天我們就是要聯合起來，集體檢舉邵永標，全面檢舉邵永標！我們既具有農民的傳統意識，也具有活躍的思想與大無畏的膽魄。我們不怕村霸橫行，也不怕鎮級、區級個別領導（如番禺區紀委科長林容，鍾村鎮武裝部長韓灼強，鍾村鎮紀委主任黎淑芬等）對邵永標的袒護包庇，我們堅持社會公正與道義良心，堅持以確鑿無疑的所述事實和眾一心的維權信心，誠心誠意地請求上級領導、媒體記者下來明察秋毫，繼而嚴厲審查、

法辦邵永標及其他一千人等。總而言之句話：對於那些爲了政績、爲了錢包任意擴大徵地範圍、採用低價補償政策、自行制定土政策、侵害農民利益、把農民集體土地看作自己的土地並佔而不補的惡毒幹部，我們一個也不放過！

全面檢舉邵永標一千人等

1、村委書記邵永標的個人資產問題。邵永標以前是個普通農民，當了 18 年村委書記後就成了本村一個腰纏萬貫的大富翁，個人資產在 1000 萬元以上。比如，石壁三村磚廠、謝村磚廠、官坑磚廠、「行軍窯」、興業木廠、藝信傢俬廠、五金電鍍廠、運通電鍍廠等等，他不用一分一厘的本錢就做了幕後的大股東；比如，他擁有一座佔地面積近 400 平方米的四層高的大樓，68 間民工出租屋（面積在 1000 平方米以上）；比如，他在石壁派出所旁以 45 萬元購入一間大商場；比如，1997 年間，他在番禺區市橋鎮建下兩棟別墅，價值 200 多萬元；比如，他在番禺區市橋鎮東風路買了一個單位的套間房；比如，他以他兩個兒子的名字在祈福新邨買了兩個單位的套間房；比如，他駕駛豪華豐田小轎車經常出入；等等等等。他如此龐大的經濟資金和固定資產從何而來？明眼人一看便清楚！

2、村委書記邵永標的黑賭嫖娼問題。邵永標在本村是一把黑白保護傘，他大膽庇賭，在他弟弟邵永成的家裏開了大半個月的賭場。他無賭不歡，而且越大的賭局他就越有興趣，一萬幾千的賭局，他後眼也不看。1996 年間，他在番禺區鍾村鎮「神燈酒家」輸掉了 70 多萬元；1997 年間，他在祈福新邨輸掉了 120 多萬元；1998 年間，他在番禺區大石鎮「香江酒店」輸掉了 100 多萬元；2000 年間，他在石二大斜腳輸掉了 100 多萬元；等等。邵永標曾召集大批黑社會人馬，包庇他的弟弟邵永成開賭場做「大耳窿」（放高利貸的意思），其中我村村民黃浩勤和李顯佳欠下邵永標的弟弟邵永成各 10000 多元不能償還，造成雙方持械打鬥，其中黃浩勤被打得頭破血流，送醫院緊急搶救。2002 年 9 月，邵永標帶領大批黑社會人馬，去鍾村鎮「添美食」餐廳恐嚇李顯佳還債。邵永標利用黑社會打手連續恐嚇村裏面的檢舉揭發人員（比如恐嚇在石壁三村裏面認可度最高的村民杜滿基），諸如大喊「收屍」、「毀壞你的鋪子」之類。邵

永標長期去嫖妓女。現任副書記區顯輝也同邵永標一樣長期嫖妓，現在他在謝村又包養了一個；以前區顯輝在鍾村鎮韋湧村某髮廊長期嫖娼，經鍾村鎮黨委紀委、政府部門批評數次，仍屢教不改。

3、村委書記邵永標的「行軍窯」問題。1999 年，邵永標濫用職權，在我村的「竹枝坑」山崗腳，他沒有辦任何手續，就秘密私建了一個大磚窯——「行軍窯」。此窯毀壞山林過百畝，每天都有 6、7 台「湘」字牌泥頭車、一台大型挖泥機、一些小拖拉機，這些機器在「竹枝坑」山崗上挖山泥，一車又一車地把我們村的財產運到他自己的口袋裏，其無償挖掉山泥制磚給我們造成的損失有不可估計之多。本來村的山崗是美好如畫的，但現在懸崖峭壁，令人目睹心寒。這個「竹枝坑」山崗，我村村民馮焯棋本來承包了 20 年（到 2004 年期滿），由於邵永標在此強力私建「行軍窯」，馮焯棋之前所種下的果樹、綠化樹基本全毀。馮焯棋原來養了十幾年牲畜，每年都能賺十多萬元，但自邵永標的「行軍窯」營業後，馮焯棋就無法養牲畜，邵永標此舉給馮焯棋造成了嚴重的損失。邵永標知道情況嚴重，恐怕馮焯棋向上舉報，就迫使馮焯棋簽一份新合同，到 2004 年期滿，之前造成馮焯棋的經濟損失由「行軍窯」每年賠償 16000 元了事，但是實際上呢，邵永標每年給他的賠償只有 15000 元，剩餘的 1000 元去向不明。以後「行軍窯」除這一點點賠償之外，不負任何責任，並且山泥可以任挖，樹木可以任毀。同時，「行軍窯」經常燒廢膠、塑料等，其燒出的濃煙擴散到幾十里之外，造成幾十里的嚴重空氣污染，附近的樹木大部分乾枯。（備註：除「竹枝坑」山崗遭到嚴重損壞之外，我村「文冒閣」山頭也同樣有近百畝遭到毀壞，「小陳頭崗」也被吃掉了大半個山頭。）

4、村委書記邵永標的官坑磚廠問題。整個官坑磚廠（位於番禺區大石鎮）製磚紅泥，全部由我村「竹枝坑」山崗供應；現在「行軍窯」10000 多平方米土地，也同時給官坑磚廠使用。以上土地的使用和泥土的開發，一年僅付 5000 元給村委會，那麼那些剩餘的大量利潤到底去向何方了呢？

5、村委書記邵永標的石壁三村磚廠問題。石三村磚廠是 1983 年所建的，本來利潤豐厚，但現在卻欠債累累。1999 年，邵永標在沒有公開投標，也沒有村民大會、兩委會討論的情況之下，私自將石壁三村磚廠給他

的好友鄧耀基承包，邵永標從中獲利；經村民維權人員檢舉之後，他就提前一年（即 2001 年 12 月 31 日）將磚廠收回，雖然鍾村鎮紀檢部門不同意他對其營業，但他又沒有經過村民大會、村兩委會討論，而於 2002 年 1 月 16 日再次擅自投標、經營，而且要求投標者押 50 萬元在村委會才有資格投標，但迄今為止，現在的承包人——邵永標的好友鄧錫興以及邵永標的大舅梁銳泉，仍沒有將 50 萬押金押在村裏面，然而他們卻仍然能夠繼續經營下去。邵永標利用職權，把石壁三村磚廠的下水碼頭佔為己有、開沙石場，其他大部分發包給他的戰友黃漸強，租金卻歸邵永標所有。——這樣做，邵永標是否合理、合法？他在承包期間每年都能賺錢，但為什麼石三村磚廠從 1983 年投產至今，每年無償吃山泥、田泥，但是每年卻都要虧本？這些錢到底裝到了誰的口袋裏，難道還不清楚嗎？

6、村委書記邵永標的賣泥交易問題。邵永標在沒有經過村民大會、村兩委會同意的情況之下，就以 0.8 元~1.5 元/立方米的價格，將「竹枝坑」山崗 100 多畝的山泥開發權授予石壁三村磚廠老闆鄧錫興，並保證鄧錫興對山泥的使用權和開發權期限為 5 年~10 年；如果村委會違約的話，就答應賠償給鄧錫興 15 萬元。我們要問的是，我們是否要賣這麼便宜的山泥來補充村裏面的經濟呢？這裏面又含有多少水份呢？答案就是：此舉極大地阻礙了這塊土地的開發和發展，卻可以填滿村委書記邵永標等人的腰包。

7、村委書記邵永標的藝信傢俬廠問題。邵永標利用職權，在石壁三村的土地上，以 135 元/平方米低價購入 1200 平方米土地建藝信傢俬廠，但之後村民到此廠量廠用地，其工業土地和建房土地竟然超過 2000 平方米！並且更嚴重的問題是，當時村民購買建房地每平方米都要 200 元，而他邵永標呢，卻竟然用 135 元就可以買一平方米！還有，原合同明明是 135 元/平方米，他卻擅自修改合同，將其改為 101.5 元/平方米！真是欺人太甚啊！

8、村委書記邵永標的「四馬崗」腳雞毛廠問題。「四馬崗」腳雞毛廠以前是租的，現在已經賣了，但是賣斷的款項比每年的租金還要少，敢問邵永標在這面私吞、私賣了多少財產？

9、村委書記邵永標的興業木廠倉庫問題。邵永標未經國土局、建委、電管所批准，就在石壁三村六隊的

糧田上建「興業木廠倉庫」。由於兩名建築工人被電死，造成極大的影響，不敢暴光。

10、村委書記邵永標的填土問題。1997 年，他置國家土地法律於不顧，將石壁三村南境對海塘的 70 多畝一級良田填為宅基地，因此事，邵永標和原村長李樹榮被廣州市國土局抓去兩天。但是迄今為止，這些土地的大部分仍被空置。同年，他還在石壁三村六隊填土良田 50 畝左右，當時填土實際的深度是 1.4 米，但是他收方時寫明的深度卻是 2 米，請問村裏在此問題上損失了多少田土費用？

11、村委書記邵永標的石三小學重建問題。石三小學重建，這本是一件人心所向的大事，但是邵永標不通過村民大會和村兩委會的討論，就在石三小學重建問題上大動手腳，使附加工程遠遠大於主體工程。石三小學重建的主體工程原本是以 42 萬多元的開標價由「水磨華」建築隊（包工頭的名字叫龔鉅華）承建，但由於邵永標大搞附加工程（附加工程 57 萬多），最後全部工程竟然用了 99 萬元之多！之後，邵永標又將村裏一塊價值為 25 萬多元、共計面積 500 平方米的黃金地以 12 萬元讓給龔鉅華當作建後施工費。敢問邵永標在這裏面侵佔了多少錢財？（備註：同時，邵永標利用龔鉅華建學校的機會，將這幫建築工人拉去建自己弟弟的三層樓高的房子。）

12、村委書記邵永標賣掉建房地地的問題。迄今為止，邵永標賣掉村裏面的土地超過 400 畝，款目共計 2000 萬元左右，但款項去向不明，他很少開國家正當發票，大部分開的是「白頭單」。如最近 2003 年 8 月 8 日村裏面的財務報表便有數目為 326541 元的 16 張白頭單，引起村民極大公憤。

13、村委書記邵永標與一位香港富商之間的合謀問題。一位香港富商以 10 萬元/畝的買地價，買了 10 畝山崗地，其中石壁三村的「竹枝坑」山崗佔 6 畝，官坑村山崗佔 4 畝，但村民不知款項落在何處。敢問邵永標在這裏面得了多少便宜？

14、村委書記邵永標與包工頭李耀棠之間的合謀問題。李耀棠通過與邵永標之間的關係，在石壁三村長塘購入近 8000 平方米的土地（實際上真正購入的土地面積超過 8000 平方米），以 135 元/平方米的低價購入。隨後，石壁三村的村幹部每人都認購幾份土地，以 350 元/平方米的高價賣給村民建房所用。如此相差 200 多

元/平方米的地價，不是明擺著在坑村民嗎？

15、村委書記邵永標與港商李監之間的合謀問題。1993年，邵永標利用職權以180元/平方米的低價出賣石壁三村1000平方米土地給港商李監，但是這塊地皮的實際價值卻是280元/平方米，為什麼這個李監能夠如此便宜地買到這塊土地呢？這是因為他們之間存在著極不健康的交易。比如，邵永標和他的妻子梁玉銀一同去香港旅遊，所有費用由港商李監承擔，另外李監還贈送一條金鍊給邵永標的妻子梁玉銀。

16、村委書記邵永標的小車問題。邵永標以每月2.2%的貸款利息購買小車，用於自己的藝信傢私廠所用，但這輛車從來都沒有為村民辦過一件實事。這輛小車每年開支2萬元費用，所有費用每年都在村裏面開支，這樣村裏面有16萬元人民幣不知去向。而後，這輛車被他以6000多元賣掉。前後買車、護車的費用，給村裏面增加了33萬元之多的沈重負擔。

17、村委書記邵永標的假帳問題。邵永標肆無忌憚地在村財務上大搞假賬、巧立名目、假公濟私，他在石壁三村村委會門前黏貼的財務報表，水份大得驚人。舉個普通的例子，1995年，我村村民李志江、李志桐兩兄弟各購入一塊土地，購入價都是60000元，但邵永標給他開的發票卻都是16000元，收據（即村會計李兆基單獨簽一個「兆」字的「白頭單」）都是44000元。

18、村委書記邵永標為親戚朋友大開後門的問題。邵永標在戶口遷入問題上，為他大量的同姓兄弟、親朋戚友，大開後門，關死前門。例如，邵永標同學的親戚——陳鏡的兒子，以5000元給我村副書記區顯輝的報酬，把戶口遷入區顯輝的戶口裏面，這些都由邵永標全權審批和幫他們拉關係。

19、村委書記邵永標包庇村幹部及村幹部兒子的問題。1997年，本村副書記區顯輝開公安摩托車到番禺區大石鎮嫖娼，被公安當場抓獲，罰款1500元，後因邵永標拉關係講情，將其保了出來。2000年，區顯輝的兒子持械打劫的士汽車，本村任何人都知道此事，但此事經邵永標拉關係講情，使這位青年逃過法網。（備註：區顯輝經常巧立名目，以「治安成夜加班夜宵」的名義開單到村報銷，其中2001年有一次是240多元；還有一次是村民的保險基金提留的風險費5000多元，他自己吃掉，沒有償還能力，就預支了下一年的工資來補償；區顯輝還長期賭錢、嫖娼，在家裏開賭場；他經常

開著警車吃喝嫖賭，不上班。但這些行為從未被邵永標批評過。（區顯輝的兒子11歲就被趕出學校，之後長期出來偷偷摸摸，至今仍然不務正業。）

20、村委書記邵永標與石三小學校長劉錦裳之間的合謀問題。邵永標利用下撥辦學經費的審批權，和石三小學校長劉錦裳一起數次行賄受賄。例如學期尾，劉錦裳就拿3000元紅包給邵永標，她也經常借錢給邵永標大賭，其校長的地位因此而永久穩固；另一方面呢，如果石三小學的教師要去旅遊或者有其他公費開支，那麼就能順利地得到邵永標的審批同意，他們幾乎所有的公費開支都由邵永標審批，並於村委會報銷。（備註：石三小學校長劉錦裳經常打學生，例如我村村民杜滿全的兒子杜鏡添被其打得背部韌帶拉傷，腿上被打成黑傷，此事經過番禺區教育局和鍾村鎮教辦的多次調解，後來又經過石壁派出所的調解，劉錦裳賠了8000元給杜鏡添做醫療補償費，其實這裏面還有邵永標對劉錦裳的包庇和幫助，否則劉錦裳的校長位置就坐不穩了。類似杜鏡添被打的例子，自她當校長以來，不下50例。）

21、村委書記邵永標的私人生意接待問題。邵永標的私人生意接待65%在石三磚廠報銷，35%在村委會報銷。比如，他過節日的個人接待，或者是他自己開的交警車場的接待費，也在以上兩處報銷，等等。

22、村委書記邵永標關於石壁三村治安隊人員的招聘問題。邵永標不優先安排我村的退隊軍人到治安隊裏面工作，反而安排他朋友的兒子和湖南籍的朋友進去工作，由於這個湖南人違反治安隊工作條例，上班時間沖涼，因煤氣中毒而死。此事村裏面賠償了63000元的損失，給村民又增加了沈重的負擔。

23、村委書記邵永標關於不給村民口糧田的問題。今年我村東升農場不再由港商區景泰承包經營之後，大部分村民強烈要求邵永標給每個村民0.5畝的口糧田以求維生，但此要求遭到邵永標的激烈反對，他還讓村民乾脆到鍾村鎮政府去要田。這個「不給村民口糧田」的問題目前已經上升到極為尖銳的程度，連每個村民要想獲得原來失去土地中的0.5畝的要求都被他嚴詞否決，這難道不是置村民生計於不顧嗎？難道不是還想著繼續以權謀私以及與他人共同合謀來繼續坑詐我們嗎？

24、村委書記邵永標其他千千萬萬的、難以數計的、形形色色的、根本就說不完的問題。今天的石壁三村村民，每年每個人只有340元以下的收入，以前有田、

有地，三餐總算安穩，但現在每天每人只有 0.9 元收入，只能吃一個即麵食，這一切都是因為什麼？都是因為以村委書記邵永標、村委副書記區顯輝、村長區禮煊、村紀檢委員、婦女主任李少芳等人為首的一大群村幹部狼狽為奸，腐敗橫行，黑白通吃！我們這封檢舉信或許僅僅透露了他們的十分之一或者百分之一，其中重之又重的村委書記邵永標的問題更是千瘡百孔，區區幾千幾萬字僅能暴露出他的冰山之一角……

我們村賣地款已經達到 2000 萬元，但是為什麼我們村現在還欠銀行超過 400 萬元呢？這 2400 萬元到底被哪些人分掉了？我們的村民連住的土地都不夠，但是為什麼村委書記邵永標卻有大量土地賣出？並且又有大量的資金來買地？他賣出了他在石三小學對面的兩層房屋和祖屋；他賣出了北帝廟對開土地、文冒閣一帶的土地、南境糧站對面的土地、石壁三村六隊、石壁三村十隊的片自留地；等等等等；——他賣出過的 200 畝土地款就超過千萬元啊！但是這些賣地款到底到哪裡去了？他買進了北帝廟酒樓、別墅、木廠、出租屋、商品房，等等等等，——他有沒有經過正當手續買入？我們村東升農場、魚塘、菲菜地、興業廠、佳德廠、英發印花廠、石壁三村磚廠、過渡碼頭、月亮賀卡出租的土地、運通電鍍廠的管理費等等租金（全是我們村的經濟收入，每年超過 200 萬元）到底去向何方了？邵永標收購北帝廟對開的大夫、減邵、生產隊的自留地而應以 40 元/平方米下撥到各生產隊分配給村民的錢又到哪裡去了？這幾十萬元為什麼到現在為止都還沒有分發下來？我們要問，這些錢到底到哪裡去了？在以上種種事實的情況下，邵永標還繼續分期付款 110 多萬元開支建村政府、治安隊，大建南景住宅道路；並分期付款 50 萬元左右建本村的街道和下水道！天啊，天理安在？國啊，國法安在？黨啊，黨紀安在？

25、村委書記邵永標的選舉問題。這個問題，我們要仔細、再仔細地講。

2002 年 4 月第一次支委選舉，有 39 人（共產黨員）參加，是無記名投票的，沒有一位黨員缺席，投出的票數是 39 票，當時有廣州市番禺區鍾村鎮的武裝部長韓灼強督導，投票的結果沒有公開宣票，就立即將票箱運到鎮政府開票，所有的黨員都不知道選票結果。這樣的選舉方法極不合理。第二次支委選舉之前任何一個黨員都不知道投票結果，韓灼強就公佈了候選人的名單，這

是 100% 的暗箱操作。

2002 年 5 月 13 日村委選舉，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村委組織選舉法》應該是無記名投票的，但是韓灼強和邵永標就提名候選人名單，要求選舉人再選這些候選人，當時村委選舉的選票結果也沒有向任何人唱票，就將所有的選票連同票箱收回村政府，只有韓灼強、村政府幹部以及那些所謂的「村代表」在場點票。當晚 22 點就直接公佈“誰誰誰”擔任了什麼什麼職務，到現在為止村民都不知道選舉的具體結果。

2002 年 6 月 15 日正式開始村委選舉，選點有三個：石三孖祠堂、石三小學門口、石三東原祠堂，每個選點都動用了 6-7 個公安人員把守。其中，在石三小學門口，石壁派出所副所長張雪軍等幹警與我村村民黃六根、黃球發生爭吵，這些幹警不准他們離開選票處五米內寫選票，此為活生生地鎮壓村民，是對村民選舉權的極大侵害。中午 12 點左右，村民投選票基本完成，他們沒有當場向村民唱票，就將選票箱收回村政府。當天下午 2 點 30 分才唱票，沒有任何村民知道選票結果，當晚 22 點村政府就立即公報委任名單，但是具體的選票結果（即到底每一個候選人具體獲得了多少票）都沒有向村民公報。村長區禮煊，還是當上了他的村長；村委書記邵永標，他的位置仍然不變。相反，對於自 19 歲開始就當上幹部的優秀年青幹部——原副村長邵慧佳和村民杜滿基，邵永標卻命令紀檢委員李少芳到村民家中做秘密的「思想工作」，要求村民千萬不要選上邵慧佳和杜滿基；並且，邵永標要求鎮黨委、鎮政府千萬不要把邵慧佳和杜滿基的名字放入候選人名單。結果，被村民公認的優秀幹部邵慧佳被拉了下來，成爲一名普通的村民；而石壁三村認可度最高的村民杜滿基雖然獲得了 400 票以上，但卻「出人意料」地排名爲村長競選人的第二名。而後，邵永標把他妹夫的侄子黃景升拉到副村長的位置；把他自己的堂弟邵國榮拉上村委成員的位置，讓邵國榮任民兵營長、團支部書記。

這次選舉不公開、不公平、不公正、不公認、不合法、不合理、不合情，根本體現不出村民的意志，是嚴重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村委組織選舉法》的暗箱操作之舉。我們均不承認石壁三村這個村委會，所以到現在為止，我們石壁三村基本上都處於可怕的無政府狀態，造成村裏面的經濟工作不能正常發展，無法協商。我們村已經連續 6 年都沒有召開過村民大會了！幾乎所有的

事情都是由邵永標一人說了算，搞「一言堂」、「家長制」，而那些村幹部、所謂的「村代表」又幾乎全是其蝦兵蝦將，一點也不為村民著想，反而只想著自己怎麼賺錢，怎麼過好日子，他們去開會不是去為村民謀事，而是去謀自己的經濟，只要開會就會有錢拿，10 塊、50 塊、100 塊一次不等。他們不問民生疾苦，反而助紂為虐啊。

檢舉石壁三村幹部的人員結構和分工問題

村委書記：邵永標

村委副書記：區顯輝（區顯輝是邵永標的親密戰友）

村長、副書記：區禮煊（區禮煊死去的弟弟和邵永標死去的妹妹是「陰間夫妻」，這是我們本地的風俗）

副村長、宣傳委員：黃景升（黃景升是邵永標的妹夫的侄子）

紀檢委員、婦女主任：李少芳（李少芳經常借錢給邵永標，邵永標因此提她任職）

民兵營長、團支部書記：邵國榮（邵國榮是邵永標的堂弟）

統計、秘書：李淑釵（李淑釵是邵永標的契妹）

理財小組成員、村聯隊會計：邵婉君（邵婉君是邵永標的堂妹，也是邵永標小舅的妻子）

理財小組成員：區錦滔（區錦滔是邵永標的契哥）

理財小組成員：李嘉兆（李嘉兆是原鍾村鎮黨委書記何校倫的舅舅，何校倫是邵永標親密戰友的哥哥）

村企業電房管理：梁銳聯（梁銳聯是邵永標的小舅）

石壁三村治安隊會計：黃兆駒（原違反國家計劃生育政策的黃兆駒是邵永標的妹夫）

我們的強烈要求

我們誠摯地希望通過此信，能夠引起黨政各相關部門、各機關、各新聞媒體的重視和關注，希望你們以詳實的調查和公正的態度，實事求是地對以上所涉人員一一調查，在明確無誤的證據之下，按照國家法律法規，依法、依紀嚴厲懲處相關犯罪、違紀人員，還人間以正道，還我們以公道。

同時，我們最關心是未來石壁三村的發展前途。我們 2236 名村民的生活、學習、工作、發展都必須依靠

一個新的基層政體。因此，我們強烈要求在石壁三村重新開始真正的民主政治，以村民大會的形式，以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按照村民的意志和國家選舉法規，重新選舉出能夠鞠躬盡瘁地為村民辦實事、能夠把村裏面的經濟搞上去、能夠以村民利益為根本利益的新一屆政府班子。

註明

舉報犯罪、懲治腐敗是每個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也是你們的職責所在，按照國家公民舉報的規定，「應當保障舉報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依法保護其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合法權益」，「嚴禁泄露舉報人的姓名、工作單位、家庭住址等情況」、「嚴禁將舉報材料和舉報人的有關情況透露或者轉給被舉報單位和被舉報人」，「調查核實情況時，不得出示舉報材料原件或者其複印件，不得暴露舉報人」，請你們按以上幾點依法行事，我們隨時恭候、並熱烈歡迎你們的到來。

堅持和平、漸進、堅韌的理性維權原則的上書人——廣東省廣州市番禺區鍾村鎮石壁三村村民 2003 年 10 月聯名上書

註：村民簽名（包括四項：姓名、村民/黨員、年齡、按手印）和聲援者簽名（包括三項：姓名、省份/國籍、職業）將於 11 月 1 日於《中國人權》網站（www.hrichina.org）同時公佈，目前暫時保密。我們從現在開始，期待黨、政、媒體的積極反應。並且，不管你們的反應到底積不積極，我們都要將我們的維權進行徹底的公開，因為無數次的經驗告訴我們：

中國的公民維權必須公開、聯合、正大、光明、透徹、磊落，必須有一股強大的浩然正氣和堂堂之風，以防止隨時隨地可能出現的暗箱操作和殘酷打壓。我們石壁三村村民期待一種真正被賦予了監督權的民主之氣，這種民主之氣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角落得以傳播、得到褒揚，並在今後漫長的日子裏成為我們村的優良傳統。我們以此傳統，為今世石壁三村之罪惡者消除劣根，為後世石壁三村之進步者鋪開大道。

王炳章

中國民主革命之路

選載

編者按：本刊曾選載過王炳章博士《中國民主革命之路》一書的部份章節。現在，為配合對歷史劇《走向共和》的宣傳，本刊將連續選載該書的有關章節，以使我們的讀者能夠從這本書裡，看到王炳章博士的心和國人的心是怎樣一起跳動著的……

六十七問：你主張民主運動以什麼樣的手段達成目標？用和平演進呢，還是革命？

答：這是令很多人困惑的問題。我的答案有兩點。其一，我們希望以和平演進的手段達成中國民主化的目標，希望避免革命，尤其是避免流血。其二，最終專制社會以什麼方式過渡到民主社會，不取決於或者說不主要取決於我們，而主要取決於執政者的態度，取決於執政者在人民的要求下採取什麼樣的回應。綜觀人類文明的發展史，社會的邁進可能沿著兩個不同的軌跡進行。一個是演進，一個是革命。演進，指的是逐步改良，避免大規模的革命和流血衝突。突出的例子是英國。英國原來是一個國王專制的國家，在民主潮流的衝擊下，王室作了讓步，先把權力轉移給了貴族；然後，在人民的壓力下，貴族又作了讓步，被迫把權力完全轉移給了平民（下議院）。結果，皆大歡喜——王室保留了，貴族

院（上議院）也保留了。其間，雖然也有流血衝突，但畢竟沒有發生法國那樣狂風暴雨式的大革命。法國進入民主時代，則經歷了不同的模式。路易王朝在民主和社會改革大潮面前，不肯讓步，拼命抵擋，觸發了攻佔巴士底監獄的大革命，路易十六被送上斷頭臺。近年，也有正反實例。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彈壓民主運動，步上了路易十六的後塵。臨近的匈牙利共產黨，則順乎潮流，進行民主改革，避免了革命的爆發。海峽的對岸臺灣，蔣經國從訓政走向了民主政治，開啓了歷史新的一頁。不遠的菲律賓，馬可斯死不讓步，被人民趕走，客死異鄉。這些例子說明，執政者對人民要求的回應，決定了社會變遷的模式。讓步式的良性回應，建立了良性循環。社會沿著演進的軌跡前進。反之，執政者執迷不悟，對人民的要求惡性回應，嚴重鎮壓，則導致惡性循環，早晚觸發暴動，社會沿著革命的軌跡發展。美國前司法部長甘乃迪曾說，成功的改良，是防止革命戰爭的最佳辦法。有句話說，革命往往是在革命家喝咖啡的時候爆發的。意思是講，革命發生與否，並不主要取決於主觀的人為策劃，主要是看有沒有發生革命的客觀社會條件。而革命的條件，往往是以執政者倒行逆施創造出來的。歷史告訴我們，演進性發展，對人民，對執政者本身，都有好處，從而對整個民族帶來福祉。革命性發展，執政者的下場可能會極為悲慘。值得提出的是，現在，有個別知識份子提出，要「告別革命」，要當一名「改良派」。這種宣稱，有著邏輯上的混亂。因為，要推動社會的進步，一般有兩條路可走：「改良」或者「革命」。當政者可做的，是「改良」；老百姓可做的，是「革命」。「改良」不是知識分子所能辦到的，只有掌權者才能作出改良。政治改革，說穿了，就是執政者將剝奪自公民的權利還給人民，如辦報紙、辦刊物的權利，選舉的權利，結社組黨的權利等。普通知識分子手中無權，怎麼「放權」給人民，「怎麼實施改革方案」，頂多可以做「改良」的呼籲者而已。反之，「革命」確是老百姓可以做的，確切一點說，是公民的一種天賦人權。當執政者不進行「改良」時，剩下唯一推動社會前進的途徑，就是人民的革命。

我們希望社會以演進的軌跡邁向民主，但希望是一回事，執政者如何回應、能否放權、能否順應歷史潮流進行「改良」又是另一回事。作為民運的積極參與者，要做好兩手準備——既呼籲「改革」、推動演進，但也

不能放棄革命、更不能反對革命。當革命大潮來臨時，要敢於迎接革命，並將革命引向正確的軌道。

六十八問：你確信民主運動一定成功嗎？好像在什麼地方，你提過民運的雙贏前途？

答：我已說過，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我堅信，民主運動一定會獲得成功。在我的有生之年，一定會看到中共的下臺。這一信念並非建立在盲目樂觀的基礎上，而是建築在理性分析的基礎上，建築在共產黨政權一個一個崩潰的事實基礎上。就是在蘇聯和東歐共產黨政權解體之前，我都持這種樂觀的看法。讓我來分析一下。這裏有兩條路。第一條路：演變之路。如果共產黨在民主潮流的衝擊下，決定開放民主選舉，民主人士就有了很大的合法鬥爭活動的空間。按照中共的法律，縣、市區以下的人民代表和行政首先實行直接民選。前幾年，中共開放無非政權的村直選，結果百分之四十七的村長由非共產黨員當選。也就是說，中國社會的基層已經變天。一旦開放縣級和市區級選舉，肯定民主人士將大有斬獲。鄉鎮、縣市為基層政權機構，有公安局和武裝部，有法院，你可以想一想，由民主人士掌權後，將是什麼局面？有了突破口，大堤就會一瀉千里，中共就會不得不開放更高層次的選舉。漸漸地，民主人士將掌控政局，最終在全國建立民主政體。第二條路：革命之路。中共死抱政權，殘酷鎮壓人民。政權繼續腐爛，終將觸發革命。在革命到來時，由於民主人士作好了準備，將出面收拾殘局。你看，兩條道路，真正的民運人士是雙贏的架勢。我為什麼對民運沒有信心？

六十九問：很多人擔心，革命將造成社會的巨大損失，不可為之。你的意見如何？

答：剛才說明，革命，不是你喜歡不喜歡的問題，而是該來就來的問題，是執政者創造不創造革命條件的問題。既然擔心革命的損失，就有必要通過各種途徑，奉勸執政者：聰明一點吧！讓步還不算太晚。至於革命比演進造成更大損失的假設，也未必正確。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假如京城有一小股武裝部隊，採取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逮捕頑固不化的執政者，宣佈實行大選，勢必會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這種一步到位的革命，可能的社會損失最小的行動。實例也證明，革命行動未必造成巨大的社會損失。菲律賓人民推翻馬可斯的革命，造成了多大損失？如果羅慕斯將軍不採取果斷措施，派飛機向總統府扔下一顆炸彈，馬可斯可能負隅頑抗，派他的

衛隊向人民開槍，反而會造成損失更大的流血慘案。另一方面，和平的抗爭，也未必不付出慘重的代價。八九學運，學生們並未有革命的念頭，但共產黨機槍坦克的血腥屠殺，給人民、給社會造成了多大的損失？假如當時策動部隊嘩變，把老頑固們抓起來；或者，革命群眾武裝起來，佔領電視臺，佔領廣播電臺，佔領北京市委大樓，甚至佔領中南海，一場大屠殺或許可以避免。據說，當時確有想嘩變而支持趙紫陽和學生的軍官，但中共黨內改良派的猶豫錯失了良機。

七十問：有人擔心，用革命換來的政權，仍然是一個專制政權。革命會不會造成以暴易暴呢？

答：這種擔心，是對歷史不瞭解的緣故，是因果絕對論。革命不見得造成以暴易暴的結果。古有美國的獨立戰爭，近有菲律賓和羅馬尼亞的革命，人家建成的並不是專制政體。反過來，用和平手段獲得的政權，也不一定是民主政體。希特勒是怎麼上臺的？馬可斯是怎麼上臺的？他們並沒有採用革命手段，他們上臺靠的是選票，是民主程序。但是，他們建立起來的，卻是一個無比殘暴的政權。結論已很明確：手段與結果之間，並沒有必然的邏輯關係；關鍵是運動領導者的素質和運動領導者的目的。

七十一問：體制內的改良與體制外的革命有什麼關係？可否相互轉化？

答：這個問題已在六十二問中基本上作了交代。還可以再明確一些，補充一些。首先，體制內改良和體制外革命的提法有時令人困惑，有必要把概念先搞清楚。政權內、政權外容易理解。進入中共的政權之內，做幕僚，或者做官，再進行改革，叫政權內；在政權之外，以平民身份，從事爭取自由和民主的事業，稱政權外。體制，不一定指政權體制。法律體制、經濟體制，都叫體制。一般而言，討論社會變革時，體制內多指在現有的法律體制之內活動，稱為改良，或叫合法鬥爭，並非特指進入政權體制之內去做幕僚或當官。體制外多指在現有的法律體制之外運作，稱為不合法鬥爭，或稱革命。

為了討論問題的方便，我們暫時借用體制內和體制外的表達方式，並作出如下定義：凡絕對排斥革命，主張承認現有法律，一切都在中共法律範圍之內活動，或利用中共法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運作，稱之為體制內改良或簡稱為合法的鬥爭；凡是根本不承認中共的既定法律，或因策略之考慮而暫時利用中共的法律抗爭，但

同時進行革命的準備工作，稱之為體制外革命，或簡稱為不合法的鬥爭。中共法律的自相矛盾，有時增加了定義上的困難。如中共憲法中規定有結社和言論的自由，組織民運團體似乎屬於體制內的運作。但它在憲法中又有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這些關鍵條款，民運團體拒絕服從它的領導，等於否定了它的憲法根本。從這一點說，組建民運團體基本上屬於體制外的活動。有時，體制內和體制外是交叉的，即合法鬥爭與非法鬥爭相交叉，兩者也是可能相互轉化的。六十二問中，朱嘉明的例子是從體制內轉化到體制外，從政權內轉化為政權外。臺灣許信良是從體制內轉化到體制外、又從體制外回到體制內的例子。許氏曾為國民黨員，任國民黨的桃園縣長，在體制內進行抗爭。美麗島事件後，被國民黨通緝，流亡海外。其後組建臺灣革命黨，致力於武裝暴動，成了徹頭徹尾的體制外。臺灣開放組黨後，許氏放棄革命，返回臺灣，在憲法內從事選舉，又進入了體制內。策略是靈活的，應視條件而調整。體制外的民運，不排除體制內即合法的鬥爭，或者說，這是策略上的運用。同時，做好革命的各種準備工作，條件成熟時，如可以進行最高權力的公開選舉時，可轉化為完全合法的運作。主張完全合法鬥爭的體制內人士，也不應一味排斥「非法」的體制外運作，因為，體制外的活動在革命未有爆發時，可以逼迫當權者作出讓步，給合法鬥爭擴大空間。如果絕對反對體制外，當革命形勢來臨時，合法鬥爭派可能成為反對革命的急先鋒，甚至作出破壞革命的不智舉措，就像辛亥革命前後的保皇黨一樣。有些例外值得說明——我們將民運人士派遣到中共內部；或者，中共政權內有人秘密地參加民運團體；再者，中共內部之人士雖未在組織上參加民運團體，但在思想上參加了民運，並從事與革命類似的活動，都應算是體制外。

七十二問：你闡明了體制內和體制外的關係。還有一個問題，在民主運動中，有激進派，有溫和派，如何相處呢？

答：首先說明，體制外的革命派並非激進派，體制內的改良派也不見得是溫和派。我被看作是體制外革命派的人，但我在策略上、做法上一直主張要溫和，不是冒進。同時，我也不會僵化地固守體制外的路線。假如有一天中共的政治改革開放了，以致可以組織反對黨，可以進行國家最高職務的競選，那我會放棄體制外的路

線。可以看出，體制外、體制內，指的是政治路線；激進、溫和，指的是態度的策略。不可否認，體制外的革命分子一般都是比較激進的。在一個社會大變革的過程中，各種派別都會賣力地表演，這屬於正常現象，不足為怪。猶如一個光譜，五顏六色。也像一隊樂隊，高音、中音、低音都有。正因為如此，樂隊聽起來才悅耳。變革中的社會，是一個立體的大工程，各種角色都有其作用。民運隊伍中，不同意見、不同路線、不同策略的爭論，更是家常便飯。我歷來主張，體制外的一派不要排擠體制內的一派，體制內也不要看不慣體制外；激進派和溫和派也要和平相處，你幹你的，我幹我的，發揮角色互補的作用。如同一個樂隊，哪能唱一個單一的調子？知名的北京政治反對派人士徐文立，在接受作家安琪的專訪中，明確指出：「在一個政治生態的環境當中，不應該只有一種單一的方式，不應該由於我們堅持公開、理性、和平非暴力這樣一個政治路線，而輕易地去否決別人的做法，因為政治生態當中需要多種形式，才能產生應有效果。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講，沒用王炳章和其他先生的一些做法，我們這種公開、理性、和平非暴力的方式也難以存在，或者難以體現出它應有的價值。」一般印象是，我是激進派和革命派的代表，而徐文立是溫和改革派。在徐文立二次被捕前，我們時有溝通，就重大事情交換意見，並商議合作方式。我們並沒用互相排斥的感覺，反而有合作互補的感覺。不幸的是，民運隊伍中兩派的爭論時有發生。一般的規律是，溫和派、體制內的改良派看不慣激進派和革命派，然後，激進派起而反擊。這也難怪，體制外一派，不排除體制內的運作，所以對他們是容忍的。猶如吹高音喇叭的人可以容忍吹低音喇叭的人。反之，體制內的一派，由於在他們的計劃中沒有體制外的運作，常常認為體制外的做法過於激進，擔心會破壞體制內一派的所謂戰略部署。在任任何一個運動中，溫和派一般容忍不了激進派，這好像是個規律。大家記得，八九民運時，有幾個工人用油漆潑了天安門毛澤東的掛像。當時，屬於激進之舉。是誰把這幾個工人向公安局報告，以致使之被捕的？是溫和派的學生。因為溫和派害怕，怕公安局栽到自己的頭上。但是，溫和派因此被記功了嗎？最後倖免於難了嗎？沒有！因此，各個派別千萬不要互相排斥，更不能幹出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據說，當年使那幾個工人入獄的學生，在「六四」屠殺之後好像十分後悔。（ 待续 ）

新聞發佈會之一

《黃花崗》雜誌

展開“大論戰”

本刊編委 孫 雲、應易中

“大陸著名學者痛說民族英雄蔣介石”一文在本刊發表之後，對於海內外大多數讀者、特別是中國大陸讀者而言，雖然聞之者動心，思之者痛心，但是，卻引起了中共和海外極端台獨勢力的強烈不滿。

中共的一批所謂老共產黨員，一批所謂的“人民解放軍”老指戰員，包括一些“不要社會主義祖國、偏要資本主義美國、早已移民西方國家的老共產黨人”，還有鄧力群等中共不死的“左王左棍”們，居然一起“義憤填膺”地上書中共中央，要求嚴厲處份“痛說”一文所介紹的中國大陸著名歷史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蔣介石研究專家——楊天石教授，逼他退休，停他主編的《百年潮》雜誌、甚至還要求判處他“叛國”罪……給楊天石教授造成了巨大的壓力，直至逼迫楊教授發表“嚴正聲明”，聲明朱有道先生為他的《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所寫的書評，是反共的，錯誤的，不實的，片面的，是斷章取義，強人所難……

幾乎是在楊天石教授發表“嚴正聲明”的同時，這份聲明，竟然由海外著名台獨人士所主編的鮮明台獨背景報紙——紐約《自由時報》“民主論壇”，首先用電子郵件向全世界進行了及時的傳播，進行了密切的配合，意在告訴大家，辛灝年主編的《黃花崗》雜誌所發表的，“大陸學者肯定蔣介石是民族英雄和否認蔣介石是獨裁者”的文章，是錯誤的，有問題的，現在楊教授

已經發表抗議聲明了，中共已經在國內進行批判和否定了……來自中華民國民主自由台灣的台獨人士們，中華民國台灣民進黨的海外工作者們，竟然如同歷史上曾有過的那樣，與中共作出了高度合作，雖然他們沒有公開地將這份“嚴正聲明”發表在他們那個專門用來“團結”中國海內外民運人士

的著名“民主論壇”上……

然而，正是這家中華民國背景的民主論壇，恰在不久前發表過題名為“辛灝年何以陷入四面楚歌”的文章。雖然他們並不知道，即便是這篇已經被他們以“本論壇有嚴格字數要求”為理由而刪改過的文章，卻又是辛灝年本人同意作者發表的，並且他早已閱讀過原稿和論壇刪節稿。論壇主編在發表該文後，又自己上網、廣為宣傳，大有一番要借用大陸歷史學者辛灝年自己說的“四面楚歌”一語，和一位十分正派的科學家辛明先生在首先肯定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一書的前提下，祇因某些看法不同所寫的討論文章，來達到向海內外宣傳——祇因辛灝年寫了一本《誰是新中國》，所以，今日在海外已經陷入“四面楚歌”。這就是說，雖然不承認中國，卻正在中華民國台灣執政，並正在積極準備競選中華民國下一屆總統的民進黨人士，雖然根本就不承認中華民國，卻要管別人國家的事情，甚至堅決反對任何人說中國的“中華民國是新中國”……

不可否認的是，要求處份楊天石教授的老共產黨員們，左王左棍們，他們之所以要中共中央處份楊教授，是因為，以楊教授為代表的大陸廣大歷史學者，對蔣介石作為民族英雄的研究和肯定，對中共指斥“蔣介石是獨裁者”的反思和否定，實際上就是否定了他們的共產革命和他們曾經危害民族國家的歷史——他們在給中

共中央的公開信中，已經交代得很好：“如果蔣介石是民族英雄，不是獨裁者，那我們算什麼？”

值得同情的是，楊天石教授在不得已的情形之下，也就是在中共的專制壓迫下，不得不發表所謂的“嚴正聲明”以自保，這對於每一個中國大陸的人來說，則是誰都能夠同情和理解的事情。每一個中國大陸的民眾，又有誰會去譴責楊教授的軟弱呢？敢講真話的中國知識分子，何止千千萬萬已經付出了他們寶貴的生命和一生的事業？

令人納罕的是，來自大陸的普通學者辛灝年先生，不過是寫了一本中國現代史的研究著作，不過是否定了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革命及其所篡立的偽共和國，不過是在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1895-1987）和蔣介石被中共否定、污辱和糟蹋了半個世紀之後，根據終於見了天日的歷史事實，也就是大陸人民反思的成果，反過來肯定了他們的歷史功績，肯定了由孫中山先生所創建的中華民國才是真正的新中國，中共的偽共和國不是新中國。但他說自己“四面楚歌”，卻與《誰是新中國》的發表沒有任何關係。因為，他第一次是在公開發表的“致中共無期徒刑徒王炳章博士的公開信”中提及“四面楚歌”的：“……祇因我你，在海外，都僅僅想做國內痛苦民眾的‘代言人’和‘代行人’，都既要反對中共的‘專制一統’，又要追求中國的‘民主統一’，所以，我們才被迫共享著‘四面楚歌的海外困境’，那就是：共產黨恨我們，國民黨嫌我們，民進黨討厭我們，‘中共民運特務們要仇視和誣衊我們。’”（《黃花崗》雜誌第五期，2003年4月號）

第二次是他在接受新唐人電視台訪談時又提到了“四面楚歌”：“……如果你今天在海外祇想為我們自己祖國的人民，我們自己這個可愛的祖國，我們歷史悠久的民族，盡一份心；你祇想為中國大陸十幾億沒有講話權力的人民講幾句話；那就會”四面楚歌”……”（《新唐人》電視台“透視中國”節目）

可以說，辛灝年自謂的“四面楚歌”一語，背景和原因一目了然。然而，某種勢力、並且是根本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極端台獨勢力，非要“移花接木”地將他自謂的“四面楚歌”，說成是因他出版了《誰是新中國》一書所造成，這就有些咄咄怪事了。因為，恰恰是因為《誰是新中國》的出版，辛先生才因接受了太多熱情的邀請，而在北美洲的許多大學和各地僑界講演《誰是新

中國》，他的兩百場講演所受到的歡迎、所造成的轟動，早已屢聞不鮮；他的《誰是新中國》至今已經被國內外數十上百家網站或全書轉載、或部分選載，來自歐洲、澳洲、台灣和東南亞的一份份邀請他講演“誰是新中國”的信函，祇是因為他“自顧無暇”，或“無心為之”，才靜靜地躺在他書桌的抽屜裡面……然而，辛先生卻是要真心感謝“民主論壇”的，因為，正是他們對“辛灝年何以陷入四面楚歌”一文的發表，才從反面告訴了國內無數關心著辛先生的朋友們：辛灝年（高爾品）十年自我流放在海外，豈但無任何背景，更不為任何黨派、任何政府所參養，哪怕是那個歷史上為他所肯定的中國國民黨今日在台灣的不肖子孫們，也不過是他的“一面楚歌”而已……

難以理解的是，如今天天都在“支持”著中國大陸民運人士的極端台獨勢力，特別是天天都在努力“團結”著“別國”海外民運人士的台獨人士，還有，就是天天都在咬牙切齒地談論著“台灣從來就跟中國沒有任何關係”的極端台獨人士，為什麼同時又在用著這樣的手段，來抵制、打擊“別國”——就是“中國”的人民，對自己國家歷史的痛苦反思、艱難反思和危險反思？來否定他們自己已經繼承的“中華民國”及其捍衛者蔣介石先生呢？當真中國共產黨至今未能完成的“反歷史使命”——推翻中華民國和消滅中國國民黨，從來就是由台灣形形色色的獨立人士，特別是過去的社會主義台獨人士和今日的極端台獨人士，與中國共產黨“共同擔負”起來的嗎？甚至時至今日，在共產黨已經沒有能力和絕無可能完成的時候，也祇有依靠他們才能完成這一“反歷史的使命”嗎？並且是不管用什麼手段，哪怕是採用李登輝那樣“純粹共產黨式”的“陰陽兩謀”，都在所不惜？

然而，中國大陸人民的歷史反思及其輝煌成果，豈但是中共禁止不了的，也是任何人士所阻止不了的，不論是在中國，還是在海外，不論是中共的老共產黨員們，還是那些從來就與共產黨有著說不清關係的台獨人士們。如果說歷史學者辛灝年先生寫出了《誰是新中國》，尚可算是他個人反思的成果，雖然他為此必須拋家去國、自我流放海外；真正的中國民運領袖王炳章博士曾高聲呼喊要“重建中華民國”，亦可以算作他二十年民主追求的徹底覺醒——雖然他早已被中共從境外綁架、並且被判處了無期徒刑；但是，祇要看一看由中國大陸成百上千藝術家所創作和拍攝的大型歷史連續

劇《走向共和》，看一看她對辛亥革命和中華民國的肯定，對孫中山先生的景仰之心和繼承之志，然後再去讀一讀大陸更多學者對孫中山、蔣介石和中華民國、以及真正中國國民黨的研究和肯定，再去大陸民間了解一下普通民眾對前後兩個中國、對國民黨和共產黨、對蔣介石和毛澤東的事實性比較，及其比較的痛苦心得，就可以明白，一切為著私欲而企圖阻擋中國大陸人民這一偉大歷史反思的任何行爲，都將徒勞而無功！

極端台獨主義者們，顯然是忘記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今天居然要在海外配合中共來壓制和打擊大陸人民對歷史的反思，特別是對蔣介石先生的反思，是十分地“不智”的，是要招大陸人民之恨的，甚至祇會給你們追求分裂和獨立的道路，帶去巨大的痛苦和麻煩……因為大陸人民雖然完全理解台灣民眾絕不願意被統到中共專制統治之下的正當願望，卻對於那些口口聲聲說“自己不是中國人”，時時處處都要說“台灣就是台灣、中國就是中國、台灣和中國從來就沒有一丁點關係”的惡性台獨勢力，則不論是在民族感情上，還是在國家意識上，都是不能接受的。

清醒的理智在告訴我們，在一個邪惡的“勝利者”絕不允許任何人講真話的前提下，在一個邪惡的勝利者隨時隨地都在用屠刀威脅著想要講真話的人民和知識分子的黑暗歲月還沒有結束之時，這個邪惡的勝利者既然已經用墨寫的謊言，塗改過了我們民族和國家血寫的真實歷史，那麼，我們幾代被愚弄的人民，不論是在對歷史事實的瞭解上，還是在思維、思考的方式上，都會給反思帶來重重的障礙，都會使反思本身變得驚心而動魄，都會因反思而產生一種深重的痛苦感和某種對歷史的虛恍意識——所謂真假難辨。但是，事實祇有一個，是非一定會愈辨愈明，人民的覺醒恰如理性之光，終將照耀我們民族曾被鮮血覆蓋的黑暗歷史，也一定會因為擁有了反思這一黑暗歷史的成果，而照亮我們民族、國家和人民的真正前途——這就是《黃花崗》雜誌要展開“大論戰”的根本原因。

凝視著中國現代歷史進程的種種艱難和斑斑血跡，我們將從本期起，展開“中華民國是不是新中國？中國國民黨（1987之前）是不是反動派？蔣介石是不是獨裁者和民族英雄？”的大論戰。

凝視著史詩般的歷史連續劇《走向共和》那一幅又一幅璀璨的歷史畫面，我們也因中心搖搖而決心從歷史反思的角度，針對今天中國大陸的現狀，來展開“要保

共改良、還是要共和革命”之獨一無二的大論戰。

我們將對論戰雙方公平對待。祇要有事實，有道理，有理論，有根據，我們就發表，祇要你說得對，我們就聽你的；

我們不害怕殺氣騰騰，也不怕陰陽怪氣，哪怕它淺薄愚昧，深藏陰謀，“唯恐中華民族之不亂”，“甘心助共為虐以自榜”，我們同樣會予以發表，更會予以消毒；

我們不懼怕戴帽子，打棍子，只要有“罵點”，罵得“高明”，或展示的全是馬克思主義的批判風采——不顧事實，無需證明，祇需“一言定性”，甚至“還要踏上一隻腳，叫我們永世不得翻身”，我們也發表，更不怕與之論戰到底……

就像某“論壇”不久前發表的“辛灝年何以陷入四面楚歌？”一文——本刊也照樣轉載一樣，我們也將在本期發表揚天石教授的“嚴正聲明”，雖然這份聲明對台獨者利而對愛中國的我們“不利”。至於“辛灝年何以陷入四面楚歌”一文的作者——辛明先生的另一篇文章“我敬佩辛灝年先生”，已經被“民主論壇”斷然拒絕發表的消息，恰於此時傳來，我們也毫不在意。因為“中華坦蕩蕩，小島何戚戚”……

我們誠摯地期望，任何人士，任何論壇，都能夠參加我們的大論戰，都能夠在對事實和理性的愈辨愈明之中，為著我們自己的民族，為著我們自己的中國，甚至是為著我們大家的台灣，盡一份熱忱、盡一份衷心、盡一份聰明和智慧，讓理性之光照耀全中國……。

我們最後要說的是：沒有任何政治經濟背景的《黃花崗》雜誌，雖然祇是大陸旅美學者和留學生在美國民間華僑支持之下所辦的一份季刊，但是，“真理之光”常常祇需要黑暗之中的一根火柴而已。“痛說”一文，誠如楊天石教授所言，雖經台灣和香港的雜誌發表，在大陸卻悄無影響，但一經《黃花崗》發表，竟然就為國內網站競相轉載，並對他造成了如此的“厄運”，其影響更是“深且廣”……原因何在？祇因它是在“黃花崗頭”為大陸讀者點燃了一堆真理之焰，因為這顛響著共和革命烈士沉痛呻吟的真理之焰，所劇然划開的黑暗，所迅疾照耀著的真理，所光照著的鮮血和歷史，實在是痛徹了我們故國的人心了……

歡迎參加大論戰，謝謝大家！

〔本期大論戰文章在“國民革命與中華民國”專欄〕

一條消息 幾家新聞 有真有假 虛實不一

中國現代史研究中心、《黃花崗》雜誌社

舉辦長篇歷史劇《走向共和》賞評會

本刊記者綜合報導

前言：由本研究中心和本刊主辦的首場《走向共和》賞評會在紐約舉行，場地爆滿，一椅難求，許多人祇能久久地站在寬敞的走廊上，來而復去。它似乎在告訴我們，海外華僑再作“共和革命之母”的歷史可能性……。本刊不再對該場賞評會作報導，祇是將紐約五大中文媒體的報導，轉載於此，並加“點評”，願有心的讀者也去“賞析”和“思索”……

紐約《世界日報》報導

馬佩華致詞賞評會 辛灝年評點《走向共和》

《走向共和》再現中華民國開國史

《世界日報》記者 邱紹璟

【本報記者邱紹璟紐約報導】再過幾天就是10月10日中華民國雙十國慶，在慶祝的同時，僑胞們也在緬懷著過去革命先烈如何以血淚奠定民主基石，並反思當前中國大陸民主的落實情況。在紐約，200多人5日下午一同觀賞了歷史大劇《走向共和》兩個半小時的精彩片段——孫中山先生為三民主義的建國理想四處奔走、起義，滿清末期朝廷的貪污和腐敗，國家和民族一再遭遇列強的欺侮凌辱，在在憾動、刺痛著人心，在歷史學家辛灝年先生慷慨激昂的評述中，掀起了一陣陣如雷掌聲。

《中國現代史研究中心》和《黃花崗雜誌社》昨日下午在法拉盛喜來登大飯店聯合舉辦《走向共和》賞評會，將59集完整版選出精彩片段來播映。

《黃花崗》雜誌社社長馬佩華表示，該劇是由一群人提著腦袋、抱著《豁出去》的心態來拍攝的，為的是讓大家面對歷史、緬懷先烈，並以古鑑今。她看了該劇後感到《心痛而又痛心》，並衷心期望三民主義理想能夠在全中國早日實現。

來自大陸的青年知識份子陸耘在放映評講前介紹了今年4月開播的《走向共和》背景。該連續劇經過四次修改才得以通過審查，有270名演員的龐大陣容，共59集。據說江澤民對該劇不滿。開播後引發相當大的爭議，有不少人對李鴻章的形象不同意，而拍片者主要在喚起大家的民主精神，提供新的歷史角度。此後，市面上出現了有刪節成42或36集的不完整版。

負責評講的黃花崗雜誌主編辛灝年根據每個片段發表評論，他比較劇中孫中山先生所講的話說：《大陸老百姓被迫作了馬列主義的奴才54年，卻不自知》；廣州起義流產，但卻是走向共和的第一步；他談到李鴻章是個了不起的改革家，在其他國家元首或外交家的日記中也記載著他在當時是世界第一流的外交家；在我們是弱國、並且是在專制末路的王朝統治下，李鴻章以《裱糊匠》精神為大清朝遮擋風雨，用

紀念辛亥革命

賞評長篇歷史劇《走向共和》

《黃花崗》雜誌與各界專家學者說古論今

【大紀元記者史靜 10月6日紐約報導】為了紀念即將到來的十月十日辛亥革命九十二周年，中國現代史研究中心、《黃花崗》雜誌社於十月五日在紐約法拉盛喜來登大酒店聯合舉辦長篇歷史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賞評會，吸引了各界兩百多位華人民眾前來。會中播放的《走向共和》精彩片段及辛灝年所做得講評，不時引起觀眾的陣陣喝彩與掌聲。

賞評會由《黃花崗》雜誌社義工、來自亞特蘭大的李剛博士主持。《黃花崗》雜誌社社長馬佩華首先致辭。她說，在迎接辛亥革命九十二周年的時候，來觀賞《走向共和》這部反映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歷史大戲，具有特別意義。只有面對歷史，緬懷先烈，才知道今後的路應該怎麼走。馬佩華要求觀眾用心來觀賞它。

《黃花崗》雜誌社義工、來自大陸的青年知識份子陸耘介紹了《走向共和》的製作背景資料和海外各界評論。他說，此劇在中央電視台首播後立即引起社會各個階層的極大反響。由於此劇被認為有“借古喻今”之嫌，引起江澤民不滿，因此在首播過程中即被刪節，並隨即遭禁播、禁售。目前在海外發行的四十二集和三十六集的版本均為刪節版。《走向共和》的總製片之一馮驥日前亦因“經濟問題”被逮捕。

會上放映了主辦單位精心剪接的《走向共和》精彩片段。在兩個多小時近二十個片段的播放過程中，全部由中國現代史研究所負責人、《黃花崗》雜誌社主編、近代史學者辛灝年做解說與講評。他的講評，幾乎每個片段都獲得了在場觀眾的熱烈回應，叫好喝彩聲此起彼伏，掌聲不斷。

辛灝年說，觀看這部歷史大戲，對於兩岸人民重新認識「三民主義」具深遠意義。它提醒現在台灣的國民黨考慮，有沒有按照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肩負起拯救中華民族的歷史責任。

對部分海外大陸人士認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過時了的說法，辛灝年說，一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至今符合世界的民主自由潮流，二是四九年以後

“以夷制夷”的策略、強烈的愛國精神和卓越的談判的才華，讓中國少賠款、少割地。辛灝年認為辛亥革命是歷史上少見的革命方式，不但以最少的流血爭取到了革命的成功，還對前王朝施以禮遇，是一次充滿了和平精神的革命。

劇中描述甲午戰爭、戊戌變法、辛亥革命、袁世凱復辟等重大歷史事件，孫中山、李鴻章、慈禧、袁世凱等也都在劇中亮相。辛灝年指該劇將孫中山民族、民權、民生思想準確表達；百年之前提出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思想毫不落伍；孫中山的哥哥不斷地提供資金補給，展現了華僑的愛國胸懷……他提醒大家別忘了是無數革命烈士用鮮血才換來了共和體制。他說，慈禧是專制的政治家，為風光地慶祝她的60大壽而花3千萬兩白銀修頤和園，既棄民於不顧，又不惜挪用北洋水師的軍費，還試圖用“立憲”口號來“籠絡人心”，目的就是想要鞏固愛新覺羅的一姓江山。

許多觀眾看得熱淚盈眶，並表示想去買來看或租來看，《走向共和》引發了華人對民族生存境遇的思考和對未來的美好期待。



世界日報十月六日之報導

本刊點評： 世界日報，畢竟是來自中華民國臺灣的中文大報，她對中華民國的本能感情，還是使她對中國大陸藝術家們所創作的這部再現了中華民國開國歷史的大型歷史劇，抱有一定程度的好感。特別是記者本人，據說是忍著不斷要流下來的熱淚，才觀賞完了《走向共和》的“精彩片斷”……

的中國，已經倒退到連滿清專制統治時代都不如。說他過時，不過是極少數人的看法。而這些朋友，為什麼“寧做馬列子孫、卻不願做中華兒女”呢？他相信，他們遲早會“拋棄馬列，回到孫文”，回到孫中山先生民主建設中國的道路上的。

放映和評講後，許多與會者踴躍上台發表感想。著名評論家陳破空說，相距百年的專制王朝，從本質到形式，都有驚人的相似。這已經成爲一個不爭的歷史常識。《走向共和》，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爲這兩段具有驚人相似的歷史，做了進一步形像的背書和詮釋。

他說，經濟上，閉關自守達二百多年的滿清專制王朝，正受到當時來自境外海上貿易(全球通商)衝擊；而上世紀末，閉關鎖國達三十年的共產黨獨裁政權，也同樣面臨全球經濟快速發展和一體化浪潮的挑戰。政治上，清王朝面對國內外立憲或共和變革的壓力；共產黨則受制於海內外民主改革的呼聲。

陳破空舉例說，晚清主導的「洋務運動」，等於後共實施的「改革開放」；晚清國策「祖宗之法不可變」，等於後共立場「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或「穩定壓倒一切」；晚清主張「富國強兵」和「船堅炮利」，等於後共口號「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軍事現代化」；晚清所謂「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等於後共所謂「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如今的「太子黨」，正是當年的「八旗子弟」；至於官場腐敗，百年後與百年前，不僅酷似，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

發言的還有耶魯大學醫學教授張育明、資深報人李勇、以及中國大陸留學生、歷史學博士曉黑、知名知識份子項厚祿、朱執中、沈源等。



《大紀元時報》十月六日之報導

本刊點評：《大紀元時報》是目前海外最大、最有影響力的中文報紙之一。這家報紙追求的是“真、善、忍”的人間理想境界，所以，他們的報導，相信不會違背“真”的原則。而對“歷史之真”的追求，恰是歷史劇《走向共和》的靈魂……



《明報》十月六日之報導

本刊點評：本刊感謝《明報》也能報導我們的新聞，感謝你們的報導基本是沒有失真，因為真實是新聞的生命。我們謝謝你們。



本刊點評：星島日報是海外資格最老、也是最大的報紙之一，它的報導富有廣泛的影響，特別為廣東僑胞所喜愛。近年來，它一再地恪守中立，不輕易表現立場的偏向，但對《黃花崗》雜誌舉辦的《走向共和》賞評會卻還是頗能公正，已足令我們感謝……

讨论电视剧《走向共和》

【本报纽约讯】中国现代史研究中心等机构昨（5）日下午假法拉盛喜来登大饭店二楼举办“走向共和赏评会”，向近300位法拉盛社区民众介绍了这部历史巨片的有关情况。

电视剧《走向共和》反映了从清末洋务运动后期到张勋复辟前后约四分之一世纪的重大历史变迁。但该剧自今年4月开播以来，因所刻画的历史人物与人们脑海中已有的形象迥然不同而引起极大争议，被一些历史学家斥为“胡编乱造”。有鉴于此，央视不得不对尚未播出的部分重新剪辑，将剧中袁世凯等人物过于“正面”的表现以及有借古喻今、含沙射影之嫌的部分台词剪去。

据悉，《走向共和》是越删越有魅力。目前在法拉盛、华埠各音像中心供出借、出售的《走向共和》VCD大致分为59集版、42集版和36集版等三个版本，其中，由于正版VCD出得比电视剧早，因此59集版是该剧的原版，从中观众就可看出哪些地方被删节。

本刊點評：看一看這一份“報導”吧！它便是中共公開在海外辦的《僑報》。謝謝它對我們的“反向報導”，謝謝它對《走向共和》的顛倒黑白，謝謝它就是這樣地將中國大陸的沒有新聞自由和搞假新聞的“自由”，如此赤裸裸地表白在海外同胞的面前……

花了三天時間，看完了中國大陸拍攝的《走向共和》電視連續劇，這是我看中國大陸連續劇以來最受感動的一部連續劇，它不僅提供娛樂，也提供了觀眾對中國現代史的認識。編劇與導演在中共的專政框架中，把清末到明初的一段史實簡略的呈現在電視觀眾前，粉碎了中共宣傳機器製造的謾言與謠言，響應了胡耀邦先前的說法：「把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

在觀看這部電視連續劇時，我翻閱對照兩本書，其中一本是中國大陸歷史學家辛灝年所寫的巨著——《誰是新中國》，另一本是台灣史學家黎東方教授所寫的《細說清朝》，證實了《走向共和》這部連續劇基本上是尊重歷史的。它根據歷史的脈絡及民間傳說來鋪展這部連續劇的故事，把歷史

人物的真面目呈現在廣大的電視觀眾眼前；這對一向篡改歷史、歪曲史實、抹煞真相、歪曲真理的中共政權來說，不禁演它才是難以置信的事。

這部號稱投資四千萬人民幣拍攝的電視連續劇是由中共管轄的中央電視台監製，內容是敘述一八九四年到一九一七年的中國政局波動與變遷。故事從慈禧太后垂簾聽政到百日維新，從北洋水師對日本艦隊海戰失敗到義和團作亂導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然後細述慈禧寵信依仗的李鴻章與日本及列強簽訂的種種不平等條約的經過。同時再現了從國父孫中山奔走革命到武昌起義成功，到袁世凱迫清帝遜位，和孫中山先生以“五權憲法、三民主義”引導“走向共和、創建民國”的艱辛歷程。

在展現這廿七年史實中，《走向共和》也細說了中國從帝制到共和的過程中所出現的阻難，如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等等。由於清末帝制的極權於此刻的中共“紅朝”有許多相似的地方，因此在北京放映期間引起中共黨內議論紛紛，原因是：此劇內容與中共過去五十三年來編造的歷史完全不同。民間因此劇而陷入深沈的反思中。鑑於中共一貫說謊造假的傳統，豈會容忍這種

借古諷今的現象在「天子腳下」出現，因此中共中宣部乃於零三年五月底下令嚴審《走向共和》這部歷史劇，接著又下令禁映，也不准DVD與VCD在市面銷售。

《走向共和》是四月十二日至五月十八日在北京播出，由於內容敏感，對白指桑罵槐，而且與中共一貫宣傳的史實不符，因此掀起收視高潮，其盛況超過轟動一時的《雍正王朝》與《大宅門》等連續劇。由於《走向共和》的感染力強，電腦網絡上出現不少觀後感式的評述，並產生「過去的歷史是有問題的」的質疑。它不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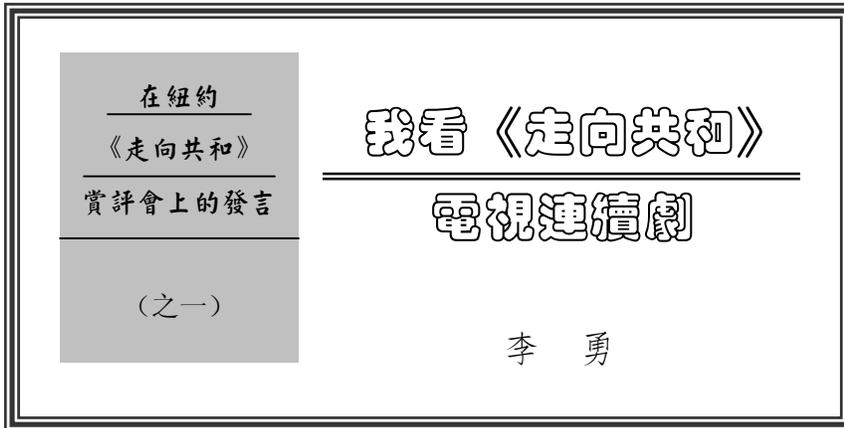
挑戰中共僵化的史觀，並否定中共篡改編造歷史的傳統，中共對它下殺手鐮，看來並非意料之外的事。

中共大陸現代史學者辛灝年先生所寫的《誰是新中國》，在描述辛亥革命前後中

國現狀上與《走向共和》基本相符，而且比《走向共和》更精細，更詳盡，但其結論與《走向共和》完全一致。記得辛灝年先生在多次演講中強調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經過歷史反思，對中共政權的建立有清楚的認識，對中共的苛暴也敢於批判，對中共過去否定的一切也有了新而正確的認識。情況繼續變下去，中共政權統治的合法性也就動搖。更重要的是，他們肯定了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中國人走向共和、創立中華民國的功德。正如辛灝年先生所強調的，中華民國就是新中國，中共政權與袁世凱恢復帝制、張勳歸復滿清，直至軍閥混戰割據，都是中國在走向共和歷程中的專制復辟。他相信，新中國，就是未來自由、民主、均富的中華民國！

《走向共和》連續劇中有許多對話可圈可點，比如電視劇第七集辜鴻銘初見梁啟超就引用英諺——約翰遜說的「愛國主義是惡棍最後的避難所」，來否定滿口民族大義、愛國主義的惡棍，這對此刻中共所高叫的愛國主義不無挖苦的意義。

辜鴻銘在與翁同龢對話中，對那些擾亂社會，妄議朝政，為非作惡之徒一概稱之為「小毛匪」，也使人聯想到蔣介石當年在台灣把毛澤東稱為「毛匪」的往事。



中共政權不論對內對外，最忌諱的是中華民國與代表民國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但連續劇中多次出現中華民國的稱呼與中華民國國旗的影像，在首集中甚至介紹孫中山與陳皓東設計中華民國國旗的經過，最後陸皓東在清兵追捕下為護旗而被槍殺！這許多劇情滿足了中國大陸人民的知情權，卻也足令中共政權上下不安。

《走向共和》裏面沒有提到國父孫中山先生的繼承者蔣介石，但在若干沒有解釋的情節中卻隱約提到蔣介石的事跡。譬如日本軍校的教官在上課時，以一塊泥土來引證中國國土，說泥土中有四萬萬五千細菌，語畢有一個中國留學生即站起來說：「不對，泥土中有五千萬細菌」；教官問他有什麼根據？他回答說：「因為泥土象徵日本」，教官大怒，把泥土擲向這名中國留學生。來自台灣的人都知道這段故事中的中國留學生就是年輕時代的蔣介石先生。

電視劇暴露了滿清王朝的貪污腐化，也描述慈禧太后的開放改革，情況與此刻中國大陸相似，但劇中不斷反復強調懲罰幾個貪官，逮捕幾個腐敗分子，無助於國家改革進步，只有徹底改變政治體系，更易政治制度，才是國家富強之道。這似乎又是在對“對症下藥”。

滿清帝制推翻後，國人一向習慣把腐敗的滿清罵得一無是處，慈禧太后橫蠻無知，光緒王懦弱無能，李鴻章喪權辱國，袁世凱淫詐狡猾，因此它們都應負起國家積弱不振之責，但《走向共和》劇集中把慈禧太后睿智溫情的一面有很詳細的描述，對李鴻章為滿清作戰失敗後面對列強簽訂不平等條約的無奈，頗付同情，甚至表現了李鴻章在忍辱負重中充滿智慧，把列強對中國的索償損害減少到最低限度。該劇即使對背上千古罵名的袁世凱也有正面的評述。劇中固暴露了他的野心，也描述了他的幹練與權謀。

據說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看完此劇後，除了對該劇為慈禧太后，李鴻章翻案表示不滿之外，還認為他對孫中山先生不敬，因為它把孫中山先生演成一個「小丑」。其實這只是江澤民的藉口，他故意藉該劇「醜化」孫中山來掩蓋他對該劇暗批中共的不滿。其實該劇對孫中山先生的描述是正確的，而且把他人性化，劇中形容孫中山先生是一個愛國愛民、正直無私的革命家，他熱情奔放，豪情大度；他眼光精準，口才卓越；他枵腹從公，節儉自勵；為了推翻帝制建立走向共和的新中國，他奉獻他一切所能奉獻的的東西，包括金錢、資財、精神、

時間甚至生命，因此他深得革命同志的信服敬重。他們因此而願意捨棄世俗的名利，不顧身家性命安危，追隨孫中山先生，一同為革命的理念而獻身。

中共上層從鄧小平起，曾經在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之前，多次說他們「不會做李鴻章第二」，但若從劇中描述的李鴻章來看，中共所有幹部，沒有一個比得上李鴻章，他們不但沒有李鴻章的才學與智慧，也沒有李鴻章在國家危難是所做出的奉獻。就以鄧小平來說，他在第二次復出後，碰上大陸全面批孔，被毛、江派去日本與日本談建交事宜。當時日本人向鄧表示侵略中國的歉意時，他居然說日本人不需道歉，相反他要向日本道歉，因為中國把孔夫子思想輸去日本使日本人受害。從這個角度看，李鴻章有骨氣多了。鄧小平想做李鴻章第二大概還不夠資格。

看《走向共和》的觀念，不難發現滿清末年的社會與當今中國大陸社會又頗多類似甚至雷同的地方。當年的滿清政府為了改變貧窮落後的國力，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但只在經濟上求變求新，在政治上仍然堅持皇權至上。因此，當時中國的民主改良與君主立憲對立，前者主張革命共和，後者主張保皇求存；而清政府則堅持專制，重用滿人，企圖永遠保住大清江山。

此刻中共政權也踏上覆轍，他們的改革開放範圍只限於經濟，不及於政治，於是海內外泛起一片體制內改革與民主革命的呼聲，彼此對立相持不下。面對這種變局，中共政權與滿清一樣，仍然堅持專制，重用共產黨人，企圖永遠保住紅色江山。

中共政權甚至效法滿清政府，在海內外製造反對民主政治的輿論，例如最流行的說法是「中國不適合民主改革」，「中國人民智太低，不知民主為何物」，「中國實施民主制度必然造成社會動蕩，國家混亂」，「推翻中共政權沒有哪一個人或者哪一個組織可以代替」。

中共政權比滿清政府厲害的是，拉攏海外知識分子。在國際上製造輿論，收買新聞文化人為他們的專制制度鳴鑼開道，他們以台灣實行民主制度所產生的局部混亂來證明中國人不適合民主，甚至說台灣民主制度實施的結果導致台獨勢力膨脹，使國家面臨國土分裂的危機，這種情形有違民族大義、愛國主義。必須誓死反對之。

在這種歪曲誇大宣傳下，中共利用經濟改革開放得到的利益去收買海外無恥文人、墮落記者，尤其是在台

灣出生、沒有嘗過中共專制滋味的知識分子，更是中共吸收拉攏的對象。於是他們均傾向於中共的「體制內改革」，反對國內外掀起的「民主運動」，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誓死維護中共那個紅色江山」。

大家輕易可以看到的是目前在紐約有一批來自台灣的敗兵之將與國民黨時代的散兵遊勇，再加上曾經是國民黨內的新聞文化工作者，他們紛紛在中共的所謂民族大義、愛國主義前倒戈，爲了中共所給的利益，爲中共在海內外奔走、呼號，他們打擊反共民主人士，排斥真正民運分子，把台灣的民主制度罵得一文不值，目的只是貫徹七零年代以前毛、江所高叫的「只有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

紐約有一名被中共收買、來自台灣的新聞工作者，他某次在參加一個歡迎中國大陸來的作家訪問團宴會，在宴席上向名作家陳忠實（長篇小說《白鹿原》作者）說：「不知道你同不同意，我認爲中國人不適合民主制度。」陳忠實先生當即很不客氣的向此人說：「你的說法我完全不能苟同！」那名台灣來的新聞工作者，以爲所有來自中國大陸的人都與共產黨一個鼻孔出氣，沒有想到碰了一個釘子，尷尬不堪，從此不敢再向中國大陸的人唱此濫詞。

國父孫中山先生也曾經在奔走革命時面臨詰難，有人問他說，中國人不知什麼是民主，也不知道什麼是憲政，政治改革只會導致國家混亂，社會動蕩，孫中山先生回答說：小孩子不識字，才要把他送入學校讀書，中國人不知道民主憲政，所以才需要實行民主憲政，假以時日他就會知道民主憲政的好處了。非常明顯，編劇者是故意引用這段話，去駁斥中共所謂中國人不適合民主的說法。

《走向共和》除了宣揚孫中山先生的「自由、平等、博愛」精神外，更強調民主憲政制度在它暴露了滿清末年的貪污腐化之後，藉劇中人的口說：要革除貪污腐化的積弊，不是抓幾個貪官污吏就可解決，問題出在制度上，只有改變制度，加強人民監督，國家才有希望。

《走向共和》是由戲劇文學家盛和煜與文學家張建傑合作編寫，由於中共高層打壓，議論紛紛，因此盛和煜把他的劇集形容爲文藝作品，並說那不是歷史教材，也不是挑戰中共所定的史觀，但中共方面對盛和煜的說法加以否定，因此它們剪去最後一集有關孫中山先生談五權憲法的演講詞，插上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宣傳片，

同時禁止這部劇集送到其它省份重播。沒有想到，中共政權的禁令下達後，該劇的DVD與VCD光碟暢銷，反應強烈，中共政權至此只好又下達禁止光碟出售的命令。這樣一來盜版者驟增，而且引發許多不同議論。在耳語頻傳中，有人說光碟影射攻擊江澤民的垂簾聽政，有藉古諷今之嫌；但另一種說法是：該劇美化慈禧太后的垂簾聽政，爲江澤民抓住軍權的垂簾聽政背書。這些說法，觸怒了新貴胡錦濤；被胡錦濤形容此劇（一）是一部荒唐的歷史劇，不符史實；（二）中央電視台副台長胡恩，影視部主任汪國輝應調職懲處。

而大陸有另一種說法是，江澤民看了該劇後，寫了一張條子給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甯，指出劇集有幾點不妥：（一）該劇把慈禧太后演成女政治家不當，其實慈禧太后是封建專制者；（二）把李鴻章演成了憂國憂民、忍辱負重、充滿機智的重臣而非賣國賊；（三）把袁世凱寫成是治世能臣，與事實不符；（四）孫中山先生演成一個輕浮狂妄的小丑人物不當，因此應該禁映。

《走向共和》送到台灣播映，改名爲《滿清末代王朝》，效果不如大陸強烈，但也引起一些對中共政權改革開放的幻想。有人認爲這部劇可以在大陸製作播放，證明大陸的胡溫政權寬鬆，也有人認爲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覺醒，不再被中共以意識形態禁錮，這是中共政策開放的結果。但台灣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前所長呂芳上則說：六四之前有《河殤》，現在有《走向共和》，這說明中共政策可鬆可緊，沒有什麼意義，也不應樂觀。

對於滿清政府囚殺追求自由民主的革命黨人，歷史學家辛灝年有這樣的敘述：「歷史的明鑑是：清王朝祇推動經濟改革，放縱經濟改革，不但拒絕專制政治行為的改良，尤其是拒絕專制政治制度的改良，特別是它瘋狂地和殘酷地殺害革命黨人，以撲滅革命的做法，不僅證明了專制改良此路不通，而且昭示了其自取滅亡的歷史過程，從反面證明了民主革命派的堅定和清醒，證明了孫中山堅持民主革命，反對專制改良和志在建立中華民國的政治科學性和歷史正確性」。（《誰是新中國》第七十九頁）

中國大陸著名作家劉曉波看完《走向共和》這樣說：「歷史在百年前，中國不但有李鴻章等人搞的改革開放，而且還有『慈禧新政』和袁世凱的『立憲政、開國會』的實踐，也有新聞自由和多黨政治，爲什麼今天號稱『共和國』的大陸上全部消失了？」

劉曉波不同意江澤民禁止《走向共和》播映的理由，他說：真正禁播的理由是「因為該劇大力張揚《共和》、《憲政》、《民主》以及《議會政治》和《政黨政治》，所以中共高層對此劇的打壓就不奇怪了，禁播此片，再次說明了胡溫新政僅止於輿論泡沫」！

其實真正令中共頭痛的還是最後一集結束時，孫中山先生的演講詞，這篇講詞講述民初的現象，與此刻中國大陸相似，就是對當今中共政權的全面否定。因黃花崗雜誌已經將孫中山的這篇講演全文轉載，本文不再轉引，請大家參閱。

2003年9月29日於紐約

在紐約
《走向共和》
賞評會上的發言

(之二)



陳破空

該電視劇展現了大量警鐘與寓言式的歷史畫卷。

譬如：劇中用相當篇幅，展示了百年前中日兩國之間的競爭和對比（這一競爭和對比迄今仍在進行）。當時，中國海軍（北洋水師）號稱亞洲第一、世界第四，結果，卻在與相對弱小的日本海軍決戰中，全軍覆沒。船堅炮利（硬件）何益？只要制度與人心（軟件）未變，表面上的富強儼然貧弱的面具。海軍走私，假彈演習，與當今解放軍情形何其相似？劇本因此昭示：不應該僅僅是富強，富強未必救中國。這是歷史一再留給中國人的警訓。畢竟，歷史上，從「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到「康乾之治」，中國的富強不止一次；今天的所謂「繁榮」，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今天的所謂「繁榮」程度，更遠非「空前絕後」。（僅二十世紀10至30年

代，那段被公認為「內憂外患」的年代，中國經濟就一直保持了平均10%以上的快速增長。）富強，為救國的必要條件，卻絕非充分條件。

這個道理，即便是那些負笈海外，「光宗耀祖」的留學生們，也多數沒有明白過來，百年前如此，百年後依然如此。比如，大名鼎鼎的嚴復，彼時，是留洋海外、學有所成的代表人物，回國後，不僅沒有為中國的徹底改造鼓與呼，反而與楊度等守舊勢力同流合污，組成所謂「籌安會」，力主袁世凱稱帝。其所學矣，學富五車，才高八斗；其所為矣，助紂為虐，遺禍千古。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是錢學森等輩，以「愛國」為名，傾其所學，充當獨裁者的「導彈之父」。在「文革」武鬥或八九年血洗我莘莘學子的槍膛中，有多少彈藥，是錢學森們的傑作？而在錢學森之後，為獨裁者歌功頌德、保駕護航者，依然前赴後繼，如李政道、楊振寧等人，何嘗不在此列？

令人痛心的是，「錢學森們」、「李政道們」、「楊振寧們」的隊伍還在不斷壯大，就在今天，就在全美、全加、乃至全世界「洶湧澎湃」的中國留學生大軍中。據說，一些人當了「海歸」後，對封殺互聯網貢獻甚巨，聞之令人歎噓！受了文明的教育，卻改不了對抗文明的「反骨」……

眼下，在中國御用知識界，甚至其對立陣營，又在流行一種說法：如果不是孫中山鬧革命，滿清通過「洋務運動」，將緩慢走向「君主立憲」，進而實現中國不流血的變革，早已迎來共和與民主。此論意在責備孫中山等人及其革命，「搞亂了中國」。同時暗示，任由共產黨統治下去，只要經濟發達了，民主自然而來。此論不管是出於理想主義還是一廂情願，也算是「一家之言」吧！然而，革命之產生，每每源於舊勢力的頑固。當權者如果不主動加快變革步伐，革命必然重演，付出的代價，不僅是舊勢力的覆亡，也將是整個社會裂變動蕩的成本。縱然有此成本，責任顯然不在革命者，而在舊勢力。

說明：

（本文原投稿本刊。後因全文已經在它刊易名發表，為避免版權糾紛，本刊祇好忍痛割愛，僅發表陳破空先生在《走向共和》賞評會上的發言部份，以示尊重）

在紐約
《走向共和》
賞評會上的發言

(之三)

曉 黑

孫中山的
終生追求
是什麼？

孫中山先生雖然在中華革命黨的黨綱中加入了「服從孫先生」的內容，並要求黨員打指模，但是應當注意的是，這是在革命遭到挫折之後的一種被迫採取的措施，是出於現實的原因進行的策略轉變。但是，不論在中華革命黨的綱領中，乃至在後來與蘇俄的合作中，孫先生都從未放棄過對民權和共和理想的終極追求，這一點才是最有價值的部分。另外，對於孫中山先生與何人合作的問題，也都可以看作是在當時環境下的現實選擇，沒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事實上，像這樣一個一生搞政治但不搞陰謀詭計，幹革命而又篤信法制的政治家，在中國近代史上，除了孫中山外，還有誰做到過呢？

在紐約
《走向共和》
賞評會上的發言

(之四)

誰
是
新
中
國

與
走
向
共
和

莊
思
明

剛才那位朋友談了自己許多有關國民黨的問題，現在我來談我與共產黨的有關問題。

我在一九五三年就是越南共產黨員。因為我是越南華僑，共產黨說是沒國界的。我滿腔熱血、提著頭參加越南革命，先後兩次被捕，受盡嚴刑拷打，死去活來，被關了約兩年。越南北方解放，我出獄到河內，當了記

者，常在胡志明身邊採訪。蘇共二十大，大罵斯大林。我在一次會上說：「越南也有斯大林，就是胡伯伯！（胡志明）」我犯了共產黨的天條。《越南之聲》電台黨委書記怒氣衝衝大罵我：「胡伯伯幹革命時，你還沒出世，你敢這樣侮辱領袖！」我被下令停職反省。

六十年代，中蘇分歧公開化，我欣賞中共反修。六五年，回北京，到新華社工作。文革開始，中共大大神化毛澤東，我公開反對這種做法。又是犯了天條。六八年四月，江青親自下令把我逮捕，全社開大會鬥我，給我三個罪名：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叛徒、越南特務。我因此坐牢、勞改十年多。七八年五月，全社開大會給我平反，說我只講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ABC。為了表示抗議，我拒絕出席那次大會。讓他們開了個沒有受害人的平反大會，非常尷尬。八零年，我準備到香港探親。中共要我給他們當特務，否則去不了。我無可奈何，只好敷衍答應。到香港後，我不理他們，反而不斷用各種筆名寫文章批評鄧小平和他的四個堅持。八五年九月九日，我在北京被捕。中共國安部向我提出兩條：「一是與我們合作，可以馬上回香港，一切保密，以後我們派人同你聯繫；不合作，就坐牢。」我考慮後回答：「我願坐牢，不合作。」因此我又坐了兩年牢。

看了《走向共和》，我多次熱淚盈眶，甚至哭出聲來。我深感痛心，幾十年來自以為是在幹革命，實際上是在幹反革命，在為復辟專制當走狗。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是在專我們自己的政，把敢於講真理、辦正事的人都逮去坐牢，而那些溜鬚拍馬、歪門邪道、貪污腐化的人，卻飛騰黃達，升官發財。《走向共和》告訴我們：只有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才是真正的共和國，真正的新中國；至於中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真正復辟專制的舊中國。

很奇妙的是，我最近讀了辛灝年先生著的《誰是新中國》。這本書的觀點與《走向共和》不謀而合，完全一致。我在讀了這本書以後，又買了幾十本，送給大陸、香港、越南、美國、加拿大、歐洲、澳洲等地的老朋友。他們讀後，反應非常熱烈，互通電話，交換心得；有的又向許多別的朋友介紹；有的還約我一起去見辛先生。所以我希望大家在看了《走向共和》以後，都來讀一讀《誰是新中國》。使我們不但在形象上認識什麼是「共和」，而且在理論上更進一步認識《誰是新中國》。

2003. 10. 5. 紐約

悉尼《走向共和》座談會

發言選

秦晉：

中國大陸拍攝的 59 集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歷經數年耗資巨大，可謂歷史巨篇。該劇反映了從洋務運動後期到張勳復辟前後約四分之一世紀的重大歷史變遷，比較翔實細緻地描繪了甲午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入侵、庚子賠款、五大臣出洋考察、預備立憲、辛亥革命、清廷遜位、民國建立、臨時約法、宋教仁被刺、二次革命、洪憲稱帝、護國討袁等許許多多重大事件的巨幅歷史畫卷。該劇還一掃以往對人臉譜化和對事片面定性之舊習，對西太后、李鴻章、袁世凱以及其他衆多滿清王公大臣的刻畫和描述沒有按照中共教科書的蓋棺定論，不脫離基本史實原貌，按所涉歷史人物的各自的行事風格、地位官價、對國勢和時局的認知以較能讓人接受的方式將他們展現於百年以後的觀眾面前。

此劇不僅是清末民初的回顧和歷史知識的基本教育，而且還可對當今中國民眾進行民主自由的教育和思想啟蒙。千家萬戶茶餘飯後坐在電視機前地跟隨劇情起伏，接受語言淺顯易懂的孫文三民主義，顯然比閱讀有關民主自由思想理論的長篇大論輕鬆自在的多。凡中國大陸所出的電影和電視劇，還沒有一部能如此清晰地條理地通過主人翁孫文本人宣揚其一生為之奮鬥和追求的民主理念，又頗為詳盡地展現出了他和他的革命黨人幾十年不屈不撓、前仆後繼推翻滿清帝制創建民主共和的具體實踐。劇末國父孫中山關於民主共和的一段獨白，雖聞已被斬截，原貌不現，但還是讓偉人以自己設計的服飾將民主共和之五權憲政娓娓道來。我們一代的男性相信都曾有過這件中山裝，但對這件服裝的五個口袋的意義一定知之甚少。胸前兩個貼袋和下擺處左右兩

個開袋分別表示民國的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和考試權，內袋意味彈劾權，從而構成中華民國憲政期的五權憲法。左右袖口的六顆鈕扣分別代表了共和的理念平等自由和博愛，民族民權和民生。孫中山先生是否真如劇中以服裝口袋宣示五權不得而知，即便是編劇的藝術加工，也可見其匠心獨具。

劇中可圈可點處比比皆是，這裏再舉兩例。例一：孫中山宋教仁等選區巡迴，有一鄉紳接待，抱怨普通百姓文化水準低，民主素養低，即使有選舉權也不會行使，只能讓他人替代。孫中山說童子五六歲尚未識字，做父親的是否因為童子不識字而不使學，鄉紳答曰正因童子不識字而使學。孫中山進而說百姓不懂民主才應使之學習民主，個人的權利又怎能被他人替代，鄉紳無言。這段對白淺顯明瞭，用孫中山先生的循循善誘來點撥當今中共官員拒絕讓民眾行使民主權利的荒謬。例二：時報記者田沫見國民黨籍參議員羅文在袁世凱的威逼利誘之下無奈的屈從就講了個孩提時從父親那裏聽來的故事，豬原本生活在山上，自由自在，被人圈養後，居食無憂，但由人宰割。人若一昧忍辱苟且，不知自身基本權利，該抗爭時不抗爭，被哀其不幸被怒其不爭，就何異於被圈養的豬。田沫的不自由毋寧死的思想精神不僅是對羅文的輕視，也是對中國百姓的提醒。

劇名《走向共和》和劇中清末民初無數仁人志士浴血奮戰欲推翻專制創建民主共和之壯舉卻引出了一個揮之不去的問題：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陸中國是真正的共和國嗎？何為共和國，根據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0 年 8 月版辭海共和國的定義如下：泛指國家代表機關和國家元首由選舉產生的一種政治制度，採取這種制度的國家叫「共和國」。很顯然中國的國家代表機關和國家元首都不是由選舉產生的，都不是由中國公民選舉產生的。當然有人願意強詞奪理說中國的黨政機關和領導人是由中國共產黨黨代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由他們代表人民當家作主，直接參加國家管理。這一代表就從 1949 年 10 月代表到如今超過半個世紀，也不問「主人」是否願意被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顯然不是共和國，卻堅稱「共和國」，此非指鹿為馬即沐猴而冠。

全劇末了一段文字說白看了讓人忍俊不禁：「創建共和的重任歷史而又必然地落在了中國共產黨的肩上，偉大而堅強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建立

了人民民主的真正共和國」是與全劇內容、與現實中國國情最為衝突的胡言亂語，有如白壁上人爲的污濁之物。但劇觀眾本人對此段胡話的墊後深表理解，沒有這段萬般無奈的權宜，這部巨片必然胎死腹中，整個劇組多年心血必然付之東流。又聞國內禁播此劇，竊以爲禁得好，本來不見得人人相爭一睹，可一經禁播，必然國人的獵奇心態頓生，反到要看一看，究竟是什麼惹惱了當局。中國老百姓有的是聰明才智，盜版本正可大行其道，可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如果百姓除了用眼看用耳聽還用頭腦想，就一定會分析和反思，中國怎麼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開了歷史的倒車。中國有過短暫的民主，但是國運就是那麼的不濟，先有袁世凱稱帝，後有張勳復辟、軍閥混戰、日本入侵、最後 1949 年中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現了封建王朝的全面復辟。國號改了，不叫帝國改叫人民共和國了，再叫帝國袁世凱就是榜樣；皇冠不帶了，龍袍也不穿了，家天下換成了黨天下，三叩九拜不興了，三呼萬歲頂禮膜拜還是保存的。孫中山先生要讓共和成爲我們實實在在的生活方式，讓它成爲我們牢不可破的信念，可是「偉大的」中國共產黨人卻讓共和成了一個名詞，一句空話，一個形式。

總之，《走向共和》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劇，筆者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去看一看，看後再想一想，認真體會劇中臺詞的含義，孫中山先生的獨白使用的都是明喻，通俗易懂，用歷史來比較和對照一下現實，答案一定就在其中。

最後，向《走向共和》劇作者、導演、出品人、演藝人員深鞠一躬。數年心血製成如此優秀作品，不但娛人，更能醒人，竊以爲對中國民衆民主自由理念的傳播之功效不亞於反中共專制獨裁民主人士十數年的奔走與呼號。

楊 軍：

看了之後，心情沈重。我只想講一點，我們應該痛定思痛，我們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生活了很多年，看了「走向共和」我們知道孫中山先生在 93 年前早就提出來，共和，三權等，而我們中國繞了個大圈子，到現在還是一黨專制，還是一個獨裁的國家，我們在海外，看了心情很沈重。這部片子的總監是中央電視臺的台長，他們都敢做這部片子，說明可能看到了中國的一線生

機，起碼我們現在在海外，做的是什麼，我們做的可能又像當年孫中山那樣，比起孫中山、黃興、宋教仁那些人，我自己覺得特別慚愧，比起那些拋頭顱灑熱血的人，我真的很慚愧，我昨天看到報紙王炳章至今仍在獄中，被中國判了無期徒刑，王炳章有四句名言，我看了之後也真的是很感動的，他提出：驅逐馬列，復歸孫文，推翻中共，重建共和。我原來對王炳章不太熟，但看了他這四句話，我非常的感動，如果我們中國多一些王炳章這樣的人，我們的子孫後代將來再看「走向共和」就不會覺得中國失去了這樣的機會。到了海外看張玉寶的，以前我們都看馮友蘭的近代史，我們都感覺我們這一代被欺騙，八十年代是寬鬆了，但不得不寬鬆，我們已經走向了世界，你不要再騙我們了，你共產黨還能騙我們多久呢，今天出了這個劇，出來後又給禁止了，因此共產黨不下臺，我們這個國家永遠是在徘徊當中，做人要有良心，我們不願再受欺騙了，今天來我想把話都說出來，我們不願到今天了，我們還被人嘲笑，還被人愚弄，還是一個專制的國家，還是一個愚蠢的國家，還是江澤民說了算，還是胡錦濤又怎麼樣，我們應該有一個真正的制度，貪官污吏腐敗到了極點，我回國做生意，那副省長就明白說，我兒子 24 歲，要出國，你給他 20% 股怎麼樣，包括李家廷，我跟他吃過飯，那個雲南省長，現在被判了死刑，這都是我經歷的事情，所以中國走向共和是從我們今天才開始做起，中國叫什麼共和，中國就是一個獨裁專制，就像袁世凱當年復辟帝制，他粉飾太平粉飾的再好，也沒有用，因爲他的根已經爛了，因此我們要創造一個從今天走向共和的機會。

秦 晉：

謝謝楊軍慷慨激昂感情充沛的發言。這點我與楊軍有相近的感受，我相信大家看這部片子是見仁見智的，我的見人見智就在這一點，我想在座談會後寫個東西，在這段時間我也在想，我們的民運爲什麼一直處在低潮，就是我們一直沒有出現孫中山、黃興式的人物，我們這一代人在從事民主運動的時候，不要說拋頭顱灑熱血，就是一點個人的蠅頭小利也不願捨棄，那能做什麼大事情，覺得寒滲，看了片子，對比一下更覺得現代民運人士的比不得百年前的，我借楊軍的藥引子說幾句。

唐培良：

我今天很感動，幾年前我經常參加這樣的會，參加民運的會。在這個會場裏，今天熟面孔不多，生面孔很多，但深度要深很多。我看這部電視劇是在報紙上看了施國英女士的介紹，說是不可多得的好作品，因此我花了三天的時間，把這部劇看完了。最受感動的一點，你說他真的也好，翻案也好，智者見智，仁者見仁，我曾經也參加過民運，到現在為止，轟轟烈烈的民運已經無聲無息了，為什麼呢？像剛才那位女士所說的，電視劇中什麼三權分立、民主理念等，我們在參加民運的時候，有幾個人真正瞭解什麼是民運，什麼是真正的民主理念，什麼是共和，沒有。而且當時的民運團體內鬥的厲害，這種內鬥實際上就是把原來在國內接受的共產黨的教育全部帶過來，海外民運為什麼一直處於低潮，就是因為海外民運人士並不知道什麼是民主，我看這部電視劇最深刻的一點就是宋教仁下鄉宣揚什麼是選舉，當一個老鄉說他們不懂，就挑幾個人教如何填選票，這就是當代中國的情況，很多人說當代中國不能實行民主，因為老百姓素質差，因此宋教仁的這段戲就告訴人們實際並不是這回事，當然我不知道當時中國是不是這樣一個情況，但這個戲就起到了這個作用，你說中國的國情不允許民主制度，老百姓沒有這個素質，那麼老百姓永遠到不了這個素質，因為沒有人去宣傳民主的理念，只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共和，但究竟什麼是共和不知道，究竟什麼是民主不知道，包括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說我們要民主，什麼是民主，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實際他並不知道什麼是民主，因此「走向共和」起到了一個啓蒙作用。我們搞民運的人，自己都不知道什麼是民主，包括原來在美國搞的一套，什麼民聯，民陣。孫中山先生他所從事的是真正的民運，包括他的對手也講他是一個無私的人，他提倡共和，推翻帝制，並不是自己要奪權，他推翻以後，可以讓位，他並不是我推翻以後，我就是當總統，但讓位以後他這個理念是不變的，你一定要堅持共和，如果不是共和，他還是要推翻你，這一點是值得我們海外民運思考的問題，我們現在說要推翻共產黨，老百姓就說你們民運人士還沒有共產黨行，推翻了你們執政，你們肯定要更差。這是老百姓不瞭解民運，民運要推行的一種民主的理念，建立一種民主體制，並不是自己一定要去執政，當然他可以去執政，就像宋教仁，他帶領國民黨去參選。

中國現代史研究中心 黃花崗雜誌社董事會

第七次財務報告

(7/1/03 - 9/30/03)

總收入	\$1194.60
捐款	\$576.00
雜誌銷售 (已收回)	\$120.00
雜誌訂閱	\$498.60
總開支	\$19380.23
印刷費	\$2885.00
打字費	\$260.50
海外發行費 (補第五期)	\$300.00
稿費	\$3259.50
郵寄費	\$1125.75
房租 (包括《反思現代史》系列電視片 攝制室租金\$3300. (含定金及手續費))	\$5700.00
辦公室水雜費 (補前)	\$317.54
電話費 (含寬頻上網費)	\$564.17
網站空間租用費 (年費)	\$229.00
會計師事務所報稅費用	\$1220.00
雜誌社接待費	\$246.36
辦公室用品	\$305.52
電視片攝制室設備	\$2033.89
雜誌搬運費	\$75.00
機票	\$587.00

說明：

- 1、部份涉及邀請的差費和接待費，及其所牽涉的雜誌社接待費用，尚未計算在內，下期公佈。
- 2、本期應付稿費為 3534.00；主編捐回全部第六期稿費為 576.00；作者謝辭稿費 274.50；目前尚無法寄達的稿酬為 198.00。
- 3、下打橫線者，為中國現代史研究中心開支費用，共 6553.89 美元。

晚清民初

新聞自由之回顧

(國內) 翔帆

編者按：我們將這篇來自國內的稿件，特意排在評述歷史劇《走向共和》一系列文章和發言之後，就是為了讓大家知道，百年之前的中華中國和百年之後的馬列中國，究竟有著怎樣的差別？今天的中國大陸相對於百年之前，究竟是進步了還是倒退了？如果不是進步，而是倒退，那末，這個倒退到底有多大？而它之所以倒退的原因和性質又是什麼？一些海外的朋友，不了解現狀，又不想去了解歷史，祇知道罵中國，祇知道罵中華，祇知道罵我們已經夠慘夠痛的國內民眾“不爭氣”，罵他們全都有“劣根性”，如果當真如此，則由本文所敘述的晚清民初的國家社會狀況，就實在難以解釋了……

清末「蘇報案」

【考其生平，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之府，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並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模】——魯迅

發生在清末上海英租界內的「蘇報案」是當時轟動一時的案件，曾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今年時值「蘇報案」發生一百周年，本文特敘述該案始末，籍此紀念百年前那些致力於共和憲政的革命先驅。

1903年5月，鄒容出版《革命軍》一書，鼓吹共和革命。章炳麟為該書作序，指斥滿清為「逆胡」，稱太平天國為「義師」，倡言有朝一日「義師再舉」。同月，章氏撰《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痛批康有為主張的「君主立憲論」，主張排滿，光復漢族。文中痛罵滿人為「東胡群獸」、「犬羊」、「蠢如鹿豕」，稱光緒皇帝為「載活小丑」。6月9日，《蘇報》刊新書介紹一則，題《讀革命軍》，介紹該書。次日，刊登章太炎《革命軍》序言。6月29日《蘇報》以《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係》為題發

表章氏《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文章一發表，立即引起朝廷震怒、中外關注。次日章太炎在蔡元培舉辦的上海愛國學社被捕。鄒容躲進一教會，後主動投案。7日6日《蘇報》刊載章太炎《獄中答新聞報》一文，繼續痛罵滿清為「逆胡羶虜，非我族類」，倡導光復革命。7月7日《蘇報》被封，報館主編陳范、愛國學社主持人蔡元培等人逃遁。相關人員陳范之子陳仲岐、帳房程吉孚、龍澤厚、錢保仁入獄。

章氏逮至租界巡捕房，英國領事拿出一本《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問是你寫的不是？章氏答曰是。於是被送入監牢。清政府曾向英領事要求該案裁判權，遭英人拒絕。10個月後，清政府外務部與各公使會商判章太炎入租界監獄三年、鄒容兩年，其餘人等當時釋放。章太炎在法庭上公開聲明「不認野蠻政府」。該案開庭時上海關道袁樹勳曾派便衣五百人準備劫持章太炎，但英國人護衛甚嚴，是以不果。沿途市民觀者如堵，有人作詩曰：

「風吹枷鎖滿城香，街市爭看員外郎」。

章太炎、鄒容以文獲罪引起社會的廣泛同情。7月6日《蘇報》記者在巡捕房對章氏進行了採訪，繼續宣傳其革命主張；吳君遂、張伯純等同志親遞書信、錢款以示聲援；社會報刊繼續刊載章氏詩文以示抗議；各國人士紛紛到監探視以示關懷，連清政府會審官員也當堂陳說「我與公等無冤無仇」。此案使章、鄒二人一時聲名遠噪。

獄中章太炎與革命黨人仍然保持聯繫。服刑期間，章太炎寫下了《獄中答新聞報》、《詩三首》、《與吳君遂、張伯純書》、《論承用維新二字之荒謬》、《孫逸仙題辭》等鋒芒畢露的戰鬥檄文發表在《浙江潮》、《國民日報》、《復報》等媒體。並預言「天命方新，來復不遠，請看五十年後銅像巍巍立於雲表者，為我為爾，坐以待之」。在獄中與鄒容二人以詩歌唱和。兩人都曾遭獄卒毆打，但滿清滅亡後的1912年章對記者說「決無此事」。章太炎在民元以後對記者說：獄中「他無所苦，但苦不准與從交談」，經申請可以讀書，可以通信。每日做工八小時，但沒有工作量要求，隨多隨少，沒有限制。決無刑罰，亦無索賄。星期天休息，有肉吃，平常素食，每餐飯量一磅。衣服居處都還淨潔。每星期有醫生看病。「犯人都胖，予亦然」。對於鄒容之死有人懷疑是被人毒殺，章太炎說：「是或有之，然難言也」。鄒容在獄中，容色憔悴，若瘋若顛，有精神病跡象。死前曾服用醫生開送

的藥品。

因曾在巡捕房拘押 10 個月，章太炎在服刑 26 個月後刑滿釋放，暫居租界外的中國公學。三天後即赴日本，受職胡漢民、汪精衛主辦的《民報》，繼續鼓吹排滿革命，致力於建立共和憲政的偉大事業。

民國初期的新聞自由

1912 年 3 月 4 日，剛剛成立不到一年的民國政府內務部以《南京臨時政府公報》第三十號頒佈了《暫行報律》，規定※前清政府頒佈一切法令，非經民國政府聲明繼續有效者，應失其效力。查滿清行用之報律，未經民國政府明白宣示，自無繼續之效力。而民國報律，又未行編定頒佈。茲特詳定暫行報律三章，即希報界各社一體遵守。§

第一章規定：「自令到之日起，截自陽歷四月初一日止，其已出版之新聞雜誌各社，須將本社發行編輯人姓名呈明註冊，否則不准其發行。」

第二章規定：「關於共和國體，有破壞弊害者，除停止其出版外，其發行人、編輯人，並坐以應得之罪。」

第三章規定：「調查失實，汙毀個人名譽者，被汙毀人得要求其更正。要求更正而不履行，經被汙毀人提起訴訟，得酌量科罰。」

此時，剛剛出版才兩個月的上海《大共和日報》也收到了政府的這條報律。憑心而論，這條報律只是要求從業者登記註冊，不得攻擊共和國體和破壞個人名譽，並無其它惡意。而倡導「風聽臚言，高位之所事，直言無忌，國民之所自靖」的《大共和日報》社長章太炎先生接到報律怒不可遏。翌日，上海報界俱進會和《大共和日報》等通電反對。章太炎先生以匿名在《大共和日報》發表社論——《卻還內務部所定報律議》。雖然匿名，而熟識先生文筆的業內人士，無人不知出自先生之手。

社論大意是：世界上的民主國家都無報律，只要符合辦報條件都可出版。滿清政府出於封鎖輿論的需要，制定了所謂報律。現在的民國政府對於殺人越貨等犯罪也未繼續執行前清法律，而惟獨聲明繼承前清的所謂報律，難道是要重蹈前清覆轍嗎？

立法的職權在國會，現在國會尚未成立，法律尚未頒佈，即使是暫行條例，也只能由國會頒佈。內務部擅自制定法律法規，已是侵權違法，怎能要別人來遵守？

滿清政府對於未能註冊登記的報館只是罰款，現在民國政府規定不准發行，這不是比滿清政府更加專制嗎？內務部的管理範圍不單言論而已，現在哥老會、白蓮教、八卦教等團體都在活動，不見取締。如果政府不是鉗制輿論，為什麼單獨下了這道報律？

難道昌言時弊、指責政府、評論約法就是破壞共和國體？內務部把政府視為無尚尊貴，難道是要替政府監督民間的誹謗嗎？

至於汙毀個人名譽，現在法律尚未頒佈，哪來汙毀個人名譽有罪名。批評別人爭權幹祿、貪贓枉法就和尋常罵人一般，如果有人面色白晳，而說他面貌醜黑，也算得上是汙毀個人名譽嗎？

現在我們將這個所謂的暫行報律擲回，所謂報律，我們絕不承認。如果不這樣，就是縱容政府的侵權行為，是容忍對人身權利的踐踏。特通電報告孫中山先生，以證明內務部侵犯人權的罪行。

社論發表後的第三天，孫中山先生親自指令內務部，宣佈取消暫行報律，取消公告刊登在 1912 年三月九日的《南京臨時政府公報》第三十三號上。

轉進「作家協會」

（上接第 128 頁）

華東局在 1954 年底便告撤銷，過了一年快樂神仙的日子，在這個時期裏，吳強完成了《紅日》的戰爭小說，我與吳強同時被分配至上海作家協會，具體工作我任作家協會機關刊物《文藝月報》副主編（巴金任主編），吳強任作協副主席兼黨組書記。

我接任《文藝月報》不久，就遇到了麻煩，起因是從老根據地南下的幾位作家、詩人，他們結成一團，想獨佔文藝月報的地盤。這時，初露頭角的孫峻青，在上海兩大報發表了憶苦思甜式的作品，一時很走俏。他投給《文藝月報》的作品，我看了不怎麼樣，未能刊出，他便聯絡幾位老解放區的作家，對我展開了攻擊，指責我偏愛上海本地老作家，排斥老區來的年輕作家。明明他們有個宗派，反將宗派主義小團體的帽子套在我的頭上。

我的兩栖身分很容易把這頂帽子扔掉，我說：「我也是老解放區來的吧，為什麼你們沒把我看作同類？『月報』是公開的園地，好茶好飯我都要」

劇中人——孫中山先生台詞摘錄

陸 耘 摘 編

第九集

孫文對康有為及其弟子講演：

大清國人人有病，愚昧之病。

被奴役者卻以為自由者，從來不知道平等為何物，不知自愛且不懂愛人，一句話，奴才不知道自己是奴才。

四書荼毒生靈，五經鈍化人心；三綱生產奴才，五常捆綁性情。這是文化之病。

普天下之大眾，食不能裹腹，衣不能暖身，而王爺大官驕奢淫逸，盤剝不止。這是經濟之病。

所有這些病症都是一個總病根，那就是政治之病：華夏四千年的封建專制。

解決辦法：走向共和。

思想之藥三味：自由、平等、博愛。

制度之藥三味：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

……

共和思想源遠流長；早在古希臘便有了初步實驗。但那過於原始，不成體系；後來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首倡三權分立，而民主憲政卻在英格蘭首開先河，其從專制到憲政的和平演變讓世界大開眼界。那麼制度一變，國勢大增，雄霸世界，至今依然。但英國是虛君憲政而已。其後又有日（本）之實君憲政。霹靂一聲，無君之憲政，也是我孫文所期望的共和，在法蘭西誕生了。盧梭巍巍高哉，把平等思想遍佈民心；百科全書派狄德羅、伏爾泰等諸位賢哲，摧毀了愚昧的神學，把博愛思想遍佈民心。時機到了，羅伯斯皮爾振臂一呼，法國人民奮起反抗專制，攻佔了黑暗堡壘巴士底獄，君主路易十六上了斷頭台，專制制度傾倒，自由踏著鮮血前進啦，紅白藍三色的共和之旗，在法蘭西上空高高飄揚

。不過諸君要知道，無君之共和，才是最純潔的憲政，也是我煌煌華夏，最終要確立的國體。

……

康有為：我是問你，我大清實行君主立憲如何？

孫文答：不可，國民均為奴才，祇留下皇帝，那要實現民主憲政絕不可能。

康有為：然則有君主而鬧共和，勢必暴力四起，血流成河，宜乎？

孫文答：若是大清皇帝識大體、知潮流，和平遜位，贊成共和，那是最好的。倘若固守專制，那就祇有推翻他，我們創造一個共和國。

第十集

孫文對李鴻章說：

天下的事情，不怕不能夠實行，就怕沒有能夠實行的人，泱泱中華一直未能自強，晚生以為首先是帶領國家走向自強的人太少。當然，國人不懂得什麼叫自強，不過，那領路的人，恐怕也領錯了路。中堂大人您佐治以來，無利不興，無弊不革，籌建海軍，修建鐵路，雖千難萬難，但還是幹成了很多大事，這是中堂您的偉岸之處；但這祇是半個中堂而已，還有半個中堂，卻酣然而睡，至今未醒。晚生所以跟中堂說這些，是因為這些話，舉國之內，唯有中堂能夠理解。歐美富強之本不全在船堅炮利，人家強大，是人家做到了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唯圖船堅炮利是捨本而求末；船堅炮利，這是中堂一生所追求的，但中堂還想再前進一步就很難了，難在大清制度，它太因循守舊，固步自封，它極不透明，更不光明正大，它像一

塊黑布遮擋著天空，國人很難吸到一點兒新鮮的空氣，很難享受燦爛的陽光，就連中堂大人您，也很難更有作為。來拜見中堂之前，晚生曾經拜見了康有為先生，康有為先生以在野之身，至今仍汲汲於維新朝政之事，但晚生以為，康先生想做的事，中堂大人已經做到了，但康先生不想做和不敢做的事情，中堂你也很難做到。

李鴻章：什麼事，這麼難哪？

孫文答：革命，像法國大革命那樣的共和革命。中堂難道就沒有心心嚮往之意？

第三十集

（康梁在檀香山蠱惑僑胞的說他們是：保皇為名，革命為實。說保皇與革命原來同流，名份有別，宗旨則一。）

孫中山駁斥說：天下事，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夫革命與保皇，理不相容，勢不兩立，而康有為以一人而持二說，首鼠兩端。其革命屬實，則保皇之必偽。其保皇之屬實，革命之說必偽矣。彼輩保皇為真保皇，所言革命為假革命。革命保皇決分兩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東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倒滿而興漢，保皇者志在扶滿而成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馳，互相衝突，互相水火，非一日矣。

孫文對梁啟超講：平心而論，我們（指與康有為）的分歧難道是為了爭誰第一誰第二嗎？不是，也不是為了要不要立憲，而是要不要保皇，請恕我直言，要革命就不要保皇，要保皇就不要談革命。藉革命之名以行保皇之實，這是要幹什麼？這是要把中國四萬萬人永遠做皇帝小兒的奴才。清朝的政體之腐敗，已是無可救藥，就像破壺漏舟，無論靠誰來修補，都無濟於事，必須徹底推翻，重新建設之。今日之局面，非革命，國家無以救存之；非革命，國家無以獲生存。可康先生死死抱住皇上，口口聲聲說，皇上對他好，他就要對得起皇上，這是為什麼？這是糊塗嗎？我要問你：我們要救的是什麼？是皇上呢？還是中國？有一句話，你肯定是知道的，古人云：不以私而忘公，不以人而忘國。可康先生僅僅受了皇帝小兒一人的恩，他就死心塌地忠於他，死也不肯轉移。卓如，請允許我說句不中聽的話，風塵女子比你老師強多了，風月場上這種忠肝義膽的故事多的是，並非你老師一人獨步天下。卓如，以你的才華和學

識，應該說早就洞穿康有為的私欲和野心……

第三十三集

孫文：我翻譯的三民主義和我黨的三民主義有聯繫也有區別。我剛來美國的時候，我跟他們講三民主義，美國人聽不明白，後來，我就引用了林肯的三民主義。我黨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就是民有主義，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二人所可獨佔；民權主義就是民治主義，天下者人人皆有治之之責，亦應負治之之責；民生主義就是民享主義，天下既為人人所共有，那天下之利權，亦自當人人所共享。

我黨的主張千條萬緒，三民主義是我黨主義之黨綱。（按：指中國同盟會，即後來的中國國民黨）

那清廷的專制是個什麼東西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不是民族主義，這是家族主義，一家一姓主義，故曰：專制。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不是民治主義，這是治民主義。國民從物質到精神，都永遠是奴隸，這種治民的主義也曰：專制。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誰在享受呢？達官貴族，誰在受苦受難呢，國民哪，這種奴役國民的主義，它更是專制。

一句話，我黨的三民主義之民，乃國民當家作主之民，而清廷所謂的民，不，包括幾千年的封建專制，是一個永遠被奴役的民。我黨的任務，便是以至公至正之三民主義去戰勝封建社會至歪至私的專制主義，去創建一個真正民主自由的共和國。

第四十六集

孫文：……專制和法制是大是大非問題，法制它是個新事物，國民還不熟悉，人民還很陌生。如今專制方死，法制方生，就在這方生方死之間，一不留神，舊制度它就很容易復辟，希望你（田沫）寫一篇警惕“新瓶裝舊酒”的文章。

第五十集

孫文：共和革命和以前的革命大不相同。太平天國也是（要）打倒清廷，但政治制度沒有多大改變。我們的共和革命卻要改革政府組織制度，改善國計民生，一切從頭做起。簡單的一句話：前代的革命是英雄革命，

現在的革命是人民革命，革命的宗旨是爲了全民的平等自由。

……

凡共和之事，文當竭盡全力。

……

民國建設，是民權，民生二者並駕齊驅的，祇有一部《臨時約法》是不夠的，祇要是共和，在民權這一基本點上，應該說是沒有分歧的。我們要在制度上解決約法上說的：民國，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我們還要繼續努力。

……

共和革命分三期而行：軍政期、訓政期、憲政期。現在辛亥革命成功了，軍政期結束了，我們現在進行的是訓政期，我們共和國所言的訓政，和帝制時代乃至專政時代的訓政是截然不同一樣的。須知共和國的皇帝是國民；以五千年被壓迫的奴隸，一旦站立起來讓他們做皇帝，那是定然做不好的。比如說，未來的內閣總理也罷，未來的大總統也罷，他們都是代表國民來行政的，他們就能一下子做好這個代表嗎？我看不一定。所以也必須訓政。

……

中國封建了幾千年，民國肇始。國民一下子要站立起來做主人，能行嗎？執行者一下子就能自覺自願地做國民的行政代表嗎？所以我們沒有別的辦法，我們祇好靠督導的手段，去督促國民，來學會做好主人，同時也是教育培養那些國民的代表，自覺自願地接受國民的監督。這就是我們所謂的訓政期。

……

同盟會共和革命誓言其中有一條：“耕者有其田”，和“平均地權”是一個意思：國家把地主的土地買過來，再分給農民。

用制度保證。行政官員一定要清正廉潔，活人要勤政愛民，還需要給死人招魂嗎？民衆和政權之間，一定要由包青天這樣的清官來維持嗎？

民國民衆當家作主之國

按照憲法，民衆委託政府來行使權力，那麼各級政府應該爲民衆辦事，爲民衆服務。我很擔心害怕一旦掌了權就會違背這個宗旨，藐視憲法，甚至倒過來奴役民衆。

人人守法就能解決這個問題，說起容易做起難，但



《走向共和》劇終時孫中山先生演講“共和”……

是再難也得要堅持做；立了憲法，還要立行政法、刑法、財產法等，這立法是不能停的。但到頭來，要是沒人遵守的話，這個法就沒有用了。

上行下效，才能讓大家都守法。你要讓老百姓遵守法，當權者首先要遵守法，如果說他要違背了法，那就要受到懲治，那就要曝光。如果大總統違反了某些法，也要立刻懲治，那這樣，老百姓還會不遵守法嗎？要讓這上行下效成爲一個良好的規矩，其實也是四個字：從我做起。

第五十一集

我曾經說過，十年以內爲中華民國的訓政期……這時期的訓政，也就是請人民好好地練習，行使參政議政權，尤其是（行使）選舉權的好機會。同時，政府行政官員也就會在實踐中更深刻地領會什麼是民主政治？什麼是代議制度？文以爲，共和之路還很長，還很艱難……

第五十二集

孫：在現代的共和國家裏，共就是說國家權力是公有的，國家的治理，是我們所有國民共同的事業。和就是合群力而治國，就是民主啊。如今，咱們就是共和國了。可這人民的民主權利，怎麼能剝奪呢？那還叫什麼共和國呢？這是你們的選票，這是你們的民主權利，去填寫你們自己最中意的人，能代表你們的利益，然後在國會上去替你們說話，你們想填誰就填誰，不要聽別人的，更不要讓別人來代替你們。這就是競選哪。國會議

員的候選人哪，他會發表演說的，你們大家呢，都去聽他的演說，誰對你們的心思哪，你們就選誰。

……

孫文：蕭鄉長，你剛才說，老百姓還不知道什麼叫民主權利，你有這個想法、觀點我不怪你，城裏頭啊，還有那些研究院，專門研究民權的專員呀，他們都這麼說。可這是不對的。如果有人告訴你，因為你的孩子不識字，就不需要上學堂，你怎麼說？

鄉長：胡說八道，正因為不識字，才要上學堂。

孫：對呀，所以有人說，老百姓的素質低，不可實行民權，這就跟孩子不識字就不用上學堂一樣荒唐可笑……你們呢，要特別珍視自己的民主權利，大家呢，多聽一些別的候選人的演講，包括別的黨的候選人的演講，從中選出最對自己心思的那個候選人……

第五十七集

孫文：英國的憲政和皇帝可以並存，日本也行，唯獨咱們中國不能有皇帝，（因為）沒有皇帝他都敢搞專制主義，有了皇帝，當然，他還可能當一陣憲政皇帝，久而久之啊，他一定會是一個朕即天下的封建皇帝，這就是咱們的國家啊，有兩千多年的封建歷史。皇帝，就（這）兩個字，可它是封建主義的招魂幡。

……

孫文：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凡一切腐朽的制度，其滅亡也都是自掘墳墓。

第五十九集

孫文：我知道，你們很著急。張勳復辟了，國會又開不成了。我們本來是共和國，可怎麼一次又一次地出現了封建主義、專制主義的東西，這個問題不解決，專制復辟，就是必然的，共和國就永遠是一個泡影。

共和的觀念，是平等、自由、博愛麼，可民國六年來，我們看到的是什麼？各級行政官員都視法律為糞土，民衆，仍被奴役著；

民國應該自由之國，可民國六年來，我們看到的是什麼？是祇有當權者的自由，權力大的有權力大的自由，權力小的有權力小的自由。民衆，沒有權力、沒有自由；

民國應該是博愛之國，可民國六年來，我們又看到的是什麼？是祇有民衆對當權者恐懼的愛，而當權者對

民衆，祇有口頭上虛偽的愛。

民國，更應該是法制之國，可民國六年來，我們看到的是行政權力一次又一次地肆無忌憚地干涉立法。你不聽話，我就收買你，你不服從，我就逮捕你；

那行政是什麼呢？應該是服務於國民，行共和之政。可民國六年來，我們看到的是什麼？是一個打著共和旗幟的家天下，在這個家天下的行政中，我們根本看不到透明的行政程序，更看不到監督之制，那些行政官員，是如何花掉民衆的血汗錢？民衆不知道那些行政官員把多少錢揣進了自己的腰包，你們不知道吧？我也不知道；

你們都知道司法是裁判吧？這個裁判的原則是什麼？是一部主權在民的共和國憲法，可民國六年來，我們根本沒有看到，這麼一部憲法麼，就那部不成熟的《臨時約法》，也一次又一次地被強姦。對了，我今天穿的這身衣服有點古怪是吧？連裁縫都說是很奇怪的。我要說，這就是共和，這就是共和的衣服，這邊，我設計了三顆鈕子，共和的理念就是平等、自由、博愛；這邊也有三顆鈕子：民族、民權、民生；那憲法呢？我發現了個新詞，叫五權憲法。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這三權叫間接民權。這裏裝的是立法權，這兒裝的是行政權，這兒裝的是司法權，這三權你們都很熟悉，叫間接民權。我情有獨鍾的是直接民權，要讓普通的民衆，都有直接參政、議政的權力，一個，是考試權，我們要把考試權還給民衆，今後，凡行政用人，一定要經過考試，不管是誰。還有一個是彈劾權。沒地方裝了，不急不急，裝在這兒。爲什麼要把彈劾權裝在裏面呢？因為它是民衆的殺手鐮，它說不定什麼時候，就突然殺出來，彈劾你。我孫文此生，沒有別的希望，就一個希望，那就是：讓共和不僅是一個名詞，一句空話，或一個形式，要讓它成爲我們實實在在的生活方式，讓它成爲我們牢不可破的信念。

第五十七集

中華民主共和國萬歲！

本刊增加榮譽訂戶：

金橋 張明泓 等

一個跨文化的傳播者

——法國學者論孫中山

作者：Marie-Claire Bergere

曉黑 譯



在追尋歷史真實的名義下，多數歐洲和美國的歷史學家持續地質疑孫中山的人格及其貢獻，強調他作為個人的弱點，作為思想家的缺少連貫性，以及作為革命領導人的諸多失敗之處。為了破壞歷史神話，他們推出了無懈可擊的研究專著，強調他們的科學和實用主義的研究方法與他們的中國同行的觀點有多麼不同。

由此，有關孫中山的史學研究已經成為兩種不同的歷史寫作模式衝突的重要地帶，也成為中西學者相互隔閡的一個無盡的源泉。對孫中山的研究既被造神的努力、也被消解神話的意圖所扭曲。面對中國歷史學家的政治建構，西方學者鎖定了一個實證主義的立場，這一立場在破除英雄崇拜的旗號下看似無懈可擊，但同時他們也受到這一方法的局限。1979年以後在中國重新興起的對孫中山的研究在西方並沒有引起反響。在西方年輕學者當中，對孫中山崇拜的拒絕導致了對因這一崇拜所產生所有分析的排斥。例如，對

西方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作用，中國沿海地區在民族主義覺醒中的作用等課題。孫中山在中國史學界之無處不在的影響，與他在西方的全面淡出形成了鮮明對照。

毋庸置疑，現在到了結束這一矛盾現象的時候。在公式化的中國官方史學和西方專著支離破碎的視角之間，難道再沒有空間對孫中山的生活與事業進行一個全面的評估？本書正是這樣一個努力。在對中國早期現代化過程中經濟社會層面的變革從事了大量研究之後，我感到轉而研究這個通常被看作促進者、理論家和革命象徵的人是理所當然的。

孫中山，一個成長在夏威夷和香港的廣東人，不折不扣是沿海中國的產物，這是一個由沿海省份，海外華人社群構成的，對外國影響開放的中國。旅行，交際，以及這個農家子弟在教會學校接受的教育促使他走入現代世界，並激起了他心中的一個欲望：要在這個世界上為中國找到一個相稱的地位和作用。

起初，他和秘密會社聯絡，集中精力組織起義，但最終他使自己為新興的知識分子階層接受，並且成為民族和共和革命黨「同盟會」的領導人。1911年革命後，孫中山短暫地擔任了共和國的總統，但共和國隨即蛻化為獨裁和無政府狀態。孫中山對中國民族命運和自身使命的信念從來不會動搖，他在廣東建立起基地，組織進步力量向北京軍閥奪取政權。1924年，西方國家的敵視迫使孫中山和蘇俄結盟，並從這一模式中獲取靈感，對他的黨——國民黨——進行了重組。

基於這些事實，孫的讚美者為他構造了一個完美的形象：一個有魅力的領導人，理論家，由狂熱的愛國熱情驅動的行動者，他完全瞭解現代化的要求，但是卻被他的缺陷或社會經濟本身的落後所制約。

真實的孫中山不是被他的讚美者所描述的一個固定不變的形象。通過他自己的一言一行，成功失敗所表現出來的孫中山幾乎是與我們同處一個時代的人：一個傳播者，一個媒體天才，他幾乎是為噴氣式飛機，傳真機和電視的時代而生，儘管他在當時只能依賴輪船，電報和報紙。雖然17世紀末葉的法國可以稱為「路易十四的法國」，20世紀早期的中國卻不是「孫中山的中國」，但孫本人仍為他所處的歷史情境所規定，而他也正象徵了這一歷史情境：一個正在走向現代的中國。

變革問題，仿效西方模式問題，拒絕或是轉化傳統的問題向來都應該是通過思想文化辯論和知識分子的思考來展開。但此刻，這一過程卻是通過孫中山這個本能地抓住了他所處的時代的精神，理解時代的力量並將其轉化為行動的人來傳播的。在清帝國將要終結的時候，他把對朝廷的仇恨變為所有反對派的熱門議題，接下來，在 20 年代，他集中於倡導反帝的民族主義，在上述兩方面都為革命聚集了支持力量。

他本能的天賦使得他從一開始就抓住了最根本的發展問題，雖然這些發展本身才剛剛起步。他預見到技術官僚對民主制度可能造成的危險，他強調基礎設施（交通，能源）在經濟現代化中的作用，企盼建立一種新型的外交和國際經濟合作關係，以超越或化解舊的敵意。他的這些「烏托邦」設想雖然被他的同代人譏笑，現在看來很多都是先知式的預言。

孫中山敏銳的眼光得益於他本人在社會上長期所處的非中心的，邊緣的位置。他出生於廣東省南端，長在夏威夷，在香港受教育。直到 1912 年，他 46 歲時回國之前，他一直居住在中國以外，在日本，東南亞，美國，歐洲間旅行和活動。

不論他走到哪裡，他都能發現中國移民，商人，學生和流亡知識分子的群體。這一相互聯繫的海外中國人群體仍然與祖國保持著多重的聯繫——家族，宗教，方言，和經濟的。這種緊密聯繫超越了疆域和民族的界限，使孫中山持續地認同儒家文化的某些特定方面，同時又鼓勵他轉向現代化。他從地球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在龐大的海外華人的網絡中從一個連接點走向另一個連接點，這使得他既發現了世界，又沒有與中國文明隔斷。於是，他以一種世界性的觀察者的批評眼光來看待自己國家的政治和社會，但又並非置身事外——他以一個外來者的眼光評判著中國，卻又作為兒子來深深愛著他。

孫中山為了革命事業足跡踏遍全球。他承擔的，或者說上天賦予他的使命（對於這個基督徒來說是一回事）就是拯救他的國家。為了這個壯志，他獻出了他的生命，精力，和才能，但不僅是作為理論家，組織者和將軍（雖然他也擔任過這些職務）和才能，而是作為一個傳播和交流者的才華。

他極大的地域流動性 賦予他的思維和性情同樣大的靈活性。他能夠像跨越地理障礙一樣輕易地跨越文化

障礙，適應各種社會和形形色色的人。一些批評家把這種靈活性和適應性看成前後不一甚至一種欺騙，但是，孫中山最主要的力量在於他的說服力。他知道，要說服一個人，就必須用與之打交道的這個人本人的語言說話。他既擅長在傳教士的圈子裏，也能在秘密會黨的會所，各種行會和學生的文化社團從事政治活動。不論在東京，倫敦，舊金山，他都可以如同在香港，河內和新加坡一樣活躍。

他隨時隨地地學習各種思想觀念，並隨時隨地傳播它們，孜孜不倦地向各類背景迥異的人們呼籲他的訴求。他始終在找尋合作者和同盟，試過包括中國軍閥，美國銀行家，法國軍方和日本政府在內的不同勢力。的確，這種複雜的接觸給人一種至少是雜亂無章的印象。孫中山從在西方被認為是二流思想家——亨利·喬治，莫裏斯·威廉——的人中汲取思想，從冒險者，外國人，理想主義者和被自己的社會排斥的極端分子中尋找著朋友。

然而，這難道不正是那些在兩個或多個文化的邊緣活動，試圖建立某種聯繫的人們的共同命運嗎？孫中山所完美地代表著的文化中介或「跨越邊界者」階層，本來就不會出自傳統的學術和權力精英，而恰恰是從被排斥的，憑藉信念和雄心自學成材的人中間誕生。他們熟悉幾種文化，但未見得精通其中一種。孫中山在中國古代經典方面可能不如一個低級的滿清官員，但是他當他 1896 和 1897 年間住在倫敦的時候，他知道如何為中國的改革事業去贏得英國公眾輿論的同情，怎樣去「促銷中國」——借用今天的廣告用語。他關於民族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的見解並不比其他同時代的中國人更犀利，但是正是通過孫中山，住在廣東，上海和北京的人們瞭解了西方的思想和制度。

追溯孫中山的道路就是重構一個關於邊界跨越的歷史。它意味著偏離正統的政治史和思想史的陽關大道而試圖從後門走進去，接近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孫中山的一些看似平凡的經歷全都充滿跨文化交流的意味。

這個在經濟文化全球化的旗幟下行將結束的二十世紀怎能不承認孫中山是它的孩子？現代中國怎能不把孫中山看作創始人？很長時間內，孫中山在中國被看作一個不幸的先驅，一個失意的空想家。作為一個

過渡人物，孫中山佔據歷史舞臺的時間仿佛僅僅是一個穿插，以等待真正的英雄人物登場。毛澤東以鐵拳和他的學說恢復了中國的主權和制度穩定，發動了經濟現代化運動。但是，不論毛澤東的百年誕辰慶典多麼熱鬧，人們的觀點終將改變，隨著 21 世紀「大中華」的崛起，共產主義的實踐終將不過變成孫中山所預言的革命和現代化的一個過渡期而已。

譯者註：

本文是法國當代最負盛名的中國歷史學家 Marie-Claire Bergere 女士出版於 1994 年的專著《孫中山》的引論。譯者根據斯坦福大學出版社 1998 年英譯本轉譯，有適當刪節。標題為譯者自擬。



三、《政治五原則》第三章「民主原則」之第三節「六權分立」之第二小節：

3.2. 六權分立

我在立法、執法、司法、考試、監察五權之上，增加了一個貨幣權，構成了六權分立。六權分立不僅彌補了五權分立的缺陷，也繼承了它的優秀學說。雖然六權分立與五權分立僅一權之差，但在立足點上和結構上是完全不一致的，效果也完全不一樣，最主要

的差別是六權分立又回到了三權分立的基礎上，仍然是三權分立的格局。

我把六權區分為大三權和小三權。立法、執法、司法為大三權，考試、監察、貨幣為小三權。三權分立的大三權是小三權的基礎，小三權受立法權的監督，對大三權起補充作用。因此，對於行政部門來說，小三權是獨立的。

考試、監察、貨幣小三權的權力，原本就是國會的。國會將這些固有的權力授予三個獨立的部門，目的是提高小三權的效率，促進小三權的穩定，減少大三權的磨擦。這樣設計是考慮了中國的國情。因為中國的民主始終是脆弱的，要建立一個固若金湯的民主制度，還需要一定的歷史進程。在這種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民主憲政的穩定、尤其是國會的團結至關重要。小三權在國會的議程中是三樁大事，各黨派肯定要起紛爭。如果將小三權獨立出去，就可以避免政治爭執，國會就可以把精力用來處理其他重大事情。

小三權的另一個目的，就是進一步削弱執法權，強化國會的力量。考試、監察、貨幣三個獨立部門的決策，行政部門無權干涉，也沒有發言權。這不僅有力地促進了幣值穩定、文官制度建設與廉政建設，而且明確地對政府進行了限權。由於國會具有監督權，小三權與國會事實上屬於一個大的體系，六權分立成爲一種「2+4」的三權分立模式。在三權制衡中，需要體現國會至上思想。國會至上並不標誌打破三權制衡，其著眼點在於捍衛國會固有的不可分割的權力，避免削弱和肢解國會的力量。

人事權是政治中的一項主要權力，是操縱政治機器之手。小三權理論的一個重要成果，就是人事權的三權分立。美國憲法把任命高級官員的權力歸於總統，卻沒有明確把免職權授予任何機構；從制憲會議到今天，在美國歷史上引起了反復爭論。因此，現代憲法要明示人事權的劃分，消除憲法爭端。我把人事權分解爲資格權、任命權和免職權，由考試部門掌握人事資格權，由執法部門掌握人事任命權，由監察部門掌握人事免職權。人事權分別掌握在三個完全獨立的不同部門手裏，徹底根除了人事專權機制。這種權力分離和分立產生了多重效果。人事權三權分立，一是從根上抑制了吏治腐敗，是建設一個開放的靈活的

文官制度的基礎；二是考試權和監察權賴以存在擁有實權的根本；三是進一步削弱了行政權。

立法、執法、司法大三權由國會、總統與內閣、最高法院掌管，那誰來掌握小三權呢？這確實是頗費思量的。在孫中山先生的設計中，考試權由專門的考試院來掌管，監察權由監察院來掌管。這種設計有一定的缺陷。首先，考試權不能掌握在官僚部門手中。成立一個專門的考試院，不僅浪費錢，而且又是一個官僚機構；監察院的權限又太小，池塘不大。因此，我拋棄了孫中山先生的舊方案，從國際和地區經驗中積累思想，另起爐竈。我設計由中央研究院來掌握考試權。這樣做能一舉多得，既避免了另設機構節省了經費，又強化了知識分子的政治地位，而且只有中央研究院才符合考試權所要求的獨立、中立、權威三種性質。我總結了香港廉政公署的經驗，設計由廉政總署來掌管監察權，廉政總署這個名字有現代民主色彩，而監察院則是封建專制中的特有名詞，不宜在民主政體中採用，而且廉政總署的權限要比監察院大。根據美國聯邦儲備體系的經驗，我設計由獨立的中央銀行來掌管貨幣權。

六權分立始終恪守分權與制衡原則，使權力互相牽制，防止權力集中。2+4 的模式使立法權相對於執法權有一定的優勢，這並不破壞制衡，而是致力於維護制衡原則。這種模式考慮了中國獨特的歷史因素，因為執法權一端加了一個專制基因的砝碼，只有使天平偏向立法權一端，才能夠與執法權取得平衡。

四、《政治五原則》第四章「法治原則」之第一節「鞏固憲政」之第一小節：

1.1.1.立憲

民主雖然是救世良方，但也不是包醫百病的神藥。民主並不承諾社會公正。印度和巴西都是民主國家，但觸目驚心的不平等、貧困和苦難，與極權專制有什麼區別？中國作為一個人口眾多、貧困落後的發展中國家，在內在邏輯上必然要步南亞和拉美民主的後塵，而不是超英趕美的夢想。

沒有一個全盤方案，實不足以救中國。中國民主運動目前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從理論上解決中國的前途問題。而中國要有一個好的前途，就要有一部好

的憲法。立憲是目前最為重大、最為基礎、最為關鍵、最為緊迫的課題。

在我之前，最有思想深度、理論深度和創見的憲法方案，就是法學家于浩成先生的「八字憲法」。但「八字憲法」不能夠回答中國的所有問題，在理論上沒有能夠完整地解決中國的前途，不是一個完善的方案。我的新五權憲法和八字憲法相比，就是多了一個民生支柱，但理論境界和深度是截然不同的，因為我抓住了這個時代中國最為重要的思想主題。在這個意義上說，新五權憲法可以說是八字憲法的理論昇華。

我在 1993 年就形成了政治五原則的思想，並演化成了新五權憲法。所謂新五權憲法，就是五項主權憲法，將政治五原則作為憲法的五根支柱。為與孫中山先生五權分立的老五權憲法相區別，故標榜為新五權憲法。

中國要有一個鞏固和完善的憲政，就要有一部良好的憲法，所以憲法問題是所有理論中最重要問題。「建築一座偉大的工程，需要工程師事先有詳密的設計，然後繪製精密的藍圖，其高度長度以及載重經久等等，一切都依這設計的藍圖而定。如果沒有經過工程師的設計，或是設計不精密，這種工程非但不大可靠，而且會含有危險性的。憲法和憲政的道理也是一樣，如果我們要想建設一個完善的憲政國家，我們必須有良好的憲法，因為憲法就是實施憲政的藍圖。」

要建立一個鞏固的憲政，憲法方案必須得到全民的認同，這一點很重要。新五權憲法是一個能夠得到全民從內心深處加以認同的憲法方案，因為它表達的是全民的心聲-----「它維護任何人想要放進去的任何東西」。

新五權憲法不僅對三民主義思想體系本身很重要，而且對中國的前途很重要。新五權憲法就是為中國未來繪製的一幅完美藍圖。依靠新五權憲法，中國就可以沿著臺灣經驗之路，走向國強民富，矯正和避免中國通往拉美和南亞的道路。而且只有依靠新五權憲法，中國才有生路。這是救中國的唯一途徑。新五權憲法不是要讓全民族去擠獨木橋，而是踏上民生的坦途。

五、《政治五原則》第四章「法治原則」之第二節：

2.政治五原則

2.1.五項憲法原則

我們首先要問，憲法是什麼？西方的學者們對憲法概念作了多種解釋。《美國百科全書》的解釋是「憲法是治理國家的根本法和基本原則的總和」。英國學者肯尼斯·克林頓·惠爾認為「憲法是指那些體現在一個文件或幾個密切相關的文件之中的規則的總和，而且，這種規則幾乎不可避免地僅僅是一種法律規則的總和。因而，在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看來，憲法和管理一國政府活動的並且是體現在一個文件中的法律規則的總和。」

在憲法學界，憲法概念是很明確的。憲法是根本法，是各種原則、基本法則或基本規則之總和。我提出政治五原則的目的，是要建立以政治五項基本原則也就是五項主權為基礎的憲法，即新五權憲法。和四項基本原則之類的東西不同，自由原則、人權原則、民主原則、法治原則和民生原則，這五項政治原則，才是真正的憲法原則。

在憲法中，憲法原則的基礎是憲法原理。沒有憲法原理，憲法原則必然是凌亂的、不系統的、不緊密的。新五權憲法的原理，就是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孫中山的民族民權民生以及法國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這三個憲法原理是完全重合的、一致的，只是一種不同的闡述形式。這三個憲法原理，均可以納入到一個哲學基礎之中去，這就是民生哲學。

從哲學基礎到憲法原理再到憲法原則，新五權憲法的層次是分明的，邏輯是嚴謹的，結構是清晰的。這種框架闡明了新五權憲法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民族民權民生的民主國家，要建立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民選政府，建立一個自由平等博愛的民生社會。從民有民治民享、民族民權民生、自由平等博愛這三大目標可以看到，新五權憲法作為根本法，簡明扼要地厘定了憲法的宗旨、目標和任務。

從社會領域到政治領域到經濟領域，各種原則性的東西紛繁複雜，這是社會複雜性、政治複雜性和經濟複雜性的具體表現。那麼憲法理論怎樣來應對這種複雜局面呢？也就是說憲法怎樣才能綜合成為根本法呢？這就需要我們通過現象學還原，把許多複雜現象還原為簡單現象，以便確定複雜世界的簡單規則。依

靠潛藏在複雜世界背後的簡單規則，憲法才能成為各領域的根本法。

政治五原則就是從複雜的社會、政治、經濟領域中提煉和還原出來的簡單規則。自由原則和人權原則是憲法的社會原則，民主原則和法治原則是憲法的政治原則，民生原則是憲法的經濟原則。因而政治五原則涵蓋了社會、政治和經濟三個大領域，實現了憲法的綜合性要求。

政治五原則是憲法的元規則，也就是統率性規則，元規則為低層次規則創建了一個框架，凸顯了憲法的根本法特徵。元規則是總體性規則，旨在使整個規則系統保持協調，使制度體系具有邏輯自治的基礎。用制度經濟學的術語來說，以元規則為基礎的內在制度減少了世界的複雜性，使整個制度體系完全建立在憲法的基礎之上。元規則的一個例子是這樣一條規定，即憲法法院可以對新法律進行復審，以弄清其是否有悖於憲法原則。

政治五原則是憲法中具有約束力的組成部分，是規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的根本原則。它集中體現了憲法的基本精神，統率憲法的基本內容，貫穿於憲法的始終，決定和影響憲法的其他原則和規定。政治五原則是五個大原則，每個大原則又由眾多小原則組成，形成母原則和子原則的原則體系。因此，憲法是一個原則集、原則叢或原則群。同時，政治五原則又可全部還原為一個原則，這就是人民主權原則。讓·布丹在《論共和國六書》中指出，主權是最高權力、絕對權力、永恒權力。讓·雅克·盧梭則提出了人民主權理論。主權在民原則是憲法的根本原則，是憲法的出發點，只有人民才具有最高權力、絕對權力和永恒權力。主權在民原則是一切權力的源泉，是所有權力的賦予者。人民依靠人民主權獲得自由、平等、生命和財產等自然權利的保障。憲法是人民的契約，是人民主權的保障書。

人民主權原則確定了憲法的最高地位，是一切立法的法律基礎，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凡與憲法相抵觸的法律和其他規範性文件，都應廢止或者修正。政治五原則是人民主權原則的具體規範和表現形式。依靠政治五原則，才能建立一個自由化、民主化和民生化的民生國家，民生國家理論正是人民主權的基本意志所在。

憲法原則是制憲者在制定憲法時所依據的基本理論，是設計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時所遵循的根本標準。憲法方案如果缺乏對憲法原則和憲法理論的洞察力，必然會是不完善的。我所設計的以政治五原則為基礎的新五權憲法，以其內在的邏輯力量，得以成為這個時代最好的憲法方案。

2.2. 政治五原則與羅爾斯的正義論

羅爾斯的《正義論》是現代自由主義的巔峰之作，我的政治五原則理論體系，就是建立在羅爾斯正義理論基礎之上的，是羅爾斯正義理論的引伸。

羅爾斯的傑出貢獻主要在於他提出了正義的兩個原則，第一個原則是自由的平等；第二個原則是民主的平等。民主的平等包括差別原則和公平的機會平等原則。西方啟蒙時代就舉起了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大旗，但古典自由主義只保證了自由，「平等的問題被考慮了但沒有被解決，而博愛則根本沒有被提上議事日程。」現代自由主義則致力於在自由的基礎上解決平等和博愛問題，這是現代自由主義和古典自由主義相區別之處。羅爾斯正義理論的第一個原則保證了「自由」，第二個原則的差別原則保證了「博愛」，公平的機會平等原則保證了「平等」，因而從理論上解決了自由平等博愛的實踐機制。

之所以說政治五原則是羅爾斯正義原則的引伸，是因為政治五原則和正義原則都對應於自由平等博愛，自由平等博愛是能夠把這兩個理論體系聯結起來的樞紐。自由原則和人權原則就相當於正義原則的自由的平等原則，民主原則和法治原則相當於公平的機會平等原則，民生原則相當於差別原則。政治五原則可以說是羅爾斯正義原則的具體化、簡單化和明晰化，這種程序更加有助於我們對正義的理解。

羅爾斯的另一個貢獻是提出了正義原則之間的兩個優先規則，第一個優先規則是自由的平等原則優先於民主的平等原則，第二個優先規則是公平的機會平等原則優先於差別原則。兩個優先規則事實上闡明了現代自由主義的兩個信條，即自由優先於平等，正義優先於效率，這是一個富有羅爾斯色彩的辭典式序列。

政治五原則同樣也是一種辭典式序列，自由、人權、民主、法治和民生五個原則之間，是首先滿足了

前面的原則，才能考慮後面的原則。自由排在第一位，表明了自由的絕對優先性，沒有自由就不會有後面的人權、民主、法治和民生。所以我們要實現民生化的目標，首先要實現自由化的目標。自由化是內定在民生化之中的。這是我之所以要用自由主義來改造三民主義的思想根基。民生排在最後面，並不是說民生不重要，而是只有在滿足了自由、人權、民主、法治的條件之後，才有可能滿足民生的條件，這是通往民生的唯一途徑。辭典式序列的另一種含義就是它的方向性，只要滿足了前面的條件，就必須去滿足後面的條件。政治五原則就像一列火車，自由和人權是兩條鐵軌，民主是火車頭，法治是車輪，而民生則是方向盤。

羅爾斯的偉大之處，是他總是從最少受惠者的地位來看待和衡量任何一種不平等，維護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這是現代自由主義致力於為窮人的利益進行辯護的思想源頭。政治五原則的民生原則就是圍繞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來安排的。解決貧困人口的民生問題，是政治五原則的主要出發點。在這裏，效率的考慮必須符合公平原則。沒有公平的效率不會是正效率，高速的經濟增長如果造成兩極分化，不斷做大的蛋糕帶來的結果是貧富懸殊，也就是貧困人口非但沒有得到經濟增長的好處，反而使貧困地位永久化，這樣的增長就既沒有效率也沒有公平。

站在窮人也就是勞苦大眾的立場看問題，這是現代自由主義的新精神。20世紀社會主義運動標榜的，也是要使勞苦大眾獲得解放，為什麼社會主義實踐非但沒有使勞苦大眾獲得解放，反而使勞苦大眾限入奴役、饑餓與貧困的深淵呢？關鍵是反自由的社會主義是哈耶克所說的通往奴役之路。自由與奴役是水火不容的對立兩極，不是自由，就會是奴役。反對自由、否定自由的社會主義，怎麼能夠帶來什麼解放呢？！解放理論的唯一基礎就是個人自由。為什麼要提解放，就是為了擺脫奴役、擺脫饑餓、擺脫貧困，最終獲得自由。民生之路就是自由之路，民生理論的目的，就是要通過制度的幫助來改善窮人的處境，促使窮人獲得個人自由。因此，任何一種理論，必須是一種自由秩序。沒有自由，意味著什麼都不能實現，原有的也會喪失，民生也就失去了賴以實現的依託。

以辭典式序列為基礎的政治五原則，以它的理論深度和邏輯力量成為立憲民主的公共基礎，使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建立在正義原則的基礎之上，建立了一個可以實現的道義世界，樹立了一個正義的社會基本結構，並通過新五權憲法將羅爾斯的正義原則付諸於法律與實踐。

2.3. 條件規範理論

政治五原則除了辭典式序列之外，很重要的在於它是一套條件規範理論。政治五原則就是五個條件，自由條件、人權條件、民主條件、法治條件和民生條件，都是互為條件互相規範的。譬如說，自由是民生的條件，民生同時也是自由的條件，自由的目的是為了實現民生，而民生的目的是為了實現自由。相互規範和互為條件，是政治五原則的主要特徵。

(1) 自發的相互強化

羅斯福新政的偉大變革，拯救了資本主義，正是因為羅斯福用民生原則彌補了自由、人權、民主、法治系統的缺陷，使政治五原則之間出現相互強化的良性互動。現代資本主義克服了古典資本主義的致命傷，而重新顯得生機勃勃，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如果羅斯福不用民生原則拯救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內在危機就難以克服。沒有惠及窮人的社會保障，即使在發達國家也消除不了饑餓。羅斯福的偉大功勳就是用民生原則改造了古典資本主義體系，迅速演化成了現代資本主義體系，依靠制度創新，而不是依靠革命，資本主義獲得了重生和新生。

民生原則的目標是捍衛、實現和促進每一個人的個人自由，這是民生哲學理論所闡明的。個人自由是最高的、最基礎的目標。要實現這一點，首先要確保既有的自由。然後從既有的自由出發，循著自由、人權、民主、法治、民生的辭典式序列路線，最終實現所有人的自由，實現全人類的自由解放。在這個過程中，在這個辭典式序列中，民生是方向性的原則。民生是路標，自由、人權、民主、法治遵循著民生路標而演化；民生又推動著自由、人權、民主、法治，形成一個自動的相互強化的上升的良性循環。

民生是軌道。沒有民生軌道，自由的火車所帶來的必定是有限的自由、有限的人權、有限的民主、有限的法治。印度民主仍然充滿不平等、貧困、悲慘和

腐敗，與西方發達國家的民主大相徑庭，就是因為印度民主沒有民生原則。民主制度本身並不承諾社會公正。沒有民生的預設，政治勢力之間的民主博弈只能消除政治專制，而不能帶來廣泛的自由。這是我提倡民生原則，尤其要堅持在憲法中寫入民生原則的動因所在。

沒有民生原則的自由，只不過是富人的自由，照樣會損害自由體系本身，並導致自由的失敗。通往奴役的社會主義極權運動正是利用了這個弱點，以至對自由世界構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脅。這是因為沒有擺脫貧困的勞苦大眾從來就沒有獲得過什麼自由，他們對自由完全隔膜和冷漠。自羅斯福新政以後，由於貫徹了民生原則，自由體系才變得堅不可摧，並導致極權鐵幕在 20 世紀末紛紛崩潰，附加了民生原則的自由在中國同樣將最終取得勝利。

新五權憲法相互強化性的第二個要點，是這種相互強化性是自發的，它會自發地相互強化，如自由能強化民生，民生反過來又會自發地強化自由。這種自發性強化所形成的內在制度正是哈耶克所主張的自發秩序。把五個原則放在一個系統中，它們就會互為條件，相互規範。一個原則的微小變動，會帶動其它四個原則的微小變動。五個原則的微小變動，則會產生更大的力量。例如，在自由原則中推行某一項自由政策，如保護產權政策，就會迅速地影響到人權、民主、法治和民生，形成一個複雜的演化系統。政治五原則系統自發的相互強化，產生了新五權憲法的威力。這是我為什麼要大力提倡新五權憲法的深刻原因。

(2) 相互預設和自我審查

新五權憲法不是五個原則的簡單相加，而是五個原則的有機耦合。五個原則的開放性、連環性、互補性和依賴性，形成了相互支持的規則群，並產生了連鎖效應。

所謂連鎖效應，是將後面的原則預設在前面原則之中，也就是將民生原則預設在法治、民主、人權、自由之中。不進行事先的預設，也就是不將民生預設在法治、民主、人權、自由之中，就不會形成連鎖效應的良性循環，歷史路徑仍會按原來的惡性邏輯運轉，不能走向新生，不能形成二律背反的困境。在貧困落後的中國，沒有民生，自由、人權、民主、法治

就無從立足和鞏固；而沒有自由、人權、民主、法治，就絕對沒有民生，以至形成惡性循環，造成「中國困境」。

改變「中國困境」只能依靠新五權憲法，就是政治五原則要同步實行，這是孫中山先生所說的要將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畢其功於一役的思想。許多人認為畢其功於一役為不可實現的理想，是因為對它的內在機制不瞭解，不理解預設的偉大作用。五個原則之間是互補的、互為條件的、互為前提的、互為基礎的，缺一不可。如果缺少民生，自由就會喪失或扭曲；如果缺少自由，民生同樣會窒息或崩潰。這是因為單一價值的分析，只能導致完全忽略其他價值，並最終惡化人類的生存狀況。只有依靠新五權憲法，中國才可能走向新生之路。

政治五原則的相互預設，使新五權憲法產生了自我審查機能，防止了原則之間互相衝突的可能性。政治五原則的系統性和網絡狀結構，使新五權憲法成爲一個自組織和自矯正的演化系統，休謨、洛克、孟德斯鳩、亞當·斯密以及哈耶克都強調一個社會的制度框架必須以演化的內在制度爲基礎。政治五原則、尤其是個人自由，始終保持著對憲法的修正權和控制權。隨著時代的發展，具體的低層次規則會不斷地被賦予新的含義，它就會自下而上地，即從具體準則到一般準則地，使憲法內容受到修正。這種演化性變遷而不是革命性廢遷的演化能力，是新五權憲法永保合法性的關鍵機制。這種內在規範的修正、審查和控制，對憲法來說十分重要。它不需要修正憲法，只要最高法院按照憲法精神和社會需要進行靈活解釋，在條文不變的情形下賦予憲法以新的合理的意義。這樣，憲法就在變化的社會中不斷獲得新的生命力，成爲一部活著的完善的穩定的永久憲法。

新五權憲法的自我審查能力，還在於致力於構築簡單的一般規則，避免具體規則與不同時代的不相容性。新五權憲法在頒佈具體的低級制度上是有所節制的，三大政策就是最弱意義的預防理論。避免具體而瑣碎的規則層出不窮、疊床架屋，是憲法適應能力的基本標誌。新五權憲法重視一般規則對複雜社會的調節作用。如耕者有其田，就是一條一般規則，它不是具體而瑣碎的，只是利用「耕者有其田」這個一般規則來進行限制和規範，有相當長的歷史適應能力，有

充分靈活的制度空間。新五權憲法從不依靠呆板和僵化的干預來實現具體目標，而重視靈活和開放的一般規則對社會的槓桿作用。

新五權憲法注重對低級規則進行簡化和精練，如三大政策，從資本、土地、勞動生產三要素來對經濟基礎進行規範，用生產要素來強化制度的協調能力，以此實現民生化的具體目標，就是相當簡化和精練的。清晰、簡單的制度大大降低了社會成本，防止了社會僵化，這是憲法理論不可忽視的要點。

★辛灝年近期應邀赴紐約僑社講演

“九一八”紀念日，辛灝年先生曾應紐約東北同鄉會的邀請，講演“紀念九一八，毋忘民族尊嚴”。他希望同胞和華僑切勿忘卻日本軍事侵略和馬列思想侵略對我們製造的兩大災難。他說，要“驅除馬列，恢復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才是我們今天堅持奮鬥的明確方向。他的講演引發了多次熱烈掌聲。

十月二十五日，全球華僑協會紐約分會成立大會，因會長李又寧教授盛情相邀，辛灝年赴會講演“華僑的貢獻”。他說，人人皆知孫中山先生那一句名言“華僑是革命之母”，但是，大家一想到這一句話，就會想到華僑如何捐錢支援革命。但是，要知道，華僑祇支持孫中山的共和革命，卻從來不支持毛澤東的共產革命；華僑最懂得什麼叫做民主和自由，所以絕大多數華僑不會喜歡共產黨；華僑最希望中國統一，但華僑衷心追求的是中國的民主統一，而不是專制一統……他的話，引起了全場的強烈反響，短短的十分鐘講演，竟然爆發了多次激情的掌聲，以致講演結束歸位之後，全場又再一次掀起長時間的熱烈掌聲，對他表示感謝。

★辛灝年應邀赴休士頓講演

十月十一日，辛灝年先生應休士頓“東西方文化交流中心”、“三民主義大同盟”和當地法輪功練功者的邀請，一天之內作了兩場講演，接受了許多當地和國外報紙、電台、電視台的採訪。驕陽烈日之下，他對千餘名法輪功練功者的講演，贏得了令人激動的持續掌聲；和臺大教授明居正先生的同堂講演，更因他對臺灣大選和大陸政情的愷切分析，而贏得了一陣又一陣的熱烈掌聲。辛灝年說，他希望聽到那個占了百分之六十五的、不急統也不急獨者的聲音。他認為，這種代表了大多數台灣人心聲的聲音，是和大陸人民既理解不願意被統到中共專制統治之下的良性台獨，又反對不認中國、敵視中華的惡性台獨的心情和立場，是相當一致的……辛灝年還是第一次公開對外講述他對法輪功的看法，他對法輪功民族性的理解，對法輪功練功者敢於追求、捍衛自己信仰的理解，及他對“要做中華兒女、不再做馬列子孫”的說法，俱得到了強烈的認同。他認為法輪功對中共北京獨裁政權的抗爭，既體現了“民不畏死，何以死懼之”這一民族精神的恢復，又證明了中共所謂改革開放、特別是高喊政治改革的絕對虛假性。

編者按：所謂「全閥」觀念，實出自林彪指某人為「全才」和張春橋指某人要對中國進行「全面專政」的文革宣告，我們這裏不過為之取名小結一下罷了。而「全閥」，即是此人集黨閥、政閥、軍閥、學

然而，現代人多強調「仁」而忽略了「禮」，其實「禮」乃是「仁」的基礎。

缺乏禮的支持，仁變得空疏迂闊，不能實行。在這種意義上，所謂禮，具有「程序」的意思。沒有程

序，好的議案是無法誕生的；沒有禮，仁也不能落實。

秩序，秩序是和諧的基礎。

命題：一個沒有程序的社會是不會有正義的；一個沒有禮的社會是不會有仁的統治的。

死寂，停滯，萬馬

齊喑，不能叫做秩序（更不能叫做「鋼鐵長城」），只能叫做壓制和死寂。所以在各種統治方式中，老人政治是最壞的一種；而老人政治中，終身制又是最壞中的最壞。

正義是什麼？

正義不是萬事如意，不是人人滿意；正義是各得其序，各本其分，即「恢復自然的秩序」。譬如，對先知而言，擔當罪孽就是正義。對酒鬼來說，酩酊大醉就是正義。對罪犯而言，漫漫苦刑亦是正義。對勞碌的人而言，恰當的報酬乃是正義。簡言之，正義和秩序是一物之兩面，二者相輔相成。

然而何以人類渴望了多少年的正義，而從來沒有真正得到過？原來，正義和天國一樣，是一個可以接近卻無法窮盡的目標。富於正義的古代被人稱為「黃金時代」，令現代人充滿不盡的思念。因為思想中的古代比經歷中的近代更有秩序，更和諧，因而更幸福，更仁。

秩序，既是禮的精神所在，也是禮的功能所在。序者，必有先後之別，上下之等。之等之別的合理，即是秩序，即是禮的統治。還有禮的節義，即因時因地因情而制的禮儀與儀禮。

我們不是唯心論者，亦非唯物論者，我們不相信「社會動亂是由於人心不古」這一說教。相反，舊禮的崩潰是因為不能適應天體變化中的需要，禮的精神

論「禮」九章（上篇）

——全閥時代的黎明

謝選駿

閥、財閥、國閥、人閥等諸閥於一身的「全才之閥」。所謂「全面專政」，即是此「全閥」對於黨、政、軍、學、財、國、人諸界的無孔不入的壟斷與窒息。「全閥時代」一詞比「文革時代」一詞，更精確的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本質特徵。而全閥時代的黎明，就是在「批孔」的醜惡鬧劇中不巧洩露出來的中國禮制文明的光輝，那光輝是半個世紀的痞子運動的烏雲無法掩蓋的精神亮點，必將成為未來中國和未來世界的重要財富。

禮是什麼？一言以蔽之，「秩序」而已。沒有秩序就不成其為社會，社會既然不復成立，文化何由哉？所以人類最可貴的、別於禽獸的地方，即在於他是文化的。如果我們承認一物的可貴，全在於他的特點（「德」），那麼我們就會承認，文化基於禮，文化的盛衰也是追隨禮的盛衰而轉移的。當然情況的複雜使得例外發生：如，禮制破壞後依然有新文化從廢墟中生長。再如禮制復興後，文化也會遲遲不能進步。

一，禮的精神

《左傳》曰：「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者也。」

即秩序思想本是人類文明追隨自然變遷的一個結晶，符合個人與生俱來的天性，因而成爲「萬古不朽」。同時，禮的節義，畢竟代代不同，所以像秦始皇那樣貪婪權位的傳之萬世，是違反自然的。如果秦始皇們的節義違背並損害了禮魂的實現，自然會推出「秦皇的時代一去不返了」的呼聲。

禮，雖是秩序，卻又不是那種鐵硬冷冰強加與人的法律條文，而是一種基於習慣法和道德律的規範，一種基於人性關懷的基本要求，這就是禮的溫馨的生命力所在。所以禮還不僅僅是秩序，而是一種比秩序更豐富更廣泛更有韻味的哲學觀念，所以說，禮還可以培養人們尊卑有節的性格。

例如，禮作爲一種思想限制，既限制了腐化過程，又限制了進取精神。這一功能在《坊記》中表露無遺，《坊記》連說「以此（防）坊民」如何如何。《坊記》想到沒有，防得過分也會惡弊叢生？中國的近代命運好像是証實了這一點，中國人在長期麻醉後，終於喪失了創造能力。因此可見，理論只能是相對的，即使禮制的復興這樣激動人心的事也不是什麼永恆的事業，時過境遷，禮制也會走向規範與襁褓的反面。

《禮記》中的《禮運》一篇，就這樣講解了禮的精神。禮的真正精髓是易易無方，禮的全部要義正類似生物機能的自我調節，如社會分工，如特定的秩序，如某種等級制度與儀禮典要。凡此種種，不可不規定，不可太規定，而要讓它在自我調節的自然過程中逐漸形成！

禮的精神還包容文明與理性的內容，引導社會倫理走向更高境界。有如孔子的理想那樣，敦促中華成爲一個禮樂之邦、君子之國。所以《禮記·樂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是以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與禮在此，顯現爲一個朝向，而不是一個定規。

不用諱言，先秦時代，社會原始，知識卑陋，因而禮的形式也帶有時代局限，這種農業社會的禮的形式，不是工業社會可以直接承襲的。但《禮記·樂記》中四種禮的功能：節（節制）、和（和睦）、別（區別）、正（導正），依然是可以通過新的形式（禮儀）予以實現的。禮儀的設立是爲了促進禮的功能。

而《禮記》是一部純駁不一的文集。依我看，《論語》比《禮記》更富於禮的敘述，當然，論語偏重於禮的精神方面，而這正是我們這個精神橫遭毀滅的時代特別需要的。

但何必要孔子的話才堪稱真理呢？孔子的影響在於他體現了道、理，體現了中國的精神傳統（述而不作）；而不是「中國的政治傳統出於孔子的發明」，所以得志的小人即使發動無理的批孔運動，也是「圖書管理員急切要批倒一切圖書」的蠢動，是決難持久的。我們不是考據學者，不是孔廟裏的叫賣者；但願我們是孔子精神的發揚者：「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不論圖書館管理員造作的批孔運動如何暴烈，孔子總還是中華民族的啓迪者：

《論語·微子》：「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耒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其大意爲：長沮和桀溺在一起耕田，孔子經過那兒，吩咐子路去詢問渡口的位置。長沮問子路：那位手拉耒繩的是誰？子路說：是孔丘。長沮問：是魯國的孔丘嗎？子路回答說：是的。長沮說：那他一定知道渡口在哪兒。子路只好再去問桀溺，桀溺問子路：你是誰？子路說：我是仲由。桀溺再問：是魯國孔丘的弟子嗎？子路回答說：是的。桀溺就說：就像淹大水一樣，現在全天下都淹了水，誰能改變這種情形呢？我看你與其追隨那些逃避壞人的人，何不跟從逃避世俗的人呢？他說完就繼續不停地覆平田土。子路回來告訴孔子這樣的結果。孔子悵然地說：我們終究是不可能和鳥獸一齊生活的，如果不和人群相處又要和什麼東西相處呢？天下政治若是上軌道，我就不必帶領你們去改變了。

由此導出經禮與變禮的問題。在我看來，經禮與變禮是這樣的：所謂經禮必須經萬世而爲律。這樣，經禮就不是某種因情設施的暫時措施，或囿於一代、

一地的特定儀節，而是一種普遍的原則大綱。經禮也是相對於每一大時代而言的，以為變禮的構架與經緯。而萬世不易的經禮則是「秩序的精神」，即禮魂。而其餘的經禮在禮魂面前，無異都降為變禮了，而更具象的一般的變禮，則淪為繁文縟節了。

董仲舒《春秋繁露·玉英》認為，「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為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至有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是故昏禮不稱主人，經禮也；辭窮無稱，稱主人，變禮也。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為子娶婦，奔喪父母，變禮也。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矣。」

以現代人的頭腦看來，不妨認為，經禮和禮魂不僅建立在人的文化傳承的基礎上，更是建立在人的生物遺傳的基礎上的。可以說經禮是先天的（生物性的），而變禮和禮節則是後天的（文化性的）。

經禮之不可泯滅，因為人的天性不可泯滅。因此，我們可以深信，秩序的生活是人的生活常數，而革命的生活不過是插曲式的變數。革命無論多麼酷烈反常，總會結束；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何況這是烹飪人肉的宴席？

二，如何理解「禮樂徵伐自天子出」？

「禮樂徵伐自天子出」（《論語·季氏》：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徵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徵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無道，則庶人不議。」），代表了西周的理想。然而，它也足以啟發我們對未來世界全球化秩序的思想索。或者勿寧說，我們可以把關於未來世界的設想，投射於上述命題，匯歸於上述命題。

天子是誰？天子就是那奉天承運而崛起的創造性天才，他涉及公共事務，切入社會生活的總體。而且他僅僅使用文明的光，不使用鐵血暴力；他是文王，而非武帝，更非闖賊。

禮樂徵伐自天子出。這原則不是一個理想，一個殷周革命的口號；而是一個公理，一個只能如此的公理。一切成功了的禮樂徵伐，都是出自天子的；凡是

成功的禮樂徵伐者，即為天子。而不能成功的禮樂徵伐，終是虛幻的只爭朝夕，這種事業不論多麼轟轟烈烈，終將流產。這種虛幻的導師領袖統帥舵手，雖然冒名為革命者，卻頂替不了天命輪轉的光輝。即使在二十世紀的一片黑暗中，人造的紅太陽依然不能遮蔽這一光輝的公理。

禮樂是對徵伐的鞏固，徵伐是對禮樂的拓展。禮樂發自內部，而徵伐拓開外部；禮樂是一種自我徵伐（即提升自己於禮樂的聖境）；而徵伐則是開化異己者的禮樂（即，徵伐作為禮樂化育的一種手段）。一切徵服必以文化的徵服為最終形式，更高級的統治是文明的向心力，而最永久的徵服則是同化。這就是「禮樂徵伐自天子出」的內涵。

無論禮樂，無論徵伐（這二者的共通性比歷來人們承認的要大得多），從內而言是同化；從外而言則是兼並。同化與兼並，並行不悖，且相輔相成，它們共同的本質就是徵服。任何徵服必須順水推舟才能揚帆遠航，額外的艱苦奮鬥不過是命運對人們的嘲笑和愚弄。成功的徵服，無須以宣傳來代替知識，只有蹩腳的圖書管理員，才會通過極力貶低自己管理的圖書，來說明自己比那些實際上管理著自己命運的圖書及其作者更加偉大，並以此抬高自賤的身價。

任何兼並與同化，若只憑借殘忍的軍事力量而缺乏複雜的社會配套，是不能持久（例如超過一代人之久）。而這些複雜的社會條件甚至連專家都很难事後搞清楚它，更不用說讓某位「當代最偉大的天才圖書館管理員」予以一概的預先洞察了。而自然的天子不是人造的紅太陽，不是憑借他的陰謀狡計來行動的，也不是用直覺「拍腦袋的瞎指揮」來代替科學的研討；相反，天子是在人們不經意的地方出現的，而且拒絕重復表演。所以他的徵服、兼並與同化與徵服，不會面臨再度失敗的危險，因為根本就沒有再度失敗的機會。命中注定的轉折作用，使逆轉潮流的人已被潮流所吞沒。

無情的戰爭並不是徵服事業的必由之路，有時反而是多餘的累贅。天子的徵服，依據社會條件應情設施，既不固守陳規，也不破除四舊（如除四害、破四舊、四人幫等奇怪的「四癩候」）。可惜圖書管理員只知道「軍事鬥爭是政治鬥爭的一種延伸，而政治鬥爭又只是階級鬥爭的一種延伸」，卻是不能知道「天

子的使命是救平社會衝突而不是挑起社會衝突，使剩餘的力量運行到文化創造的軌道上而不是灌輸到互相屠殺的陷阱裏」。從這意義說，戰爭和軍事鬥爭，只是最爲低下的徵服方法，而暴力專權、軍事管制，乃是低能者用以鏟除較高智能的「政治」（或美其名曰「政治掛帥」）。故古人云：「兵者兇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兵法八篇·乾篇》：「乾者，天也；天者，時也；時者，勢也。勢在上，高屋建瓴，瀉能千里；勢在下，潛龍騰躍，高莫百尺。有云：兵者兇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何謂不得？勢可不用兵也，雖兵黥面、將請戰，不用；勢不可不用兵也，雖寬貫日、天雨血，用之。昔堯歌韶而九苗服，舜作棋而九苗叛，豈舜之不如堯乎？敵勢、我勢，勢所不同故也。漢初，匈奴蹂躪邊鄙，高祖挾破楚之餘威，與戰，竟有白登之圍。高祖戎馬畢生，豈不知兵要乎？中原初定，壟畝荒廢，民思息肩，兵盡厭戰，以此疲弱，而驅狼虎，孫武復生，不能成功，而況劉季乎？是我勢不足勝也。文景之際，辛苦經營，內充府庫，外削強藩，殆及劉徹，中央一統，既養悍卒，復生肥馬，遂與北戰。衛青踐踏沙漠，去病收獲名王，匈奴逃遁，去陰山而無消息。漢馬十九奔斃，漢卒逾半填壑，雖驅強虜，僅得小勝，邊釁未消，而中國沉痾。是以武帝慚愧而下罪己之詔。此是我勢雖足勝，而敵勢尙不足敗也。昭宣中興，而匈奴擊烏孫敗，逢大雪，人畜什不還一。丁令、烏桓於外削之，五假單於於內割之，敵勢既墮，然後中國擊之。北者西遁，南者內附，自此匈奴不爲患者二百年。勢之與戰，天之與人，可一理而通也。」）這就是文治的「中國思想」不同於黷武的「西方真理」之處。

三，《大戴禮記·禮三本》與中國宗教

《大戴禮記·禮三本》所描述的，實際上是古代中國的國家宗教。據許多跡象判斷，日本的神道教就有不少地方摹仿此種宗教。日本神道之所以具有（較之中國國家宗教）更大的社會覆蓋面，在於它傳入了民間。混合倭人的原始信仰、知識階層的漢人傳統，形成武士階級的意識。當中世紀日本皇權衰落時，爲了尋求財政的支持，皇權終於容忍了民眾參與國家宗教的祭祀及供奉。這樣，日本皇家祀拜就傳入了民間，並獲得了新的動力。一種在富裕的中國皇族看來是可

笑與謬誤的措施，卻造成了一種持續的全民崇拜的動力。

中國的皇權，歷來是嚴禁百姓參與皇家祭祀的，爲的是獨佔祭天祀地的特權。但結果卻造成了皇族與民間的背離。到頭來，中國的皇家宗教也因這份孤寡而失去了日本式的擴散機會；雖然沒有後者那種貽笑大方的小家子氣，但卻因脫離了力量源泉而在時代的變遷下流於外強中乾。

阻遏中國皇家祀拜轉化爲全民宗教的障礙是：

1，中國皇權實際上始終未曾衰微，儘管它常在不同的強人集團手中交換。也是因此，皇權神話也就失去了深入民間的機會，而始終局促於統治階級的廟堂，甚至是僅僅屬於「皇族」家廟的玩偶。

2，中國文士的合理性文明程度遠較日本武士爲深，所以種種淺陋的神道把戲不容易說服中國士人，並在民間鄉紳中間發揚光大、紮下根去。

3，中國的皇權更迭頻繁，與倭王之數十世系相比，雖然中國皇權具有更強的政治整合力，但缺少倭王對倭人宗教上的感召力。

倭王在中國文化大量輸入日本列島時（魏晉南北朝），還只是祭祀儀式的一介司祭者。當中國皇權思想輸入之後，中國的神格化的王的觀念才開始尋找日本的替身。驗之各個民族的歷史，這種神王原來都是最古老最初始的王權形式。日本人的這一後進性，使他可以在保持原始王權的條件下，同時致力於吸收較高的文化（如中國文化和經由中國介紹的印度文化）。

相反，中國國家宗教則是相當合理的宗教。越到後來，它就越少依靠神話的支撐，也不仰仗群眾的迷信。它是以禮、以社會秩序、以人的合理性文明爲槓桿，而有意設置一種準宗教（所謂人爲的「第二信仰」）。這不能不限制了它所能激發的宗教熱情。而沒有熱情的宗教，群眾是無法全身心投入的（他們既然不是理性的存在，又怎樣參與合理的宗教呢）。中國國家宗教崇拜的對象是「禮三本」，即「天地」、「先祖」、「君師」。其理由是，這三者作爲「性之本、類之本、治之本」，是無法被文明過程所省略的。僅此而已。

如此來看，佛教進入中國之前的中國本土宗教，不是超自然的「愛的宗教」或「畏的宗教」，而只是

爲人倫服務的「敬的宗教」。這使它很有節制。它僅表示對宇宙大地、人類祖先和君主親師的敬，並用宗教儀式來使這種敬達到一種秩序化。這比之近世法國人孔德所謂的「人類的宗教」，仿佛是有「更多的理性」，可以算得「人類歷史上最早出現的理性宗教」，也許比之小乘佛教更多應用的、倫理的意識，而更少哲學的、宗教的意韻。

讚之者不妨說這一合理的宗教終能保其哲學意義的完整，得力於它免於群眾感情的混雜。然而，這一特性也注定了另一個方面，即面對來自西方的另一種聲音的挑戰時，它所顯現的那種空疏疲沓。它死得無聲無息，與中國中央集權的君主制的一起垮台，仿佛早已完結了。它還能在新的基礎上復興嗎？這也許是今天無法作答的。

不論在古代中國還是在近代世界，以國際無政府狀態爲特徵的戰國時代，都是用「法」的觀念來代替「禮」的觀念，用主權效忠（「國」、「民族」）代替了神權效忠（在中國古代是對天與天子，在世界近代是對上帝與教會）。這在近代世界說是體現了「文明的進化」；但在古代中國卻意味著「文化的退化」。它說明傳統禮治若不經必要的損益，便難以適應由貴族社會向大眾社會的過渡。

當然，古代中國與近代歐洲的區別是顯而易見的：中國貴族社會（西周、春秋時代）的解體並未導向民主型的大眾社會，而是走向了專制型的大眾社會——秦漢帝國。比起戰國的動態來，秦漢社會是相對靜態的，所以，新的禮制（而非禮治）又步法家遺產的後塵而發育了。這是不同於西周習慣法性質的一種人爲制度，因而是脆弱的、無根基的。但這兩種禮畢竟還是有共同點的：弱化強力而尊崇慣例。而慣例，大多是發軔於法。

應該說，任何一種禮都是建立在相應的法的基礎上的。它把支撐法規的強力，軟化爲一種道義信念和一套深植人心的習俗。它較之赤裸裸的法，是更高的即更有文化性的社會規範。而禮制則是一種法的、硬性規定佔主導性的禮序，是禮治的成文法化。它的困難在於，常與等級制度與各種集團利益牽涉太深。故在其不適性日漸裸露時則較難調整，具有日益擴大的惰性。

（接右下）

寧仲康先生

將孫先生手著的三民主義文獻

整理成書

加拿大寧仲康先生經過多年悉心研究和考證，終於將孫先生手著的三民主義著述三篇，包括講演錄手稿、包括文言手稿等，整理成書，並作序文一篇，可望問世。在序文中，寧先生對三民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對立關係有進一步的發現，頗見益於當今。本刊將於下期選載。

本刊記者

（接左下）

現代中國人常在傳統主義與反傳統主義之間徘徊不已、痛苦萬分。這是因爲，他們始終未能聽到一個神秘而有感染力的聲音：

「能使中國復興其偉大傳統的人，必須是個勇於反對中國現行習慣的人。」

這才是死生相濟？這個聲音費解嗎？並不。須知，要使中國再有榮耀，必先揚棄中國以前的榮耀。「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老子》三十六章）。而在尋求中國復興的方案中，難道我們不需要從相反的角度來聽取這智慧嗎？——「將欲與之，必固奪之；將欲興之，必固廢之；將欲強之，必固弱之；將欲張之，必固歛之。」——這才叫置之死地而後生呢！這就是我們的「反傳統以復興傳統法」！

處於當今世界大變革、文化大調整的沖擊下，對傳統文化的合理態度是：在第一領域即在理智的、文字的、意識的領域中拋棄它。不論我們的背離多麼徹底——在第二領域即在情感、以致和心理上，我們都將不得不與它始終廝守的。

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

抗戰詩抄

林牧晨 提供

台兒莊

力揚

台兒莊，
你回來了。
從強盜的血口裏，
從敵人幻想的陰謀裏；
我們戰士的、民衆的
千萬雙鐵手
把你奪回來了。
我們歡呼著你，
擁抱著你，吻著你，
這爭奪的勝利，
使我們快活得流淚。
你曾經被法西斯的血腥
所玷污，現在
我們卻用鮮紅的熱血
把你洗淨，而且養育著你
——在這烽火的春天，

你盛開著民族解放的鮮花。
我們是更加痛愛你，
就像更加痛愛
一個重入懷抱的戀人。
我們決不讓你
再遭敵人的蹂躪，
而要緊緊地守衛你。
我們已用我們的血，
把你的名字和盧溝橋，
平型關一起
都書寫在光榮的史頁上。
你已經成爲我們最後勝利的驛站
從你這勝利的開始，我們要
收復濟南，平津，東北，
南京——和一切的土地。
在街頭，在田野，
在每一面角落，
我們用歡呼，
用歌唱，
用圖畫，
用爆竹，
用大聲的叫笑，
用光明的火炬，
慶祝著你；
千萬人的心，
千萬人的眼睛，
都凝注著，
這勝利的火炬，
企望那解放的明天。

投稿：四月十二日 漢口

原載：《抗戰日報》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台兒莊

魏丹湖

撫摸遍身——是劍創和彈傷！
轉過頭來——是機影與刀光！

抱頭鼠竄忘記指揮作戰的尊嚴，
鶴唳風聲嚇掉了戰勝俄羅斯的威權！

耳裏依然是中國軍的吶喊！
心裏是驚懼憤恨與淒愴，
兩三萬的士兵齊臥血沙場！
台兒莊拋下了無數炮彈與刀槍！
我武士道的威風一旦喪！
有何面目見天皇！
東戰場——軍敗逃往！
西戰場——也是遭殃！
不料中國軍隊英勇難當！
這場戰爭粉碎我吞併支那的夢想！
怕讀田中義一的奏章，
往事不堪回想
「一二八」，白川死在申江！
我今日無可奈何。
祇得代領殘軍奔扶桑！

引自《抗戰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十五日

送別

鄭廣旆

最後這杯酒，
劃分了情愛和仇讎。
當傾盡的時候，
退脫了纏綿的手。
於是，
曳著一道煙波你去了，
帶著壯士的鐵的心，
和一雙冒火的眼睛，
向天涯，
尋覓兇手的頭顱
祭父兄的白骨。

原載《抗戰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九

中共第一號戰犯：

民族英雄蔣介石

香港 胡志偉

乃抗戰之延長，本質上為民族戰爭。」

一九四八年五月廿日就任中華民國行憲第一任總統。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九日蔣函美國總統杜魯門，要求美國直接指揮國軍作戰。十一月廿九日蔣與熊式輝商請麥克阿瑟來華指導

編按：由大陸旅居香港的著名專欄作家、歷史學者胡志偉先生的新著《且以真偽衡人品，莫以成敗論英雄》已由香港夏斐爾出版公司出版。該書對毛澤東欽點的一百零八名“戰犯”的故事，作了可靠和翔實的記述。其中，特別是對中華民國領袖蔣介石及其作為中共的“第一號戰犯”，有著十分中肯的評價，所引資料也具有相當的權威性。現將該部份摘錄下來，以參加已經開始的本刊大論戰：“蔣介石是否民族英雄、是否獨裁者？”

胡先生新書的其它部份，我們將會摘要刊載，以饗讀者，

一九四八年底毛澤東親自圈定四十三戰犯名單，在翌年初的和談中，自始至終堅持要懲辦戰犯，且一步不讓，而第一號戰犯，就是蔣介石。

誠然，「蔣介石是一九四九年在中國發生的那場悲劇的主角——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在大陸遭遇失敗的代表人物。但是，作為領導北伐成功的革命領袖，作為曾經領導偉大衛國戰爭勝利的民族英雄，作為一位始終堅持捍衛國家主權與獨立、一貫追求和平與統一的國家元首」（註一）（《誰是新中國》第 ），他將永遠銘記在子孫萬代的良知與心靈之中。

蔣介石(1887-1975)，名中正，浙江奉化人，保定陸軍速成學堂肄業。

一九四七年七月四日國民政府通過蔣提出的《戡平共匪叛亂令》，指斥中共「擁兵割據，擾害地方，

國軍作戰。自毛澤東開出戰犯名單、提出八項和平條件後，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一日，蔣氏宣佈引退，稱「祇要和平果能實現，則個人的進退出處絕不縈懷」。翌年三月一日在台北復行視事，執行總統職權、一九五四、六〇、六六、七二年在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三、四、五次會議上當選連任第二至第五任總統；在國民黨七大、八大、九大、十大上，均連續當選國民黨總裁，還兼任國家安全會議主席、國防研究院和革命實踐研究院院長等職。初到台灣時，他猶雄心勃勃規劃「三年準備五年反攻」，但因美國政府掣肘，始終壯志未酬。一九五八年杜勒斯訪台時發表聯合公報稱：「中華民國政府認為恢復大陸人民之自由乃其神聖使命……而達成此一使命之主要途徑為實行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而非憑藉武力。」這個公報實際上是逼蔣公開宣佈放棄反攻大陸。此後一九六二年大陸飢荒蔓延，赤地千里，餓殍遍地；一九六八年文革浩劫，共軍淪為「語錄兵」，毫無戰力，蔣氏迫於美方壓力失去了兩次最佳反攻機會。一九六四年中共試爆原子彈成功時，他獨自嘆息「打回大陸是不可能了」。蔣公前生戎馬倥傯，飽經憂患，忍辱負重，風雨如晦。在他生命的最後廿五年，沒有共產黨作亂，沒有跋扈軍閥叛變，沒有職業學生搗亂，沒有惡性通貨膨脹，沒有外敵入侵肆虐，他在台北士林官邸的慈雲亭度過了安適的晚年。但在公開場合仍呼籲國人“莊敬自強，處變不驚”。國府退出聯合國後，七二年元旦蔣氏發表《告全國軍民書》，鄭重宣示「與共匪勢不兩立，絕無任何妥協餘地」。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心臟病突發逝世，享年八十八歲。遺囑

曰：「實踐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國土」。四月十六日啓靈時，路祭民眾逾三百萬，靈襯暫厝於桃園縣大溪鎮慈湖行館。參加喪禮的有美國副總統洛克菲勒等廿七國一百四十二名政要。

旅美史學家唐德剛曰：「蔣介石是我民族史上千年難得一遇之曠世豪傑、民族英雄也……五千年來，率全民，禦強寇，生死無悔，百折不撓，終將頑敵驅除，國土重光，我民族史中，尚無第二人也。」(註2)

另一位旅美史學教授黎東方也說：「蔣公是一代英雄，能夠對日本侵略者抗戰到底，憑這一點已是千古不朽」，但「他不該屈服於美國壓力，不向日本索取賠償。日本殺了我們如此多的軍人與平民，毀了如此多的家園與財產，怎可不要日本賠！倘若蔣公拒絕美國扶植日本，中國政府便有錢撫卹戰死者與被殘殺者的家屬，醫治我們的傷兵，幫助退伍軍人就業，幫助失掉家園與財產者重建家園重奠經濟基礎。那麼中國人民何至於在飽嚙對日抗戰之苦後，又遭受了內戰與四人幫的災難？」(註3)

誠哉斯言！世界級的文學大師林語堂在其享譽國際文壇的名著《吾土吾民》(註4)中，對蔣介石作了以下評論：「他是一個嚴以律己的人，既不吸煙，也不喝酒，連茶也不喝。他光幹不說，召集會議時自己不發言，靜靜地聽別人講，把他們送走後，自己再作決定。他可以站在夏日之下，給下級軍官接連演講幾小時。他很少顧忌個人安危，一旦需要，他就冒著生命危險出現在前沿陣地上……他老練、精明、富有遠見、執著、工於心計、雄心勃勃，並且愛國。他成熟、視野開闊，能以中國的利益為重。他期待一個強大、統一和獨立的中國」。針對中共攻訐蔣氏「消極抗日」，這位國際上第一流的作家秉承知識份子的良知指出：「他(蔣)一直在拖延時間，避免與日本作戰，在等待著中國可以團結起來，有力量對日作戰的那一天……蔣介石是故意向日本屈服長達五六年，以便讓中國人民對日本的憤懣情緒達到白熱化的程度……他一直等待到自己確信有各派領袖的廣泛支持，知道在與日本作戰的同時，背後不會遭到暗算(按：當時南方軍閥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均與日本有所勾結，西南軍閥龍雲也處心積慮同日方媾和)……南京淪陷後，在漢口的中央政府議會中，軟弱動搖的領導(按：指汪精衛、周佛海、褚民誼等人)已經準備

去講和，祇有當蔣介石抵達漢口，士氣才高漲起來，抗戰到底的決心重又堅定起來。」他對蔣介石的抗日功勳作出了以下結論：「這場(民族)解放戰爭依賴蔣介石的領導素質和策略的地方太多了……他每一步都算計對了。他對即將到來的抗戰的性質，能夠作出正確的、有遠見的理解，這使我感到佩服。他不愧是民族危亡時期的一位民族領袖，他內心的睿智和道德品質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是能夠適應形勢的」。

以大歷史觀點(即從長時間遠距離的姿態看歷史)馳名國際史學界的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黃仁宇教授在《張學良、孫立人和大歷史》(註5)一文中指出：「即使早年對蔣介石作出十分嚴厲批評的美國左翼作家白修德，在其晚年曾對《新聞週刊》記者承認，他過低估計了蔣介石遇到的困難，那就是「動員五百萬的兵力同強敵不斷地作八年苦戰，為中國歷史向來之所無，而且軍隊係社會既成因素所併合出來的一種產物。嚴格說來，我們的社會即使罄其力也無從支持八百個師之現代化的軍隊……一九三七年中國之對日抗戰不僅物質條件欠缺，而且組織能力也不夠。縣以下是無數村落間的小單位，除了幾個通商口岸之外，縣以上應有的現代機構一般都不存在。民間既如是，軍隊與官衙的行動與運轉必受其影響。所以西安事變之前蔣介石派黃郛和何應欽與日本交涉，總是提倡忍辱負重。戰事一開，他又將一切謹慎擲諸化外，而以士氣人心代替組織與效率。其不惜犧牲，有如將原來儲備軍官的教導總隊一體投入戰場，事前向他們訓話，囑他們個個必死(死時確極慘烈)。他的目的是將一個局部的戰爭拖成一個全面的抗戰，使無人可以規避，並且終於拖成一個國際戰事，中國也賴此得到最後勝利。凡此都不是軍事教科書之所敘及」。對於蔣為外人所詬病的遙控部隊、越級指揮，黃仁宇教授認為係「當日環境之產物。國軍最大的缺陷，不僅是素質低，而且是素質不齊。在很多將領心目中，抗戰是人生的一大冒險，功名固可以成於旦夕，禍害也可以生於俄頃。後面的預備隊可能突然失蹤，側翼的友軍可能不在指定的時間地點出現。部隊的建制不同，補給也有參差，部隊長平日的恩怨也可以影響到戰時的協同，一到軍法審判，軍法官祇在邏輯上替責任問題銷案，很少顧及內在的公平。這很多問題統帥都不能一一解決，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又如何掌握統帥

權？於是蔣介石祇能強調人身政治。就是他的越級指揮，也還是他人身政治的延長，祇有經過他的耳提面命，對方才覺得責無旁貸。很多超過常理以外的任務，能否確實執行不說，首先也祇有委員長手諭或面諭才能指派得過去。他之令第十軍方先覺死守衡陽，以後方被俘，然後逃回仍得到蔣的袒護支持，即是此種作風的表現」。

至於蔣對張學良和孫立人兩案的處理，黃仁宇教授認為絕非小器量與意存報復。「這一點，歷史上已留下多則例證，有如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又如他戰後之對待日本。倘非如此，他縱掌握黃埔嫡系、軍法權威和特務系統，也難能做中國之領導人達半個世紀之久。即是他和史迪威鬧翻之後，他仍請史茶會道別，并且解釋他們兩人之無法和衷共濟，并非個人恩怨，這一切皆見於《時代》週刊記者白修德所整理出的《史迪威文件》。蔣提議贈史青天白日勳章，又將雷多公路命名為史迪威公路，都被史迪威引以為榮」。近幾年，到奉化蔣介石溪口故居朝拜的遊客每年不下三百八十萬人，而去年毛澤東韶山故居參訪者祇有前述數字的十份之一。國共紛爭過去半個多世紀了，中國人的子孫後代各自以自己的雙腳投下了對蔣公擁戴與懷念的一票。

大陸學者辛灝年在《誰是新中國》一書中曾說：「偉大的中華民族，從來就對失敗的英雄懷有特別的崇敬之心，一曲兩千年久唱不衰的《霸王別姬》，古往今來曾催動了多少人深情而又痛惜的淚水。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半個世紀以來，我們面對著一位曾保存了我們偉大民族血脈的民族英雄，一位曾保衛了中國國民革命、推進了祖國民主統一的革命領袖，一位曾預言共產革命祇能使我們的民族與人民陷於萬劫不復的悲慘境地，因而自始至終堅持要反對和鏟除共產邪惡勢力的偉大人物，祇因他是一九四九年那一場巨大失敗的代表者，因而才不僅被他的敵人糟蹋得不成樣子，甚至被他的背叛者、某些追隨者和新一代不解歷史者否定并誤會至今」。(註6)

無可否認，蔣介石是中國五千年歷史上的一位偉大領袖。但他是凡人，而非聖人。他的一生所犯的最大過錯莫過於那阿 Q 式的「以德報怨」。他反對盟國瓜分日本，放棄向日本索取戰爭賠款，絲毫沒有博得日本朝野人士對戰爭罪行的懺悔。相反，東京靖國神

社的香火日盛。這是他始料所未及的。同蔣一起在西安事變蒙難的機要室主任、密碼室主任(曾破譯日軍偷襲珍珠港電報以及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飛太平洋的電報，後者導致美空軍擊落山本座機)毛慶祥，對蔣公有以下評價：「蔣在西安事變前效法德意獨裁政治，做事有魄力，有決斷，執行命令一致。事變以後性情與行動都有變化，對中共又恐懼又感激，內心有很大的矛盾。他怕部下反他，所以對官員貪污、違抗命令者，不敢懲辦，結果政治、經濟、軍事都出了毛病。如果沒有西安事變，中共不可能佔領中國，朝鮮和東南亞也不會赤化而威脅到世界和平。」(註7)

參加大論戰文章之二：

偉大的民族英雄——蔣介石

旅美大陸學人 龍勝熊

作者前言：本人不是中國國民黨黨員，不是台胞，本人祇是從大陸來到美國的一位專門研究中共賣國問題的人士。

過去數十年，中共及毛澤東爲了打倒蔣介石先生，曾給蔣介石先生加上許多罪名。現在，人們從中共及毛澤東給他們自己的戰友、“同志”妄加罪名的伎倆來看，終於可以看出，過去，他們給蔣介石先生所加的種種罪名，都是錯誤的，是莫須有的。中華民族應該正確認識蔣介石先生的歷史地位，恢復他應有的名譽和光榮。

在二十世紀中，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發生最重大的事件，可以說有四件。

一是偉大革命家孫中山先生創立三民主義學說，領導國民革命，推翻了滿清皇朝，建立了中華民國。

二是，日本帝國主義連續發動侵華戰爭，給中國造成深重災難、痛苦和損失。

三是蘇俄繼承沙皇衣鉢，繼續侵華，侵吞中國外蒙古，割去中國二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搶劫了中國大量財富。

四是中共大膽賣國，出賣了外蒙古，承認了前蘇聯新侵佔的四十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承認了歷史上全部的不平等條約，出賣了東北和新疆，出賣了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

這四件大事，都對中華民族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

所以說，二十世紀是中華民族復興的時代，但又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時期。在上述四件大事中，創造了中華民族的偉大英雄蔣介石先生。蔣先生為繼承孫中山先生的遺志，為實現三民主義的偉大理想，作出了卓越的貢獻。與此同時，蔣先生還被迫、不得已必須同國內外的敵人進行最堅決的鬥爭，擔負起挽救中華民族於既倒的重任。歷史賦予蔣先生的使命，既十分偉大，又非常艱巨。

為了拯救中華民族，維護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完整，蔣先生比任何一國的領袖所遭遇到的情況都要複雜；比他們所遇到的困難都要大。

蔣先生需要同來自三個方面的敵人進行鬥爭，既有內部敵人，又有外部敵人。一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二是蘇俄帝國主義的侵略；三是中國共產黨的進攻。三面受敵。每一種敵人都要打倒他。蔣先生堅決地、勇敢地與這三方面的敵人進行了終生不懈的鬥爭，維護了國家的尊嚴，保護了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這個功績是偉大的，不朽的。

最令人欽佩之處是蔣先生曾經奉孫中山先生之命，赴蘇俄考察，親生經歷，使蔣先生深刻認識蘇俄之本質及其對中國之危害。蔣先生沒有被共產主義邪說所欺騙。

1923年9月初至11月末，蔣先生在蘇俄考察近三個月，受到蘇俄各界的極大重視。蘇俄黨政軍高層人士，如遠東局局長胡定斯基（即胡定康、魏金斯基）、蘇俄外長齊采林、陸軍部次長司克亮斯克、參謀總長密熱夫、教練總監彼得羅夫斯克、馬林、以及蘇共第二號人物托洛斯基等，都熱情接待了蔣先生，並與蔣先生進行了會談。蔣先生還訪問了彼得格勒，參觀了軍事院校，並參加了十月革命節紅場閱兵典禮（當時列寧已是植物人，醫生不準列寧會見客人，故蔣先生

未見列寧）。經過這三個月的考察，蔣先生以他偉大政治家的睿智，深刻洞察了蘇俄政權及蘇俄共產黨的問題和本質。他回國後，向孫中山先生作了明確的報告。

1924年1月16日，蔣先生從上海赴廣東，攜《赴俄報告書》並向孫中山先生作了口頭說明。他說：

“我與蘇俄黨政負責者談到外蒙古問題，立即發現他們對於外蒙古，絕對沒有放棄其侵略的野心。

“綜括我在俄考察三個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無形之中，發生一種感覺，就是俄共政權如一旦臻於強固時，其帝俄沙皇時代的政治野心復活，並非不可能，則其對於我們中華民國和國民革命的後患，將不堪設想。

“當我回國的前夕，乃接到共產國際對我中國國民黨的決議文，觀其論調，對中國國民革命沒有真切的認識，而其對中國社會，強分階級，講求鬥爭，他對付革命友人的策略，比對付革命的敵人的策略更多，殊不勝其慨嘆。

“蘇維埃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

蔣先生說：“在我未往蘇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對我們黨國民革命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誠，而絕無私心惡意的。但是我一到蘇俄考察的結果，是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斷定了本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主義於一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是危險。”

1924年3月14日，蔣先生還特別寫信給廖仲愷先生。廖先生是國民黨的大左派，時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是影響孫先生“聯俄”、“聯共”的重量級人物。後來的廖承志，就是他培養的兒子。蔣先生給廖仲愷的這封信，表達了蔣先生在蘇俄考察後，對蘇俄的深刻認識。

蔣先生在信中指出：

“尚有一言欲直告於兄者，即對俄黨問題是也。對此問題，應有事實與主義之別，吾人不能因其主義之可信，而乃置事實於不顧。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弟對兄言，俄人之言，祇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也。

“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爲其正統，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對中國之政策，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爲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

他還指出：“凡事不能自立而專求於人，其而能有成者，決無此理。國人程度卑下，自居於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如神明，天下寧有是理？彼之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凱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易名稱，使人迷惑於其間而已。所謂俄與英法美日者，以弟視之，其利於本國而損害他國之心，則五十步與百步之分耳。

“中國人祇崇拜外國人，而抹殺本國人之人格。如中國共產黨員之在俄者，但罵他人爲美奴英奴與日奴，而不知本身已完全成爲俄奴矣。吾兄如仍以爲弟言爲不足道，而毫無省察，則將來恐亦不免墮落耳。”

蔣先生最後說：“弟雖未亡，而實欲兄以此書作亡友遺囑耳。”蔣先生對廖仲愷真誠規勸，語重心長。

後來，蔣先生寫了一本書《蘇俄在中國》，也談到他對蘇俄的認識。

他說：“馬克思主義在俄羅斯，滲入了大斯拉夫主義及沙皇專制主義的特徵。

“蘇俄爲了“世界革命”，認爲一切暴力和卑鄙的手段都是合理的。

“中國在列強一連串的不平等條約之下，淪爲次殖民地國家。俄共認爲這是他們在東方散播共產主義的種子，來制造階級鬥爭的第一個大好園地。”

蔣先生對蘇俄，經過親身實地考察，得出對蘇俄的上述認識和論述，非常重要。這對他以後領導中國前進和發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和深遠的意義。

從蔣先生的上述認識，可以充分看出蔣先生的立場、思想和觀點。

蔣先生具有高度的民族意識和堅強、堅定的國家觀念。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與共產黨人根本不同的最可貴之處。共產黨人沒有民族意識，沒有國家觀念。

蔣先生堅定地維護國家民族尊嚴，維護國家領土和主權的完整。深刻批判了那些崇洋媚外的洋奴、俄奴。

蔣先生明確地認識誰是中國的敵人，誰是中國的朋友，敵友觀念非常鮮明，與中共認敵爲友、認賊作父根本不同。

蔣先生明確指出自立自強的重要，任何妄圖依賴他國，投靠他國，都是沒有出息的，而且對國家是有害的。

蔣先生的政治智慧和敏銳的洞察力，大大高於毛澤東無數倍。

毛澤東是屬於政治投機，政治欺騙，大肆鼓吹投靠蘇俄，最後竟然走上賣國求榮的可恥道路。毛澤東是在大量賣國之後，才從“一邊倒”的泥坑中，慢慢要爬出來，羞羞答答承認蘇俄是“社會帝國主義”。然而太晚了太晚了。他的認識，不僅比蔣公的認識遠遠落後四、五十年；而且，尤爲嚴重的是，他的思想品質太惡劣，有意欺騙全國廣大人民。

在國與國的關係上，各國都是從自身的利益出發和決策。都是半斤和八兩（按中共大陸的度量衡，應是半斤和五兩了！）沒有什麼差別，更沒有所謂“無私”的援助。

在世界上沒有替天行道的國家。可是，在中國幾百年才出一個毛潤之先生，卻拼命叫嚷蘇俄是替天行道的大救星，奉若神明。毛澤東罵別人“崇洋媚外”，罵得一塌糊塗。實際上，他自己才是天字第一號的大崇洋媚外。人們真是應該把他罵得狗血噴頭才對。

蔣公深刻論述了被毛澤東捧上了天的所謂“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即“蘇俄的馬克思主義”是什麼貨色，說它“祇不過是馬克思主義，加進了大斯拉夫主義和沙皇專制主義而已”。

應該說，所謂“蘇聯”，祇不過是沙皇專制獨裁的新包裝，換湯不換藥。馬克思主義祇不過是掩蓋它對外侵略擴張的工具。

蔣先生深刻地批判了那些恬不知恥的“俄奴”。被批判者，也包括毛澤東。

蔣先生對蘇俄考察後的認識和論述，已經是八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在當時，蔣先生的這些論述，不可能被中共左傾份子所接受。時至今日，八十多年過去，再重新學習蔣先生這些講述，豈不讓人感到蔣先生當時的講述完全正確。恐怕用句句是真理，來看待蔣先生的這論述，也不算爲過吧！“造反有理”的俄奴們，對蔣先生的這些論述，能夠拿出像樣的反駁嗎？

蔣先生堅決抗蘇、反共，豈不是完全為中國人民免遭中共的殺害和破壞？豈不是完全為中華民族免受外國欺侮和壓迫？豈不是為了保衛中華民族的領土和主權不受損害？

由於蔣先生堅決反共，中共就拼命攻擊和污蔑蔣先生，給蔣先生羅織大量罪名。如今，八十年時間過去，大量事實充分證明，中共給蔣先生所加的所有"罪名"都是錯誤的，是不能成立的。在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蔣先生是完全正確的。毛澤東和中共是完全錯誤的。

蔣先生的上述認識，是他以後領導中國革命的思想基石。在孫中山先生去世之後，蔣先生義無反顧地繼承孫先生的遺志，擔負起歷史重任。

從蔣先生走上中國的歷史舞臺，就肩負起三大重任。這就是抗日、抗俄及反共。面向這三個敵人，鬥爭極其尖銳、複雜，任務非常艱巨。既要和外部敵人鬥，又要和內部敵人鬥。內部敵人與外部敵人緊密勾結。內部敵人是打著“革命”的旗號相號召，掩蓋幫助蘇俄侵華的本質，欺騙中國大眾。

在中國的歷史上，長期以來形成和存在的一個問題，就是對俄國如何看待和對待？俄國，包括蘇俄是中國的敵人，還是中國的朋友？這是很長時間一直在爭論的一個問題。這是一個特別重大、關繫到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問題。自李鴻章起直到毛澤東，形成一群聯俄派。他們的理由，就是聯俄抗日，聯俄制日。毛澤東更多了一個借口，就是“俄國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因此，到毛澤東時期，聯俄最徹底，把俄國看成是中國最親密的朋友，對蘇俄五體投地，無限崇拜，毫無保留全部投入蘇俄懷抱。

蔣先生與聯俄派根本不同，他明確認識到：俄國，包括蘇俄，不是中國的朋友，而是中國的敵人。

俄國是最陰險狠毒的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同時更是侵略中國領土、主權，破壞中國獨立，危害中國生存的國家。

中共為了一黨私利，為了自己的生存，根本不顧國家、民族的利益和存亡，投入蘇俄懷抱，成為蘇俄侵華工具。所以，蔣先生反共，實質上也是抗俄。

抗日戰爭時期，中共一方面在後方不斷破壞抗戰，一方面又與日本侵華勢力勾結，相互串通，甚至

出賣中國政府軍事情報給日本。抗戰勝利後，又與蘇俄公開勾結，在蘇俄支持和指使下，不顧一切，拼命攻打政府軍。

蔣先生與這三個敵人進行艱巨、複雜的鬥爭，前後共達二十八年之久。中間，經過八年的浴血奮戰，終於戰勝日本帝國主義，收復東北和臺灣，贏得中國在世界上的崇高地位，中國人民真正站了起來。

就是俄羅斯的學術界也都不得不承認，蔣先生是領導中國對日抗戰的愛國主義者，他致力於維護中國的領土和主權。

由於蘇俄與中共的合夥攻擊，蔣先生雖然未能在軍事上對這兩個敵人取得勝利；但是，蔣先生還是盡最大努力，保住了孫中山先生創立的中華民國，實現了三民主義理想，對中國歷史作出了卓越的、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與國內外敵人長期鬥爭過程中，蔣先生表現了崇高的民族氣節和英勇大無畏的精神。在抗日戰爭後期，日本已經敗相畢露，多次向中國提出求和要求。蔣先生為了維護同盟國的整體利益，拒絕了單獨對日媾和。

中國抗戰勝利後，斯大林又多次邀請蔣先生訪俄，蔣先生堅決拒絕。蔣先生對斯大林的認識，比毛澤東高出無數倍。與帝國主義國家頭目，又有什麼好談的？蔣先生這些崇高品質，與毛澤東削尖腦袋要去訪蘇相比較，更可看出蔣先生之偉大！

毛澤東是中華民族的叛逆，是歷史的罪人。蔣先生則是偉大的民族英雄。

蔣先生雖然未能戰勝蘇俄及中共，但這絲毫無損蔣先生的偉大和光榮。中國歷史上很多忠臣和英雄，都難免遭到挫折和失敗，甚至被害，這不奇怪，也無損於這些英雄和偉人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大家最熟悉的是，岳飛被秦檜所害，林則徐被琦善誣陷，等等，多不勝舉。在二十世紀之中，蔣先生在大陸的軍事失敗，敗於毛澤東之手，實際上是等於敗於奸臣之手。毛澤東就是中國二十世紀最大的奸臣。他奸在忍敵為友，認賊作父，賣國求榮，勾結蘇俄帝國主義者，與帝國主義者合夥，破壞中國的獨立和主權，出賣中國領土。倘若沒有毛澤東勾結蘇俄，共同反對蔣先生，蔣先生不會在軍事上失敗，中國也不會失去外蒙古。這是不言而喻的。

正是由於蔣先生的堅決反共，才遭到中共的惡毒攻擊，被加上許多莫須有的罪名。但這絲毫無損於蔣先生的偉大。蔣先生的堅決反共，維護了中華民族的尊嚴，維護了國家的獨立和主權，維護了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也保護了一部份地區和人民的安全，使他們免遭中共的蹂躪和殘害。所以，蔣先生的堅決反共，完全是正確、必要的。設想，如果當年蔣先生反共更徹底，不讓中共得逞，中國不會失去外蒙古；中國大陸不會發生數千萬百姓被中共殘害致死，中國整個國家也不會像如今之大陸，貧困，落後，整個國家不會山河破碎。

蘇聯文豪索忍尼辛，在一九八二年就說：由於海峽遼闊，臺灣就成了中華民國所留下來的一塊復興基地。就在這三十三年來，它不斷地向全世界顯示著，如果中國大陸不淪入共黨之手，整個中國都會達到臺灣一樣高度發展的水平（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世界周刊〉載）。索忍尼辛這個評論非常公正和準確。

如果說蔣先生有錯誤，可能還是在於反共不夠徹底。之所以會如此，這或許是由於蔣先生過分講究信義。如西安事變後，蔣先生返回南京，完全可以將東北軍調離陝西，由中央軍接任剿共任務，把中共軍“堅決、徹底、干淨、全部”消滅之，則可不致於留下後患。又如，抗戰興起之後，不收編共軍，不給共軍發軍餉；不令其發展，則後來可能會好得多。

共產黨人是俄國人訓練出來的，他們學習和繼承了俄國人陰險、狡猾的習性，失去了人性，與這些人交往，和與常人交往，根本不同。他們是根本不講什麼信義的。他們可以連父母都不要，搞階級鬥爭，就是要兒子鬥老子。土改時，地主家庭出生的中共黨員，父親被鬥死、被餓死，也不許這種黨員去問一下自己的父親如何。就是要借此考驗這位黨員的堅定性，考驗這位黨員的“黨性”。和這些失去了人性的人，怎麼能講信義！

在中共來說，他們自然要把中共的勝利，及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列為二十世紀的頭等大事。當然，中共的勝利，及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在中華大地上發生的大事。但這不是最重要的大事。

中國共產黨是俄、日侵華的產物。有俄、日侵華才有中國共產黨；如果沒有俄、日侵華，也就根本不會有中國共產黨。所以，中共的定位是，它是俄、日

侵華的副產品，是帝國主義勢力侵華的幫兇，是俄日侵華的工具。俄、日侵華，即是重要大事，中共作為俄、日侵華的副產品和幫兇，自然也就抬不上與俄、日侵華事件平等的地位。

中共的勝利，及其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在於使中國大陸改變什麼顏色，而在於它使中國大陸淪為俄國的殖民地和附屬國。這是最關鍵問題之所在。中共的勝利，標志中華民族危機的加深。

中共沒有自己治國的理想和方案。它祇是鬥爭和奪權。毛澤東就公開說：“世界上一切革命鬥爭，都是為了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所以，奪取政權就是他的目的，除了奪取政權，他沒有其他目的。他在奪取政權之後，不是治國和強國，而是七鬥八鬥，把一個好端端的中國大陸，鬥得七零八落，亂七八糟。一切都搞糟了！

中共的勝利，及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代表中國歷史發展的方向。他們所有的事業都以失敗而告終，從“革命”起，到奪取政權的一切措施，全面失敗。最後，他們也必將像蘇聯一樣土崩瓦解，煙消雲散。所以，中共的勝利，及其中華人民共和國，列不上二十世紀中國發生的最重大事件。它祇是中國歷史前進中的一股逆流，一種倒退，一種反動。

孫中山先生早已明確指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可使此項共產主義或蘇維埃制度實施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共產黨人不聽從孫中山先生的教導，背叛孫中山先生，迷信於“蘇俄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投靠蘇俄，在中國大地不遺餘力推行階級鬥爭，結果不出孫先生所料，一事無成。

現在，蔣先生終生與之奮鬥的三個敵人，日本侵華以失敗而告終，已經過去五十多年。俄國侵華依然在進行，中共尚在殘存。這後兩國敵人尚未退卻，中國已經山河破碎。中國已經處於危急存亡之秋。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絕不是危言聳聽，而是正在進行的現實和未來。

為了挽救中華民族垂危的命運，中國人應該繼承蔣先生的遺志，繼續進行抗俄、反共的偉大事業。反共不是為了奪權，而是為了維護中華民國的生存和未來。中共實行的制度不適合中國，也不適合任何一個國家。中共賣國，把中國賣給了俄國。祇有中共政權

徹底垮臺，俄國侵略勢力全部退出中華大地，中國才有前途和希望。

孫中山先生創立三民主義，蔣先生為實行三民主義偉大理想奮鬥不息。這才是中華民族前進的方向！

參加大論戰文章之三：

關於蔣介石與毛澤東的一個比較

前北京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研究生 周亞輝

一， 傳統比較法與現代比較法

中國民間的傳統比較法是以福祿壽等個人利益指標來衡量一個人的成功與否的。現代比較法則把一個人對社會的貢獻大小作為衡量其人生成功與否的重要指標。我認為，在衡量政治人物的成功時，應以對社會的貢獻為主要指標。

二， 用傳統方法比較蔣介石和毛澤東

壽，毛澤東祇活83歲，蔣介石活了88歲。毛澤東在壽命上輸給了蔣介石。

祿，毛澤東和蔣介石分別當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的頭號政治人物。但毛澤東祇當了26年（1949～1976），而蔣介石當了48年（1927～1975）。有人說，1949年後，蔣介石退守臺灣，不算數。我要說的是，國際社會不接納中共和毛澤東，直至1971年底中共才被允許進聯合國，而這個允許進入還是毛澤東、周恩來大搞金錢外交的結果。而中華民國直至1971年底還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美國1979年才與中共建交，之前與中華民國維持外交關係。

福，毛澤東家六名近親死於非命。毛死後，其妻江青侄子毛遠新，近臣皆沒有好下場。蔣介石的髮妻死於日本人的轟炸。蔣死後，兒子蔣經國在台繼承權位是眾望所歸。至今臺灣人民仍懷念蔣經國先生，因

為他在政治民主化和經濟現代化方面對臺灣有巨大貢獻。

三， 用現代方法比較蔣介石和毛澤東

（一）毛澤東在搞共產痞子革命的過程中和取得政權後，至少導致一億中國人民非正常死亡。而蔣介石並無類似紀錄。

（二）毛澤東氣量狹小，將劉少奇等一大批共產黨幹部整死。蔣介石寬宏大量，唯才是舉。例如，閻錫山，李宗仁，馮玉祥曾發動中原大戰攻打蔣介石，甚至險些炸死蔣介石。但他們被蔣介石打敗後，蔣介石仍用李宗仁做副總統，用閻錫山當行政院長。

（三）毛澤東實行愚民政策，閉關鎖國。蔣介石則勵精圖治，改革開放。

（四）毛澤東在中國復辟了帝制，斷送了共和。蔣介石則力行憲政和三民主義。

（五）蔣介石保護私有財產權，而毛澤東則領導共匪殺人越貨，霸人財產。

（六）毛澤東淫亂，而蔣介石不能稱之淫亂。

（七）毛澤東直至56歲才竊據大陸。蔣介石英明神武，文武蓋世，祇有41歲就統一了大陸。有人會問，毛澤東把蔣介石趕到了臺灣。我的回答是，中國人民不爭氣錯誤地接受了共產黨的迷惑毒害。錯不在蔣介石，而在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自己。

這些比較還可繼續下去。我的結論是：毛澤東將遺臭萬年，蔣介石則千古流芳。

參加大論戰文章之四：

關於拙作《痛說》一文

所起事端的情況通報

香港學者 朱有道

八月十四日夜，我致電楊天石查詢許惠東（五十年代死在監獄的北平市參議會議長）卒年，他扯開去滔滔不絕訓了我一小時：

(1)你在《傳記文學》撰寫的《蔣氏密檔》書評在《黃花崗》雜誌刊出後，國內多個網站全文轉載，已經闖了大禍。後果有多嚴重，在電話中不便說，將來你會知道；

(2)自99年以來，極左派一直想把《百年潮》掐死，要使它停刊，現在找到了把柄。海外左派的《主人公論壇》登出一批老共產黨員的公開信，「興師」問罪，要求胡錦濤與中共中央將楊天石開除出黨，查封百年潮月刊，再追究楊天石等人的「叛國罪」；

(3)閣下的文章，在台灣、香港發表都不礙事，因為禁止進口；唯美國的《黃花崗》雜誌不可。因該刊文章全部上網，所起到的作用，為海外任何一種反共報刊所做不到。文章經國內網站轉載，其影響深且廣，給國內那撮以「左」面貌出現，反對鄧小平理論，反對改革開放政策的人提供了重磅炸彈；

(4)閣下的書評，將拙著所提歷史事件結合事實發議論，例如“六四”、反腐等等，這犯了國內研究歷史的大忌。為此，我要發表長文與你“劃清界限”，不然後果相當嚴重；

(5)閣下在香港、台灣、美國撰文，無人追究；然殃及在國內的鄙人，後果可能是萬劫不復的。今後倘欲繼續在大陸學術界交朋友，從事學術交流，就不可寫那些“離經叛道”的書評；

(6)袁偉時、印捷可以辱罵孫中山，罵孫是「殺人魔王」、「禍國禍粵」都不會有人追究，但他們都不敢頌揚蔣介石。那兩者是不同性質的問題。揄揚陳炯明「天地正氣古今完人」與歌頌蔣介石不能相提並論。

參加大論戰文章之五：

不廢萬古江河流

——為朱有道先生辨誣

旅美大陸學者 潘仁泉

上月下旬，我和一些關心國是的友人都收到了鐵桿台獨人士洪哲勝先生電郵來的楊天石教授八月廿四

日「嚴正聲明」，連附件洋洋灑灑一萬六千餘言，端的是慷慨激昂，娓娓動聽。然而重新審閱，《黃花崗》第五期所刊朱有道先生「大陸著名學者痛說民族英雄蔣介石」一文後，大家都覺得楊教授因為講了幾句真話，而被中共黨內的極左派與凡是派對殺圍剿，這是十分令人惋惜的，人們都理解楊教授此時此刻的惶恐心情，卻也不約而同地引發出以下十四項隨感：

左王左將借題鬧事 矛頭直指中共中央

一·楊教授的「聲明」本文一萬三千餘字，其中三分之一篇幅系批評朱文的「政治攻擊」與「反共情緒」，另三分之二篇幅是撻伐中共內部極左派「借題鬧事，肆意攻擊江澤民同志及其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攻擊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鑑於楊教授自稱祇是個無黨派學者，似不必逾份來為現總書記與前總書記保駕護航，一切是非曲直宜由胡、江二位、至少由中共中央書記處發表聲明，以受激濁揚清之效。

二·對照楊教授的《蔣氏密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與朱先生書評內容，發覺引文並無舛錯，亦未違反學術規範。書評本來就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文體，就好比前輩作家魯迅先生在其傳世之作《中國小說史略》中所述，一部《紅樓夢》，有人以為是記敘已故大學士明珠的家事；有人說賈寶玉、林黛玉是影射清順治帝與董小宛；有人說此書弔明之亡，揭清之失，「紅」影射朱字，「賈」指清朝，男子是滿人，女子指漢人，十二釵指清初江南十二文士；還有人說此書系曹雪芹的自傳……。這些不同角度的解讀均有助於瞭解全書的旨趣，但並未影響其普世價值。所以這類學術評價的問題絕不應扯上“斷章取義，各取所需、甚至反動與否”等等價值判斷。

三·人們都注意到，楊教授的史學著作常常正反兩論並立，「但書」比正論更為詳盡。這是在極權統治下，一切有良知的文人，為提防「秋後算帳」的不二法門，如是則永遠立於不敗之地。學術研究採取首鼠兩端策略，固然有失誠心，但設身處地為楊教授著想，我們似乎不必苛求鐵幕中人。前不久，北京著名律師朱元濤一百五十多元錢在香港中共官營的三聯書店買了《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回程在北京機場海關被沒收。該書作者高華是南大歷史系教授、博

導，他運用國內公開發表的文章、資料撰寫這篇博士論文，交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卻被北京海關、海關總署監督司與中級人民法院判為「否定毛澤東思想、否定延安整風運動、政治上有害」纏訟經年，至九月八日才由北京高院判決勝訴。不然的話，海關的低學歷丘八，居然有權否定全國十大名牌大學之一的南京大學博士教授的社科研究成果，豈非「全民李敖化」、「全民瓊瑤化」了？朱元濤是北京的大牌律師，高院不得不網開一面，然而每年全國各地不知有千千萬萬本學術名著被顛預無能的海關小吏充公銷毀，那也難怪大陸上史官遍地了。

書評與轉載不同 假設史學荒誕

四·楊教授指摘朱文沒有照抄他批判蔣介石的段落，這又是強人所難。即便在中國大陸，書評文章都有字數限制，自幾百字至一、二千字不等，朱先生的書評寫到近萬字，獲台、港、美三地刊物不加刪節發表，這已經是罕見的一例。書評與轉載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書籍與雜誌又是不同的載體，要不「斷章取義」，除非將楊先生大作《蔣氏密檔》四十七萬言全文轉載，這非但使海外刊物礙難從命，連楊先生主編的《百年潮》月刊也必定要敬謝不敏的。

五·楊先生承認「一九四九年以來大陸歷史學家普遍認為，調（中山）艦命令為蔣介石所發，是蔣的陰謀」，又根據史料確定「蔣介石沒有直接給海軍局或李之龍下達過調艦命令……矯蔣介石之令的是黃埔軍校駐廣州辦事處主任歐陽鍾」，卻否認「蔣介石蒙冤七十五年」，這般一加一等於二的淺顯道理都拎不清，還要說什麼「即使沒有右派的造謠和挑撥，蔣介石遲早也會製造出另一個事件來的」，這又陷入了今日大陸盛行的「假設史學」，真不知道歷史學家的職責是研究已發生的歷史事件，抑或充當算命先生、預測大事的角色？既然歷史有其必然性，蘇俄侵佔我北方疆域三百多萬平方公里是必然的，日本掠奪釣魚台列嶼是必然的，日本化學武器傷害中國人民是必然的，那還需要國防部和外交部做什麼，養幾百萬大軍編列幾百億國防、外交預算所為何事？

東北軍投敵多如牛毛 張學良親弟是大漢奸

六·楊先生說「九一八事變中，中國軍隊未作任何抵抗就丟掉了東北大片江山」，又肯定張學良是愛

國人士，為什麼不指明「丟掉東北大片江山」的是「東北王」張學良？為何此人在東北不抗日？在熱河不抗日？偏偏要逃到偏遠的陝西省去侈言抗日？為什麼張學良敢發動中東路戰事，卻不敢同實力遠遜於蘇俄的日本較量？既然中東路起釁並非中央政府下令，為何「丟掉東北」要埋怨「蔣介石對日外交妥協退讓」？當時中央祇能以蘇浙皖贛湘五省稅收供養全國三百萬軍隊；東三省與冀察察等省，平時無款解中央，地方稅收名目繁苛，十有九成用以養兵，而兵幾何，每月每兵所得幾何，中央並無過問之權，互疆場有事，中央責以防禦，則請餉之點來如雪片，平日已被一口吞空，涓滴無餘，中央何從得財以應其請？請而不遂，則一切責任歸於中央，而舉土地以委諸敵人，反而諉過於中央「妥協退讓」；真正叛國投敵的東北軍將領鮑文樾、富雙英、胡毓坤、王永泉、劉桂堂、孫殿英、何豐林、董鵬飛、楊毓珣，槍殺邵元沖、王以哲的東北軍團長孫銘九投敵充當日偽山東省保安副司令，以及張學良親弟張學銘在日寇敗象必露的一九四三年六月投敵出任汪偽軍委會委員，卻祇字不提，這些都是「愛國」的「必然」產物嗎？

七·楊先生一再強調「蔣介石對日本的軍事實力估計過高……在民族敵人面前軟弱」，他似乎不知道，在八年抗戰中，中國軍民的傷亡率是日本軍傷亡率的六十倍，中國士兵以血肉之軀抵擋日本的坦克、大炮、毒氣，在長城抗戰時，我軍未見到敵人即大半死於敵方凜冽的炮火，這樣的犧牲難道還不夠慘重嗎？難道要把二十個師的預備隊全部拼光死光才算不「畏戰，避戰」嗎？

八·楊先生說「蔣介石的忍辱是在國家尚在，事猶可為的時候」，但他不說，當時日軍一個師有五千多匹馬，五百輛汽車，步槍每人一支，但國軍每師祇有三千八百支步槍，既無坦克，又無陸空協同，多數師沒有大炮，這正如華南師大左雙文教授所說，「當國者不可能一碰就炸，動不動就破釜沈舟，在準備很不充分的情況下輕易決策，舉一國之生命財產投入於戰爭之中，而沒有絲毫的遲疑，猶豫。如果是這樣，反而是不可想像的」。相比之下，今日中共擁有槍彈、導彈、中子彈，為什麼在民族敵人面前畏戰、避戰、不敢一舉收復被侵略的彈丸之地釣魚台列嶼呢？

爲什麼還要把神聖國土割讓給蘇俄、印度、甚至緬甸那樣的小國弱國呢？

六十五年前毛澤東就已經頌揚蔣介石爲偉大領袖

九·蔣介石是不是民族英雄，在國際反法西斯盟國中，早有定論。二十八年前他去世時，赴台奔喪的美國副總統洛克菲勒曾說過：「美國人民將永遠銘記蔣故總統的果斷、大勇和愛國情操以及二次大戰中他對盟國的貢獻。他的功業與盛德，足以使他在人類歷史中永垂不朽」。在中國大陸，早在六十五年前，毛澤東就在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報告中承認：「國民黨有它光榮的歷史；有孫中山先生和蔣介石先生前後兩個偉大的領袖」，表示「我們是堅決擁護蔣委員長及其領導下之國民政府與國民黨的」。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毛澤東還當衆高呼「蔣委員長萬歲！」這些不足以證明蔣介石是民族英雄嗎？近幾年，到奉化蔣氏溪口故居朝拜的遊客每年不下三百八十萬人，在「蔣家王朝早已滅亡」、「毛共王朝尚未滅亡」之時，竟然爲毛澤東故居所不敢想像。有道是「歷史確乎是人民寫的了」。極左份子說：「痛說蔣介石是民族英雄的人，就是國民黨潛入共產黨內的殘渣餘孽」，依照那種三段論法，國民黨殘渣餘孽每年遞增三百八十萬，連毛澤東本人都不例外，此人原本就當過國民黨候補中委兼代中宣部張，倒也名符其實。

十·兩年前，由軍方宣傳費用支撐的極左刊物《中流》和《真理的追求》遭到查禁與停刊，使極左份子如喪考妣。這兩道取締令是江澤民頒發的，原因是這兩種極左刊物瘋狂地反對改革開放，且其銷數幾乎是零，相信任何人出任中共總書記都不會支持這樣兩本不得民心的刊物。而今年七月，那一小撮左王左將假借朱有道在海外發表的書評而突然發難，其矛頭是直接針對江澤民胡錦濤的。如果遮掩的匿名信能「推翻」胡江體制，楊教授捶胸頓足也是枉然；如果極左份子不得人心，沒人理睬，楊教授委實不必反應過度。

所謂老戰士的匿名信充斥了姚文元式的暴力語言

十一·有關胡漢民的評價，歸結爲「顛倒是非、欺罔民衆等」五十五字。今年七月十五日參考消息第十五版有詳盡的評述，那整版的文章指出「『九·一八』與『七·七』事變都是胡漢民指揮軍閥勾結日寇、

南北夾擊當時中國中央政府的惡果」。如果胡漢民真是愛國人士，新華社參考部斷不會刊發這整版文章。設若有人不服氣，也容不得不同意見，是不是想要砸碎中宣部，改組新華社呢？是不是要將時光倒流三十六年呢？

十二·所謂「老戰士」的匿名信，胡扯朱文「涉及幾本在境外出版的有關蔣介石的專著」。我們一再審閱朱有道的書評，發現引文來自三種出版品或文獻：①《蔣介石日記類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南京）藏；②《李潔之文存》兩冊，廣東省興寧縣政協副主席著；③《陳濟棠》，廣州市社科院歷史系鍾卓安教授撰寫，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出版。其中沒有一本是境外出版或保藏的，「老戰士們」怒髮衝冠，是否想砸爛第二歷史檔案館、搗毀興寧縣政協與廣州市社科院，然後「再追究違反憲法的責任和叛國罪」呢？

十三·「老戰士們」的匿名信，充斥了戚本禹、姚文元式的文革語言暴力，仿佛讓讀者返回那個遍地腥雲、滿街狼犬的十年；即使楊教授的「聲明」，也使用了一些非學術的語言，那是十分令人遺憾的。記得全國作協主席巴金在他晚年回憶文革浩劫的《隨想錄》中說過，他每講九句假話，就是爲了掩護一句真話（編按：巴金的那一句真話究竟真不真，還要另當別論）。對於楊教授的大量史學論著，當也可作如是觀。正因爲楊教授走在大陸同行們的前頭，根據史料講了一些真話，所以受到海外同行的敬重！名目不同的學術基金會每年都資助他去美國、日本、台灣蒐尋史料、出版專著，此乃實至名歸；相反，有個大陸出來的極左學者，長期以來都拾左王左將之餘唾，不斷重復四人幫的歷史觀，故他踏上美國土地多年，迄無一家基金會願意資助他研究經費。楊教授的宏義，有人認爲是「頌揚蔣介石」，另有人認爲「對蔣介石斧鉞交加」，這些本屬學術討論的範疇。不應該見到一種不合己意的觀點就輕率上綱，棍棒交加。如果堅持打棍子、扣帽子、抓辮子，還有什麼學術繁榮可言？！

惡性台獨份子中共極左派的吹鼓手

十四·最後我們必須嚴肅指出的是，那一萬六千言的「聲明」與極左帖子，是由惡性台獨份子洪哲勝

在四處傳播的。眾所週知，洪哲勝是台獨集團中最極端派系的掌門人，他長期駐美，代表民進黨，以中華民國的公帑收買與拉攏大陸流亡海外的民運份子，同他們商定在推翻中共政權後，允許台獨、藏獨、疆獨。如今洪哲勝對辱罵蔣介石的言論如獲至寶，還加上按語廣為散發，並非他厚愛於江澤民胡錦濤楊天石，其真正動機無非是醜詆蔣介石的人格，否定他一生對國家、民族的功績，一筆勾銷六十年前他在開羅會議堅持收回台澎主權的歷史事實，從而割斷台灣與大陸的法律與歷史臍帶，俾加快台灣獨立的步伐。幾十年前，中共內部的極左勢力曾經以金錢、物質參養過台獨的幼苗；如今台獨勢力在台灣已經初具規模，形成氣候，這不是應合了一句古話了嗎？——玩火者必自焚！

2003. 10. 10.

參加大論戰文章之六：

關於拙著《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的

嚴正聲明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現代史研究所所長 楊天石

編者按：務請讀者仔細閱讀楊教授的這篇一字未易的“嚴正聲明”。你一定會痛心共產專制主義的幽靈依然窺伺在這篇聲明的字里行間；你更會悲哀地感受到一個想講真話、想做真學問的中國知識份子所無以擺脫的虛假、緊張和恐懼心態；謝謝極端台獨人士迫不及待將這份嚴正聲明傳到了全世界……

我研究中華民國史和中國國民黨史三十餘年。多年來，我在努力完成上述兩項國家科研重大項目的同時，長期進行有關蔣介石的專題研究，陸續發表相關成果。其中一部分，收入《近代中國史事鈎沈——海外訪史錄》一書，作為《近史探幽系列》之一，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於1998年出版。2002年2月，我又將另一部分論文結集為《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作為《近史探幽系列》之二，仍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此書出版後，頗蒙海內外學界關注。部

分媒體發表了使我汗顏的稱譽文字，但是，也出現了一些極不正常的情況：海外發表了一篇嚴重歪曲拙著面貌的反共「書評」，境內少數一貫以「左」的面貌出現，敵視鄧小平理論和我國改革、開放事業的「左派」借題發揮，將矛頭指向中共中央。這就迫使我不得不發表聲明，以正視聽。

一 斷章取義、無中生有、強人就己的「書評」

今年4月，段幹木先生在台灣《傳記文學》4月號發表「書評」，評論我的《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以下簡稱拙著）。該文題為《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生死於不顧——大陸一流學者為蔣介石翻案》，此後，美國《黃花崗雜誌》第5期又發表《大陸著名學者痛說民族英雄蔣介石》一文，署名朱有道，而內容則與台灣《傳記文學》所刊完全相同。事實表明，段幹木（朱有道）先生的「書評」斷章取義，強人就己，並且借題發揮，進行政治攻擊，已經超出了「書評」的範圍，並且嚴重歪曲了我的著作，造成很惡劣的影響。

茲依歷史事件先後，從幾個方面揭示「書評」的歪曲，同時說明拙著的真相。

（一）關於中山艦事件。拙著旨在還原歷史真相，洗清加在中共頭上的誣妄之詞，揭露此次事件雖發端於西山會議派的挑撥離間，但蔣介石的所作所為，有其必然性

中山艦事件發生於1926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當年3月18日深夜，黃埔軍校駐廣州辦事處主任歐陽鐘聲稱，「奉蔣校長命令」調艦，共產黨員、時任海軍局代局長的李之龍即派中山艦及寶璧艦應調。但是，當兩艦由廣州開到黃埔軍校後，卻發現並無調艦之事。20日晨，蔣介石即逮捕李之龍等共產黨員50餘人，佔領中山艦，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收繳工人糾察隊槍械，監視蘇聯顧問。此後，蔣介石在許多場合，即聲稱中山艦的調動，系李之龍「矯令」，目的是將他強行綁架到莫斯科，屬於共產黨和蘇聯方面的陰謀，而1949年以來大陸歷史學家則普遍認為，調艦命令為蔣介石所發，是蔣的陰謀。事情的真相如何，一直是個謎團。

拙著根據大量扎實、可靠的資料指出：1. 中山艦駛往黃埔並非李之龍「矯令」，它與汪精衛（當時國民黨的左派領袖）、季山嘉（蘇聯顧問）無關，也與共產黨無關。多年來，蔣介石和國民黨部分人士一直大肆宣傳的所謂「陰謀」說顯然不能成立。2. 蔣介石沒有直接給海軍局或李之龍下達過調艦命令。因此，所謂蔣介石下令而又反誣李之龍「矯令」說也不能成立。3. 中途加碼，「矯」蔣介石之令的是黃埔軍校駐廣州辦事處主任歐陽鍾（拙著 115—116 頁）。其原因在於國民黨右派想「拆散」當時廣州國民政府的團結局面，挑撥國共關係，「使共產黨和蔣分家」（121 頁）。拙著特別著重指出：就蔣介石誤信右派謠言來說，中山艦事件有其偶然性；就當時國民黨內左、右派的激烈鬥爭和蔣介石的思想來說，又有其必然性（127 頁）。「蔣介石和左派力量爭奪領導權的鬥爭必不可免，即使沒有右派的造謠和挑撥，蔣介石遲早也會製造出另一個事件來的。」（129 頁）

拙著關於中山艦事件的論述大體如上。但是，在段幹木（朱有道）先生的「書評」中，卻專門寫了一段「中山艦事件，蔣介石蒙冤七十五年」，作為拙著為蔣介石「翻案」的有力證據之一。這是嚴肅的科學態度嗎？

（二）拙著批判蔣介石「專制、獨裁成性」，批判國民黨由「一黨專政進一步發展為個人獨裁」，而「書評」卻聲稱，拙著肯定蔣介石「是在向著現代民主和法治前進」

1931 年 2 月，蔣介石與國民黨元老、立法院院長胡漢民在制訂約法問題上發生分歧。蔣主張制訂約法，而胡則反對制訂約法。28 日，蔣介石悍然將胡漢民軟禁於南京湯山。關於此事，拙著評論說：「蔣介石雖然早年就參加辛亥革命，但始終並無多少民主思想。」（293 頁）「他此際之所以重視約法，主要是中原大戰和北平擴大會議的刺激。」「中原大戰是國民黨統治中國後第一次大規模的軍閥混戰。……它不僅造成了人民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也嚴重威脅著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的統治。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不得不接過政敵的口號來，力圖以此爭取人心，剝奪反對派的藉口，從而穩固自己的統治。」（同上頁）在這一論述的前提下，我曾根據蔣介石日記提

出，他有過某些「刷新」政治的念頭。拙著寫道：「儘管蔣介石的目的是『闕絕亂源』，鞏固統治，但是赦免軍事、政治犯，制定約法，自由選舉，自由提案，議案公開，等等，畢竟是在向著現代民主和法治前進。他在『江電』中重提曾作為國共合作基礎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也頗有耐人尋味之處，無奈蔣介石專制獨裁成性，一遇到反對意見，他就又用起老套路來了。」（294 頁）拙著還分析說：「蔣是個獨裁主義者，追求、神往的是大權在握，個人專斷的『總統集權制』，豈能容得別人的批評、牽制和反對呢！」拙著又說：「軟禁胡漢民事件是中國 30 年代初期的一次典型政治事件。國民黨的一黨專政進一步發展為個人獨裁。自此，南京國民黨中央和國民黨政府僅存的一點民主氣氛掃地以盡。」（299 頁）文章結尾，我特別指出，蔣「用粗暴的辦法踐踏了現代民主的原則」。類似的嚴厲批判還有，不能一一列舉。但是，這些，段幹木（朱有道）先生都不引，主觀、武斷地聲稱：「楊天石認為蔣介石前述舉措『是在向著現代民主和法治前進』」，也作為拙著為蔣介石翻案的例證之一。斷章取義的做法還有比這更突出的嗎？

（三）拙著指出，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的對日外交仍以妥協、退為讓特徵，但「書評」卻將它當作「中共喉舌」的言論，引用拙著來加以批判，利用本人反對本人

段幹木（朱有道）先生的「書評」有一段妙文，照錄如下：「中共喉舌一向認為：『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的對日外交以妥協與退讓為特徵。』但楊天石教授以大量史實證明，暫時的妥協包含了『弱國面對強國時的無奈與不得已，它是一種政策，也是一種謀略。』」經過「書評」的這一處理，楊天石就成了反對「中共喉舌」的勇士。事實是否如此呢？

拙著原文是這樣的：「九一八事變中，中國軍隊未作任何抵抗就丟掉了東北大片江山，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因此受到了國人最嚴厲的批評和指責。此後，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有所改變，其表現是：在淞滬地區和長城各口抗擊來犯日軍；在談判桌上，也進行過若干抗爭。但是，就其總體考察，這一時期，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的對日外交仍以妥協和退讓為

特徵。」(403頁)兩相比較,「書評」祇刪去了上引拙著中最後一句的「仍」字,就將這一觀點定性為「中共喉舌」的語言。那末,敵人到底是「中共喉舌」呢?還是「中共喉舌」的反對者呢?

我在認定廬溝橋事變前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的對日外交「仍以妥協和退讓為特徵」的基礎上,對此進行過認真、嚴肅的科學考察。拙著指出:蔣之所以如此,一由於他的「興奮中心在剿共」。(381頁)。拙著說:「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蔣介石認為內憂重於外患,視中共為頭號敵人。」(397頁)對此,拙著嚴厲批判說:「當時的國民黨和中共之間有巨大的政治分歧,但無論如何,總是『兄弟鬩於牆』,在民族敵人面前屬於內部矛盾。蔣介石視中共為『心腹大患』,視日本侵華為『皮膚小病』,將中共看成遠比日本軍國主義者更為危險的敵人,這就顛倒了內外矛盾之間的關係,違背了國人團結禦侮的普遍願望,一系列的錯誤也就由此產生了。」(397-398)

拙著指出,廬溝橋事變前蔣介石實行對日妥協和退讓政策的第二個原因在於「蔣介石對日本的軍事實力估計過高。他認為:日本已是現代化國家,日軍武器精良,技術高明,中國在短時期絕對無法彌補這兩大缺點。因此,在他看來,中國軍隊『有敗無勝,自在意中』。他甚至估計,日軍在三天內就可以佔領中國沿江、沿海的要害地區,切斷軍事、交通、金融等各項命脈,從而滅亡中國。」(381-382)對此,拙著分析說:「中日間的差距是事實,戰爭需要準備也是事實,蔣介石主張進行不斷的、有後續力的持久戰鬥也是正確的。但是,蔣介石對日軍實力估計過高,對戰爭中武器、技術的作用也估計過高,相反,對中國的抗戰力量則估計過低。他戰略、戰術呆板,祇知道打陣地戰、固守戰,不懂得集中優勢兵力攻敵一點的戰略戰術,也完全不懂得人民戰爭和敵後戰爭,這是他長期畏戰、避戰的原因。」(384頁)

拙著還指出,廬溝橋事變前蔣介石實行對日妥協和退讓政策的第三個原因是中國傳統歷史文化的某些影響。拙著說:「蔣介石是浙江人,熟悉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發憤圖強、終於滅亡吳國的故事。」(384頁)拙著還指出,中國古代哲學家老子的「欲取先予」,「以退為進」、「以柔克剛」等思想對蔣介石也有影響。(385頁)這些,拙著都有扎實的資料為

據,並非虛構。但是,即使如此,我仍然對蔣介石當年的妥協、退讓進行了批判,拙著說:「應該指出,勾踐的忍辱是在抵抗失敗,國家滅亡之後,而蔣介石的忍辱是在國家尚在,事猶可為的時候。蔣介石的忍辱反映了他在民族敵人面前的軟弱一面,其結果是使國家權益一再受到損害。」(386頁)又說:「蔣介石實行這一政策,有其錯誤的、應予批評、譴責的方面。」(403頁)正是在這一前提下,我才表示:戰爭需要多方面的準備,蔣介石在一段時期內妥協、退讓,目的之一在於拖延時間,作好準備,其中「也有弱國面對強國時的無奈與不得已。它是一種政策,也是一種謀略」。但是,在段幹木(朱有道)先生的「書評」中,我的上述分析和批判都不見了,我的書就完完全全被說成是蔣介石「辨誣」、「翻案」之作了。

(四) 拙著肯定胡漢民、陳銘樞、李濟深、馮玉祥、張學良等反蔣愛國人士,而「書評」卻一律否定

20世紀30年代,由於蔣介石對日妥協退讓,因此激起國民黨黨內部分愛國人士的強烈反對,先後有胡漢民組織「新國民黨」,組成「西南派」,陳銘樞、李濟深等成立福建人民政府、馮玉祥組織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等事件。對此,我在拙著中都有一定程度的肯定。例如,拙著稱:「蔣介石的對日妥協政策日益為國人所不滿,胡漢民由於主張抗戰,逐漸爭得國民黨內部抗戰派的擁護。」(312頁)但是,「書評」卻說:「以上種種陰謀活動表明,胡漢民絕對不是『相當正派』的政治人物。」又說:「胡漢民策動了抗戰前中央與地方連綿不絕的戰事,導致內耗嚴重,於是日寇乘虛入侵。」還說:「張學良是個投機遊移分子。」凡此,都和拙著的觀點完全對立。

(五) 拙著對蔣介石的抗日作了適當肯定,同時,也對其軟弱、動搖作了揭示和批判,但「書評」卻全面捧場,美化其為「民族英雄」

儘管蔣介石長期實行對日妥協、退讓政策,但是,在日寇侵略危機日益加深的情況下,他不得不從事抗日準備。一方面,他仍然堅持「剿共」政策,但同時,又企圖迷惑日本人,以對「紅軍」的追剿掩護其在四川、雲南、貴州建立長期抗日基地的行為。廬

溝橋事變爆發，蔣介石終於決心抗戰，和中共再度合作。抗戰八年中，他一面指揮國民黨部隊對日作戰，但同時又和日本人多渠道地秘密談判。在拙著中，我第一次向世人揭示了蔣介石和小川平吉、萱野長知之間的曖昧關係。拙著分析說：「抗戰前期，蔣介石腳踏兩頭船。他一面進行對日作戰，同時又維持談判，準備妥協。當日軍大舉進攻，國民黨軍作戰不利時，這種動搖、妥協的傾向表現得尤其突出。蔣介石之所以最終沒有接受日方誘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和日本政府愚蠢、僵硬的『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政策有關，也和中國共產黨的存在，國民黨內部抗日力量的存在有關。蔣介石充分懂得，祇要他接受日方條件，甚至祇要他和日方談判的消息透露，他就會遭到人民和一切愛國力量的強烈反對，從而導致垮台。」（428 頁）拙著還以大量獨家發現的資料探討孔祥熙與日本人之間的秘密關係。拙著指出：「孔祥熙的議和活動應該看作蔣介石全盤對日策略中的一招，曲折地反映出蔣介石的內心矛盾和兩手策略。蔣介石長期認為中國實力不如日本，與日本作戰，中國必敗。從九一八到盧溝橋事變，蔣介石終於走上了抗戰的道路，但是，蔣介石思想上的恐日症並未消除，因此，他採取的是一面作戰，一面和談的兩手政策，根據不同形勢，交互為用，以便進可以戰，退可以和，左右逢源。」但是，段幹木（朱有道）先生對我的上述分析和論述都視而不見，過度稱譽蔣在八年抗戰中的表現。《傳記文學》的標題是《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生死於度外》，《黃花崗雜誌》的標題是《大陸著名學者痛說民族英雄蔣介石》。請問，這符合拙著的原意嗎？能從拙著找到「民族英雄」這四個字嗎？值得提醒的是，由於個人精力和篇幅的限制，拙著中沒有一篇研究蔣介石如何指揮國民黨軍隊對日作戰，相反，僅有上述兩篇「痛說」蔣和日本方面秘密談判的文章。這是在「痛說民族英雄蔣介石」嗎？

（六）「書評」反映作者的觀點與情緒

通過上述分析可見，段幹木（朱有道）先生的「書評」斷章取義，自取所需，強人就己，無中生有，嚴重歪曲了拙著的面貌。其各種觀點，均系「書評」作者的觀點，與拙著無關。「書評」還有一部分

政治攻擊的內容，相信明眼人均能看出，那是「書評」作者反共情緒的發泄，與拙著更沒有任何關係。

二 「左派」們為何借題鬧事

段幹木先生的「書評」改題換名，在美國《黃花崗雜誌》發表後，為國內一家網站轉載，為少數一貫以「左」的面貌出現，反對鄧小平理論，反對改革、開放政策的人士（以下簡稱「左派」）發現後，覺得是個好機會，連拙著都沒有看，也不想看，就急不可耐地在「工農天地」網站的「主人公論壇」上發表致胡錦濤同志及中共中央的公開信，借題鬧事。他們一面攻擊我所主編的《百年潮》雜誌，一面肆意攻擊江澤民同志及其「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攻擊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

（一）「左派」們根本沒有見過拙著，就急不可耐地發表公開信

公開信題為《蔣介石是中國的「民族英雄」？還是「頭號戰犯」、「千古罪人」、「民族敗類」？》，署名是「一群老紅軍、老八路軍和老新四軍、老人民解放軍戰士。」（以下按照該網站的說法，簡稱「老革命戰士們」）該函一開頭就咬定朱有道的「書評」是我寫的。函稱：

最近在一家國內的網站上，看到境外的《黃花崗雜誌》今年第五期披露的，介紹國內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百年潮》主編楊天石的《痛說民族英雄蔣介石》一文（其中還涉及與此有關的幾本他在境外的出版的有關蔣介石的「專著」），引起我們這些老紅軍、老八路軍和老新四軍、老人民解放軍戰士們極大的震驚和憤怒。這件事，在當前的政治、思想領域，也勢將造成歷史的根本顛倒，帶來極端嚴重的混亂。

接著，這些「老革命戰士們」就表述了他們對蔣介石的看法：「早已經作為一個有歷史定論的 20 世紀中國的歷史人物，被釘上歷史的恥辱柱。」然後引用毛澤東 1948 年所著《將革命進行到底》文中的一段話，同時引用同年中共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最高權威發言人，說明當時就已將蔣介石列為「第一號戰爭罪犯」。作者就此嚴詞責問我：何以在半個多世紀後，竟然將蔣介石「變成了中國的『民族英雄』？」作者

很會寫文章，顯然也用過心思，接著就是幾大段很動情的文字，例如：「這已經成了許多參加過十年內戰、抗日戰爭和三年解放戰爭的老戰士們所百思而不得其解，絕對無法容忍和接受的事。更是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那些革命先烈們的絕對不能答應的事。」「如果蔣介石變成了中國的「民族英雄」，那麼，我們這些人，我們的革命先烈們，領導我們進行這場偉大革命的中國共產黨及其偉大領袖毛澤東，豈不是就都變成了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歷史罪人』了嗎？人民英雄紀念碑，不是也應當徹底推倒嗎？社會主義的新中國，不是也就失去了建立和存在的理由嗎？」這些文字真是擲地有聲，不愧是「老革命戰士」！

然而且慢，作為「老革命戰士」，必然對毛澤東同志的著作非常熟悉。「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你們根據什麼證明朱有道的「書評」是我寫的？又根據什麼肯定我在境外出版過幾本「有關蔣介石的專著」？還根據什麼證明「民族英雄」是我加在蔣介石頭上的桂冠？海外刊物上的文章能夠信以為真嗎？可敬可愛的「老革命戰士們」，你們多年的對敵鬥爭經驗哪裡去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真擔心你們要被控為誣陷罪呀！

附帶說一句，我對你們的「老革命戰士」的身份很懷疑。倘是，為什麼不敢署名？須知，你們這一舉動是件大事。假如中央重視，可能會向你們做進一步的調查。你們不署名，怎樣找到你們呢？

（二）「左派」的目的在於借刀殺人，要求黨中央封禁《百年潮》，同時為《中流》和《真理的追求》鳴冤

「老革命戰士們」在寫了上述動情文字後，就提出「強烈要求」：一、希望把這件事徹底查清，弄一個水落石出。楊天石到底是一個什麼人？現在所看到的《痛說民族英雄蔣介石》一文，據說是來自境外，（還有與之有關的「著作」），這是不是真的是楊天石所寫？如果不是，為何不親自出來加以澄清？如果確實是他寫的，目的又是何在？為何還要拿到境外發表和傳播？是通過什麼途徑傳播出去的？這比在國內傳播是不是產生了更為惡劣的效果和影響？二、在查清之後，如果確實是他所寫的，就應當作出認真、嚴

肅處理，並向廣大讀者和人民群眾作出認真、負責的交代，以消除其極端惡劣的影響。

公開信一開頭本已咬定朱有道的「書評」是我寫的，然而「老革命戰士們」自知毫無根據，畢竟心虛，所以這裏又故意閃爍其詞，以便在一旦受到質詢時易於脫身。但是，請問「老革命戰士們」，你們既然連「是不是真的是楊天石所寫」都不能肯定，何以連拙著都不找來看看，就輕率地向中央告狀，並且急急忙忙公之於網站呢？其實，你們的如意算盤很清楚，不管是不是，先扣上一盆屎再說，說不定永遠查不清呢！

應該說明的是，我祇是一個普通學者，「老革命戰士們」對我並無太大興趣，他們是另有所「圖」的，請看下列一段文字：

人們注意到，楊天石不僅是社科院的研究人員，共產黨員，還是一家「官方」輿論陣地——《百年潮》的主編。2001年以來，一貫堅持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兩家雜誌《中流》和《真理的追求》，遭到查禁和停刊，為什麼像《百年潮》這樣的刊物和它的主持人楊天石，卻可以通行無阻？從刊物的內容、傾向到受到的不同對待，兩者何以呈現了如此巨大的反差和鮮明對照？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這不是更值得人們深思嗎？

這就是「老革命戰士們」所寫公開信的主旨所在了。《中流》和《真理的追求》是不是「一貫堅持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他們對鄧小平理論，對新時期的改革開放持何種態度，這裏不予評論，相信廣大讀者心中有數，相信黨中央心中也有數。至於《百年潮》，這裏我也不擬作自我標榜，相信廣大讀者心中有數，黨中央也心中有數。我這裏祇想說的是，《百年潮》受到「匿名信」攻擊已經不祇一次了。早在1999年末，中央有關部門就收到過兩封匿名信，攻擊《百年潮》反對黨和社會主義，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為此，有關部門曾經組織調查組，將敵刊當時全部已發文章仔細審閱，結論是：沒有發現有任何反黨文章，「匿名信」所述許多情況都是不真實的，調查組還指出《百年潮》有三大優點，三個不足。這一調查報告經黨中央領導同志批准。這就是《百年潮》得以生存至今，我能主持該刊至今的原因。

中國近代史，特別是中共黨史，研究難度很大，有人形容為「雷區」，不無道理。我們辦刊中不可能在所有問題上都把握準確，因此也就不可能沒有缺點和不足。我們歡迎一切善意的批評和指導。但是，我們堅決反對匿名誣陷。「花上六毛錢（一張郵票），讓你查半年」，這是一種極壞的作風。

（三）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左派」借題鬧事，矛頭直指中共中央

封掉《百年潮》是「左派」們多年的願望，但是，以為「左派」之志祇盡於此，那就未免把他們看簡單了。上引「老革命戰士們」的公開信在敘述《中流》、《真理的追求》和《百年潮》的不同命運後說：「兩者何以呈現了如此巨大的反差和鮮明對照？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這不是更值得人們深思嗎？」這裏話中有話，是全函的「精粹」所在，不可忽視。

其實，不用他人代為分析，緊隨「老革命戰士們」公開信的「跟貼」已經將所有要說的話都說出來了。「跟貼」雖祇有幾個人署名，但層層深入，步步遞進，鋒芒很銳。茲選錄如下：

《百年潮》是中央黨史研究室的機關刊物，這家刊物，多年以來，打著黨史研究的旗號，刊登了大量的反黨文章。利用黨史研究反黨，這家刊物可以說是個惡劣的典型。（作者：秀龍山人；網上發表日期：2003-07-13 01:09）

他們是國民黨潛入共產黨內的殘渣餘孽。毛主席說：「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毛主席又說：文化大革命是共產黨同國民黨長期鬥爭的繼續（大意）。說明共產黨內不僅有資產階級，還有國民黨。毛主席的洞察力是多麼深邃啊。痛說蔣匪介石是民族英雄的人，就是國民黨潛入共產黨內的殘渣餘孽。（作者：ldf，網上發表日期：2003-07-13 07:18）

上面三段是鋪墊，下面就直接攻擊江澤民同志了：

將《中流》《真理的追求》兩個刊物與《百年潮》這個刊物刊登的主要文章進行比較分析，看誰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誰是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結論是十分清楚的。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中流》、《真理的追

求》被封了，至今未復刊，而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百年潮》儘管近年來不斷受到讀者的尖銳批評，卻安然無恙。前任總書記江澤民同志是不是有責任向全黨和全國人民解釋一下，這種反常的局面到底是怎樣形成的？（作者：秀龍山人；網上發表日期：2003-07-13 08:17）

香的變臭/臭的變香——這種很反常的現象出現，正是脫離毛主席革命路線，否定毛澤東主義——毛主席繼續革命論的惡果！如不批判和擺脫修正主義路線枷鎖，還會向災難的深淵往下滑！（《反面教員的作用不可忽視》。作者：工言；網上發表日期：2003-07-15 07:38）

接著，其中一位化名「子夜光」的「左派」就要求「整黨」，開除楊天石一類的「叛黨的人」：

應該立即整黨，凡是這種叛黨的人，首先要一律開除出黨！再追究違反憲法的責任和叛國罪。（網上發表日期：2003-07-14 14:50）

然而，「左派」們很快就發生分歧。「幼雅」等攻擊現在的中共中央是「執政的資產階級集團」，根本沒有可能「整黨」，必須等到他們「執政」以後才能進行。他們說：

馬克思主義者執政的時候整黨，是為了解決隊伍防止資產階級復辟，馬克思主義者不執政的時候，其主要任務是推翻資產階級專政，此時，整黨的手段絕對不能夠實現純潔隊伍的目的。馬克思主義者要求在資產階級執政的時候進行整黨，挨整的主要對象肯定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老先生糊塗了》。網上發表日期：2003-07-14 23:02）

誰來整黨？真正的共產黨人現如今沒有能力對黨內進行清理整頓，執政的資產階級集團自己的屁股還擦不乾淨，更不要指望他們肯進行整黨。

現在，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來說是整頓、壓迫，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來說是推翻和反抗，無論是黨章還是那個黨員，都沒有能力對資產階級進行整黨，還是等真正的共產黨人執政後再談整黨吧！（《你說的對象我看到了》。網上發表日期：2003-07-15 14:01）

「左派」們越說越激動，他們竟攻擊江澤民同志的「三個代表」為「資產階級思想意識」：

資產階級不是不敢整黨，他們祇是不敢按照黨章進行整黨，但是他們卻敢於也迫不及待地通過整黨來推銷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加速改變無產階級政黨的顏色，三塊表不是通過灌輸資產階級思想意識來實現整黨目的的嗎？（同上）

對此，「子夜光」表示：要發揚「五不怕」精神，借楊天石關於蔣介石的評價問題和「黨內資產階級鬥爭」。「子夜光」說：

正因為如此，這才是一場鬥爭，別說現在，就是在毛主席領導下，不是同樣要有五不怕精神，才能堅持真理嗎？蔣介石是帝國主義、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封建主義勢力在中國利益的總代表，是人民公敵！他敢於在人民中國公開表明這種立場，我們就不能表明自己的態度嗎？……這就是真共產黨員和黨內資產階級鬥爭的一個戰場！（《你以為你的道理別人都明白嗎？照你這麼說，老戰士的信也不必寫了？》。網上發表日期：2003-07-15 17:30）

「秀龍山人」也表示，要開展「黨內鬥爭」。他和人辯論說：

黨的路線決定一切。因此，黨內鬥爭特別是路線鬥爭，是最重要的鬥爭形式。按照你的觀點，我們應當放棄一切黨內鬥爭。這正是搞修正主義的人所希望的。（上網日期：2003-07-15 18:52）

但是，「秀龍山人」此論卻遭到「幼稚」的反對，他認為「現在是修正主義把持黨的大權」，「黨內的走資派還在走」，號召人們「揭露修正主義的假面具」：

現在是修正主義把持黨的大權，共產黨人主要是通過揭露和反擊的形式來實現路線鬥爭的目的，如果還套用過去的方式在不同時期進行路線鬥爭的話，最終會滑向與修正主義調和的立場上去。現在的形勢下共產黨人應當去揭露修正主義的假面具，號召無產階級起來反擊他們的猖狂進攻，而不是在黨內進行整頓，我反對的是通過整黨的形式同修正主義進行路線鬥爭，起碼你根本就沒有能力進行整黨，現在黨內的走資派還在走，而且是一大批。（《乾脆把你們倆的問題和二為一了吧》。（網上發表日期：2003-07-16 03:23）

從誣陷我吹捧蔣介石是「民族英雄」起，「左派」們海闊天空地「神侃」一通之後，仍然不忘回到

出發點，將我的言論和「修正主義上台」聯繫起來。

「質疑」的文章說：

不是共產黨修了，墮落為國民黨，能出這樣的「共產黨員」？沒有修正主義上台這個基本事實，這樣的「共產黨員」敢胡說八道？他個人祇是個工具，祇是修正主義思潮的代表，祇是它的主子需要他打頭陣；祇是膿瘡火毒在體內不在體表。（《決定事物的發展的是內因》。（網上發表日期：2003-07-16 10:42）於是，「左派」們就號召人們和黨中央進行「生死決戰」了。「凜然」說：

中國當前正面臨著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兩種前途命運的生死決戰！一切真正的共產黨人、一切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都應該勇敢地站起來，為捍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保衛人民的社會主義江山而英勇奮鬥！（《向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致敬！》。網上發表日期：2003-07-22 01:37）

圖窮匕首見，至此，「左派」們掀起這場鬧劇的目的不是昭然若揭了嗎？

（四）必要的自白

「左派」們借題鬧事，他們想當然地認為，我是《百年潮》主編，必然是共產黨員，「整黨」云云，即系為此而發。其實我祇是個研究中國近代史、知識面略為開闊一點的無黨派學者。《百年潮》是一份以發表中國近、現代史為主的學術刊物，其反映的內容自1840年鴉片戰爭至今日止。專業的需要使有關方面想到了我。我因為想找到一條使提高與普及相結合的史學道路，同時也想通過史學為新時期的改革、開放事業服務，所以儘管我在社會科學院方面有繁重的科研任務，但仍然答應勉力兼任主編。我能在這一崗位上工作近七年，應是新時期才可能出現的新現象。「左派」們連起碼的調查研究都沒有做，就主觀地作出判斷，並由此展開了一系列對中共中央的攻擊。不知你們讀了本人的這一聲明之後，是惘然若失呢？還是又找到了攻擊的例子？不過，應該提醒「左派」先生們注意的是，《百年潮》嚴格實行黨員社長負責制、編務人員集體辦公制和稿件向主管、主辦單位送審制，並不是我個人可以專斷、拍板的。

寫到這裏，我想起了捷克共產黨員伏契克的一段話：「人們，我是愛你們的。你們要警惕呀！」

三 建議「左派」先生們讀點書

「左派」先生們在根本沒有見到拙著的情況下，就根據海外的一篇「書評」誣陷我吹捧蔣介石為「民族英雄」，並且誣陷該「書評」是我寫的，迫不及待地在網站上發表公開信，從而使自己落入非常尷尬的境地，應該好好反思了。這裏，我想再簡略介紹我的其他著作中關於蔣介石的論述，提供「左派」先生們作為反思的資料。

1·《中華民國史》第二編第五卷。中華書局 1996 年出版。該書論述國共合作、北伐戰爭以及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清黨反共等史實。關於四一二政變，我寫道：「上海是蔣介石的舊遊之地。在這裏，他外可以爭取列強支持，內可以得到江浙資產階級的援助，還可以利用黑社會充當打手，具有其他地區不具備的優勢。」（該書 364 頁）我又寫道：「上海工人階級作好了戰鬥和犧牲的準備，完全沒有想到，等待他們的是陰謀和欺騙。」（390 頁）我還寫道：「四一二政變立即得到了中外反動派的歡呼。」（395 頁）「清黨的結果是，國民黨失去了大量的精英，新舊官僚、政客、投機分子乘機聚集，國民黨的腐化日益嚴重。（418 頁）由於該書的嚴格的科學性，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常務副主任金沖及發表書評說：「這部近 60 萬字的巨著，許多方面的研究成果比前人又有新的突破。它是近年來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內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近代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連台灣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主任李雲漢都不得不承認：該書「內容充實，體系完整」，「除對蔣中正尚是斧鉞交加外，其他敘述都甚平實可信」。（《北伐史的面面觀》，台灣《近代中國》第 113 期，第 114 頁）

2·《近代中國史事鈞沈——海外訪史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8 年出版。這是我的《近史探幽系列》三本著作中的第一本（《蔣氏秘檔》一書是第二本），其中有多篇文章，批判蔣介石對日妥協，揭示蔣介石在抗戰勝利後悍然發動內戰，以及國民黨失敗，中共領導的人民革命戰爭勝利的必然性，如《從大舉進攻到全面敗北》、《南京政府崩潰時期的陳光甫》等，茲不贅引。

3·《民國史》（1912—1949）報告提綱。這是我今年 3 月在中央國家機關某部門舉辦的系列講座所作的報告，發表於中共中央國家機關工作委員會主辦的「紫光閣網站」（www.zgg.org.cn/20033/jqlszs06131453_1.htm），將收入我正在寫作中的《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續集。該報告第三部分專門分析國民黨失敗的原因：（一）不得人心的內戰。（二）失去農民：國民黨的土地政策，二五減租與三七五減租的流於空談。（三）失去民族資產階級：國家壟斷資本與官僚私人資本的擴張，民族資本主義的被擠壓與被窒息。（四）經濟惡化、貪污腐敗：特權官僚階層的產生與發展。貪污盛行、通貨膨脹。掠奪性的幣制改革與經濟統制。（五）一黨專政，個人獨裁：國民黨的封建化與法西斯化。「黨治」名義下的「黨國」體制。「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與中共的矛盾及其發展：北伐時期的爭奪領導權，抗戰時期的政令、軍令統一。兩次內戰期間的以武力消滅異己。法西斯主義與特務統治：中統與軍統。集中營。圖書審查。戡亂總動員。《緊急治罪條例》與特種刑事法庭。

「左派」先生們，看了上述資料，你們還能找出什麼攻擊我的理由嗎？你們不覺得自己的公開信寫得很可笑嗎？

我還建議你們讀幾篇文章或著作：

1·周恩來《致蔣介石》（1936 年 9 月 22 日）：「當先生實行孫中山先生革命政策時，全國群眾聞風景從，先生以之創黃埔，練黨軍，統一兩廣，出師北伐，直抵武漢。」《周恩來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06 頁）

2·毛澤東《致蔣介石函》（1936 年 12 月 1 日）：「當前大計祇須先生一言而決，今日停止內戰，明日紅軍與先生之西北『剿共』大軍，皆可立即從自相殘殺之內戰戰場，開赴抗日戰場……是則先生一念之轉，一心之發，而國仇可報，國土可保，失地可復，先生亦得為光榮之抗日英雄，圖諸凌煙，馨香百世。」《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88 頁）

3·《周恩來傳》。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 年版。該書在分析 1958 年「炮擊金門」事件時，引用周恩來的講話說：「蔣介石也不贊成美國的做法，一方面是

怕影響蔣軍的士氣，另一方面也不願意完全受美國的控制。因此，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和蔣找到了共同點，可以聯合起來，一致反對美國。」（該書 1432 頁）該書還引用 1956 年周恩來對一名即將赴台訪問的英國人的談話：「首先，你可以向他們說，蔣介石是我們老朋友，他認識毛主席，也認識我。我們同他合作過兩次。」該書比較詳細地敘述了毛澤東、周恩來為爭取蔣氏父子所做的工作。毛澤東 1956 年 10 月表示：「現在台灣的連理枝是接在美國的，祇要改接到大陸來，可以派代表回來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協委員會。」對此，周恩來補充說：「蔣經國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協是理所當然的。蔣介石將來總要在中央安排。」周恩來還在另外一個場合，托人轉告台灣「副總統」陳誠：「我們和台灣也有共同點，那就是民族精神。」「為了不使美國的陰謀得逞，台灣當局首先應該團結內部，也就是蔣氏父子和陳誠的團結。」

4·鄧小平、江澤民關於解決兩岸關係、促進台灣回歸的多次講話。葉劍英、鄧穎超、廖承志等關於爭取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的講話、文告。這方面的文件很多，不能一一引證。

我很想知道，在你們讀了上述文獻之後，有何感想？

蔣介石已經去世近三十年，早已成了歷史人物。他一身經歷複雜。早年，追隨孫中山革命；中年，和共產黨有過兩次合作，兩次內戰；晚年，退據台灣，夢想反共大陸，但堅持一個中國，堅決反對台獨。因此，如何按照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根本原則研究蔣介石，真實地敘述並分析他一生中的不同階段、不同方面，研究其發展、變化以至最終為中共所領導的人民革命打倒的歷程，給予全面、準確、辯證的科學評價，是擺在中國歷史學家面前的重要工作，也是寫好中國近代史、中共黨史、中華民國史必須解決的重要課題。在這一問題上，同樣應該堅決貫徹江澤民同志關於「理論創新」、「與時俱進」的一系列指示，允許「百家爭鳴」，而不應該見到一種不合己意的觀點，就輕率上綱，棍棒交加。那樣，還有什麼學術繁榮可言！

你們自稱是「老革命戰士」。你們一定知道，上一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中國共產黨一直主張和國民黨

「平等談判」，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近年來，又將爭取台灣回歸，完成祖國統一大業作為新世紀的重大任務。我在《蔣氏秘檔》一書中曾經指出，對蔣介石的評價有兩種錯誤的觀點：一種是「千古完人派」；一種是「十惡不赦派」。看來，惡意歪曲拙著的「書評」作者屬於前者，而你們則屬於後者。請問，堅持「十惡不赦」的觀點，符合歷史真實嗎？能夠化解怨仇，捐棄前嫌，在海峽兩岸和全世界華人中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嗎？能夠最大限度地孤立妄圖分裂祖國的台獨分子，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嗎？祇有實事求是，辯證分析，當肯定者肯定，當否定者否定，才能使歷史成為科學，也才能顯示中國共產黨人的廣闊胸襟和光明磊落的態度，也才易於爭取台灣同胞和受國民黨影響的那一部分海外華人。這些年來，陳水扁之流一直在台灣大罵蔣氏父子，以之作為台灣必須獨立的「理論」之一，陳水扁的老婆在出訪美國時因為醜詆宋美齡而受到華僑社會的廣泛抵制。這些事情你們知道嗎？「左」和右相通。你們到底站在什麼地方？不應該認真想想嗎？

以上所寫，是和你們交流交流想法。你們可以不同意，也可以和我爭鳴，但是，希望你們立即停止對江澤民同志，對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攻擊，也不要再幹誣陷歪曲、匿名告狀一類事情。我將保留通過法律向你們以及你們的網站進行追訴的權利。

參加大論戰文章之七：

辛灝年（先生）

為何陷入四面楚歌？

（——粗評醒世之作《誰是新中國》）

加拿大 辛明

轉載說明：1、〔〕裏面的仿宋體字是發表時被“民主論壇”所刪去的部分；2、（）裡面的一行仿宋字為本刊編者所加。3、黑斜體字為“民主論壇”發表時所加。

〔辛灝年（高爾品）先生是一位有良心、有膽識的作家和學者。他是中國的一級作家，出版有十餘部具有廣泛影響的文學歷史著作，擁有許多社會職務和榮譽頭銜。爲了追求真理，他毅然拋棄了榮譽和地位，放棄了自己駕輕就熟的文學創作，轉而從事現代史的研究。積十數年的刻苦鑽研，終於完成了《誰是新中國》一書。此書的副標題是《中國現代史辨》。顧名思義，此書的宗旨是要對中國共產黨編造的顛倒黑白的偽歷史進行撥亂反正。辛先生的書既不乏詳盡的史實，又具有理論的闡述，有理有據地告訴我們，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是蘇聯的附庸，之後又在第三國際的指示下搞武裝割據。在抗日戰爭中，共產黨消極抗戰，積極擴充實力，從而搶奪了抗戰的勝利果實，以武力打敗了國民黨合法政府，實現了專制政權的復辟。生活在中國大陸的十三億中國人民長期受中國共產黨偽造的、爲該黨歌功頌德、文過飾非的歷史所蒙蔽，此書宛如一聲炸雷，可驚醒沈睡的國人，故筆者稱之爲“醒世之作”。

辛先生在《誰是新中國》一書的《後記》和在新唐人電視台的訪談節目中披露了該書的成書過程。辛先生在國內就基本完成了本書的初稿。爲了防範共產黨的覺察和加害，他每寫好一頁就連忙鎖進抽屜，連老婆都不讓看。每寫好一節或一章，即燒毀或撕毀，有時一連燒、撕五、六次，以至自己幾乎達到了可以全文背誦的程度。爲了把書稿帶出國外，辛先生把它寫在幾本厚書的天頭、地腳、中縫和頁邊當作眉批腳註、甚至當作禮品的包裝紙，以防被海關查獲。辛先生所承擔的風險和壓力是一般人無法忍受的。辛先生所付出的勞動和艱辛也是一般人無法支付的。

來到西方自由世界以後，辛先生住在簡陋的地下室裏伏案筆耕，終於完成了這一巨著。那麼，辛先生的目前境況如何？他總應該苦盡甘來、春風得意了吧？非也！辛先生〕

（民主論壇發表版從這裡開始——本刊編者）

辛灝年在接受新唐人電視台的訪談節目中說：他發表了《誰是新中國》之後所受到的壓力比在國內還大。

他說：共產黨恨我，國民黨嫌我，民進黨厭我，民運人士看不慣我。我簡直陷入了四面楚歌。

作爲一個獨立知識分子，筆者不屬於這四面的任何一面。筆者想拋開外部因素，僅僅從辛先生的大作本身來分析一下辛先生何以會陷入四面楚歌。筆者對辛先生是十分崇敬的、對辛先生的大作是非常喜愛的。所以請辛先生千萬不要誤會，筆者絕對沒有從第五面對辛先生唱楚歌的意思。

如果對辛先生的大作進行破題解題，那麼辛先生全書論證的就是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即是新中國。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宣佈東北易幟，「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從而使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統一了中國。1911年結束帝制後的中國終於結束了軍閥混戰。中國從此不再祇是一個地理名詞，而變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統一國家。這確實是一個偉大的進步。在當時，把這個國家叫做新中國是恰如其分的。

但是，這個「新中國」創建伊始，以蔣介石爲首的中華民國領導人就對它實行了國民黨一黨專制。蔣介石及其各級黨政軍官員在各種媒體上都毫不諱言地自稱其國家爲黨國。在此黨國中，蔣介石大搞個人崇拜、特務統治、重用私人、排除異己，幹盡了獨裁者的勾當。因此，它很快就不「新」了。今天再說它是新中國，不僅共產黨、民進黨、民運人士不能接受，連國民黨自己都無法接受。因爲現在的國民黨人已經今非昔比了。他們接受了多黨政治、民主選舉等進步觀念。現在的國民黨已經從過去的國民黨中脫胎換骨了。把當年的國民黨黨國當作新中國來推崇，這是與他們目前的政治理念不符合的，它將影響他們在下次總統大選中與民進黨抗衡。

正如辛先生在書中所述，在抗日戰爭前後，國民黨確實進行了從軍政到訓政到憲政逐步轉化的努力。但是我們沒有充分的證據表明當時的國民黨一黨專制政權會轉化爲一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因爲它還在繼續它的特務統治，還在鎮壓異議人士，暗殺聞一多、李公樸。它致力於從軍政到訓政到憲政轉化的誠意還需要考驗，而我們現在已經沒有辦法進行這種考驗了。

辛先生說，共產黨以武力推翻國民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政權是對這種努力的反動和倒退，是一種專制復辟。共產黨在大陸五十多年的統治證明了辛先生的論斷是千真萬確的。因爲，在這五十多年裏，共產黨幾乎剝奪了人民的一切民主權力，幾乎限制了人民

的最基本的自由。正如儲安平先生在 1947 年所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

因此，我們有充足的理由說，雖然都是一黨專制的黨國，但是國民黨黨國比共產黨黨國要好一些。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就把國民黨黨國表彰為「新中國」。特別是在今天，國民黨黨國在大陸和台灣都已經成為了歷史，就像共產黨黨國將來也必然會成為歷史一樣。我們應該著眼於現在，放眼於未來。如果我們一定要為中國人民找到一個新中國的話，筆者認為目前台灣的多黨制的中華民國可以算得上。因為在那裏沒有經過動亂就實現了全民的共同富裕，那裏已經實現了多黨政治和總統直選，那裏的人民已經在享受中國人民自古以來從來沒有享受過的最大的民主和自由。

辛先生的大作把蔣介石捧為民族英雄，這可能是使辛先生陷入四面楚歌另一個原因。總結辛先生在「民族英雄——蔣介石」一節中把蔣介石封為民族英雄的四大理由，可以一言以蔽之，那就是蔣介石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抗日戰爭，取得了這場偉大的衛國戰爭的勝利。但是，如果我們由此推而廣之，祇要領導衛國戰爭取得了勝利的人就可以稱為民族英雄，那麼蘇聯的大獨裁者斯大林也可以稱為民族英雄（辛先生是這麼說的），因為他領導蘇聯人民贏得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依此類推，古今中外歷史上的許多封建帝王，祇要在對外戰爭中獲得了勝利，就都可以算做民族英雄。那麼，民族英雄未免太多了，也未免太容易當了（祇要具有領導人的地位，並且在對外戰爭中獲勝）。

蔣介石是受到各個方面的很多人所共同憎惡的獨裁者（儘管辛先生叫他「新權威」）。他把總統職位傳給兒子蔣經國（儘管辛先生說，「在選擇他自身的接班人時，面對種種輿論，雖經內心衝突，終能決意「內舉不避親」，以蔣經國續其重任）體現了封建帝王家天下的思想。在他的領導下，全國人民（除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外）同仇敵愾，堅持抗戰，贏得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這裏有他個人的功勞，但

不全是他個人的功勞。我們不可以僅僅因為這一點就認為他是民族英雄。

在保衛國家的戰爭中，獨裁者和民族英雄一樣，也可能很堅決、很頑強，因為在獨裁者的心目中，國家就是他個人的私產，他當然不容許他人染指。獨裁者和民族英雄的不同之處就在於，獨裁者以保衛國家政權為目的，理直氣壯地要求人民為他作出犧牲，不考慮人民的願望和死活，而民族英雄在保衛祖國的領土不被侵犯、資源不被掠奪的同時，還要儘量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還要把人民從苦難中拯救出來。因為民族英雄不是人民的主宰，而是人民的一份子，他們把人民視為自己的骨肉同胞。筆者認為，恰巧在這一點上，蔣介石不是民族英雄。在抗日戰爭中，蔣介石視人民為草芥，使中國人民付出了許多重大的並不必要的犧牲。

首先讓我們以辛先生提到的花園口決堤為例來說明這個問題。1938 年，為了延緩日軍沿隴海路西進，蔣介石聽信兩個小參謀的餽主意，決定「以洪水掩擋敵軍」，命令商震的部隊在 6 月 9 日在鄭州北面的花園口用重炮轟開黃河大堤。滔滔不絕的洪水淹沒了河南、安徽和江蘇三省四十四縣的大片土地，使百餘萬人身葬魚腹，千餘萬人流離失所。給華北人民帶來了深重的苦難。而日軍祇損失了一些來不及轉移的輜重，祇淹死了幾千個日本兵。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軍部早就考慮過這種可能性。他們估算，如果要淹死日軍三個師，至少會淹死三百萬中國老百姓。於是，他們得出結論，任何政府對自己的老百姓都不會這麼殘忍，國民黨政府不可能使用這一下策。但是，蔣介石讓他們失算了。因為蔣介石根本就沒有把中國老百姓當人看。對於他來說，保衛他的國家是第一位的。他的子民反正是可以子子孫孫、繁衍不絕的。

辛先生說，「『棄一方之眾，以存我一國之民』。古今各國戰史皆富其例，歷史功過自明。」我們就來看看這一舉動的歷史功過吧。在花園口決堤以後，黃河改道流行，富饒的華北平原之一部從此變成十年九澇、人煙稀少的黃泛區。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的華北糧倉的面積從此大為減小。更為甚者，1943 年，改道的黃河再次泛濫成災，造成河南省的特大饑荒，餓死了將近一千萬人。這真是「歷史功過自明」啊！

花園口決堤僅是蔣介石在抗日戰爭中草菅人命的一個典型範例。別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一些，例如發生在筆者故鄉長沙的「長沙大火」。（也許這一事件的重要性不夠，好像辛先生根本沒有提及此事。）1938年10月，日軍攻佔武漢，進入湘北。蔣介石慌了手腳，命令湖南省主席張治中搞焦土抗戰，在日軍到來之前把長沙燒為灰燼。自11月12日晚間縱火，至14日熄滅，大火燒了三天三夜，把古城長沙的房屋幾乎全部燒光，兩萬多名老百姓被活活燒死。而且，問題還在於，古城長沙被燒為灰燼之後，日本鬼子並沒有來。第一次長沙會戰是在將近一年之後的1939年9月到10月才打起來的。因此，焦土的結果並沒有抗上戰，而是讓幾十萬長沙老百姓在數九隆冬裏露宿風餐。這怎能不讓老百姓義憤填膺呢？面臨無可壓制的民憤，蔣介石為了推卸責任，下令槍斃了長沙警備司令鄧悌等三人，就算把事情了結了。但是，葬身於火海的兩萬多冤魂卻並不能因此而復生！

把民族英雄的桂冠授於這樣一個隨意把人民置於水深火熱（不是形容，是實指：水深：花園口；火熱：長沙市）之中的人，恐怕共產黨、國民黨、民進黨和民運人士四面的大多數人都無法接受。作為第五面，筆者也無法接受。

歷史研究是很嚴肅的科學活動，來不得一點感情用事。我們不能因為共產黨黨國邪惡，就肆意拔高國民黨黨國，就神化國民黨黨國的領袖——獨裁者蔣介石。從事歷史研究，應該把客觀、公允、事實求是和恰如其分當作座右銘。筆者以此與辛先生共勉。

參加大論戰文章之八：

辛灝年先生

“必然”四面楚歌…

旅美中國民運人士 陸耘

辛明先生的文章「辛灝年為何陷入四面楚歌？」，被「民主論壇」發表並立即張貼於許多網站，重又引起了筆者持續多年的思考，這就是海外中

國民主人士的處境以及如何保持中國民主人士的本色。

中國民主人士，雖然各人信仰的意識形態也有不同，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特別是近現代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也有著不同的見解，但都是共產主義運動的反對派（筆者不認為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同時會是一個真正的民主主義者）。為了中國人民的自由和尊嚴，為了使國家長期健康發展，我們反對中國共產黨政府的專制獨裁統治。我們懷著對國家和社會的責任，期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推進中國社會的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許多人為此不斷奮鬥，付出了巨大的犧牲。

然而，中共專制獨裁者們，卻視中國民主人士為其最大敵人，給予殘酷打擊和迫害。流亡海外的中國民主人士，也受到中共及其黨羽的攻擊。因為中共歷來視政權為其生命，將黨的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當中共認為其獨裁統治收到威脅時，他們可以不擇手段。中共殘酷鎮壓一九八九年愛國民主運動後，在其內部文件中闡述鎮壓的合理性時，就提到，如不採取嚴厲手段鎮壓，「國家就要亡了」。我們都知道，一九八九年席卷全國的愛國民主運動，祇是要求懲治腐敗，和提出了有限度的新聞自由及民主要求，不會造成任何「國家就要亡了」的局面。但中共卻認為，當他們嚴厲「排斥任何社會力量」的獨裁控制受到挑戰時，他們「可以採取任何手段」。他們不認為，除了共產黨的利益外，還有國家利益存在，（馬克思主義者不認為存在普遍的、超階級的國家，因而，也不認為存在著普遍的、超階級的國家利益）。或者，他們不願意在共產黨的利益之外，考慮國家和民衆的利益。因此，當符合「黨的利益」時，他們可以和侵略者合作，可以任命漢奸為副總理，也可以支持分裂國家的組織和個人。於是我們就看到了，中共有時可以容忍各種反中國的，分裂國家的言行。但是，對中國民主人士的民主要求，卻一定是嚴厲地加以鎮壓。

中國民主人士來到海外，本應得到理念基本相同的中國國民黨的支持。事實上，在蔣經國總統主政時代，中國民主人士曾得到中華民國政府的無條件支持和幫助。祇是在李登輝主政以後，臺灣島內台獨勢力膨脹，李登輝政府及其後的民進黨政府，自外於大陸人民，將大陸民主人士視為搜集情報和推行台獨政策

的工具。也就是從這一時期開始，海外的中國民運不僅在組織上不斷分裂，而且在理念上發生巨大分歧。一部分人由於思想的糊塗，更多的是由於利益的關係，他們或對「獨」派採取機會主義的態度，或逐漸成爲「獨」派的馬前卒。更多的民主人士則同「獨」派劃清界限，保持中國民主人士的本色。而「獨」派對中國民運的利用，深深打擊了中國民主運動，他們從另一側面，與中共遙相呼應，破壞中國民主運動組織，打擊中國民主運動人士，敗壞中國民主人士的聲譽。需要指出的是，成爲「獨」派工具的人，他們已經拋棄了中國民主運動，他們已經不是“中國的民主人士”了。但他們打著使他們自己具有利用價值的中國民運的旗號，才得到「獨」派政府的支持，才獲取了中國民主人士所沒有的資源。因而，他們在一定的時期內會頗具聲勢。這些「獨」派人士，爲了獨佔“中國民運”的海外舞臺，處處打擊中國民主人士，直至和中共從不同的方向，圍剿著真正的中國民主人士。

這就是爲什麼堅持中國民主運動的王炳章先生，爲何在海外處處受到打擊和排斥的根本原因和必然原因。因爲他堅持中國的愛國民主運動，不願做敵視中國之政治勢力的工具，當然會受到來自中共專制獨裁統治者和各種「獨」派勢力近乎圍剿的攻擊。筆者曾在不同的場合，聽到不同的人談到王炳章先生的種種缺點和「錯事」，但那一件都沒有那些受「獨」派勢力僱傭的「民運人士」做的壞事那麼壞，但爲什麼他們倒沒有受到圍攻呢？答案是明顯的。

這也就是爲什麼辛灝年先生和他的《誰是新中國》會受到某些「民運人士」排斥和攻擊的原因。辛先生懷著對自由民主的嚮往，拋棄了中共的專制統治。辛先生懷著對歷史的虔敬，要恢復中華民國歷史的真相。辛先生懷著對故國人民的關愛，不贊成台獨，希望中國走向民主健康發展的道路。正像辛先生所說：如果你今天在海外祇想爲我們自己祖國的人民，我們自己這個可愛的祖國，我們歷史悠久的民族盡一份心，你祇想爲中國大陸十幾億沒有講話權力的人民講幾句話，那就會「四面楚歌」。在海外由某些所謂「民運人士」舉行的「研討會」上，某些打著「民運」旗號的網站雜誌上，充斥著批判所謂「中國民族主義」的言論和文章。他們歪曲歷史，爲旨在分裂中國的極

端民族主義，極端地方主義和極端宗教勢力製造輿論。在有些「民運」「研討會」上，大部分時間用來論證「分裂中國」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祇要講中國統一，就是大逆不道，就受攻擊。這些「民運人士」正在做著近百年來日本人一直在做的事情，這就是削弱和分裂進而打垮中國。祇是要說明的是，辛先生這裏所指的「民運人士」，是那些打著民運旗號的，已成爲「獨」派工具的人，而真正的中國民主人士，卻會同辛先生這樣深明大義的學者一起，共同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

還有些朋友，認爲祇能對共產黨“和平理性非暴力”，不能講人民對共產黨的反抗。對這些朋友，我們祇能說，並非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能和平地解決。人民的民主利益，有時比表面的和平更爲重要。

那麼，辛灝年先生是否由於肯定了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中華民國，肯定了蔣介石先生的歷史功績，并在同共產黨的「新中國」比較後，得出由孫中山先生開創的中華民國才是新中國，就在海外面臨著「四面楚歌」了呢？答案也是否定的。

我們知道，中共對一九四九之前的中華民國和蔣介石先生，進行了長期妖魔化的攻擊，而這些宣傳許多都是顛倒黑白的。我們不能奢望那些已經接受中共宣傳的人，很快能贊同辛先生的說法。我們相信，歷史終歸會恢復其本來面目。近二十年來，國內已有越來越多的人具有了同辛先生相同的認識。極端台獨勢力爲了「走出中國」，處處敵視和醜化中國，當然要醜化中華民國歷史和蔣介石先生，因此，他們的說法，不足爲據。倒是一些十分正派的人士，對中華民國歷史和蔣介石先生的認識，是否仍然在受著共產黨和極端台獨勢力的影響呢？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中華民國，連年戰亂，國家怎能進行正常的民主發展，作爲合法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到處組織農民和士兵暴動，那個政府能夠容忍？中日戰爭十幾年，半個中國淪陷，國家祇能全力抗戰，無暇它顧，但就是在抗戰剛剛勝利後的一九四六年，中華民國政府即根據自己在戰時的承諾，制定了民主的憲法。祇是後來由於內戰，憲法無法實行。一九四九後，退據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面對竊據大陸的中共“時刻都要解放臺灣”等到威脅和島內社會主義台獨勢力的裡應外合，自然沒有可能立即回歸憲政。

當我們討論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時，不能離開當時的歷史條件和歷史進程，以如今西方國家長期形成的，在國家安定時期實行的民主憲政制度的標準去衡量中華民國的歷史。因此，有些朋友對中華民國這段歷史的責難，是否也太嚴苛了些？聯繫到美國在二次大戰時期也有新聞管制；九一一後，在紐約街頭發表同情恐怖分子言論者，也被判坐牢。我們實在沒有理由過度責難外患內憂下的中華民國和蔣介石先生。

判斷一個國家是否專制國家，要看其立國基礎和其領導人在可能的情況下，是否願意推進和實行民主憲政。有些朋友也承認，在抗日戰爭前後，國民黨確實進行了從軍政到訓政再到憲政之逐步轉化的努力。但正是由於國家長期處於戰爭狀態中，使這種努力無法進行下去。我們並不能因此就否認國民黨執政的中華民國，會轉化為一個有健全民主自由制度的中國。應當承認，即使在美國，國家利益，民間秩序和民權自由之間，有時也存在著矛盾。九一一後，即有一種理論在美國大行其道，即：除非政府首先保證民間秩序，一個公民無法行使其自由的權利。美國司法部對「國內恐怖主義」的定義甚至包括對政治上持不同政見者的監視。布什等保守派人士顯然認為為了保衛美國國家安全的需要，可以犧牲部分民權。當然，美國有些自由派人士反對這樣做。但是，這正說明，在美國這樣既有民主傳統，又繁榮安定的國家，也有限制民權的時候。有些朋友也許像自由派人士那樣，認為這不符合自由的原則，但，這就是政治的現實。

爲了中國的健康發展，我們需要借鑑歐美的主流思想。人權自由，民主憲政，國家利益，是歐美各國的立國基礎和政府行事準則，不可偏廢。

蔣介石先生是民族英雄，這一點毫無疑義。一些朋友所說的，「民族英雄在保衛祖國的領土不被侵犯、資源不被掠奪的同時，還要儘量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還要把人民從苦難中拯救出來。因爲民族英雄不是人民的主宰，而是人民的一份子，他們把人民視爲自己的骨肉同胞。」從而賦予民族英雄以太多的民主主義的理想色彩。祇要在對外戰爭中，特別是對外反侵略戰爭中，領導國家和人民，同外敵戰鬥（即使沒有獲得勝利），就都是民族英雄。岳飛、文天祥、史可法等等，他們雖是失敗者，雖然更談不上是深富

民主主義的精神，但我們中國人，卻世世代代都稱他們爲民族英雄。

比較一九四九年前後的中國狀況，中共的「新中國」就是在馬列旗號下所實行的專制復辟。所以，它是舊中國。中華民國，從她立國的第一天起，在推翻了數千年家天下的皇權後，就把她立國的根本理論和基礎建立在天下爲公（國家權力是公有的），主權在民（全體國民）的法律意識形態之下，相對於幾千年專制的舊中國，中華民國就是新中國。也許，同西方發達國家的民主憲政制度相比，那時的中華民國，還遠不完美，還不符合一些朋友的標準。所以，我們也才希望，朋友們能同我們一起，共同推動中國的民主化，使中國能在未來比歷史上的任何時期都更加民主。

2003年9月8日

參加大論戰文章之九：

斯大林不是民族英雄

而是民族罪人

——答王希哲先生

加拿大 辛明

王希哲先生在《爲什麼中華民國是新中國——王希哲答辛明先生》一文（見《大參考》2003年8月20日）的結尾，沒有說明任何理由，就理直氣壯地告訴辛明，「至於辛明先生問：『蘇聯的大獨裁者斯大林也可以稱爲民族英雄』麼？希哲回答：當然！」雖然這不是討論問題的態度，但是辛明還是想與王希哲先生進行一番深入討論。雖然辛明「缺乏歷史知識」（王希哲先生指責辛明語），辛明還是想根據自己可憐的歷史知識，告訴王希哲先生，「斯大林不是民族英雄，而是民族罪人。」而且，辛明不願意以勢壓人，而是要說出自己的道理。

王希哲先生沒有告訴辛明和廣大讀者，他爲什麼認爲斯大林「當然」是民族英雄，想必是因爲斯大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領導蘇聯人民贏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所以，在此短文中，辛明將集中討論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究竟起了什麼作用，是加速了蘇聯贏得衛國戰爭的勝利，還是延緩了蘇聯贏得衛國戰爭的勝利？是民族英雄，還是民族罪人？

在列寧逝世之後，斯大林爲了奪取最高權力，先後殺害了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重要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把偌大一個蘇聯變成了他個人獨霸的天下。蘇聯紅軍的創始人托洛茨基流亡國外也無法逃脫他的魔掌，被他的契卡特工在墨西哥用斧子砍死。在1936年的「肅反運動」中，斯大林以莫須有的罪名處死了好幾十名元帥和高級將領，連年僅43歲、前程無量的蘇聯元帥圖哈切夫斯基（1893-1937）都不能倖免。斯大林的瘋狂清洗幾乎徹底搞垮了蘇聯紅軍。赫魯曉夫在《赫魯曉夫回憶錄》中寫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蘇軍慘敗的日子裏，伏羅希洛夫元帥曾與斯大林發生激烈爭吵。伏羅希洛夫元帥厲聲指責斯大林：「是你整垮了蘇聯紅軍。」

斯大林以大清洗大大削弱了蘇共政權和蘇聯紅軍還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他還對獨裁者希特勒情有獨衷。1939年8月23日，斯大林的蘇聯和希特勒的德國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規定雙方互不使用武力；不參加直接或間接反對他方的國家集團。當時，希特勒已經進軍魯爾地區、吞併奧地利、佔領捷克斯洛伐克、侵佔東普魯士、拿下默默爾地區。他的侵略野心已經大白於天下。斯大林和希特勒簽定這一條約無異於給希特勒解除了的東西兩線作戰的後顧之憂。因此，《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墨迹未乾，希特勒德國即在9月1日從西部大舉進攻波蘭，正式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波蘭軍隊被德軍打得潰不成軍之際，斯大林趁火打劫，由東部進軍波蘭，積極參與了與希特勒的分贓活動。在不到四個星期的時間裏（9月1日至9月27日），蘇德兩國就完成了對波蘭的瓜分。希特勒貿然入侵波蘭、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日子與《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之日僅隔8天，這絕對不是巧合。只要稍微有一點歷史知識，就無法抹殺斯大林在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上的「貢獻」。

有《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作護身符，斯大林認爲他從此可以高枕無憂，完全忽視了希特勒德國進攻蘇聯的可能性。據朱可夫元帥的回憶錄《回憶與思

考》，在1941年6月，作爲副國防人民委員，他曾多次向斯大林報告：德軍入侵在即，蘇聯必須做好防衛準備。斯大林皆一笑置之，認爲這是帝國主義在離間蘇德關係。1941年6月22日凌晨4時，準備就緒的德軍以162個師、3400輛坦克、7000門大炮、300萬人的兵力大舉進攻蘇聯領土。斯大林獲報以後仍然不相信這是真的，仍然把它當成帝國主義離間蘇德關係的陰謀詭計。因而，在德軍越境進攻幾十分鐘以後，才有蘇軍將領自發地率領部下進行有組織的抵抗。這時，希特勒的機械化部隊已經使用「閃電戰術」攻陷了許多蘇軍的縱深陣地。

斯大林對蘇軍高級將領的殺戮、與希特勒的狼狽爲奸、以及他對《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無盡幻想，導致了蘇聯在蘇德戰爭初期的慘敗。如果蘇聯沒有遼闊的國土和嚴酷的冬季；如果只有陸軍下士軍銜的希特勒在充當德軍最高統帥的過程中沒有屢犯戰略錯誤，那麼，無論斯大林槍斃多少個敗下陣來的司令和政委；無論蘇聯全國軍民如何浴血奮戰，蘇聯能否取得那場戰爭的最後勝利仍將值得懷疑。

然而，經過全國軍民的拼死抵抗，蘇聯畢竟贏得了勝利。如果因此就把斯大林捧爲民族英雄，那豈不讓人笑掉大牙！斯大林的罪惡統治使蘇聯人民在戰爭中付出了極爲沈重的代價（蘇聯在二次大戰中的死亡人數高達兩千萬，佔世界死亡人數的一半），增加了戰爭的困難程度，延緩了最後勝利的到來。我們可以設想，如果沒有斯大林的罪惡統治，蘇聯人民付出的代價將小得多，他們贏得戰爭的勝利將快得多。因此，斯大林不是民族英雄，而是民族罪人。不單是民族罪人，由於他提前了戰爭的爆發，延遲了戰爭的結束，增長了戰爭的進程，他對全世界人民也犯了罪，也是全世界的罪人。

王希哲先生說：「辛明爲『民族英雄』賦予了他很多理想主義的民主主義色彩。」辛明不敢苟同。辛明說的是：「民族英雄不是人民的主宰，而是人民的一份子，他們把人民視爲自己的骨肉同胞。」辛明連民族英雄代表人民都不曾說過，更不要說代表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了。但是王先生卻無的放矢搬出來「『民族英雄』不是三代表。」亂扣帽子、隨意上綱，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做法。這種手段應當是當代中國民主運動的開山者之一的王希哲先生所不齒的。因



此，辛明懷疑王先生沒有搞清楚「三個代表」指的是什麼。辛明之所以有這種懷疑，是因為王先生對於「四項基本原則」也不甚了了。王先生想當然地說：「……共產黨領導。這是不可挑戰的『四項基本原則』的第一原則。」但是，這是共產黨心裏想的，（趙紫陽比較直率，他說過，「其它幾項都可以少提，主要是堅持黨的領導。」）他們口裏說的要比王先生想象的狡猾。鄧小平1979年3月30日在中共中央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提出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官方版本是：「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後改為人民民主專政）；第三，必須堅持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一直就列為第三項，從來就不是「第一原則」。

王先生說：「辛明先生把中華民國＝國民黨」。但是辛明自己從來沒有這麼「把」過。辛明在文章中說「目前臺灣的多黨制的中華民國可以算得上」新中國就是明證。「把中華民國＝國民黨」的不是別人，正是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他們一口一個「黨國」，把國民黨和中華民國等同起來。在這一點上，共產黨再次表現出了它的狡詐。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徹頭徹尾、貨真價實的共產黨黨國，但是中國共產黨卻從來沒有承認過。它詭詐地狡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

王先生說：「在經過必須的一段以黨治國的訓政時期後……」辛明認為「這是缺乏歷史知識的說法」。美國的開國元勳們從建國的第一天起，就把美國建成了「多黨政治、民主選舉」的民主國家，根本就沒有「經過必須的一段以黨治國的訓政時期」。

作為這篇短文的結尾，辛明最後有一個問題向王希哲先生請教。如果薩達姆·侯賽因「領導」伊拉克人民打敗了美國領導的倒薩聯軍，保住了他的獨裁政權，王先生您是不是認為薩達姆·侯賽因也是民族英雄？如果您這麼認為，請說明理由，不要以「當然」答復之。

八九“六四”後，獨遊蘇格蘭尼斯湖

流浪者

生靈塗炭歎生靈，人民軍隊殺人民。
千山長哭三江血，高風吹皺一湖雲。

《周祥自傳》連載之三

我是民國二十八年九月到組訓組辦公，黃組長常跑各學校，或到單位走動，很少坐辦公室。組員陳若淵，也有很多外務。在辦公室整日辦公的只有我一人。江西支團那時還是籌備處，組訓法令全缺。我草擬各種組訓法令規章，到年底已成寸厚小冊了，精印裝訂成活頁本。黃組長每日下班前一定來辦公室簽字，隨手帶來牛肉乾，分配我一些。

民國二十九年元旦我被升為組員，和陳若淵一樣，另來了一位由婦幹班畢業成績優異的女同志曹金英。她是一位胖女青年，口齒伶俐。她來了以後，辦公室顯得熱鬧些。我們三人組織了一個讀書會，名叫瓊若軒。瓊是金英的原名，若是若淵，軒是我的別名瑞軒。雖未義結金蘭，實際名異義同。我們相約讀書寫心得並日記，又互勉每周寫篇短文；開始實行認真，漸漸因工作出勤出差，最後金英工作調動，讀書會逐漸散失。

記得我到職才二月，即著手籌辦招考幹部工作。我經辦一切考務，考生大致分二大來源。書記胡軌是戰幹三團政治部主任，受蔣主任之托，挑選一批幹部，蔣主任親自談話。另一面是招考，其來源是助理書記彭朝鈺引來的吉安幫，其次是組訓組長引來的臨

川幫，其三是幹事劉已達從泰和推薦來的三女二男共五人。所有參加考試的都經過我辦手續報名，筆試二場後放榜。這五人中有一名程偉，經敘談是南師二期同學，其他四名住小旅館，程則寄我宿舍。因我一人房間是間小教室改的，加張床位有餘，橫豎我是獨身。劉幹事薦的人一個也未取。總務組組員馬詠滄寫榜，我發現戴琦和她的女友羅賢貞、湯曉雲、我的同學程偉均名落孫山。我告訴黃組長謨熙，劉幹事推薦的人全墨。由於說客臨川桂昌宗在臨川見過戴琦，已向黃組長一再推保，黃頗有印象。經我面告榜上無名，黃可能是和好好先生，向書記陳宗濤請示後，即寫了一張小紙條交給我。我送給馬詠滄，加在榜的末了。她們於是變成革命女幹部了。

青幹班訓期為三個月十二月開始，次年三月結業，再實習三個月，即為團的正式幹部。在三個月訓練期中，每周小組會講課，我被指定為小組指導員之一。

支部每周舉辦周會，這是我的專責之一，多半是蔣主任親來主持，因為工作關係，主任對我印象不壞。當時在專員公署工作三個科員級的游鯤、王志剛、韋安仁和支部的我，稱為青年四傑。民國二十九年蔣主任也是行政專員，經常下鄉巡視，常帶韋安仁和我為隨從人員，韋副官業務為主，我則工作任務為重。下鄉都是赤足草鞋，一日走百華里以上，隨地在攤販或小餐館進食。今日的蔣總統、當年的蔣專員，是非常的平民化，到贛南各縣各地巡視，決不打擾地方政府。

有一次，蔣專員帶韋安仁。到信豐縣鄉下巡視，當晚宿在區公所，晚飯後，在他臨時休息處舉行了會議，大概九十點之間，他要我們早點休息，以便明早起趕路或工作。當夜月明如皎，我在草地上和保安大隊長商量，明日一早動身步行去游山，此山可通湖南、廣東、福建三省，是共黨遊擊活動之地。我為蔣專員明日登山的安全而顧慮。我和吳大隊長站在坪中央，正是皓月當空，蔣專員從宿舍走出來，詢問我們為何還不就寢。吳失言為明日警衛問題。蔣專員說不要派任何警衛。我即暗示吳不要多言，並說隨即就寢。當時我密囑吳大隊長派三排人成為三梯隊，第一梯隊以蔣專員的視線為距離，二、三梯保持適當距離。黃昏蔣專員抵油山腳，飲泉水並休息。第一梯隊

不知蔣專員在山腳休息，繼續前進，被他發現，不僅未見責斥，反將落伍兵士槍枝，親自代背。山頂上有一廟宇，正在修理，工人吃剩殘食，蔣專員饑餓，隨便就食。未幾槍聲大作，三排人應敵，此地區是共匪首領曾山的窩點，二三小時的對峙，互有傷亡。天未明，蔣專員即從後山下山返回贛州。假如那次不是我小心要吳大隊長派人，其後果真難以想像。此事只有韋安仁和我最清楚，現韋已作古。軍閥社長漆高儒，若干年前曾就油山遇險寫了一篇文章，說明蔣總統經國冒險犯難倒是真的，但是其中經過沒有核實。因那時漆在贛州，只有傷患運至贛州，遇險詳情，既未親身經歷，只是以耳代目，不僅語焉不詳，且有不實之處。

匪首曾山曾在信豐靠山區。我隨蔣專員清鄉，當發現一匪幹，圍追其後，被其逃脫。後匪偽政權成立，曾山曾一度任江西省長。倘那次被吾人捉住，曾山的個人歷史將是兩樣。從信豐回贛州，是一個月亮皎皎的夜晚。戴琦從外縣調來傷兵之友社來工作，已經有一些時日，彼此常來往，已談及婚嫁。因徐玉蘭和程京震結婚，訂在九月十五日，我們決定九月一日結婚。我們依照蔣主任的號召，戰時節約，以榮譽形式婚禮。我以最新式請帖用短文表示我們的共同志趣，為參與革命抗戰建國運動而獻身奮鬥。證婚是蔣主任挂名，正遇出巡，由主任秘書周靈筠代表並蓋蔣主任印章。我們是利用星期日，星期一照樣上班，在戰時我們沒有婚假，我們真正是為國家而犧牲。算來這時到支團服務剛剛一年。

快到新年的時候，一日蔣主任在專員公署辦公室約見我，要我去吉安當分團主任。我說我來支團工作，僅僅一年，我想在主任身邊工作再長些時候，再到外縣工作。他說，你不願意去，那我去好了。我知道他不高興，我隨即說主任言重了，我惟有遵命。他轉喜，而命我準備，民國三十年一月一日到吉安到差。支團部助理書記彭朝鈺，組長江海東，招待所負責人蔡希曾，吉安主任楊虞賢，一概免職去重慶。中央派來工作人員只有組訓組長黃謨熙留職。

我于元旦日攜了新婚妻戴琦及一男勤務兵方直東去吉安到職。前任主任楊虞賢，是我同班同學，以後他參加了康澤將軍在星子辦的特訓班。我也曾參加，因家庭反對半途而廢。這次康將軍派了五位學生：彭

朝鈺、江海東、楊虞賢、蔡希曾、程京曾到江西支團工作，不知犯了什麼錯誤，一夜之間被蔣主任全部解職。我到達吉安分團部時，楊已離部多日，各股長都是新派的，從幹訓班畢業，雖然新舊主任不銜接，工作仍在進行中。

我接事之後，將附設的中正小學加以充實，學生已達千人，規模相當大。又成立國術班，防空服務隊，有一位年已七十的國醫名鄔傳鳳，其身手矯健若四十的人，除教國術外，並領導防空服務隊。他是跌打損傷中醫師，空襲傷患全由他義診治療。另又成立新生活運動服務檢查隊，實行戰時生活節約運動，雷厲風行。吉安青年會蔡智傳以前曾與蔣專員有過接觸，他對我的工作有所肯定，我並不知道，只有各機關為戰時各種工作開會時，我覺得蔡先生對我的工作有好感。

年終時在泰和召集全省各分團主任開檢討會時，蔣主任親口講評。他說吉安有小上海之稱，吉安分團是那裏黑暗社會中的一盞明燈。我頓時覺得受寵若驚。

吉安分團部設在原吉安師範學校原址的最後棟，中間住了些民家。他們如何住進來，我也不大清楚。因為這是我未當主任以前的事。我的臥房前段房子，住了二位瘦高男子及眷屬。那位年長的常常穿著舊瑪古呢軍裝，人也很帥。他的兒子曾任過我的錄事，因他的鋼板字寫得不錯。有一晚，我臥房失竊，叫了警察來看。他說我的勤務兵方直東有很大嫌疑，將他帶去，從此未回來，可是竊案未破案，想方直東是枉死了。後來我入夜特別留意小偷，有二次我在黑暗中發覺人影，追趕時總是向後牆溝地隱逸。我再三考察推理，就是那穿瑪古呢父子嫌疑最大。我因赴重慶受訓，回部時，內人戴琦又去重慶受訓。我隨後又交卸調贛州支部任組長，所以未能貫徹追究。

可是方直東的枉死，是那時大陸特務人員的不負責任，草菅人命的行爲。我覺得，我雖未殺伯仁，而伯仁因我而死，事經四十五年，我感心內不安。

王昇專員（公署視察），史朝瀛（總務組員），倪豪（分團主任），李德廉（分團主任），王蘊（支團組員），以及我（分團主任），六人赴重慶中央團部青幹班三期受訓，爲期三月，地點爲重慶復興關後

馬家寺，四圍高地，中間低地，宿舍課室，操場都在低地，出校必須爬很多坡階，一如復興關。

全班受訓人員約一百五十人，男三分之二，女三分之一，都是全國各支團調來的，也都是帶職受訓。在這三個月中，我是盡全力吸收訓練的精華，所有的活動，儘量參加，實習分團工作職位，須參加競選。我參加的結果，得高票當選，數十位女同學全體投我的票，把四川大學畢業的在四川支團工作的彭家瑞同學刺激得有點嫉妒。演講，辯論比賽，我都僥倖獲得第一名。

結訓時，我們江西六位受訓的同學特赴南溫泉一旅舍休息，並辦了義結金蘭手續，成爲異姓兄弟。

青幹班的全名是「三民主義青年團幹部訓練班」，班主任是三民主義青年團長蔣中正兼任，副主任是中央團部組織處長康澤兼，康負實際責任。結訓時，康召見我個別談話。他說，江西支團有少數幹部不識大體，問我有何意見。我說，蔣主任和康處長都是當今的青年導師，爲幹部的不能造成你們之間的誤會；青年團要從幹部著手形成整體的力量，才能有效對內外的敵人戰鬥，獲取勝利。康同意我的意見，並徵詢我的意見，調我去昆明西南聯大分團工作，並限立即動身。我說我返江西吉安辦了交接即來重慶轉昆明到職。返回吉安後，終以小家庭拆散，兩地分離爲苦，乃放棄去昆明帶職求學機會。

未幾，妻戴琦奉中央令調訓，我於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一日奉調支部第三組組長，史朝瀛第一組長，李德廉第二組組長，王升助理書記。我們三期同學負責整個支團工作。

籌辦虎崗夏會營，調高中畢業生千名集訓，蔣主任兼營主任，蔣緯國任大隊長，王升大隊指導員，李德廉訓導組長，我是教務組長，所有中正大學，廈門大學的名教授都網羅來了。課外活動，成立了電話修理、汽車修理、電器修理、機械修理等各種小組教學，由學員自由報名參加，其他體育運動，田徑、游泳、籃球、排球、乒乓球一律齊全，各位學生吃得好，玩得夠，每個人都有一個美好的回憶。結業的一天晚上從虎崗到贛縣城，舉行了一個不夜之天的活動，所有籌備工作均由我計劃推動，在贛縣城內舉行了一個活動叫做「萬人舞蹈」，總指揮蔣緯國，通宵

達旦。從此江西流行數句諺語：商人的吉安，官僚的泰和，青年的贛州。

江西支團原是籌備處，奉中央令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幹事成立正式支團的幹事會。一日黃昏時，蔣主任臨時召集王升、李德廉、許素玉和我到主任公館座談，由蔣夫人親做俄點享客。我們請示幹事候選人如何產生，他說我們都可做候選人，當時我們都很驚愕，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是否聽得真實。我任代表大會宣傳組長，大會宣言是我寫的，記得蔣主任只改了一個字。大會向中央提出一個大案，包括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李德廉負責政治、軍事，我負責經濟、社會。

全省代表大會除了選舉幹事外，還選取了出席中央代表大會代表，當選代表為王升、許素玉、李德廉、周祥。學生代表胡美璜，他是胡家鳳之子。工人代表是大鎬礦工人王進富，只有十八歲，什麼也不懂。我們到了重慶向大會報到，江西代表孤獨地住在一棟學生宿舍。各省代表都很活躍，只有我們江西代表由蔣主任領我們跑步，到黨國元老吳稚暉住宅晉候，到蔣委員長侍從室參觀二次，所以有侍衛人員結識。以後，被委座派來贛州侍衛蔣主任時，我們已成故知了。

後來我們聽到一點內幕消息，中央組織處長康澤，和書記長張治中意見不一，又和我們的蔣主任也不投緣，所以大會一切消息，江西代表是被封殺的。因為我們的票是被棄置的，蔣主任對我們也沒有指示，所以一支毛筆圈選，我們只是隨意圈了幾人而已。三民主義青年團的誕生是在一念匆促之間，戰後合併也是在匆促一念之間。黨團之不和，間接助長了敵人的勝利。事後痛定思痛，勝利沖暈了頭腦，是其中一大原因。

由重慶返東南，回到了贛州，蔣主任命我當第三組組長，主管宣傳業務。屬下有一主任組員，組員三，助理三，服務員若干。有一服務員馬浜，後在香港成為名作家，專寫歷史小說，筆名南宮博，現已作古有年。又有一服務員是一畫家，馬歇爾來中國為戰後國共調解人，九上廬山見蔣委員長，那名服務員為馬歇爾畫了一張人像，馬歇爾甚為高興。

三十二年江西支團部遷到泰和，和省政府相配合，這時蔣幹事長經國辭職，由詹純鏗繼任。我仍任

第三組長，我建築青年活動中心、電影隊、平劇隊等。青年報仍在贛州發行，不過名義上受我督導，實際上等於獨立王國。我直接辦了江西青年月刊，計百餘頁；江西青年通信社，發行甲乙兩種稿，業務頗發達。每周還要為江西民國日報寫一篇專論。年輕的時代，不知道疲勞，也不怕忙，經常不休不眠。抗戰已進入後期，蔣委員長在重慶號召青年從軍，所謂十萬青年十萬軍，一寸山河一寸血。我籌備江西青年從軍促進會，我任總幹事。我第一個簽名從軍，妻戴琦時任女青年班主任組員，在青年館召開群眾大會時，呼籲青年從軍。她左手戴了一顆純金戒指，因顧慮我從軍危險，右手隨意將左手金戒指，取下又戴上，結果金戒指丟了也不知道。可見她因為從軍心理有些緊張，後來想起，實屬一個笑話。

幾日簽名者數千人。三十三年四月，贛東上饒蓮荷，黃維將軍辦軍訓班，劉溪清奉青年軍政治主任命辦政工幹訓班，劉是主任，詹純鏗是副主任，我任輔導員。三個月第一期畢業，在江西黎川成立青年軍二〇八師，師長黃珍吾，黃埔一期，政治部主任詹純鏗，我被發表第一科之長。江西支團幹部大都分發二〇八師政治部。詹純鏗在蓮荷協籌幹訓第二期工作，我率部分畢業學員到黎川籌備成立政治部，一切大致就緒二個月後，詹才就任主任。全師共約一萬二千人，均為大專中學生，閩贛各半。

師的直屬部隊共計三千余人，初到秩序有點紛亂。每日黃昏時，由黃師長珍吾主持會報，第一團長王大鈞，第二團長王永樹，第三團長陸澄清即直屬營長，政治部由本人代表。政治部管軍風紀，在會報前我照例到直屬各營連巡視一遍，看見任何部隊士兵違紀情形，用小本當場記錄時地人事。當主席要我發言，我不顧慮各部隊長情面。各部隊長初不以為意。每次師長要我報告，我照例將時地人事逐件報告。師長黃珍吾是黃埔一期，資格老，軍威嚴，每次會報根據我的報告作講演，各部隊長漸漸感到頭大了。各團部隊，我也抽時常去視察，三個月下來，各部隊對我的視察，特別注意。

直屬部隊每周一晨八時，在師部前大廣場集合，首由師長黃珍吾訓話，次由本人作一周時事報告。對日抗戰後期，物資缺乏，數千人大集合，講話沒有麥克風。黃師長聲音洪亮，我報告也要提高嗓門，在土

高臺上，盡力大聲叫喊，講完下來，汗將所穿上衣濕透。每周時事報告，我都作了充分準備，報告以後，從師長到士兵，反應相當良好，因此，我對國際國內時事脈絡，相當熟悉瞭解。

黎川縣費縣長，是保定軍校前輩，和江西省主席曹浩森是同學。師長黃珍吾以黃埔一期自恃，費縣長以保定出身不買帳，兩人在師部互相拍桌吵架，僵持不下，詹主任純鏗作和事佬勸散。詹主任，黃師長分別約我談話，要我即刻準備赴江西省政府晉見省府主席曹浩森，三日撤換黎川縣長。黃師長並要我接任黎川縣長。我當時向黃師長表示，我向曹主席建議換費縣長，但我不便薦自己接任。次晨師部派來美國最新軍用小吉普車，由黎川出發，下午三時許即抵達臨時省府所在地寧都，浩公親自接待我在他的辦公室談話。我很婉轉地將黃師長與費縣衝突經過，作了詳細的報告，就退出他的臨時辦公室。記得那時我穿草綠軍服，腳上穿了一雙長統馬靴，精神飽滿。浩公是保定出身，是北伐以來有名的儒將。那時他沒有兒女在身邊，見我是一位二十余歲的同鄉晚輩，加上曹周兩家世誼，視同子侄。他在門前目送我離去，走了很遠回首，他仍在門首遙望，這種長者的親情，令我畢生難忘。當日深夜返回了黎川，向詹主任黃師長復了使命。逾三日，黎川新縣長是陳鏗陽，由湖口縣調來。他是一位任了十餘年的老縣長。湖口都昌兩縣接鄰，讀書人彼此都熟。我在軍中任政治部第一科長，主管民運，和縣長接觸機會正多，一見如故。陳縣長要我把他家視如己家，公餘隨時在他家用餐，加上內人戴琦是黎川三民主義青年團分團部書記，和縣政府工作，關係密切，分團主任魏運約，又是我過去下屬好友，所以我做軍中民運工作，可稱得心應手。

二〇八師政治部工作人員，大部份是三民主義青年團江西支團部工作人員調來的，主要工作人員如科長、督導員、連指導員，都是經東南政工班受訓畢業的。工作人員工作精神旺盛，意志集中，求好心切，故青年軍十個師政工考績，二〇八師政工績效，居然名列前茅。民國三十四年初秋，日本無條件投降未幾，二〇八師奉命移福建。我奉命留守，因南昌光復，留守處移南昌。未久，曹主席發表我任南豐縣長。南豐位於寧都南城之間，是曾子固的家鄉，文物茂盛，農業富饒，尤其南豐橘，世界有名。

八年抗戰剛勝利未久到任，民生凋蔽，百事待理。抗戰剛結束，中共叛亂又起，徵兵徵糧，仍難停止。國家整編軍隊，駐南昌近郊八十八軍叛變，經臨川、黎川、南豐、廣昌而去廣東。我習軍事，這回算是用上了。足足兩夜三天在辦公桌邊，未曾上床。桌上排著軍用地圖，左手執著電話筒與省軍事指揮部通話，右手執著電話筒向保警隊指揮作戰，繳下輕機槍、駁殼槍、步槍、手槍不少。叛軍本想進南豐縣城向商家搶劫，因戒備森嚴，繞道沿山區到廣昌。所有叛軍武器，是在南豐山區所截獲，得省方予以嘉獎。

徵糧、購糧是當時要政之一。我到任後照例兼糧食處長，副處長張某是省糧食局派的，我未更換，繼續留用。張某個子魁偉，五十餘歲，貌似忠厚。我那時未及三十，一般傳言是「小孩子縣長」。接任約月餘，一日縣議會議長及議員多人在我辦公室公洽，張副處長親捧一大堆田糧移交清冊，趁多位客人在坐，匆忙中要我簽章會報。他一照面表示公文緊急，我即警覺他有居心。我接過一大堆清冊和公文向手邊桌上一放，口說緩些再說。退出未久，客人仍未走，他又來催促。我板起臉也說，要你急什麼，經喝退了，他不敢再來。當晚我仔細檢查各鄉存糧清冊。次日星期日，我帶衛士親自下鄉查倉，發現存糧顆粒無存，當即將管糧人員一概送縣拘押，共拘押一百餘人，限期數萬石糧歸倉，否則決不放人。張副處長嚇得面無人色。未幾，所有的糧一律歸了倉，重檢無誤後始放人。從此老油條的幹部不敢欺瞞小孩縣長了。

一日，縣紳劉默遠來看我。他指手劃腳，半命令口吻，要我派他的胞弟為南豐縣城琴台鎮糧庫主任。未得我同意就走了。聽說他是騎在歷屆縣長的頭上。我前任的汪縣長，對劉的話，是百依百順的。我是向來沒有這些習慣，何況青年團的幹部跟著蔣主任經國天天喊著革命。劉紳士這一招，正是革命的對象。劉默遠曾在軍閥時期任過江西省財政廳長。他的子女多受高等教育，他的女婿是英國留學生。他的家財很大，田地很多，果園甚大。聽說抗戰八年期間，他的田莊果園所用的工人，都是逃避兵役的年輕人。他不僅不給工資，連伙食都是工人自帶。照蔣專員經國在贛南治理的標準，有殺頭的資格。我當然沒有那個膽量去依法殺他。可是縣議會議長向我檢舉劉默遠有一漢奸嫌疑案擱在縣府未辦。經查果然查出，由經辦

承審員研究後，呈省保安司令部請示，複示拘提送省法辦。深夜糾集警察局長詳研以後，嚴密部署，清晨將劉氏拘捕，押在警局拘留所。午間，省地政局長劉已達到，由車站迎來縣府，經過庭院時，默遠向局長鳴冤求釋。劉局長疾走而過，未予理會。次日以車押送省府。他的背景是省府民政廳長李中袞，越三日即由李廳長保出。李是江西CC的首席人，對江西三青團的人，他也無可如何。只有放放謠言，指責罵罵而已。自從頭號土劣被驅逐以後，政府威信大增，政令風行草偃。過去大街向午常見一僕在前引路，一僕手撐高大商用大涼傘在後，中間一老人慢慢走方步，招搖過市的奇景不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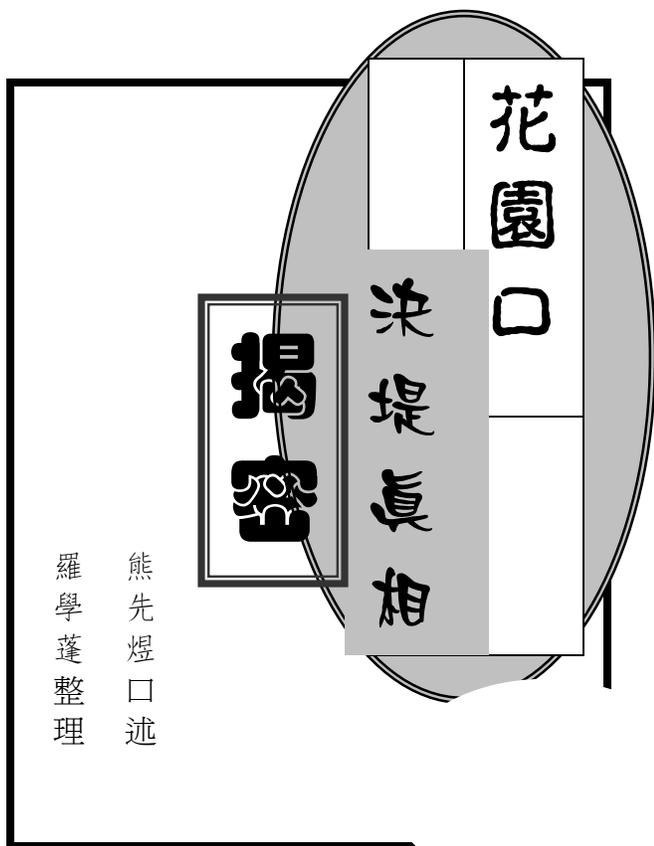
縣政工作，千頭萬緒，民、財、教、田糧、田賦、檢察、稅務、役政。中央、省委辦、地方自治，責集一身，權力有限。我乃採取最新辦事方式，每任委辦或自辦，一事一案一卷，凡一事開始，立案一卷，工作完畢，一卷即清理結束。故民國三十六年春天卸任，兩個月所有田糧稅務，一律結清會報，開民國以來，江西八十三縣縣政新紀錄。記得民國三十三年我在黎川青年軍工作時，江西支團的同事楊玉宏，在黎川與南豐之間的南城縣任縣長。當我由黎川赴南昌時經過南城，他帶一秘書在辦移交；等我由南昌去南豐赴任，再經南城時，他一人在辦移交；等我由南豐卸任，兩個月移交清楚以後，三經南城時，他還在辦移交。他做一年縣長，辦了三年的移交。我從三十四到三十六的三個年頭的移交，僅僅兩個月，即清結前後任會報了。所以行政三聯制，分層分級負責，一事一案一卷的方法辦事，確實有良好的效果。可是當我移交會報以後，四經南城時，他一人還在那裏辦移交，我計算他做縣長一年，辦移交已三年矣。

中國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決定合併，江西支團的幹事，變成江西省黨部的執行委員。江西支團部的業務，由省執委會下新設青年運動委員會接管。我任執行委員兼青運會主任委員。那時南昌大專學校學生響應上海北平鬧學潮（所謂反饑餓運動），青運工作，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南昌的學運，算是在平安中渡過。稍後因公到南京，特別到政治大學訪問，學潮的遺迹仍在：如對蔣夫人、蔣經國先生的侮辱標語文字，很多仍殘留。足見中共地下工作，做得非常兇猛毒狠，具有麻醉青年的獨到工夫。中國共產黨走

過五十年時程，昔日那種對青年的魔力，現在完全消失，共產祖國蘇聯，也給時代巨輪碾得粉碎。共產黨帶來人類極大的災害，促使全人類覺醒。中共忙著改頭換面，藉著中國文化蔽羞，尚且苟延殘喘地撐著，但是遲早要被傳統文化與時代巨輪所淘汰。

民國三十八年新年，蔣總統宣佈下野，全國人心浮動。徐埠會戰失敗以後，共軍力圖渡江。三四月，白崇禧部隊紛紛經南昌後撤。我本供職省府新聞處副處長之職，對前方戰事消息靈通。我與同事李德廉商量後，擬將江西省各大專學生組織起來，成立遊擊總隊。因我是青運會主任委員，由我兼總隊長，準備動用保安團隊的裝備。提經省執行委員會討論，方主席兼省主任委員主持會議，對動用保安團隊裝備，不敢負責。組總隊不成，省府南移離開南昌，我也包車攜眷赴福州。王升家眷一妻二子與我同車抵福州。因事先與省銀行總經理吳仕漢洽妥，妻戴琦本在省行工作，急調福州分行。分行在福州蒼前山設有招待所，同車朋友徐貴庠一家，向玉梅女士等，均隨同住招待所。陳元同學家住福州，大概陳元設法，王升眷屬、徐貴庠一家與向玉梅先後搭便船赴臺灣。我因妻戴琦在分行工作，未急赴台。至六月福州局勢緊急，地方由薩鎮冰出任維持會，街上要衝，均裝大木柵門，人心惶惶。蔣總統侍衛張毓中從臺灣來了福州，他的太太在分行和琦相識，一見如故。張毓中在鳳山輪代購到三張大人一張小孩的票，時大雨滂沱連日，幾經艱苦，才登上了鳳山輪；無臥處，又費了二十元袁大頭銀元，水手讓了臥鋪位給我。遇颱風，船顛簸得厲害。我暈船，嘔吐不停，如得大病。好不容易挨到基隆外海停船，頭暈乃止。晨，登船頂呼吸新鮮空氣，忽有一官長走過來，向我立正敬禮。原來他是憲兵團長，數年前是憲兵連長，駐贛州。一次，蔣專員將支團部人員與軍警編成臨檢小組，我是小組長之一，剛好憲兵連長是配在我的小組。多年不見，他任憲兵團長駐上海。他由上海撤退到臺灣，我正沒有臺灣入境證。他知道後，立即送來制服和名牌，我臨時做了他的上尉書記官；一會兒登了岸，退還制服和名牌。次日赴臺北，從此未再與憲兵團長會過面，至今我懷念不已。

（待續）



編者按語：抗戰前期，花園口決堤一案，在當時，即曾遭遇不抗日的共產黨和許多所謂“民主愛國人士”的極大誣蔑，其鬥爭矛頭，乃是直接指向了所謂“不抵抗”的抗日統帥蔣介石；一九四九年之後，花園口一案就更加遭遇了中共形形色色歷史教科書的誣蔑，甚至成為歷史的定論，從而將蔣介石、國民黨定在了那一根“禍國殃民”的歷史恥辱柱上。然而，自一九八五年始的中國大陸民間歷史反思潮流，卻將這一歷史的疑案重新推回人間，以作重新的清理，更以歷史的事實，來澄清一個勝利者對歷史的百般誣蔑和栽贓，來指認這一歷史劇痛的由來和結果，來證明中華民族那猶如壯士斷腕的抗日決心……朋友，請讀一讀這篇大陸親歷者的回憶和研究文章，來為歷史掬一捧酸苦但又悲壯的淚水吧

一、“決黃河之水阻隔強敵”早有議案

花園口決堤，是抗戰史上的一件大事。同時也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占有重要的一筆。而我作為當時的一名青年軍官，也參予其間：不僅改變了決堤地點（由趙口改至花園口），並前往花園口實地勘察後選定決堤河段，並且從始至終指揮了決堤的全過程。新八師炸毀黃河鐵橋後，奉命守衛西起汜水東至花園口的黃河防線。不久又改為西起鐵橋至馬渡口一線防務。師部駐京水鎮。

此時，日寇已抵黃河北岸，因鐵橋已毀，無法過河，祇能與我軍隔江對峙。日機常飛越黃河向我陣地投彈，拋撒宣傳品。新八師也數次派出便衣襲擊隊，與在淪陷區共產黨領導的黃河支隊配合，襲擾日軍。

對峙至五月，戰局對我嚴重不利。日軍統帥部策定了一個五路會攻徐州的計劃，企圖將中國軍隊主力一舉殲滅於徐州一帶。其中一路即土肥原的第 14 師團由濮陽經董口，偷渡黃河，南下截斷隴海路，意在阻止中國軍隊東進增援。

5 月 23 日，土肥原偷渡黃河成功，即以精銳的快速部隊沿隴海路兩側西進。蔣介石急令薛岳指揮四個軍追擊圍殲土肥原部。薛岳不力，未能成功。至 6 月 1 日，土肥原部攻佔睢縣迫近蘭封（今蘭考）、杞縣。而另一股敵軍則由亳縣方面經鹿邑、柘城向太康迫近，且有進犯平漢路許昌、鄭州一帶的企圖。兩路敵軍合圍，將使在開封、蘭封之間的我軍主力部隊被“包餃子”，處境岌岌可危。

6 月 2 日敵陷開封；3 日，敵步騎兵千餘附坦克 10 餘輛到達中牟與我警戒部隊接觸，鄭州也危在旦夕。在此緊急情況下，第一戰區長官部急向蔣介石建議利用黃河伏汛期間決堤，造成平漢路以東地區的泛濫，用滔滔洪水阻止敵人西進，以保證鄭州不失。此建議立即得到蔣介石的批准。6 月 4 日，敵軍攻打開封之際，我 53 軍 1 團奉令在中牟縣境趙口決堤。5 日，20 集團軍總司令商震親臨趙口督促。始掘於趙口，繼改於花園口。至 9 日，黃河水終於從決口洶湧而出。

我認為，花園口決堤的決策，不能歸咎於蔣介石。從純軍事的角度講，決堤於我有利，係不得已而為之。其依據如下：

建國後，晏勛甫在其自述文章中談到：1935 年他擔任武漢行營參謀長時，便有中日交戰時可決黃河之堤將敵隔絕於豫東，借以保全鄭州之議案；1938 年他

出任第一戰區長官部參謀長時，又和副參謀長張胥行以此計劃向程潛建議，程認為可行，遂向蔣介石請示，蔣回電予以批准。

此係花園口決堤的直接原因。除此之外，還有馮玉祥、白崇禧都曾向蔣介石建議放黃河之水制敵。

我手中蒐集有眾多國民黨要員向蔣建議“以水代兵”的函、電，為證明我的觀點，現摘要如下。

1、陳果夫於1938年4月3日建議在武陟決堤。

委員長鈞鑒：台兒莊大捷，舉國歡騰，抗戰前途或可從此轉入佳境。惟黃河南岸千里，頗不易守，大汛期間且恐敵以決堤攻我，我如能取得武陟等縣死守，則隨時皆可以水反攻制敵。蓋沁河口附近，黃河北岸地勢低下，若在下流任何地點決堤，祇須將沁河口附近北堤決開，全部河水即可北趨漳、衛（即漳河與衛河），則我之大危可解，而敵則居危地……

2、姚琮（時任軍委會辦公廳副主任）21日電，建議在劉莊、朱口決堤。

熊次長哲民勛鑒（即熊斌，時任軍令部次長）：黃河舊險地方在考城以東者如河北之劉莊、魯省之朱口，倘即刻施以決口工作，更於舊河道下游多拋埋柳枝，則河水必改道南向，一時造成泛濫區域，雖不能淹沒敵軍，至少可使其行動困難，全局情勢必將改觀……

3、陳誠轉呈王若卿建議在黑崗口決堤。

蔣委員長：據炮兵第16團王團長若卿6月10日報告稱：

1、頃聞我軍決蘭封口，引黃河水淹日寇，其計甚佳。但水經黃河故道，魯西、蘇北受害最烈，豫東僅占一部，於豫省軍事關係較小。

2、查黑崗口水位較開封高出30丈，堤身兩側皆水，歷來稱為險工。如在該處決口，其大流直趨開封，經朱仙鎮、尉氏直貫汴周公路，橫斷亳、柘、周、漯河公路，與軍事關係最鉅……

3、開封為河南政治中心，首應破壞，免致資敵。以上引用部份資料便可證明，決黃河堤從軍事上分析，於我有利，應屬國民黨上層軍政人士的集體智慧之產物。最終由蔣介石拍板，乃因他當時最高軍事統帥地位所致，可以理解。

二、為什麼決定在花園口決堤

介紹完當時的背景，再接著談我親歷親見之事。

6月6日拂曉時分，住在京水鎮師部的蔣在珍師長突然被電話鈴聲驚醒。蔣抓起話筒一聽，原來是集團軍總司令商震直接與他通話，告訴他：隴海路南之敵已突破通許一帶我軍防線，逼近開封，而趙口決堤尚未完成；命令新八師加派步兵一團，前往協助。

蔣在珍不敢懈怠，趕緊起床，叫我隨他一同驅車趕往趙口視察。

趙口一段，地勢較低，選中此處決堤至當。惟計劃此事時，對黃河水勢估計過大，對堤質估計過鬆，故而決定在大堤相隔四十公尺處挖開兩道口子，以為河水同時放出後，利用河水的鉅大壓力，能將兩處決口之間四十公尺長的河堤沖走。孰料決口掘成，中間大堤久沖不垮，兼之決口過於狹小，流量有限，士兵雖奮力加寬，然軍情緊迫，已時不可待。

我向蔣在珍談了我的看法後，蔣立即叫我隨他前往鄭州，面謁商總司令，由蔣呈報，我在一旁作詳細補充。商總司令的意思是增加官兵，加快速度。我則認為決口過於狹小，人去得再多，也無用武之地。商命令我們即返趙口，協助53軍1團改善技術，儘快放水。

我與蔣在珍又返回趙口，正與決堤部隊長官計議之中，忽接商總司令電話，轉達統帥部指示，命令新八師於本部防區內另選地段決堤。

我們馬上登車駛返京水鎮。途中，蔣在珍問我：“我師防區內的沿河地段，你都熟悉，你看究竟在哪裡決堤最好？”

我謹慎答道：“以地形而言論，馬渡口、花園口均可。不過，馬渡口與趙口相距不遠，敵人已迫近這一地區，恐堤未決成，敵人已至。為獲時間寬裕，我看最好還是選定花園口一段為宜。”

蔣在珍當即拍板：“時間緊，任務重大，事不宜遲，那就定在花園口吧。”

回到京水鎮已經是夜裡十點左右，剛剛吃過晚飯，商總司令派集團軍參謀處長魏汝霖前來督促決堤事。商議中，定下兩條原則，儘快完成任務，儘量縮小受災地區。

蔣在珍命令由我主持決堤工程。受命於危難之際，我既感興奮，又覺沉重。我當然清楚那黃河之水撲向千里平川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滔滔洪水吞沒的，

不僅僅是驕焰萬丈的日寇，被日寇奪佔的鐵路、公路；同時，也有千千萬萬中國同胞的土地、家園、祖墳，甚至還會無情地吞噬掉他們的生命啊！

但是，我同時也清楚，作為一個軍人，我無法選擇，祇有服從。

領命後，我即著手準備。夜裡 12 時，即率工兵營營長黃映清、馬應援和黃河水利委員會專司河堤修防的張國宏段長，乘坐一輛中吉普匆匆趕到花園口，勘察確定決口位置。

到達堤上，但見腳下河水潺潺，水位莫辨，一彎月牙兒在雲中浮游，時隱時現。微風拂拂，十分涼爽。我們馬上開始工作，豈料所帶四支手電筒，非僅光亮微弱，且燈泡質量尤為低劣，一經使用，先後全部燒壞。我看看錶，已是 6 月 7 日凌晨兩點鐘了。我考慮到事關重大，不敢摸黑盲目選址，乃決定上車休息，待天亮後再勘察選址。五個人擠在車上，祇能坐以當臥，人已倦極，但無人能睡，皆坐待天明。

天剛亮，我們幾人就沿著黃河逆流而上勘察。頭晚沒準備吃的，就祇好餓著肚子幹。河堤上，有一個冷清的關帝廟，廟中無人，門大開。我們全都進去了，對著紅臉長鬚的關雲長磕了三個響頭，還敬了香（用菸代）。那一刻，我們全都表現得十分虔誠，十分莊重。我跪在地上默默禱告：“關老爺，中華民族眼下遭了大難，被日本鬼子欺侮得慘。我們打不過他們，萬般無奈，祇好放黃河水淹，淹死了老百姓，你得寬恕我們。”

大約過了一個鐘頭後，我選定在關帝廟以西約 300 米處決堤。我看中這裡，是因為此處為黃河的彎曲部，河水洶洶而來，到腳下突然受阻，壓力較之直線處為大，容易沖垮河堤。而且從地圖上看，待河水從花園口一帶湧出，漫過已被日寇佔領的開封、中牟、尉氏、通許、扶溝、西華等縣境後，便可注入賈魯河，向東南而行，流入淮河。賈魯河道，可成為一道天然屏障，阻止河水無邊漫延，當可減少人民所受之損失。

當我說出我的意見後，用樹枝指著鋪在地上的地圖，詢問隨同各員有何意見，如沒有不同意見，就這麼定下了。

這時，眾人神色莊嚴，淚光朦朧皆不能言。

我問張國宏：“張段長，你是我們請的專家，你要表態，定在這裡，行，還是不行？”

張國宏答非所問，目光呆滯，連連嚷道：“要死多少人……要死多少人啊！”

我提高聲調說道：“死人是肯定的，在這裡決堤，死的人會大大減少。你必須表態，行，還是不行？”

張國宏這才意識到自己的責任，認真地看著地圖，表態同意我的選擇。

工兵營營長黃映清不待我問他，已經“咚”地一聲跪在了地上，舉眼向天，熱淚長淌。

我們全都隨他跪了下去，四個人跪成整齊的一排，面對著波濤洶湧的黃河，放聲大哭。直到工兵連和二團九連的官兵來到堤上，我們才住聲。

三、扒花園口全靠人工挖掘，未用一兩炸藥

我們馬上動手劃線，決定相隔五十公尺之距掘兩道決口，由大堤內側對准河床底部平行地掘進，決口外寬內窄，呈倒“八”字形。預計掘至河底，決口可寬至十公尺左右。放水之際，洪水從大口入小口出，增大壓力，更容易沖垮大堤。我這些後來證明行之有效的想法，均是從趙口決堤失敗的教訓中得來的。我還決定，在河堤中央，暫留三公尺寬，最後再掘，以便維持施工期間東西交通往來。

計劃完畢，工兵連和九連馬上按線開挖。不一會兒，第二團全部集中，第三團也趕到堤上，乃分由大堤南北兩面同時動工，以加快掘進速度。這一切安排完畢，我才驅車趕回京水鎮復命。蔣師長聽完匯報，見我眼中佈滿血絲，眼圈發暗，知我一夜未合眼，便叫我趕快去睡上一覺。

我見他叫上鄭自襄副官馬上要去花園口，哪能睡得著，堅持隨他上車，一同前往。

蔣在珍在堤上認真巡視後，對我選定並已在實施中的決堤方案大加讚許。旋後同返京水。

早飯後，蔣在珍決定移住花園口，親自督促施工。已由參謀長晉升為副師長的朱振民將軍（遼瀋戰役時在東北起義。解放前夕被黨派回貴州，策動地方部隊、包括熊先煜所在的 275 師等起義）見師長帶病

上堤，也前往堤上協助。我則抓緊時間記日記，然後睡了一覺。

午後二時許，我找了輛自行車騎上前往花園口。剛上河堤，幾位平時與我稱兄道弟慣了的軍官便大聲叫我。第二團團長王松梅手裡拿著張軍用地圖對我嚷道：“兄弟，你幹了樁了不得的大事！我剛才認真察看了地圖，你選這決口位置要是稍微向西偏一點點，不把賈魯河利用起來擋水，那鄭州還有平漢線上多少城鎮，恐怕全成汪洋。兄弟主持決堤，雖使千萬百姓葬身魚腹，可功在國家，功在民族，將來一定討個好夫人，多生貴子！”

我對王松梅這話永不能忘，因為，它居然應驗了。抗戰勝利後，鬼使神差，我居然和我崇拜的佟麟閣將軍的三女兒佟亦非結了婚，幸福地生活到現在。你說，這事怪不怪？

我對王松梅說道：“我在中央軍校受訓時聽德國教官教過軍事地圖學，那知識，總算沒有白學。”

下午 3 時，魏參謀處長也親臨花園口決堤現場視察，對於決口位置之選定，頗為讚許。並說趙口決堤，迄今仍無效果，上峰已將希望完全轉移到花園口。官兵聞之，群情振奮，工作更加賣力。

魏參謀處長還通報軍情。謂：隴海路以南西犯之敵，由平漢線突進甚速，情勢極端危殆。

當晚，聞鄭州爆炸聲甚烈，一刻未停，響至天明。那是已經作好撤退準備的我軍，在自動破壞鄭州車站及城內可能會被敵人利用的設施；即使日寇奪去鄭州，留給他們的，也祇是一座空城。

我們兩千餘決堤官兵耳聞隆隆不絕的爆炸聲，心急如焚，乃日以繼夜，猛掘不止。

6 月 8 日，掩護部隊的傅衡中團在花園口以東 15 華里處與日寇騎兵接火，將前來偵察襲擾之敵騎擊退。京水鎮上，出現了日寇便衣，一時人心惶惶。移住河堤上監工的蔣在珍，下令將師部由京水鎮移往東趙集。

為加快掘堤速度，張國宏段長招集附近百姓協助，並指示掘土方法。河堤上軍民混雜，人山人海。武漢統帥部每隔一小時便來電話催問決堤進度，希望能早一刻放水。可見黃河決堤，已對抗戰大局影響甚鉅。

長官部也派戰地服務隊男女同志前來慰問鼓勵。他們帶來白麵豬肉，還在河堤上唱歌跳舞演節目，為決堤官兵打氣鼓勁。

中午前，魏處長再度由鄭州趕來，代表商總司令慰勞新八師官兵，目睹決堤官兵雖連續工作一晝一夜又半日，卻毫無倦容。許多人已經雙掌鮮血淋漓，用綁腿纏手，仍揮鎬掘土，不肯休息。魏處長深為感動，當眾宣佈，如於當夜 12 點放水成功，總司令部獎法幣兩萬元；如明日晨 6 時放水，則獎一萬元。

午後，日機兩架，從北飛臨花園口上空偵察，並投彈數枚，落於決口附近西南面村莊，炸死炸傷居民十餘人，但決堤並未因此而停止片刻。

花園口河堤係小石子與粘土結成，非常堅硬，挖掘相當吃力。而且，河堤完全靠人工挖掘，未用一兩炸藥。經新八師官兵與前來協助的民工苦戰兩晝夜後，終於 6 月 9 日上午 8 時開始放水。

魏處長當即兌現法幣一萬元。

洪水湧進了決口，恰似兩條黃色的鉅龍在躍動奔突。我們目睹著洪水疾速地向著附近早已疏散一空的村莊撲去……也就在那一刻，兩千多名已經極度疲乏的軍人似乎才感受到了精神上的沉重壓力。陰雲密佈的蒼穹下，我們肅然無語。同樣的心情，我們也曾有過，那是四個月前炸毀黃河大鐵橋之際。

我在 6 月 9 日的日記中無比悲痛地寫到：“當放水瞬間，情緒緊張，悲壯淒慘。起始流速甚小，至午後一時許，水勢驟猛，似萬馬奔騰。決口亦因水勢之急而迅速潰大。遠望一片汪洋。京水鎮以西以北轉眼間皆成澤國。預料不數日將波及若干縣境，心甚痛焉。”

6 月 10 日，幸得天公相助，一早陰雲翻滾，天光暗淡，至 10 時突然暴雨傾盆，竟日不停。這場大雨實有利於決口之加大，洪水最終沖垮兩道決口間五十公尺長河道。至此，黃河改道，滿河大水由此撲向千里平川……

我作為花園口決堤的具體指揮者，在五十二年之後的今天再來回顧這一重大的歷史事件，不免感慨萬千。對於被洪水吞沒的數十萬同胞的靈魂，我的心永遠也得不到安寧。也正因為這樣的原因，我才於幾十年間對涉及花園口決堤的資料倍感興趣，悉心蒐集。

今人撰文以為，花園口決堤的目的是淹沒敵軍，“以水代兵”消滅其有生力量，這是不準確的。統帥部直接的軍事目的是放出黃河水造成地障，以阻止和遲滯敵寇的進攻，為我軍機動爭取時間。當然，洪水湧出後給敵人造成的損失，確實是重大的。

那麼，這一軍事目的是否達到呢？

黃河水給日軍造成的創傷，可以從日本官方的文件中得以佐證。

1、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編寫的《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中寫到：“6月10日前後，中國軍隊在京水鎮（鄭州以北15公里處）附近，掘開了黃河南岸的堤防。因此，黃河濁流向東南奔流，中牟首先進水，逐日擴大，從朱仙鎮、尉氏、太康，一直影響到蚌埠。第二軍6月13日為救援孤立在中牟的第十四師團一部，從第五、第十、第一一四師團兵站抽調工兵各一個中隊及架橋材料一個中隊，配屬給第十四師團。隨後於16日又從第一軍調來獨立工兵第二聯隊主力及渡河材料一個中隊。6月15日以後，由於泛濫的河水擴大到尉氏的第十六師團方面，第二軍除調回第十四師團兩個工兵中隊外，又逐次增加架橋材料兩個中隊，摺疊船40隻，獨立工兵第十一聯隊主力支援，然後向泛濫地帶以外撤退。方面軍於6月17日命令臨時航空兵團全力以赴援助第十六師團方面的補給。用運輸機、輕重轟炸機，在6月16至24日之間給兩個師團投下補給糧秣、衛生材料等，合計約161.5噸。29日，方面軍在徐州舉行聯合追悼大會。僅第二軍死於洪水人數便達到7452名之多。”

2、日本大本營陸軍部撰有日軍侵華史長編。其中第440頁記載如下：“中國軍隊6月10日左右於鄭州東北掘開黃河堤防，使黃河水向東南方向湧出，採取了水淹戰術，淹沒了自己的廣大沃野，形成了經中牟、尉氏、周口、阜陽連接淮河的大地障，給我軍行動造成極大困難。”

而據我方目擊者說：“洪水到處，日軍驚恐萬狀，東奔西突，人馬踐踏，車、馬、人員淹沒不計其數。”

毫無疑問，這是中華民族所承受的極其慘重的犧牲。也正由於這一慘重的犧牲，才改變了嚴重不利於我的戰爭態勢，粉碎了氣焰囂張的日寇奪取鄭州後（當時統帥部已決定放棄鄭州）迅速南取武漢、西襲

潼關的企圖。如果沒有黃泛區阻隔，鄭州淪陷後，敵人必然直逼武漢；而由豫至鄂，不僅有鐵路運輸，而且地勢平坦，極利敵之機械化部隊縱橫馳騁。我軍能據險堵截的，僅一武勝關而已，一遭突破，戰局不堪設想。

花園口決堤後，由於形成黃泛區這一鉅大地障，終於迫使敵人止步於平漢路以東，我唐、白河流域及漢水中游方得以免遭敵鐵蹄踐踏。唐、白河流域人口眾多，地域寬廣平坦，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有力地支援了抗戰。正由於有了黃泛區這一地障，我第一、第五戰區才分別得以在洛陽、老河口立足，與江南諸戰區遙相呼應，從而確保西北、屏障陪都。

單純從軍事角度講，花園口決堤，乃是我國處於經濟、軍事、科學、工業全面落後的情況下，面對強敵不得不採取的“斷臂圖存”之舉，事關國家危亡，華胄存續。作出局部之重大犧牲，而換取民族之慘勝，後人是應該理解的。

僅舉當時一則國際電訊，便可明瞭：

“巴黎6月17日哈瓦斯社電：急進社會黨機關報《共和國》頃評論中國黃河決口事云：前當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入侵荷蘭時，荷蘭曾以決堤為自衛計，其國人雖患水災於一時，然其領土終得以保全。厥後1812年冬季，拿破倫一世攻俄時，俄國亦以堅壁清野之法阻止法軍前進，並將莫斯科城付之一炬，卒至拿破倫一世所率大軍，為之敗潰。似此，某一民族受外人攻擊而有滅亡或淪為奴隸之虞時，輒利用洪水與冬季凜冽氣候以禦敵，其事又安足怪異？時至此際，中國業已決定放出兩條大龍，即黃河與長江，以制日軍於死命。縱使以中國人十人性命換取日人一人性命，亦未始非計。此蓋中國抗戰決心所由表現也。”

讀此豪言壯語，怎不令我這86歲的歷史親歷人，淚灑江河啊……

七古：江天問

流浪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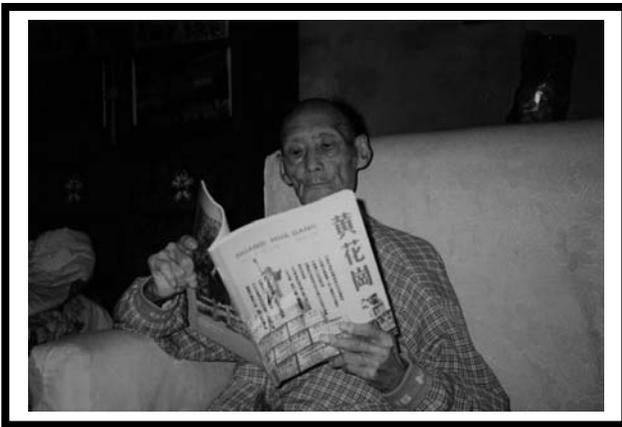
寒星暇目疑含問，江風拂水水細奔；
天鈞又橫秋江上，不知釣翁換誰人。

（此詩寫於三十多年前，忽聞林彪出逃、墜機之時）

本刊正待送往印刷廠之時，傳來老人逝世的噩耗，令人不勝哀情……石懷瑜老先生千古！

淞滬鏖兵

北京 石懷瑜



南京保衛戰作者石懷瑜先生在北京家中閱讀《黃花崗雜誌》，並稱黃花崗辦得很正派，斥蘇維埃是雜種，並說我現在什麼也不怕了……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軍繼蘆溝橋事變，蓄意擴大戰端，妄圖以武力壓迫我國接受其苛刻條件，以達到速戰速決的目的，又在上海無理尋釁，籍口日軍曹山本永夫事件，向我發動大規模的軍事侵略。我官兵守土有責，奮起抗擊，偉大的全民抗日戰爭因而全面展開。統帥部決定：中央軍校教導總隊為拱衛首都部隊。為預防敵軍空襲，除部分團隊進入指定的警衛要地外，其餘部隊分別疏散於紫金山東麓及其駐地附近隱蔽地帶，積極訓練，整裝待命。全體官兵莫不磨拳擦掌，準備與敵人決一死戰，一消百年來深仇恨海，奇恥大辱。

8月15日，天陰有陣雨，中午時分，首次發出空襲警報，駐在帳篷的官兵，立即進入防空掩體。遂即看到大編隊的敵機出現在南京上空，一時我防空部隊

的高射炮、高射機槍以猛烈的火力迎擊。敵機不敢低飛，倉惶投彈後逃逸。我總隊的高射炮擊落敵機一架，墜落在滄波門附近稻田裏，機毀人亡。此後，敵空軍不斷空襲，有一次混合大編隊在一百架以上，炸彈落在城內外各處，殺傷了很多平民。我軍事目標未受多大損毀。

為維護京滬鐵路軍運之順暢與安全，奉統帥部命令，副總隊長周振強（總隊長桂永清赴倫敦參加英王加冕典禮尚未回來）派軍事營營長吳曙青率領該營（五個連）分別部署在京滬鐵路沿線的重要車站、橋梁、涵洞，嚴密警衛，以策安全。

8月20日左右，為吸取上海作戰的經驗，作為爾後參戰借鑑，周振強率領營以上幹部分乘汽車到羅店、大場等地參觀學習，回京後向統帥部報告：前線部隊，士氣旺盛，愛國熱情很高，前僕後繼，不怕犧牲，英勇殺敵的精神十分感人。但也有不足之處，戰鬥技術和戰術運用較差，不講究構築工事，不注重對空隱蔽，只憑愛國熱忱，以劣勢武器裝備和敵人硬拼，因而傷亡很重，兵力過渡消耗。戰地救護力量不足，傷兵不能及時搶救運送。後勤供應不及時，彈藥得不到及時補充。友軍之間的通訊聯絡時常中斷，協同作戰很差，須進一步改進。上述意見，統帥部匯總後印發前線部隊參考。

9月初，參加英王加冕典禮的總隊長桂永清業已回來。統帥部命令由總隊部派一營兵力開赴前線，指導前線部隊構築野戰工事。桂永清派第一團二營營長索本勤率領該營前往上海。當日夜晚在堯化門車站上車，到達南翔後，前線一些部隊先後派來一個加強排兵力，歸索營長指揮，偵察地形，構築防禦陣地。為盡可能減少傷亡，避免一點突破，全線崩潰，防禦陣地宜採用縱深配備。要求步兵散兵坑，輕重機槍掩體，交通壕，掩避部盡可能加深加固，而且一到陣地，立即構築工事，籍以減少傷亡，增強防禦韌性。索營長於示範任務完畢後撤回南京。

蘊藻濱反擊戰

上海戰事開始時，日本侵略軍氣焰萬丈，十分猖狂，揚言三日內佔領上海，三月內滅亡中國。自以為不可一世，不可戰勝的「皇軍」，一開始即被我英勇官兵迎頭痛擊，局促於滬西狹窄地區，毫無進展。

8月17日，統帥部命令桂永清派一個加強團兵力開赴上海張華濱、蘊藻濱。桂永清決定以步兵第二團為基幹，配屬工兵、通信兵、炮兵各一連，小炮兩連，由胡啓儒率領開赴上海。此時，胡團正在烏龍山佈防，晚餐甫畢，即趕到龍潭車站。與此同時，配屬的特種部隊亦由孝陵衛營房行軍到堯化門上車，17日先後到南翔車站。下車後，被張治中的中央兵團部控作預備隊，位置於蘊藻濱後裘新街隱蔽地帶待命，當日即被兵團部將該團分割使用。通信兵連擔任兵團所屬的兩翼部隊的通信聯絡，工兵連留兵團部專業使用，炮兵連歸兵團炮兵指揮部統一使用，小炮連擔任兵團司令部及兩翼部隊的防空任務，因而有名的胡加強團不但分割了加強部隊，而且將團屬建制的炮兵連及小炮連也抽出去。胡加強團成爲一團僅用步兵火力作戰的部隊，戰鬥力大爲消滅。

18日上午，兵團部得知情報，日本紗廠方面的敵軍向別處轉移，兵力顯著減少，即命胡團於當晚接替虹口對面廣西部隊一個旅的防務。此時正在帶領通信兵架設電線的施有仁連長遇見了胡團長，就將兵團部命他接替防務的事告訴他，並請其準備按時接防。胡團長對他說：我已與某旅長取得聯繫，但某旅長所知的情報適與兵團部相反，即日本紗廠方面的敵軍並未向別處移動，兵力並未減少，反而顯著增加。情況判斷，可能很快向我發動攻擊，貴團雖然兵員充實，武器精良，訓練有素，但總不及我一旅之衆；而且剛到前線，敵情不明，地形不熟，孤團作戰，兼顧後勤，困難很多，萬一失措，影響全線，最好不急於接防，待我旅擋過敵人這次攻擊之後，再爲交接，比較妥善。原來這位旅長是黃埔三期，胡曾當過他的區隊長，過去有師生之誼，現在又並肩作戰，公情私誼，自非一般。胡請施連長將此情況報告兵團部斟酌，經張治中同意，防務交接因而延緩。

19日上午，果如所判敵情，虹口日本紗廠方面的敵軍開始向我蘊藻濱友軍陣地發動攻勢，敵機向我陣地輪番轟炸，敵軍艦大炮和地面炮兵密集射擊，接著敵步兵在敵戰車掩護下向我友軍陣地猛撲，展開激烈戰鬥。我友軍竭力抵抗，終以傷亡過重，陣地被敵突破，不支潰退。情況緊急，張治中即將胡團投入戰鬥，並嚴令全力反攻，奪回全部陣地。胡團長奉命後，在光天化日、毫無隱蔽之下，冒著一片立體火

海，下令部隊於集結地展開，一營在左，二營在右，三營爲預備隊，攻擊前進。因團的重武器已被分割使用，此時僅使用步兵輕武器，以血肉之軀，與陸海空聯合的現代化敵人戰鬥。在攻擊前進中，胡團長被敵人雨點般的兵艦大炮和飛機轟擊下一度昏倒，幾乎失去指揮全團能力。在此關鍵時刻，由於團的連排長全由軍校八、九、十期畢業生挑選來的，戰鬥技術熟練，有高度的愛國熱忱和不怕犧牲、爲國效命的勇氣。在激烈戰鬥中，各營連均能主動地互相支援，協同動作，班排戰士也能各自爲戰，反復拼搏，白刃相接，激戰到黃昏時候，才將突入之敵悉數驅回其兵艦，恢復友軍全部失去的陣地，連夜構築工事，繼續固守。

8月20日，天一明，敵寇又集中兵力，海空步炮聯合，向我陣地進犯，均被我團擊退，直到日落，陣地未稍動搖。夜晚，兵團部以我團損失慘重，派36師某旅接防，團將防務交接清楚後，撤下火線，在常熟附近整頓數天，撤退南京整補。

增援八字橋

1937年10月25日，總隊奉命增援上海八字橋防禦戰。桂永清命副總隊長周振強率參謀人員先到上海虹橋與胡宗南兵團部聯繫總隊的戰鬥任務。同時，桂以步兵一團二營爲先遣支隊，由營長索本勤率領，星夜鐵路輸送，經蘇嘉線開赴八字橋。總隊的步兵一、三兩團（第二團因在蘊藻濱損失很重，正在整補，未參加）及直屬部隊陸續出發。27日到達七寶鎮車站，下車後即到虹橋。周振強對索營長說：兵團部命令我總隊接替俞濟時、黃維師，其防務均歸桂永清指揮，你營今晚就去接防。索營長當晚會同該師聯絡參謀人員視察防地境界，因夜間視線不明，即以陣地前方較爲明顯突出的地形地物爲輔助目標，大致交待了該師防禦地區的正面，右起張濱渡左至八字橋之線。當晚52師撤離防地，索本勤營於拂曉前進入陣地。陣地上只有一段交通壕及簡易工事，敵我屍體橫豎遍地，彈藥武器，到處棄置，敵我傷亡之衆，可以想見。索營長接替防務後，除嚴密警戒監視外，規定連排不准擅自出擊，暴露目標，夜間不准隨意放槍，白天完全隱蔽，入夜構築工事。此時偵知敵軍大部已渡過蘇州河，八字橋鎮局部地區已被敵軍佔據，現正部署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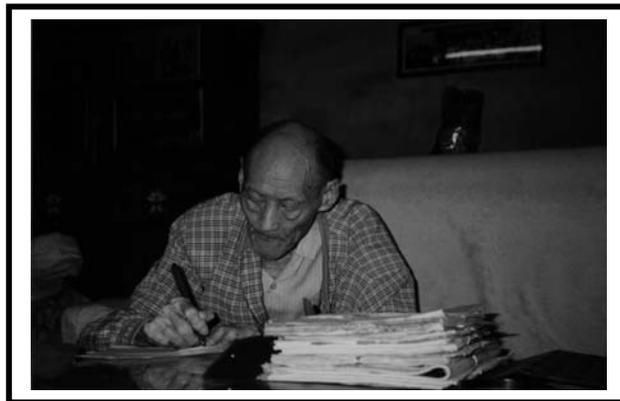
力，準備向我全面進攻，不時派出少數部隊進行搜索和試探性侵襲，均被我前哨部隊擊退。

10月28日前後，總隊的一、三兩團及直屬部隊於萃莊下車後適逢傾盆大雨，部隊即冒雨展開，沿蒲青公路東側向七寶鎮方向前進。七寶鎮已被敵機轟炸，夷為廢墟，未見有敵人蹤跡，爾後發現七寶鎮南端有敵前哨部隊，兵力不足一連，經我前衛掃蕩後向蘇州河方向退去。當我前衛驅逐敵前哨部隊時，因天氣陰暗，視線不清，我士兵初次作戰，殺敵心切，只顧英勇向前，沒有發現架在樹上的敵輕機槍，因而蒙受相當傷亡。當天晚上，周振強派兵夜間襲擊，將佔據八字橋鎮附近的少數敵軍驅逐後，就在八字橋、張濱渡、屈家橋之線佔領防禦陣地，第一團在左，第二團在右。防禦正面雖不很寬，但無有利地形及既設工事可以依託，考慮到若受敵人優勢炮火轟擊，很容易一點突破，動搖全線，決定營為戰術單位，採取重點縱深配備，趕築工事，增強防禦的韌性。

八字橋為敵軍企圖突破我陣地的主要選擇點。大概是10月29日，敵軍大部隊業已渡過蘇州河，部署兵力，向我陣地發起總攻擊。敵軍作戰慣例，首先飛機輪番轟炸，重炮猛烈射擊，摧毀我陣地防禦工事，步兵在戰車先導掩護之下向我陣地猛攻，雙方展開激戰。敵步兵蛇行蟻附，接近我陣地前沿時，均被我守軍以密集火力和手榴彈消滅在陣地前，伏屍遍地，傷亡枕藉。局部陣地上展開白刃戰，我一團二連連長劉洞平與敵肉搏中陣亡。敵軍在攻擊受挫、無法進展之時，竟不顧國際公法，施放大量毒氣，連長晏澤英以下全部犧牲，在該連督戰的少校團附劉殿卿同時陣亡。團長李昌齡一到火線，即被炮彈破片炸傷多處，擡下火線，由中校團副繼續指揮，堅守陣地。第三團團長馬威龍在該團陣地行將被敵突破之際，手下無兵增援，親率團部勤雜兵及通信兵沈著應戰，團旗被打得片片飛散，營長陳裕廉、連長張洪九陣亡，終將進攻之敵擊退後收拾餘眾，守住陣地。敵人此番進攻失敗後，未敢再作大規模進犯，僅以猛烈炮火轟擊，步兵只以輕重機槍虛張聲勢，未敢接近我陣地前沿，雙方對峙三天三夜。

11月初，敵軍在我杭州灣金山衛登陸，向我右翼作戰略大迂回。杭州灣地區守軍兵力單薄，既未拒敵

於登陸之時，也未殲敵於登陸之後，以至敵軍登陸成功後如入無人之境，繼續擴大戰果，遂致上海我軍



九十一歲高齡、並且身患癌症的前國民革命軍上校石懷瑜老先生在北京家中奮筆寫作，回憶國民革命軍的光榮抗戰往事……

大撤退。我總隊亦奉命放棄八字橋，向後撤退，八字橋戰役至此結束。

當總隊撤退到蘇州河附近時，蘇州河大橋已被破壞，橋東數裏的公路兩旁，均被撤退各部隊遺棄的車輛、馬匹、重武器所阻塞，無法通過，前有大河，後有追兵，總隊的車輛、重武器亦不得不破壞後丟棄。除先頭部隊在大橋未破壞前業已過河外，殿後部隊都自行設法過河，以致溺斃潰散者很多，景況很慘。主要過失在於，擔任破壞大橋任務的工兵，只顧上級規定的時間而未按當時實際情況將橋破壞，以至撤退部隊蒙受不應有的損失。桂永清丟棄座車，泅水過河，身邊只跟一名衛士，正在徒步向蘇州行進途中，遇見一團二營六連排長劉海平，桂令劉通知先遣支隊索本勤過河後沿途收容，順鐵路線撤到南京。索本勤撤到蘇州河時，大橋已被破壞，無法通過，即率全營沿河上行數十里，在一個大村莊停下，命令各連以班為單位，自行設法渡河，並指定過河後集合目標，天亮前全營渡河完畢，遂即乘車回南京，沿途收容了各部隊不少散兵。桂永清到蘇州後乘車回京。八字橋之役，我總隊以兩團兵力，接替黃維的61師和俞濟時的52師的防務，與進攻之敵鏖戰三天三夜，敵人傷亡慘重，未能突破我陣地，總隊傷亡約四千多，因蘇州河橋梁破壞，殿後部隊重武器全部丟棄，損失很大。

國民軍臨沂血戰日寇

好好讀了一年書 戰火興起被迫停學

本刊編審吳學燦按語：這篇回憶，真實地再現了六十幾年前的中國。當時，日軍燒殺搶掠、奸淫婦女，無惡不作。蔣介石委員長領導全國軍民，奮勇抗敵，譜寫了一曲保家衛國、感天動地的悲壯詩歌。然而，就在全國人民家破人亡、流離失所、四散逃難的時候，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叛國流氓團伙，卻歡天喜地、興高彩烈、彈冠相慶。因為，國家的困難、民族的悲慘、人民的痛苦，正是他們這些亂世奸雄大顯身手、篡權奪位、稱王稱帝、出將入相、賣國求榮之千載難逢的大好時機。

有人說毛澤東是千古一帝。不錯！毛澤東就是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人類歷史上最凶殘、最暴虐、最陰險、最毒辣、最無恥、最狡詐，最不講信義、最沒有廉恥、最沒有良心，殺人最多、禍國最烈、誅心最毒，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空前絕後的千古一皇、萬年一帝。

毛澤東死後，中國人才慢慢地恢復了嘴巴的功能，慢慢地開始有人講真話。但是，要想暢所欲言地講真話，只有在共產黨的管制範圍之外，才有可能。我在這裡說的是“可能”，而不是“一定”；那是因為有許許多多的花某某、梁某某，還有形形色色的陳文英。在美國這個自由民主的大本營，花某某、梁某某、陳某某們如魚得水，吃了東方吃西方、吃了美國吃中國。還有一些人，被我稱為“三角嘴”。他們——鉤掛三方來混帳，台灣美國共產黨。因為有花某某、梁某某、陳某某和“三角嘴”們的存在，許多逃出共產黨魔掌的人，還是心有餘悸，不敢毫無顧忌地說真話。這裡發表的血淚回憶，是不怕花、梁、陳和“三角嘴”的，是說了真話的。因此，讀者一定會覺得真實生動、親切可信。

黃陀村小學當時有一百多位學生，都是男孩，共有六七個老師。老師教學嚴謹，學生學習認真。每個學生都有一張書桌，每日都有家庭作業。我回到家後有時連飯都顧不上吃，就先爬在炕上寫字讀書，背誦課文。才好好地讀了一年多的書，對一個孩童來說可謂剛入門，拉上正套。但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軍發動了蘆溝橋事變。七月十七日中華民國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正在廬山發表宣言，決心對日抗戰到底，持續八年的抗日戰爭就此開始。

我記得正當秋收季節，天氣炎熱，二伯父等青壯男性農民帶著各自的棒子麵、窩窩頭、鹹蘿蔔、大蔥、飯袋和鐵鍬，奔赴保定以北的徐水漕河一帶挖戰壕、修工事。不幾天，他們面色蒼黃疲憊不堪地返回家園來說：「那裡的莊稼芝麻豆子都爛在地裡，無人收割，東洋鬼子的砲火可著實厲害。」日本飛機連續轟炸保定城，不斷有飛機低空飛到我村上空巡邏搜索，卻未轟炸或掃射。就在中秋節前夕，中央軍萬福林五十三軍從保定城經過我們家鄉往南撤退，有十個八個的散兵游勇流落我村，住個三五天就離開不知去向，未見有搶百姓的。有一股大部隊，就是呂正操一個團留落在我村東南任邱、河澗、安國一帶駐紮下來，組織成八路軍；之後成為聶榮臻華北野戰軍的主力部隊，流動於以冀中為主的華北各地，擴大軍事武裝力量，建立鞏固中共自己的根據地為其主要目的。當時農村的學校都停學了。

因為白晝皇協軍來，夜晚八路軍來，黃陀村國民小學的老師外鄉人都走了，只剩下本村王玉老師湊合維持著，日偽清苑縣教育局發有維持會編印的小學課本，老師不願教，學生也不念。當時的八路軍只有擴軍抗日、建立共產黨政權的順口溜和歌曲，並未編寫課本可教可讀，故此只有請私塾老先生教授孔孟的四書五經。所以我從十歲開始直到十二歲離開家，在私塾內又讀了二年多，從百家姓、三字經、弟子規念起，直到大字、中庸、上論語、下論語、孟子、告子、幼學瓊林，五言千家詩以及部份古文觀止等。讀過的書大多背誦如流。

人中雄獅大伯父 應召入伍步步升

敢死隊誓死血拼 臨沂保衛戰慘烈

我的大伯父張志純，曾在我村四五里之遙的北石橋和小張村做長工十五年，為人憨厚，勤勞本份。在地主家的牲口棚裡，借來地主家的百家姓、三字經、大學、中庸、論語，在陰天下雨不能出工或夜晚勞動之餘誦讀。大伯父從不吸菸喝酒和賭博，掙來的工錢全部拿回來撫養弟弟妹妹們。

大概是在七七事變前四五五年左右，馮玉祥將軍到保定招兵。大伯父辭去長工隻身到東關招兵站。因為大伯父身高一米八五，粗壯魁梧精神，顏面黑紅，兩隻大眼炯炯發光，顯示出憨厚樸實燕趙健兒義士的特色，站在人群中好像一頭雄獅。當時馮玉祥將軍正在招兵站，一眼看中，大步走向前把伯父拉出來，問他是否會拳術。大伯粗聲粗氣，用洪鐘般的胸喉聲回答說：「我會！請老總點撥！」馮將軍咧著大嘴笑著說：「給我練一套大宏拳！」大伯父當場拉開架子，打起手勢，腳下生風有根，拳出順流有力，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練完一套，氣不喘汗不出，旁若無事無人。馮將軍拍著伯父的肩膀說：「好小夥子，真是好樣兒的！就留在我的武術營了！」

某次，第三軍團長龐炳勳將軍觀看馮部武術營表演，當時大伯父已升任排長，被龐一眼看中，調往第三軍團司令部警衛團，任第一營第一連手槍連長。龐總司令本人是河北省新河縣人，其部師旅團長亦多為河北人，如沈克、馬法五、劉世榮、李旭東、司元凱等，其次為山東人如李振清等。基層官兵基本上都是冀、魯、豫子弟兵，少數為安徽、蘇北人，都是馮玉祥將軍親手培養出來的西北軍老根底兒。第三軍團在抗日戰爭早期徐州戰役後，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第四十軍，龐親任軍長；駐防豫北晉東南時，龐升任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下轄四十軍、新五軍（軍長孫殿英）和二十七軍。

龐部無論在哪裡駐防，和當地人民群眾的關係都非常親密友好。就在毛澤東死後，我到河南林縣參加食管癌防治工作，當地中共各級幹部和人民群眾提起抗日時期四十軍久駐林縣，都異口同聲地說四十軍和老百姓的關係非常好。官兵廉潔愛民、奉公守法，軍人欺壓老百姓的事可以說從沒有發生過。當時林縣一帶的經濟發展也欣欣向榮，公共衛生、掃盲、文化、教育、科技普及等也發展很快，迄今人民群眾仍懷念不已。

抗日戰爭初期，龐部第三軍團編入第五戰區李宗仁司令官轄區戰鬥序列，奉命死守臨沂城。龐部只有五個團，實力遠不如中央軍一個軍，竟然對抗日本皇軍中最優秀、號稱無敵的現代化板垣師團，並附有一個山炮團和一個騎兵旅的實力。日軍以餓狼扑羊之勢向龐部猛撲。龐軍團長親臨火線，統率五個裝備低劣的雜牌步兵團子弟兵據臨沂城死守。日寇窮十餘日夜的反覆衝殺，傷亡枕藉，竟不能越雷池一步。板垣征四郎統帥的兵力是一支數倍於龐部的現代化裝備勁旅，竟然敵不過支那雜牌軍。當時國際上下轟動傳揚，彩聲四起。板垣經受不住內外壓力，乃親自上陣拼命督戰。

臨沂守城戰漸感不支，雙方都打得精疲力竭，戰爭進入最慘烈的緊要關頭。有一天深夜，龐軍團長忽然傳令把大伯父叫到他的指揮所戰壕內，厲聲厲色地說：「張志純！我的特務團只剩下你這個警衛營手槍連了！這次抗日戰場面對的是日本鬼子，不是過去內戰面對的是自己同胞，作為軍人為國捐軀死在抗日戰場是無上光榮！我們第三軍團眼看都打光了，我只有死在抗日戰場一條路可走！還留下你這個血本手槍連何用！張志純，我現在命令你率領手槍連和軍部八大處官兵，包括全體炊事兵、通訊兵、勤務兵、醫務兵，組成敢死隊，總共約有一個營的兵力，我委任你為火線敢死隊中校隊長，趁此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潛出城關，深入敵陣，和日寇短兵相接，只許成功不准失敗！你不死在火線，膽敢活著回來見我，我要砍下你的腦袋示眾！」大伯父立正答話：「絕對服從總司令命令！率領敢死隊衝殺敵陣！下定必死的決心！一定完成任務！」

大伯父召集了手槍連和全體敢死隊員。那時還是早春天氣，夜晚冷氣襲人，大伯父當眾脫了個光膀子，把眼一瞪，振臂登高一呼：「有種的漢子們跟我來！」立即領兵衝入敵陣，個個拿著大片刀、手榴彈、短槍，使出全身解數在敵陣中反復衝殺。當時雙方都打得精疲力盡，在黑暗中把日寇殺了個措手不及，板垣作夢也沒想到這些天兵天將從何而降。手槍連就是司令部的警衛連，都是從全軍團選拔出來智勇雙全的英勇壯健、訓練有素、渾身是膽的彪形大漢。

十幾天來他們眼看自己的弟兄們一個接一個地爲國捐軀，人人義憤填膺，對日寇恨得咬牙切齒，個個是哀兵，都下定爲抗日而死的決心。這一營敢死隊對准日寇頭顱，猶如殺豬宰羊切瓜剝菜一般，疲憊不堪昏昏沉沉的日軍在刺刀見紅短兵相接中被砍殺得措手不及，坦克大砲機槍都用不上了。敢死隊員們的大砍刀都捲了刃，不夠鋒利的，就用手榴彈砸，人人的身上都沾滿了日本人的鮮血，和自己的汗水混在一起直往腳下流。

如此砍殺大半夜，基本上沒遇到甚麼大的抵抗。敢死隊員們往返衝殺正在興起，東方顯出魚肚白的微芒，忽然聽到一聲炮響，城門大開，一片喊殺之聲從城內衝出來，和城外敵後張自忠部五十九軍增援部隊的殺聲連在一起。敢死隊員則以一當十，充當嚮導，龐張兩軍內外夾攻。臨沂城內外龐張兩軍以疾風暴雨之勢夾攻板垣師團，日寇不支，倉惶撤退。龐張兩軍合兵一處，窮追一晝夜，日寇無法立足，一退九十餘里。

中共一九四九年奪取大陸政權建政之後，把國民革命軍一律定爲僞軍；把一切在抗日戰爭中爲國捐軀、死於抗日火線上的國民革命軍烈士家屬，一律定爲僞軍反革命家屬；把國民革命軍抗日官兵定爲反革命分子，把千百萬在抗日戰場上流血流汗死裡逃生的民族精英大部鎮壓。抗日英雄們沒有成爲日寇的俘虜，倒成了中共的俘虜，甚至死在中共的刑場上（馮雪峰所編上饒集中營影片，其中國民政府槍殺骨瘦如柴的中共黨員、血流成渠的鏡頭，顯然是取自中共鎮壓槍殺所謂反革命分子的鏡頭，張冠李戴。很明顯，當時國民政府如果真有如此槍殺中共黨員的事，也不可能拍成電影鏡頭，而且當時的攝影技術並無如此之高，當可說明）。大多數國民革命軍被俘後，都死於歷次政治運動的迫害中，或在勞改隊內被鬥死、害死或餓死。我父親於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於四川大邑縣唐場，在中共十八軍婦校衛生處被害死；我大伯父於一九五七年在陝西被中共批鬥，在絕望中跳進渭河慘遭溺死。

日寇侵華罪大惡極 農民避禍苟且求生

一九三七年中秋節前後，日寇十個八個騎兵每隔十天半月就來黃陀村一次，有幾個上了年紀的人出來，帶著一小籃雞蛋應付一下，轉個圈兒看看也就走了，並無燒殺擄掠打罵農民的事情發生。日寇對待農民的政策可能是你只要不拿起武器來抗擊他們，安分守己種田，作所謂的良民，種莊稼、串親戚、婚姻嫁娶、廟會唱戲、雜耍等一類的日常人間活動，日寇是不過問的。但對那些曾槍殺過日本兵的村莊，日寇往往要進行全村搜索，甚至燒殺，以示報復和威脅。日寇對農村聚賭賭博的無賴流氓、不務正業爲害地方的惡棍二流竊賊，一旦查獲證實，大多予以逮捕，送往門頭溝或唐山去作苦役。

雖然在我們家鄉沒有發生燒殺擄掠之事，但這並不是說日寇侵略中國無罪，這種侵略本身就罪大惡極。幾個日本兵進入村中，農民們恨不得一鬩而起，亂棍把他們立刻當場打死。農民離開土地將無以爲生，老老少少三四代人都住在村內，殺害幾個日本兵以泄一時憤恨，求一時之痛快，事後農民一家老少逃往哪裡？何以爲生？空口說白話容易，站著說話也不腰痛，但脫離實際的官腔高調只能禍害百姓，何益之有？這大概就是世居村莊的中國農民，幾千年沿襲下來的惰性，無可奈何沒有選擇的習性，只能隨著朝代轉換做順民。可悲可嘆的中國人啊！甚麼時候才能逃出這種被逼無奈的隨大流瞎起鬨，避禍求生，卻像畜牲一樣被驅趕的悲慘命運呢！

中共抗日是假 發展壯大是實

農民自衛團最後還是參加了呂正操的部隊，往返於冀中一帶。某次在任邱縣和日軍遭遇，劉振邦在連長任內右臂負重傷殘廢，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轉業還鄉，後任黃陀村聯保主任。一九五〇年中共以反革命罪，將劉振邦槍斃於村東北口大河坑內。據劉振邦生前對鄉親們多次陳說，共產黨從來沒有正面打過日本。八路軍主要是消滅和日寇打得疲憊不堪的抗日軍人。活動於冀中一帶抗日的河北民軍，就是如此被共產黨和日本人兩路夾攻消滅、擠出河北省的。

劉振邦還說他最痛恨共產黨的就是共產黨殺人如麻，常常把俘虜的中國抗日軍人、投降的皇協軍，甚至地方上的私塾先生、老中醫，扣上個漢奸的帽子，

集合成一堆，無論寒冬或盛夏，都叫他們剝光衣服光著身子自己挖坑，然後用槍逼著他們一個個地跳進坑去，填土活埋，哀告呼救聲亂成一片，真是慘絕人寰。日本人被俘虜後，往往好吃好喝好待承，先後都送往司令部轉移到延安。劉振邦嚴肅地說，共產黨內的鬥爭亦相當狠毒，互相殘殺的事不斷發生。不過共產黨內部一時據有權位的人，對自己的黨員總是優待些，不是活埋而是砍頭，還要留下點皮肉以落個全屍；只有連長以上的幹部才值得個槍彈，處以槍決，一般都是打心臟。

劉振邦經常在群眾中公開發說，他算把共產黨看透了，即或共產黨在中國勝利了，也只是暫時性的，這個沒人性的主義早晚必然滅亡，只是老天爺讓中國人嘗嘗共產主義到底是啥滋味，是個甚麼東西！劉振邦在臨刑前挺胸昂首對群眾說：「我劉振邦人屈命不屈，對得起黃陀村鄉親們！中國的正義人士，共產黨是殺不完的，我在九泉之下也要瞪著兩隻大眼，看著你們這一撮坑人害人的共產黨豺狼能夠橫行到幾時！」清苑縣公安局刑警隊奉命槍決劉振邦時，用的是達姆彈，據觀望的群眾說，劉振邦的頭顱被炸開，腦漿噴射出丈餘高的紅光，直奔西方。（待續）

民間故事

申雪

中南海的鐵蒺藜

中南海與北海之間隔著一座橋。這座橋叫金螯玉蟲東橋。以往站在橋上，橋北是北海的龍船，巍峨的白塔；橋南是中南海的碧波，綠樹掩映紅牆。齊胸高的漢白玉橋欄，精美流暢，白、滑、冷。

1974年的深秋，在人們的不知不覺中，也許只是一夜之間，彫琢精美的漢白玉橋欄不見了，代之以毛刺朝天、密密排列、一人多高的綠色鐵蒺藜。行來過

往的北京人驚訝、嘆息，人們只能從鐵蒺藜的格子裡眺望中南海了。

中南海的鐵蒺藜是歷史的標誌物。在它豎起的那一刻，中南海的統治者已經開始懼怕人民了。他們已經自覺不自覺地與人民為敵了。他們在給人民以恐懼的同時，也驚恐地防範著。

現在，在金螯玉蟲東橋中南海一側的鐵蒺藜下，不僅有荷槍的軍人，還有穿著蹩腳西裝的便衣。

天打五雷轟

1995年夏季，三伏天的北京下了一場雷暴雨。電閃雷鳴，劈雷蓋頂，煞是熱鬧。位於東城區圓恩寺衚衕的茅盾故居，其院落中一棵二人合抱的老樹被驚雷攔腰劈斷。樹幹和枝杈繁茂的樹冠壓倒在茅盾故居毗臨衚衕一側的屋頂上。屋瓦已坍，屋梁似倒未倒；大樹懸空，威脅半邊衚衕。

有人在此疏導衚衕裡的過往行人，不讓行人停留，以免大樹壓房突然倒塌發生危險。附近恰有一所小學，孩子們個個好奇；路過這裡時總要問家長：大樹為甚麼倒了？家長們的回答各有不同，但最經典的是，一位家長告訴孩子說：「茅盾當文化部長的時候，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害了不少人，所以死後天打五雷轟。連家中百年老樹都被轟倒了。」孩子聽完，滿臉訝異。

難忘的婚禮

十月的北京，金風送爽。每年十月都是人們辦喜事的大好時節。尤其十月十日更取十全十美之意。

1989年十月十日我去參加朋友的婚禮。他家住在東城區的一條衚衕。我們準備好了鞭炮，只等迎親車隊一到就放鞭炮，迎新娘，慶喜慶。

十點鐘車隊來了，鞭炮齊鳴，銀花四射。漂亮的新娘子下了車，大家的情緒達到高潮。突然，從衚衕中段的一個大宅門裡衝出了一群手握衝鋒槍的大兵，大聲叫喊著要我們不許動。這陣式，把大家都嚇壞了。

原來，這座大宅院裡住著國家主席楊尚昆，就是李鵬宣佈戒嚴令時主持會議的那個老小子。六·四大

屠殺後，他的警衛加強了，並高度戒備。我們放鞭炮，驚訝了大兵。

派出所居委會也來人了。對我們又唬又嚇又壓，說是不准在衚衕放鞭炮。大家真掃興，好端端的婚禮就這樣給沖了。

不過，我們也知道了，那些六·四大屠殺的決策者，日日心驚膽戰，連婚禮的鞭炮也把他們嚇得靈魂出殼。

陳希同撒尿

1993 年的盛暑，廠裡傳達市委書記陳希同要來慰問大家。慰問甚麼？說是慰問全廠工人戰高溫、抗暑熱、奪高產。

為迎接陳希同的到來，全廠停產三天大搞衛生。天上地下折騰個底掉，工人們都汗流頰背。

陳希同來了。小車直接開到設備最好的柔性車間。陳希同在前呼後擁下進了車間，手臂一揮，「同志們辛苦了」，然後和身邊的人嘀咕了一句，一轉身，沒影了。他到專給老外建的衛生間方便了一下，出來坐上小車就走了。前後沒有三分鐘。

陳希同走後，工人們傳開了「陳希同來了，撒了泡尿就走了」。為了這三分鐘，六千人的大廠停產三天，勞民傷財。說的是陳希同，不只是陳希同，在腐敗的官僚體制下，類似的事可多了去了。

李鵬關謠

九十年代中期，總理李鵬很長時間沒露面。海外媒體一度傳出李鵬身體不好。為糾正傳聞，新華社還配發了一張李鵬在北戴河游泳的照片。

終於，李鵬在一座工程的剪綵典禮上露面了。工程總指揮握著李鵬的手冒出一句「祝您早日康復」。李鵬一甩手，板起面孔，三角眼一瞪，正顏厲色地說：「我身體一直很好」。當著記者的面，弄得總指揮灰頭土臉。

總指揮錯就錯在他在百忙之中把小道消息大道消息都弄混了，一不留神說出了心裡話。

辛灝年為謝辭德國、澳洲和台灣講演邀請 致 歉

最近，歷史學者辛灝年雖榮幸接到各地的講演邀請，但因雜誌煩身，國際旅行不便，不能成行。為此，特對德國學聯負責人、澳大利亞中國工黨主席、台灣全球華僑愛國總會秘書長吳振波先生和連宋後援會全球代表大會公開表示歉意。

辛灝年

將應邀赴舊金山等地評講《走向共和》

由於紐約首場《走向共和》賞評會大獲成功，影響遠播，激發了華僑的愛國激情、特別是支持共和革命的思想，舊金山數華僑團體將安排三場賞評會，並熱情邀請辛灝年赴舊金山評講。

李鵬確實一度有恙，近七十的人本屬正常。但他大事撒謊小事也撒謊，國家的事撒謊個人的事還撒謊，撒謊成性。

朱鎔基翻臉

朱鎔基剛當上總理的時候，到北京的一家大型國有企業視察。當時大批工人下崗才剛剛開始。北京國企的廠長們對待工人下崗後的待遇很是慎重。廠長們深知下崗工人承擔了改革的代價，國家虧欠他們的。

朱鎔基聽取廠領導匯報。在談到下崗工人待遇時，這位廠長很是得意，因為廠裡做得比較妥貼，本以為會得到總理的首肯。哪想朱鎔基突然打斷廠長的話，八字眉倒豎，翻臉了；質問廠長：「這麼多人，你養得起嗎？」

總理震怒，嚇壞廠長。總理一走，立即召開幹部會傳達總理指示：「這麼多人，你養得起嗎？」並把下崗工人待遇大幅下調。還把總理指示傳達給所有下崗工人。

打那以後，國企領導就把朱鎔基的話當做尚方寶劍，開始了對下崗工人的瘋狂打劫。

蘇維埃即代表會議，是蘇俄在一九零五年革命時期設立的一種政治制度。一九二七年廣州起義時中共就建立了短短數天的蘇維埃政權，一九二八年毛澤東在井岡山地區建立了正式蘇維埃地方政府。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蘇俄國慶日）共產黨人在江西、福建交界處的瑞金縣葉坪村召開中國蘇維埃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到會的有中央區、閩西區、湘贛區、湘鄂贛區、贛東北區、湘鄂西區、瓊崖區及上海、武漢的工人代表共一百九十人，鄂豫皖蘇區因戰時交通不便未參加這次會議。這次大會宣佈成立了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下設勞動、土地、財政、軍事、外交、內務、教育、工農檢查部等部。中共正式宣佈中國已經分裂為蘇維埃的中國和國民黨的中國，公開主張武裝推翻國民政府，並在蘇區並進了長達五年的專制統治，給中國特別是所謂蘇區帶來了深重災難。幾十年來由於中共的片面宣傳，人們對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真相知之甚少。今天我們從不同角度反思歷史，戳穿數十年的欺騙性宣教，還歷史以本來面目是十分必要的。

一、偽「憲法大綱」

中國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偽「憲法大綱」開宗明義地宣揚自己的政治主張是「有系統地限制資本主義的發展……以轉變到無產階級專政」。規定「中國蘇維埃政權所建立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蘇維埃全部政權是屬於工人、農民、紅軍戰士及一切勞苦民眾」，「軍閥、官僚、地主、豪紳、僧侶……是沒有選派代表參加政權和政治上自由的權利的」。在這

個政權的武裝力量上規定「惟手執武器參加階級鬥爭的權利，只能屬於工農勞苦大眾」。在「公民」選舉權上規定「中國蘇維埃政權在選舉時給予無產階級以特別的權利，增多無產階級代表比例名額。一切剝削者的政治自由，在蘇維埃政權下都絕對禁止」。它的民族政策是

「中國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由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國家的權利。蒙古、回、藏、苗、黎、高麗人等，凡是居住中國區域內的，他們有完全自決權，加入或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在宗教政策方面規定「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蘇維埃國家的任何保護和供給費用。一切蘇維埃公民有反宗教宣傳之自由」。在「外交」政策上則宣稱「中國蘇維埃政權宣告……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蘇聯是客觀存在的鞏固聯盟」。

這個偽「憲法大綱」是在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天壇憲法》基礎上的嚴重倒退。由孫中山先生親自主持制定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貫穿著民主精神，規定「中華民國為永遠之民主國」，設立有上下兩院的國會並充分保障人權。一九一三年由袁世凱頒佈的《天壇憲法》也規定「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並保障國民的言論、出版、結社、請願、營業和遷徙自由。即使是被人指為一黨獨裁、於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制定「訓政時期約法」也明確了委託國民黨代管政權是臨時的，最終目的是回歸憲政，而實際上國民政府也於一九三六年公佈了「五五憲草」，規劃回歸憲政，還政於民。可見不管是孫中山時代、還是袁世凱、蔣介石時代，追求民



大陸 樊一弓

主始終是時代主流。即使某些政治家們打著民主的旗幟，心懷不可告人的目的，但他們也不敢公然主張實行階級專政。即使前進的道路曲折迂回，中國社會一直在民主政治的路程上艱難跋涉，沒有一個政治集團公然宣稱進行專政統治。

偽「憲法大綱」在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以最高「法律」形式規定一個可以階級凌駕於其它階級之上，規定只有他才能手執利刃實行階級專政並剝奪其它社會階層的一切政治權利；在「選舉」權上第一次給一個階級以特別的權利，肆意破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會公理；它剝奪所有人的自由經營權利，排斥、拒絕一切宗教，公然踐踏公認的基本人權；它的所謂民族政策無疑為國家分裂打開了綠燈；它的「外交」政策顯然是一紙投靠赤俄的賣身契，是自甘做赤俄兒皇帝的政治宣言。這個偽「憲法大綱」與《臨時約法》、《天壇憲法》比較，不管是政治、經濟還是文化和保障公民權利上都出現嚴重倒退，而且公然主張建立一個恐怖的獨裁專制政權，從世界政治史和中國政治史上衡量，都稱得上是一部臭名昭著的惡法。

二、赤俄領導的中共「革命」及賣國行徑

中共是在赤俄領導的共產國際幫助下成立的，一九二零年俄共遠東局派維經斯基來華，會見李大釗、陳獨秀，籌備建立中國共產黨。中共「一大」綱領提出了「聯合共產國際」，「二大」提出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完全交出了革命領導權。共產國際不僅直接向中共下達行動指令，而且干預、參與了中共黨內的反陳獨秀、李立山、羅章龍的路線鬥爭。共產國際為中共培訓幹部、提供經費，派出以德國人李德為首的軍事顧問指揮作戰。在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塞的過問下，王明被安排進中央委員會，後又擠進了中央政治局。中共在以赤俄為首的共產國際領導下，以推翻國民政府為目標，成為中國政局的動亂源。實際上，中共不但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也成了赤俄的「兒皇帝」，它唯蘇俄馬首是瞻，幾乎一切政令都以共產國際的指示為準。

一九七九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僅供黨內傳閱的《王明言論輯》記載：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中國問題委員會上，斯大林就對中國同志說：「沒有無產階級的領導，便不會有革命的勝利」。

一九二七年共產國際在《中國革命問題的宣傳大綱》中要中共注意革命過程中的困難，逃陣和變節。一九二八年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九次擴大會議通過所謂《對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指出「黨應準備應付新的廣大的革命浪濤的高漲；黨對這新高漲的革命浪濤必須的任務，便是組織，實現群眾的武裝暴動，因革命的任務，只有用武裝暴動和推翻現存政權的方法才能解決」，慫恿中共舉行武裝暴動，並指責中共「一部份在農民區作指導工作的同志，迷戀著零碎的必遭失敗的游擊戰爭，而不注意把運動準備擴大到廣大的範圍」。指示中國共產黨「必須堅決的反對一切在城市和鄉村中沒有準備的暴動」，「黨應明瞭自身主要的任務，在準備城市與鄉村或鄰近各省共同聯絡出動，並在一廣大範圍中組織與準備這各動作（暴動）。因此，便須與過去重視散漫不相聯絡的必致失敗之游擊鬥爭的傾向奮鬥（這種危險已見於湖北、湖南及其他等地）」。由此可見，當時人們對中共引狼入室，賣國求榮的指責並不是沒有根據。

在武裝暴動上，共產國際指示中共「在現在當革命失敗的時候，我們必要在農村中重新建立自己的組織，重新創造自己之政治影響的基礎，在動員農村廣大的群眾，特別是貧民……採取堅決的勇敢的鬥爭」（一九二九年《紅旗》第六十期）。指示中共組織雇農工會和貧農團。在蘇維埃區域實行軍事紀律。要爭取一省，幾省的首先勝利，然後爭取全國的勝利。

在蘇維埃政權建設上，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政治決議》指出：必須在最有保障的區域裏建立起蘇維埃中央政府和真正能夠為這一政府的支柱，建立起工鞏固的蘇維埃革命根據地。國際指示中共「黨團必須是蘇維埃的提案與決議的創首者及召集報告會與其他各種會議的發起人。」

關於土地問題共產國際幾次指示「蘇維埃區域之中，黨的注意的中心，應當是土地問題的解決……同時，黨要宣傳國有土地的中心口號」。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給中共發出《關於農民問題的信》指導對於富農的工作。

在經濟方面，國際指出在蘇維埃區域要有一定的經濟政策。「實行向富農及一切剝削者徵發，限制或調節一部份為境內廣大人民自己所要求或軍事上的必要的物品（如糶料、鹽、煤油等）底價格。「有些地方限制一切商業自由，限制一切物價，甚至實行強迫挨戶徵發」

關於國統區的鬥爭，國際決議：「黨應當聯繫政治的經濟的鬥爭，儘量去發展政治罷工，定出準備各地的或者幾個主要工業城市的同盟罷工方針。組織政治罷工的時候，除反對軍閥和國民黨的口號之我，必須提出接近一般工人群眾生活的……經濟要求，……同時，應當儘量去鞏固赤色工會，堅強工人自衛的團體」。國際指出在國民黨統治區裏農民運動的策略是：應當是發動和領導抗捐、抗稅、抗債……等各式的鬥爭引導農民群眾走向游擊戰爭和地方起義。

關於民族問題，以蘇俄爲首的國際再三指出：「中國境內有千百萬回民，還有千百萬的藏、蒙、苗、瑤、滿以及安南、朝鮮等等少數民族，對這些民族的工作與反帝運動及土地革命有極大意義和作用」。企圖挑起民族矛盾，從中漁利。

在黨的建設上，國際指出：首先就要使黨數量發展，黨報和數量與質量加多和提高。

由些可見，中共作爲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完全沒有所謂革命的自主權，它的一切行動都服從共產國際的指示、命令和精神，中共在實質已成爲赤俄顛覆中國政府的工具。對此，中共並不諱言。它公開地說「由國際負責幫助成立臨時的中央領導機關。實行在國際直接領導之下，號召各級黨部完全遵照國際決議及指示執行實際工作。中國共產黨的一切黨員……像一個人一樣，一致起來實行共產國際的路線（《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人民出版社）。「我們黨在中央領導之下，不怕這一切困難和複雜性，堅定不移地執行自己的總政治路線——列寧主義的共產國際的路線」。中共四中全會更是提出：「對共產國際路線百分之百的忠實這個口號，是使黨更加布爾塞維克化和蘇維埃革命更加勝利的唯一道路和保證」（《共產國際》中文第一期第五卷）。中共領導人在分析中國革命的優越條件時興致勃勃地說：「中國共產黨有以斯大林爲領導的列寧主義共產國際的直接領導」（王明《中國革命危機的加深和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就連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後來的清剿中土崩瓦解，不得不倉皇逃竄前，也需向共產國際請示，共產國際復電同意後才狼狽出逃。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日，東北中東路理事長兼全路鐵路總辦呂榮寰根據國民政府的指令，以武力接收中俄共管的東中鐵路。八月，中蘇邊境戰爭爆發。蔣介石政府以「一致對外」號召全國人民與蘇聯抗爭。而此時共產

國際第六次世界大會通過的《反帝國主義大戰的鬥爭與共產黨員的任務》向中共指出：「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無產階級，在這一戰爭中，不但要努力使本國的政府一敗塗地，而且要積極的努力保障蘇聯的勝利」。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的批示精神，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進攻蘇聯」與「擁護蘇聯」、「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而且隨著事迹發展的過程而轉變成實際行動」（一九二九年《布爾塞維克》第十期），在這場中蘇邊境戰爭中，中共公然叫囂要用「實際行動」站在蘇俄一邊，攻打中國，同時污蔑中蘇邊境戰爭中維護了國家利益的國民黨是無恥的合盤的出賣民族利益。中共的倒行逆施受到全國的一致反對，馮玉祥、閻錫山、吳佩孚、張作霖等軍閥，都發出聲討赤俄肅清共產黨的宣言通電，主張一致對外。就連一些正直的共產黨人也對這種赤裸裸的賣國行徑表示不滿，七月二十八日，陳獨秀寫信給中央，批評中央在中東路問題上的政策。他認爲這次邊境戰爭是國與國間的糾紛，國際間的糾紛。而中共執意認爲這是資本主義國家（中國）與社會主義國家（蘇聯）間的戰爭，是帝國主義武裝干涉蘇聯的一部份，因而中共必須站在蘇聯一邊，不惜用「實際行動」來對抗自己的祖國。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中華民族處於生死存亡之際，團結一致，抵抗外侮是社會各界的共同心聲。當此關頭，中共仍然把反國民黨和反日本帝國主義並列，甚至認爲前者更重要，他們污蔑「國民黨政府事前參預了日本武裝佔領滿洲的計劃」。甚至說「推翻國民黨政府，是勝利地進行民族革命戰爭的先決條件」（一九二九年《布爾塞維克》第十期）。中共的擾亂是「九一八」事變後，國民政府不能痛下決心反擊日本的重要原因之一。

蒙古在蘇聯的策謀下獨立，但一直沒有得到孫中山、袁世凱、蔣介石政府的承認，對此赤俄極爲不滿。中共秉承蘇俄的意旨，恬不知恥地叫囂「最無恥地，到現在國民黨政府還不承認外蒙古是獨立自主的人民共和國，而把外蒙古看成中華民國的附庸」（一九二九年《布爾塞維克》第十期）。他們煽動民族矛盾，污蔑國民政府「對於蒙、藏、回、瑤、苗、黎、僮等弱小民族，施行其殘忍的屠殺和壓迫，對於高麗、安南、臺灣、印度、菲律賓等的革命戰士，經常地把他們逮捕起來押送給英、日、法、美帝國主義劊子手處死」。聯繫到蔣介

石一路北伐，致力國家統一和偽「蘇維埃憲法大綱」中鼓吹蒙、藏、回、瑤獨立的條款，誰愛國，誰賣國不是昭然若揭了嗎？

三、紅軍的基本構成及實際狀況

關於紅軍的基本構成，毛澤東一九二八年在《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中說：「紅軍的成分，一部是工人、農民，一部是遊民無產者。遊民成分太多，當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戰鬥，傷亡又大，遊民分子卻有戰鬥力，能找到遊民補充已屬不易」，然而他又說：「紅軍士兵大部份是由雇用軍隊來的」。王明在《武裝暴動》的序言指示：「在許多地方的土匪漸與農民運動相接近，漸漸直接的幫助農民的鬥爭，這種事實尤其使共產黨員不能不注意到他們對於土匪的關係的問題。我們應當鑽進土匪隊伍中去……可以組織他們作革命的爭鬥」；紅軍、蘇維埃政府還和全國的哥老會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蘇維埃政府曾發出通知要求參加哥老會的區鄉兩級黨員務必參加開山堂，宣稱「有蘇維埃，有紅軍，哥老會就有了靠山」，並鼓勵蘇區內的大爺、當家、管事的要積極到白區發展（周恩來《關於哥老會問題》），可見紅軍的構成從一開始就摻雜著土匪、山堂、幫會成份，帶入了吸大煙、充光棍等惡劣習氣。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中承認：「紅軍每到一地，群眾冷冷清清。我們深深感覺寂寞，我們時刻盼望這種寂寞生活的終了」。他在《紅軍第四軍前委給中央的信》中還承認「湘贛邊界寧岡各縣的農民只願在本縣赤衛隊當兵，不願入紅軍，因此紅軍簡直尋不出幾個湘贛邊界的農民」。為了保證有充足的兵源，蘇維埃政府動用種種手段開展了一系列「擴紅」運動，使紅軍規模迅速擴張。

擴大紅軍的方式一是鼓動。毛澤東在《查田運動的群眾工作》一文中指出：「在每次分配東西群眾鬥爭熱忱最高漲時，要適時地提出擴大紅軍」。就是在這樣的場合興國縣大地鄉曾一次動員了十三個人當紅軍。對於經過屢次動員而無動於衷的農民則組織「兒童團，恥笑隊，宣傳三四次不去便恥笑他」（《長岡鄉調查》）。二是利誘。一九二八年湘贛邊區《土地法》中規定：「紅軍及赤衛隊的官兵，在政府及其他一切公共機關服務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農民所得之數，由蘇維埃政府雇人代替耕種」。雇人代種的標準是：農忙時每家幫二十五個工，平時平均每家幫十個工。紅屬幫助紅屬，每天

需付一毛半，紅屬幫助群眾，每天能得兩毛，群眾幫助紅屬則不付錢。而遍佈蘇區各鄉的油鹽肉合作社、布匹合作社，只有紅屬才給賒帳。貨缺時，紅屬先賣，減價百分之五，社員後賣，不減價，非社員再後賣。其糧食調濟局，賣出時先賣紅屬，再賣給困難群眾。賣給群眾要扣除損耗。紅屬無錢可以借糧，秋後歸還，不取利息。無疑，這樣的優惠條件在極端貧窮落後的農村地區對廣大農民有著極大的誘惑力。三是徵兵。蘇維埃《憲法大綱》就規定了「實行徵兵制度」，蘇區的徵兵就是通過強行攤派兵額，指定各村限期完成。毛澤東《長岡鄉調查》關於擴大紅軍一節中就有生動記載：在「擴紅」會議上，「長岡村代表答應擴大五人，塘背村代表答應四人，新溪村代表答應三人，泗網村代表答應三人，共十五人，限十一月三十日做到」，這至少說明有一部份農民參加紅軍並非是出於自願。四是收編俘虜。通過宣傳鼓動、利誘和脅迫，一些農村甚至出現了男子都當兵吃糧的局面，如興國縣長岡鄉十六至四十五歲壯年七百三十三人，當紅軍做工作三百二十人。才溪鄉上才溪村十六至五十五歲男人五百五十五人，當紅軍四百一十九人。下才溪十六至五十五歲七百六十五人，當紅軍四百四十二人。未參加紅軍的在鄉男子也編入赤衛隊、兒童團，如長岡鄉在家二十四至四十五歲男子編赤衛軍一排，全鄉六十六人，除重病殘廢二十人外，全部編入。同齡女子編赤衛軍一連，全鄉二百四十六人，除病殘二十六人外，一律編入。十六至二十三歲青年編少隊一大隊，男女合編，全鄉一百零一人，除病殘十五人外，一律編入。通過上述四種方式，紅軍規模迅速膨脹，中央蘇區的紅軍兵員最多時曾達到八萬多人。

這種迅速擴張起來的軍隊，素質低下，良莠不一，因而軍隊作風極為惡劣，下級士兵境況十分悲慘。主要表現為官兵等級森嚴，打罵士兵、虐待傷員，士兵逃跑不斷，甚至還有士兵不堪虐待而自殺現象發生。毛澤東在《廢止肉刑問題》一文中披露：「各部隊中凡打人最厲害的，士兵怨恨和逃跑的就越多。最顯著的例子，如三縱隊第八支隊部某官長愛打人，結果不僅傳令兵、伙夫差不多跑完了，軍需、上士及副官都跑了。九支隊第二十五大隊曾經有一時期來了一個最喜打人的大隊長，群眾送給他的名字叫做鐵匠，結果士兵感覺沒有出路，充滿了怨恨空氣。特務支隊第三大隊打人的結果，跑了四個伙夫，一個特務長，兩個鬥爭好久的班長，其

中一個名蕭文成，臨走留下一封信，申明他不是反革命，因受不起壓迫才逃跑。四縱隊初成立時，一、二、三縱隊調去的官長，一味地蠻打士兵，結果士兵紛紛逃跑。二縱隊逃兵比任何縱隊多，原因雖不止一個，然二縱隊下級官長的大多數打人的習慣最厲害，乃是最重要原因之一。二縱隊曾發現過三次自殺事件（排長一士兵二），現在紅軍中一般士兵的呼聲是「官長不打士兵，打得要死」。毛澤東在另一篇《優待傷病兵問題》中披露：「官長替傷病兵送茶水、蓋被窩、隨時慰問等習慣，在紅軍中簡直沒有。官長對傷病兵，採一種不理問態度，甚至表示討厭他們的態度」。「行軍時官長以至士兵對在沿途落伍的傷兵完全不表示一點同情，不但不為他們想法子，反而一味地怒罵，或無情地驅逐他們」。「傷兵傷後，七八天還沒有衣服換，調養費病官有，病兵沒有」。「飲食惡劣」。「與當地群眾關係不良，以致傷病兵看醫院如牢獄，不願留在後方」。「使士兵不滿意紅軍」。這樣的體罰虐待，使下級兵士無法忍受，紛紛出逃。如長岡鄉一次逃兵七人，下才溪一次逃兵就有二十五人。迫使各鄉蘇維埃政府不得不成立以蘇維埃幹部、紅屬婦女和兒童團組成爲宣傳隊、突擊隊，在各鄉開展逃兵歸隊活動。

四、蘇區的土地革命

二、三十年代中國農村的土地狀況據當時國民政府調查是：全國百分七十三的家庭平均每戶擁有十五畝土地，百分之五的家庭戶均擁有五十畝以上的土地。資本主義式的雇工租地大規模商業化農業經濟並不普遍。百分之三十的佃農耕作的土地完全是租佃的，百分之二十以上的佃農耕作自己的土地同時租佃部份耕地。平均地租爲百分之四十三。除地租較高外，土地兼併不是非常嚴重，絕大多數農民都擁有自己的土地，基本自給自足的農村人口佔百分之七十五。爲保障雇農利益，國民政府一九三零年頒佈的《土地法》規定給予佃農無限期續約權，除非地主要收回土地自耕。國民政府還制定了將租金限制在百分之三十七的政策。佃農並不一定非常貧窮，有的佃農大戶反而比小自耕農富有。因此整個二十世紀統治中國的意識形態「耕者有其田」可以說是人們對現代經濟學無知而接受的一些政黨的機會主義口號。由於這類口號給國家以超越法律之上侵犯財產，和公民人身安全的權力，它爲以後導致經濟災難、政治動

亂的政治遊戲規則的盛行開了一個惡例（楊小凱《民國經濟史》）。

然而蘇維埃政權並未顧及當時農村的土地狀況，而是全盤照搬馬克思主義關於實行土地「國有化」的理論。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一書中把剝奪地產作爲無產階級建立自己的政治統治的必要手段，蘇維埃政權的土地革命完全貫徹了這一理論和充分運用了這一手段。

毛澤東一九二八年制定的湘贛邊區《土地法》規定：沒收一切土地歸蘇維埃政府所有。竹木山歸蘇維埃政府所有。分配土地後，除老幼疾病沒有耕種能力及服公衆勤務者以外，其餘的人必須強制勞動。這部蘇區最早的《土地法》不但沒收地主、富農、中農土地，而且還沒收貧雇農、佃農擁有的少量土地及一切寺廟、宗祠、義莊、學田等公共土地，並勒令一切有勞動能力者強制勞動。「邊界對於土地是採取全部沒收，徹底分配的政策。中間階級在革命高潮時受到打擊，白色恐怖一來，馬上反水（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說明那裏的土地革命遭到各個社會階層的普遍反對。一九三四年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對此作了修改，規定：「所有封建地主豪紳軍閥官僚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無論自己經營或出租，一概無任何代價的實行沒收，被沒收的土地，經過蘇維埃由貧農與中農分配」。同時，沒收地主財產，沒收富農土地及多餘的耕牛、家具、房屋。「只分了些壞田、破屋給他們，現富農耕牛、農具需向人租」。經過土地革命以後，連毛澤東也承認「現在富農家況比雇農差」（《長岡鄉調查》）。這樣的土地革命無疑徹底解決了土地兼併問題，但由於蘇維埃政權實行土地「國有」政策，農民並沒有成爲土地的真正主人，他們徹底喪失了自己對於土地的完全權利，全部成了另一個雇主——蘇維埃政府——的佃戶。

即使是這樣的土地革命也被當時的中共中央領導層視爲革命不徹底，有的地方革命前五六年甚至十幾年請過長工的人或者只請過一二年長工的富裕中農也放在富農一類，他們的財產被沒收。如勝利縣原劃地主富農二千一百多家，後地方蘇維埃重查有一千三百多家改爲中農或貧農，錯劃者佔一半以上。而第二屆人民委員會發佈第一號訓令：「在暴動後查田運動前已經決定的地主與富農，不論有何證據不得翻案。已翻案者作爲無效」。有錯不糾，公然掠奪中農、貧農財產在蘇區暢行無阻。一九三三年二月，中央政府土地委員會發出第二

號訓令，要求蘇區重新分田，「限二月內必須徹底分好，要使豪紳地主分不到一寸田，富農分不到一丘好田」。當時僅中央蘇區約有三百萬人口，地主、富農以佔百分之五計，至少有六萬人完全失去了生活來源。同年六月，蘇區開展了一次查田運動。毛澤東甚至說：「查田運動是查階級，不是按畝查田。通過階級就是決定階級成份，是對這個人決定生死的時候」（《查田運動的群眾工作》）。通過查田運動，一些剛分到土地的農民又被收回了土地，甚至採取了株連手段，如長岡鄉「八月查田查出地主之妻女與工農結婚的六人，從這六人收回土地三十六擔六鬥」（《長岡鄉調查》）。

由於採取這種極不合理的土地「國有制度」，農民被強制手段改造為無產階級，失去了他們視為生命的土地，且被驅使著強制勞動，生產積極性大大降低，以至「現在春天來了，各地農民動手耕田的還很少」。「田歸蘇維埃所有，農民只有使用權的空氣十分濃厚，並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農民感覺田不是自己的，自己沒有權來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田」（毛澤東《關於加強春耕工作的意見》）。

五、蘇區的經濟狀況

任何一個不帶偏見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都不得不承認三十年代是上世紀前半期中國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一九二三至一九三六年全國每年工業增長達百分之八以上。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一年全國新增工礦企業達六百多家，共修成公路十一萬六千公里，修成鐵路一萬公里（不含日本人在東北所修五千里）；政府債券制度也發展起來（債券主要由國家政府銀行及上海私人銀行購買）。全國私營報館林立，文化事業也進入上世紀的最繁榮期。國民政府從列強手中收回了海關管理權，領事裁判權。一九三六年公佈的「五五憲草」，規劃回歸憲政，還政於民，同時立法院先後制定了民法、刑法、民事訴訟法、法院組織法、商事法、公司法。這一系列立法行為為當時的經濟發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礎。可能說這個時期是上世紀上半頁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事業得到全面發展的最好時期。

而此時在蘇維埃區域則呈現絕然不同的情況。毛澤東在一九二八年說：「日常生活壓迫，影響中間階級反水：紅區和白區對抗，成為兩個敵國。因為敵人的嚴密封鎖和我們對小資產階級的處理失當這兩個原因，兩區

幾乎完全斷絕貿易，食鹽、布匹、藥材等項日常必需品的缺乏和昂貴，木材、茶油等農產品不能輸出，農民斷絕進款，影響及於一般人民」（《井岡山的鬥爭》），蘇區的經濟已瀕於崩潰的邊緣。

在農業方面，由於青壯年男子大多當兵，生產靠婦女兒童維持，而當地當時多是不從事農業生產的小腳女人，她們被迫脫下長衫，換成短褂，剪成短髮從事農業生產。就連列寧小學的兒童也有「捉來罰掃地的，有罰禁閉的，有罰餓飯的」（《長岡鄉調查》）。「暴動後（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全區荒了許多田，在全區沒有做粉幹及板子的，沒有煮酒的，生產低落百分之二十」（《才溪鄉調查》）。

在工商業方面，毛澤東說：「紅色區域的許多手工業生產是衰落了，煙紙等項是其最著者」（《井岡山的鬥爭》），「工人，木匠失業百分之三十，裁縫大部失業，泥匠失業百分之三十，篾匠失業百分之十，理髮增加百分之十」。「私人商店除一家江西人開的藥店，全區絕迹」（《長岡鄉調查》）。湖北大冶縣蘇維埃領導人曾因擔心採取極端措施而導致小煤礦主逃離而受到中央點名批評，要求他們對小工廠主採取完全沒收政策。蘇區內的工商業一遍凋零。

在經貿方面，蘇區最有優勢的項目是竹木、錫砂等資源，但由於戰爭封鎖，這些資源根本就無法流出蘇區，為了打破封鎖，「我們有計劃地組織人民的對外貿易，並且由國家直接經營若干項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鹽和布匹的輸入」，「從出入口貿易的數量來看，我們第一個大宗出口是糧食，每年大約有三百萬擔穀子出口」（《井岡山的鬥爭》）。但糧食的大量出口對貧窮的蘇區來說無異於飲鴆止渴，它進一步加重了普遍的饑餓現象。

在稅收方面，蘇區統一由縣蘇維埃徵收，交高級蘇維埃政府支配。由於蘇區是貧困落後地區，幾乎沒有什麼工業，經濟落後，稅源少，徵稅工作十分困難。蘇維埃政府頒佈的《土地法規定》徵收百分之十五的土地稅，「都是山地，農民太苦，不好收稅」，財政的入不敷出迫使一些地方蘇維埃政府違反《土地法》規定，擅自擡高徵收標準，毛澤東承認：「寧岡收的是百分之二十，比中央辦法多收半成」（《井岡山的鬥爭》），這自然又加重了農民負擔。

在物價方面，毛澤東給我們記錄下了詳細情況，在

「模範的長岡鄉」按市價穀暴動前每擔三元，三二年四元七角；花生暴動前每擔三元，三三年三元五角；番薯暴動前每擔一千文，三二年一千三百文；豆子暴動前每擔七元，三二年十元，三三年十二元；豬暴動前每斤六百五十文，三二年九百文，三三年八百六十文；雞暴動前每斤七百五十文，三二年九百文，三三年一千二百文；雞蛋暴動前每個二十五文，暴動後四十文；片柴暴動前每斤八文，三三年十二文；木油暴動前每元五斤半，三二的三斤半一元，三三年十二兩一元；鹽暴動前一元七斤，三一年一元一斤，三二年一元三斤半，三三年一元一斤，蘇幣二元一斤；中等藍布暴動前一百五十文一尺，三二年二百五十文，三三年三百八十文；洋火暴動前四十文一盒，三二年七十文，三三年一百八十文；洋油暴動前五百三十文一斤，三二年一千一百二十文，三三年一千六文。而在另一個鄉——才溪鄉——情況也基本相同：暴動前做一套單衣要十八毛，三一年二十一毛（合大洋一元半），三三年三十四毛（合大洋二元四角）；鹽暴動前每元十斤，三三年每元一斤，有時僅買十四兩；菜油暴動前每元三斤半，三三年每元一斤十三兩；鐵比暴動前貴一倍；洋油，暴動前百分之五十人家點洋油，每元買七斤十四兩，三三年只買一斤五兩，因此除機關辦公外，無人點它了，均點松光。魚，現在已無市。從這些記錄看，暴動後與群眾生活息息相關的基本生活口最低的也漲價百分之四、五十，最高的漲價竟達十幾倍。蘇區農民生活之苦由此可見。

在群眾生活方面，「信春竟有百分之八十的群眾缺糧。群眾食酸菜水，說與放鹽差不多。雇農十分之六比最貧的貧農要好些，十分之四則同於貧農」。「富農家況比雇農差」（《長岡鄉調查》）。缺糧缺鹽是困擾蘇區的最大難題，特別是鹽，由於「國民政府在蘇區周圍設立食鹽公賣局，限制每人每月賣鹽不得超過一斤。當時流行一句話：『有人拿走一粒鹽，店主趕過三家店』（江西出版社姚名珉《回憶中央蘇區》），周圍的食鹽根本走私不到區內，蘇區、白區成了兩個絕然不同的世界，蘇區農民生活痛苦不堪。

上述種種已使蘇區經濟、群眾生活出現了嚴重倒退，然而他們的痛苦還不僅止於此，經濟公債、合作社集資、慰勞紅軍、攤派義務工、重要商品的壟斷經營使整個蘇區農民成為蘇維埃政府的集體農奴，他們的勞動成果幾乎被掠奪殆盡，農民負擔空前加重。

經濟公債。一九三三年蘇維埃政府按轄區人口約三百萬人的規模發行經濟公債三百萬元，但由於地主、富農財產業已罄空，大批農民被脅持入伍和一些貧雇農處於絕對貧困狀態，經濟公債主要由在鄉農民承擔。如長岡鄉攤銷公債五千四百五十六元，全鄉除去當紅軍者外，在鄉者不論老幼婦孺共一千四百六十五人，人均攤派三點七元，但實際在鄉十六至四十五歲人口男女僅七百六十人，每個勞動人口實際負擔七元多。但農民大多沒有現錢，「收到了穀子八百二十二提，值四千一百一十元，又收到現洋一百二十七元，共收了四千二百三十七元，尚差一千二百一十九元沒有收齊，限十一月二十日收齊」（毛澤東《長岡鄉調查》）。上才溪村十六至五十五歲在鄉人口男女共六百二十八人，攤派公債四千元，人均六元多。下才溪村在鄉同齡男女六百六十七人，攤派公債四千一百四十六元，人均也達六元多（毛澤東《才溪鄉調查》）。這其中還要考慮照顧孤寡、優待紅屬減免部份，有的農民一戶攤派竟高達四十五元。毛澤東說在長岡鄉開了四次會才攤派下去，他承認百分之六十的兒童都買了公債，五角，一元、二元、三元不等，在「另鄉有強行攤派」，並向中央瞞報「群眾完全滿意」。這三百萬元公債為蘇維埃政府和紅軍提供了充足經費，時湖南省政府主席魯滌平感歎「經年剿匪，耗費百萬」，雙方經費的豐竭可見一斑。

合作社集資。蘇維埃政府為了實現商貿壟斷經營，在蘇區各鄉設立了消費合作社、糧食合作社、油鹽肉合作社、布匹合作社。其運作資金就是向農民攤派。如長岡鄉消費合作社向農民集資三百五十元，糧食合作社集資二百六十元，才溪鄉糧食合作社集資一千八百多元。壟斷經營必然贏得暴利，毛澤東說：「區社半年四百多元本錢賺了六百多元」，社長、會計各發放獎金六十元。而六十元在當時可以買三頭牛。

慰勞紅軍。強制性的慰勞紅軍同樣加重了農民負擔。毛澤東是這樣向中央介紹他們的攤派工作的：長岡鄉「每村答應毛巾四條，黃麻草鞋與布草鞋長岡村答應一百一十雙，塘背一百雙，新溪九十雙，泗網一百雙」。才溪鄉「布草鞋上才溪八月五百多雙，九月一百多雙，十月九十多雙，下才溪八月三百多雙，九月二百零八雙，十月三百雙，十一月六百三十雙」。同時強令農民開展所謂「擁護區蘇」活動，「決定贈送紅區一幅，一尺四寸紅布，寫四個字，要打爆竹（結果打了五六千爆

竹，都是群眾自己買了去打的)。鄉蘇維埃甚至規定在村兒童「交月費一銅片，慰勞紅軍」。對農民的盤剝可謂敲骨吸髓，無孔不入。

攤派義務工。在湘贛《土地法》中有除老弱病殘外所有人都須強制勞動的條文，同時規定「老小雖無耕種能力，但在分得田地後，政府亦得分配以相當之公眾勤務」，就連強迫入編的兒童團，毛澤東認為「男少隊，可當長夫，女少隊，可當短夫」。攤派義務工方面的最好事例就是毛澤東在長岡的一項政績工程、形象工程，「修理河堤道路：決定限十一月二十日十天內，修好通江背洞之六裏長的大路，修六尺寬。修好後再修他路，四尺寬。於路修好後修那個一丈寬被水沖壞了的河堤。至於那座大木橋，則與榔木鄉合修」。長岡鄉在村青壯男婦只有七百多人，攤修如此大的工程量，負擔不可謂不重。

廣大蘇區本來就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區域，除了少數商品需要域外流入，大部份基本生活資料完全可以滿足日常所需。由於需要供養主力紅軍、地方武裝和機關工作人員約十萬多人，更重要的是大量青壯年男子調到外地及蘇維埃的壟斷經營和名目繁多的土地稅、集資款、經濟公債、義務工和強制勞動，使蘇區農民實際負擔遠遠高於白區佃農百分四十三地租的負擔，蘇區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中央蘇維埃政府成立一年多裏，轄區內爆發群眾自發的數十起武裝反抗鬥爭也就毫不奇怪了。聯繫到當代中國農民承受著亂收費、亂攤派，動輒被收走土地、牽走豬羊的種種痛苦，原來中共的農村政策是其來有自，一以貫之的。

六、「工農民主專政」的「選舉」鬧劇

蘇區政權的組織形式與蘇俄是相同的，即代表會議，這是俄國工人階級在一九零五年革命時創造的一種政治制度。工人、農民、紅軍士兵有選舉權，其它一切階級都被排除在外。為完全操縱選舉結果，偽《憲法大綱》特別規定「中國蘇維埃政權在選舉時給予無產階級以特別的權利，增多無產階級代表比例名額」。為了體現工人階級對中國革命的領導，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甚至推選了一位工人——向忠發——為總書記。即使如此，蘇區幾乎沒有什麼工業，因而無產階級代表——工人——很少，於是選舉時張羅一批半農半手工業者湊數。這樣的工人素質自然十分低下，以致一些人

感歎：「農村工人一點沒受過教育，蠢得很，什麼也不懂，甚至比一般農民還要落後些」（《王明言論選輯》）。一九三三年在蘇區進行了一次鄉級蘇維埃政府代表直接選舉，農民以村為選舉單位，工人以鄉為選舉單位。毛澤東一九六五年為《長岡鄉調查》一文作註時特別說明：「鄉村的工人是手工業者，如建築（泥水匠）、打鐵、造紙、裁縫、木匠、篾匠、剃頭師傅。人數很少，叫他們單獨組織工會，領導廣大農民，農民是不服氣的。農民不認為他們是自己的領導者，工人方面，也不認為自己有資格可以領導廣大的農民。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以的，才沒有再開這種笑話」。這些半農半手工業者為了得到土地，大多承認自己是農民，但蘇維埃政府為了體現其工人階級政權性質，將他們一律列做工人，包括他們的家屬。

選舉委員會發榜，有選舉權的一張，十六歲以下無選舉權的一張，地主富農等無選舉權的一張。前兩張紅，後一張白。候選名單恰如應選人數。地主、富農、工商業者、知識階層、僧道自知沒有份，都沒有到會。選舉會上先由選舉委員報告，鄉蘇主席報告，區蘇同志報告，問選民有意見沒有（沒有），依候選名單逐名介紹、表決（無否決者），所有代表一致通過。接著進行攤銷公債，如下才溪的選舉大會上就攤派公債一千五百元；選舉會上甚至有人提議全鄉十六歲至四十五歲無疾病者全體上前線，也獲多數通過；會上組織者提出要到會群眾批評鄉蘇工作，但無敢批評者。最後上才溪農民二千六百人選出代表四十人，而工人一百八十人選出代表三十五人。共產國際關於「黨團必須是蘇維埃的提案與決議的創首者及召集報告會與其他各種會議的發起人」的指示在這次選舉會上得到完全執行，就連毛澤東也不好意思的承認：「選舉委員會在組織候選名單問題上沒有起什麼作用，只有黨的活動」。

七、人間地獄

中共信奉暴力革命，主張徹底消滅一切剝削階級，蘇維埃存續的歷史就是一部血腥的屠殺掠奪史。譚平山、鄧演達就曾指責中共暴動是殺人放火的過激行為，是赤俄陰謀唆使共產黨徒搗亂國民黨統治。對此共產黨自己也不諱言。毛澤東在《紅軍第四軍前委約中央的信》中發出這樣的牢騷「屠殺主義又固然是為淵驅魚，改良主義也不能再號召群眾」。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共湖北

地方簡史叢書》記載湖北陽新縣僅一九二八年七月至一九二九年四月半年間就殺死地主、富農三千一百七十人，一九二八年元月中共游擊隊襲擊劉家祠堂，殺死地主劉慧臣一家五口。地主黃香谷六十壽辰，中共農民武裝殺死黃香穀，搶走銀元八百元。大冶縣地主黃曉階嫁女兒，中共手槍隊打死黃曉階並搶走嫁妝。種種暗殺、沈塘沈江、燒人住宅的暴虐行爲書不勝書。這樣的屠殺搶奪就連共產黨內部一些有良知的人士也自覺不安，陳獨秀曾主張以召集國民會議的口號來代替建設蘇維埃政權的鬥爭，合法運動的口號來取消奪取群眾準備武裝暴動的工作，經在帝國主義國民黨統治這下去和平發展的思想來取消推翻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統治的行動。他因而以「右傾」錯誤而被開除出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紅四軍第六次黨代會上，有人提出「禁止盲目焚殺」的提案而無人理會。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中說「三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甯岡，批評我們燒殺太少，沒有執行所謂使小資產變成無產，然後強迫他們革命的政策，於是改變原來前委的領導人，政策一變。四月全軍到邊界後，燒殺雖仍不多，但對城市中等商人的沒收和鄉村小地主富農的派款，是做得分外厲害的」。一九三一年八月，《中共鄂南蘇區特委目前工作計劃的決議案》明確提出發動貧農、中農起來驅逐反對家屬。各級蘇維埃政府命令赤衛軍、少先隊用強迫手段將「反動家屬」趕出蘇區，對不願離開者施以棍棒，斷絕飲食。於是這些被沒收了全部財產、土地，身無分文的地主及家屬四處亡命。可見整個蘇區對地主、富農的屠殺、流放是有指示、有計劃、有組織進行的。其組織內部在反「改組派」、「AB團」、「托—陳取消派」、「羅明路線」鬥爭中採取「一疑、二捉、三打、四供、五殺」的簡單政策，也有數萬人頭落地，其中僅陽新、大冶兩縣就殺了兩千多人。

除了屠殺，紅軍平民財產還進行了有組織的搜括搶掠。福建省中共黨史研究會《黨史研究參考資料》一九八二年第五期記載了紅軍打下福建漳州時的情況：楊成武回憶說「看是戴禮帽的、穿西服的、穿大褂的、戴眼鏡、拿文明棍、穿皮鞋的，都把他當土豪。我們那個團就抓了一百多個，有的不是土豪，而是華僑。《聶榮臻回憶錄》：「當時陳嘉庚先生在漳州開有一座商店，派了他的款，他開始不交。我們只是派人進入他的商店，取走相當於所派款項的罐頭、膠鞋等給部隊吃用，仍令其繼續」。紅軍漳州停留了四十九天，籌集了款項一百多

萬元。「全軍在汀做了整齊的服裝，每人發四元零用費，給養已不成問題」（毛澤東語）。三零年紅三軍團「在黃石港宣佈沒收帝國主義的洋行、商店，成千上萬農民組成搬運隊」，「農民挑著銅幣、銀幣，一擔一擔送到紅軍司令部」（《彭德懷自述》），黃石港乃鄂東一小鎮，不知那裏哪來的帝國主義？紅五縱隊在大冶縣金牛鎮殺了幾個土豪，籌得大洋三萬塊。毛澤東在其文集不止一次地說「僅僅發油鹽柴菜錢，每月也需現洋萬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給」，「政府和赤衛隊用費，靠向白色區域打土豪。至於紅軍給養……錢亦完全靠打土豪」，「九月罰地主九元，捐富農二百二十五元（十一家，多的捐四十元，少的十元），富農的現款過去罰的也有，現在罰的也有，無所謂捐」。其搶掠民財已經成了毫不掩飾的公開行爲。紅軍不僅自己搶掠，還組織群眾參與，毛澤東在文集中自豪地誇耀「湘潭馬家河，有率領一萬五千群眾向六個劣紳問罪，延時四日，殺豬百三十個」，「閩西贛南的民衆都非常之好，在長汀縣城及新橋、河田等地工作時，奪取土劣穀子的群眾，一聚就有幾千」。燒殺掠奪使蘇維埃政府一時間聚集了鉅額財富，以致紅軍後來從蘇區潰逃時，蘇維埃國家人民銀行行長毛澤民找到其兄，商量搬運「秘密金庫」，將大批金條、銀元分散搬運，這些金銀成爲紅軍潰逃時的主要經費。

八、蘇維埃政府的腐敗

腐敗問題隨著蘇維埃政權的建立而產生，成爲中共無法根治的頑痼，這是「無產階級專政」絕對權力的必然伴生物。一九二八年井岡山蘇維埃政權甫告成立，毛澤東就察覺「對經費的濫用和貪污到處發現」（《井岡山的鬥爭》）。就連其最基層的農村幹部在打擊地主、富農時也將豬雞等物，煮起來少數人吃；瑞金紅軍醫院就曾發現醫官私自買藥。中上層幹部腐敗現象則更加嚴重：一九三三年福建省甯化縣雇工工會組織部長謝浪金貪污光洋三十多元、福建省軍區特務營副政委黃裕湖與大隊長黃士輝合夥貪污擦槍費和沒收來的物資案剛被查處，福建省蘇維埃政府文書金華堂貪污公款、閩贛省黎川縣兒童局書記馬玉堂貪污兒童捐款案又被發現。一九三四年中央蘇區開展檢舉揭發、懲治貪污浪費鬥爭，僅兩個多月就從中央總務廳、財政部、勞動部、貿易總局等機關和中央造幣廠、中央合作總社等企業及工農劇

社、互濟會查出貪污分子四十三人，其中造幣廠會計科長凌全香一年內貪污二十一萬多元、會計蕭倫海貪污一千多元是第一大案，他們的貪污額幾乎夠一個師一年的經費。中央印刷廠會計科長楊其茲與軍委印刷所會計科長路克勤每隔一天就到餐館聚餐一次，每次吃掉二、三十多元，這在當時可算是超級豪華宴席，後查出楊其茲貪污十七萬多元，路克勤貪污四十多元。中央蘇維埃政府所在地葉坪村蘇維埃政府主席謝步升殺夫奪婦、並曾殺死一掉隊軍醫，奪其金戒指，因蘇區中央局任職的謝春山包庇而一度釋放。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央大禮堂基建工程處處長左祥雲因貪污被判死刑，三月二十五日「中央政府副主席」項英親自在於都縣主持審判大會，劉仁祥、劉天浩、李其芳等貪污被判死刑，縣蘇維埃政府主席熊仙壁被判監禁一年。

由此可見從地方蘇維埃政權到蘇維埃中央政府都存在嚴重的腐敗行爲，中共中央總書記王明所謂的「只有蘇維埃政府是唯一的廉潔政府，這種廉潔政府是中國人民有史以來時時刻刻的希望出現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已經完全具備有現代國家的一切條件和成份，它完全有資格稱作文明的人民共和國」（《王明言論選輯》）只是自欺欺人的無恥謊言。

九、小結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在蘇俄的羽翼下孵化壯大起來的，是蘇聯對外輸出革命，建立紅色衛星國步驟在中國的具體實施。蘇俄的這種陰謀在當時已爲國人識破，一九二六年以章太炎、馮自由爲首的「反赤救國大聯合會」就致電蘇俄駐北京大使加拉罕，抗議加拉罕在中國宣傳赤化，「煽惑無知之青年，啖以金錢，授以利器，爲虎作倀」，（一九二六年五月六日《申報》），章太炎說：「現在的共產黨，我們可以直接稱他俄黨，藉著俄人的勢力，壓迫我們中華民族，這是一件很可恥辱的事。我們應當反對藉俄人勢力壓迫中華民族的共產黨」（一九二五年《醒獅週報》第五十八號）。中共領導的武裝暴動是在工人階級鬥爭理論指導下的農民暴動，一九二九年中共中央調查的贛南各縣黨員人數及社會成份統計表清楚地表明，在其黨內工人只佔百分之十左右，農民佔到百分之七十，知識分子等其它階層佔百分之二十。即便如此，中共也頑固地認爲工人階級有凌駕其它階級的種種特權，這種被馬列主義精神控制的農民

革命盲目提出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口號，「焚毀教堂、寺廟，撤毀鐵路、電線」（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共湖北地方簡史》），是太平天國革命和義和團運動的再次重演，嚴重影響了社會安定、經濟發展和抗日的進行，給民族造成深重災難，是一場應該全面否定的革命。

中共反對完全符合國情民意的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三民主義」，對以孫中山爲首的國民黨「修改不平等條約，恢復中國在國際上自由平等之地位；實行普選制度；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絕對自由」（一九二三年《元旦宣言》）及土地制度改革之正確主張和不懈努力視若無睹，詆毀「三民主義」是「白色恐怖的旗幟」（王明《爲什麼不組織雇農工會》），鼓吹階級專政和階級鬥爭，以暴力方式推行土地制度改革，主張專制復辟，因而沒有絲毫先進性，與當時中國的基本國情和社會發展規律完全悖。中共在中蘇邊境戰爭中站在蘇聯一邊，出賣祖國；在「九一八」事變後主張先推翻國民政府，後進行抗戰；污蔑蔣光鼐、蔡廷鍇率領的十九路軍上海抗戰不是國民黨領導的，而是反動軍閥爲了升官發財和投降帝國主義。它在二、三十年代的所作所爲已徹底站在了全體人民和整個社會的對立面，遭國人唾棄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

蘇維埃政府在轄區內外實行屠殺掠奪政策，推行激進的土地制度和商賈壟斷經營，將廣大農民捆綁在其集體農莊強制勞動，因而受到社會的普遍反對。毛澤東在其文集中至少三次提及紅軍每到一處遭受冷落，駐紮下來與當地群眾關係不良，蘇維埃政府同群眾的關係十分不好的事實就是確鑿證明。當時社會「糟得很」、「是殺人放火的過激行爲」、「過激份子搗亂」、「土匪行徑」的輿論是其最好旁證。蘇維埃政權的殘暴統治充分表明了馬列主義理論上的謊謬及其實踐中的反動性，所謂代表民衆利益，解放民衆困苦的革命行動變成殘民虐民的恐怖行爲，整個蘇區成爲那個時代最爲黑暗的社會，人民陷入痛苦深淵。長期以來那段史實被掩蓋，人們被歪曲宣教所蒙蔽，僞「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至今仍戴著人民政權、「模範蘇區」的炫眼光環。揭開那張僞裝的面紗，還歷史以本來面目是我們知識階層應盡的職責。讓我們永遠銘記苦難民族的創傷——牢記並反思那段恐怖歷史——不是爲了清算過去，而爲了審視現在並憧憬未來。

殘暴的

壽陽事件

大陸 王雨峰

事件發生的背景

1958年，毛澤東發動了大躍進，喊出了“十五年超英，二十年趕美”的吹牛口號，不顧客觀經濟規律，製定了根本達不到的高指標，強迫全國人民完成。中共山西省委緊跟中共中央，於1958年1月提出“鼓足幹勁，猛烈躍進”，要“徹底掃除一切消極、保守情緒”；二月，省委召開了地、市、縣委書記會議，要求提前五年實現農業發展綱要，爭取十年“過長江”。生產指標層層加碼，浮誇風、瞎指揮滿天飛，興辦起奴隸制的“人民公社”，把農民的自留地、家庭副業、農村小商販、集市貿易，都當作“資本主義自發勢力”取締了。農業、輕工業下滑，糧食極度缺乏，市場供應緊張，財政赤字嚴重。誰對所謂的“三面紅旗”有半點懷疑，誰就會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者。壽陽事件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

事件始末

1959年10月，中共晉中地委委員王之一調任壽陽縣委第一書記。他上任伊始，就召開縣、公社、管理區、生產隊四級幹部擴大會議。10月29日和11月16日又連續舉辦基層幹部和縣級黨員幹部整風訓練班，在“反右傾、鼓幹勁”的口號下，對當年糧食生產計劃再次加

碼。本來，由於深翻土地攪亂了熟土層，加上旱災，當年的計劃15840萬斤就難以完成。他反而向上級謊報：當年實產為22000萬斤。其實，產量祇有11900萬斤，僅為上報數的一半。按原計劃，全縣當年應交徵購任務9800萬斤，實際完成9363萬斤。上交以後，全縣實際僅留2537萬斤。16萬壽陽居民，人均口糧僅有158斤，還不包括籽種、飼料。王之一居然懷疑農民瞞產私分，認為農民家裡至少隱藏著1200—1500萬斤糧食；祇要挖出這部分糧食，就可以彌補因謊報產量而出現的虧空。王不顧人民的承受能力，以興修水利、大辦工業和城市建設為由，決定在全縣集資100萬元。結果，各級官員又層層加碼，最後總計集資指標竟高達418.3萬元。羊頭崖公社這年人均收入僅46元，而集資任務每人50元。上湖公社收入總計80萬元，給各村分配的集資任務卻高達百萬元。於是集資有了新內容：糧油草菜蛋、金銀銅鐵錫、磚瓦石頭木也在可集之列了。當然，“現金更得力”。一些生活日用品，如自行車、手錶、縫紉機、座鐘、衣物、毛巾、肥皂，都列入集資的範圍。宗艾村有一戶什麼也拿不出來，祇好把祖墳“獻出”。當時社會上流傳著“無產階級就是一鋪一蓋、一碗一筷，還有身上的穿戴；除此而外，其餘都是禍害”的民諺。

宗艾公社是王之一的“點”，是全縣八個公社中搞得最兇的一個公社。他們挖糧集資的花招最多，逼供的刑罰也最殘忍。群眾拿不出物資，幹部就派搜索隊強行搜家，翻箱倒櫃，挖地刨牆，私設公堂，拷打逼要。公社辦公室主任王維，把學校一座二層樓上的教室，闢為鬥人場所，組織了一支130人的專業打人隊。刑罰有二十多種，最常用的是推擁和升級。所謂推擁，就是一群打手圍成一個圈，將“幫助”對象擁在圈內，推過來，推過去，不達目的決不罷休；所謂升級，就是在桌子上放張凳子，然後放磚，讓“幫助”對象站上去，交不出東西就把凳子推倒，將人摔下，有的當場摔死。據統計：該公社在運動期間摔死4人，鬥後死亡24人，鬥後自殺19人，畏鬥自殺16人，活活餓死24人，因缺糧造成浮腫便秘死亡69人，共計156人。

太安是宗艾公社的重點村，在王維的直接插手下，殺氣騰騰，烏煙瘴氣。全村952人中，有121人被鬥，致死者達36人。該村當年實產糧食66.7萬斤，徵購任務竟達74.9萬斤，王維還要再加40萬斤。為了完成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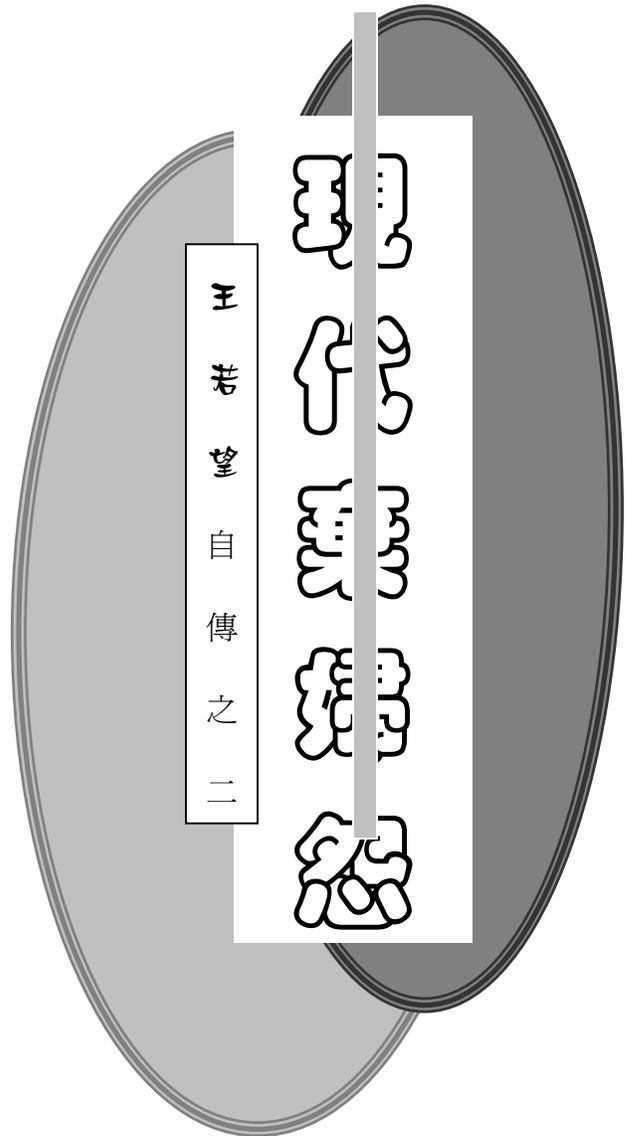
務，王維等人以“抵抗統購統銷”，“對黨欺騙隱瞞”為藉口，對農民嚴刑拷打，逼要糧食。原任支書被打傷撤職後，指定了打人兇手梁某為新的支部書記，和學校教師蘇景雲等人狼狽為奸，操縱全村運動，同時還組織起 40 多人的打人隊。社員趙義元夫婦，被他們捆起來摔打，打壞胳膊，打掉牙齒，口鼻流血，最後被逼上吊自殺。在摔打副隊長張信時，將張幾次高高抬起，摔在地上，用拳頭猛擊胸部，抓住頭髮在地上猛磕腦袋。張已奄奄一息，還大罵他“打死你，哪裡還在乎一個人半個人”，接著又是一陣腳踢，直至氣絕身亡。蘇景雲將一個生完孩子剛滿月的婦女脫掉衣服，拉到院裡挨凍。一個幹部乞求，他竟慘無人道地吼叫：“不怕，凍死我負責。”僅他就親自打過 86 人，推打後死亡 6 人，畏鬥投井服毒死亡 8 人，新任支書梁某打過 82 人。

這年，宗艾公社在凹兒修建一座小型水庫，800 多民工都是離家在外，沒有什麼糧食可挖，但揪鬥打人之風還是十分猖獗。被鬥者達 121 人，致死 10 人。這個工地上有一個專設的執法隊。一次，一個叫張四姐的婦女被摔打後，子宮出血不止。她央求說：“我還有一個吃奶的孩子”。但人稱“母老虎”的執法隊長任某某卻大喊大叫：“死一個算什麼，死十個也沒關係。”還有一位五十多歲的勞動標兵王狗小，因勞累過度，休息時被“母老虎”發現後，活活摔死。二十多歲的民工任文厚被摔死後，水庫派人直接將屍體拉到該家墳地埋葬，父母想看一眼都不允許。

在“挖糧集資”運動中，死人事件接連不斷，縣委書記王之一卻說：“不要大驚小怪”，“死人不可避免”，模仿毛澤東的話說什麼這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問題”，聲稱“不能給群眾運動潑冷水”。他們經常在電話中三令五申：必須限期完成任務。因此，下邊蠻幹的人氣焰更加囂張，叫嚷什麼：“死人算什麼，死是他不願意過社會主義的關，把資產階級思想帶到棺材裡去啦”！

壽陽縣的“挖糧集資”運動，從 1959 年 10 月底發動，到 1960 年 1 月結束，經歷三個月。全縣有 11159 戶被抄家搜查，24063 戶被掠奪財產，3116 人遭到殘酷鬥爭，打死、逼死、嚇死、餓死 349 人，人民生活極度困難，民不聊生，疫病蔓延，牲畜死亡，人口外流，人心惶惶，全縣城鄉籠罩在一片紅色恐怖氣氛中。中國大陸在 1959—1962 年間餓死 4000 多萬人。河南省

信陽地區就達 20 萬人。壽陽事件中的死亡人數，雖趕不上這些“死亡大縣”多，卻活生生地反映出當時的中國老百姓是生活在怎樣的黑暗社會中。在中國五千年歷史上，這段歷史的殘酷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接上期）

在哈爾濱只有十來天，我們就回到上海，可以說是一無所獲，第二年就爆發了抗美援朝戰爭，全國捲入了打倒美帝的狂熱中，各個大城市皆成立了抗美援朝後援會，發動捐獻飛機。

大概由於我在宣傳捐獻飛機中表現突出吧，上級指派我參加第一屆「赴朝慰問團」，團長廖承志，以大軍區為單位成立慰問分團（西北、華東、東南、華北、四個分團）。

我任華東分團秘書長，浩浩蕩蕩開赴朝鮮前線。後來還組成了第二、第三屆赴朝慰問團，梅蘭芳、巴金等都到過朝鮮前線。

參加慰問團，特地挑選文化藝術界知名人士，各民主黨派的代表人物，徐鑄成（《文匯報》主編）、武和軒（民革中央委員）、陳仁炳、張孟聞（民盟上海主委），出發以前每人做了一套統一的禦寒服裝，四個分團有一百四十餘人，分頭去瀋陽會師。

那時，南韓李承晚的部隊與美國兵已打到平壤以北，形勢吃緊，志願軍總部命令慰問團先在瀋陽待命。這樣，我們在瀋陽停留至陽曆年底。全體慰問團皆住進東北旅社。

有一天下午，我發現電梯間旁的一間小屋，一個女服務員送進窩窩頭和一點兒小菜；當她打開門時，我好奇地看裏頭究竟是什麼人生了病。

我驚奇地發現，小房間裏是一位女性，面色憔悴，頭髮不整，似曾相識，一下子想不起在哪裡見過她。我就問那位女服務員，她說：「她是神經病，丈夫是東北局的大官，不要她了，就把女人扔在我們這裏不管」。

反正我們在瀋陽閑著，我倒要弄明白，這個瘋女是哪一位高幹的棄婦？

我上門去找旅社的政治指導員，由於穿著慰問團的統一服裝，用不著介紹就取得了他的信賴，他告訴我當代高幹仗權力幹出了一出「現代棄婦怨」的悲劇。

這位不幸的棄婦原來是方紀同志（參看本自傳第二卷：「抗婚小組」一節中，她與凱豐的強迫婚姻有過詳盡的交代）。

方紀的美貌我曾作了如下的描述：「她的美麗在群芳中確實有突出之處，她端莊裏透出娟秀和靈氣，青春的光芒四射，她一旦進入會場，隨便什麼人都會向她行注目禮，覺得能多多看她幾眼也是一種享受」。（239頁）

何凱豐，原名克全，江西人，與王明、秦邦憲都是留蘇派幹將，何的年齡比方大十多歲，我在延安聽過他多次演講，那時他任中宣部長，他的報告與王明異曲同工，枯燥乏味，口齒不清是他做報告的特徵，喜歡引用斯大林語錄，凱豐的文章散見於《解放周刊》和《新華

日報》，江西土話和口齒不清總算避免，但言而無味像個癩三依然如故。像方紀那樣的美人兒與他結合，一枝鮮花插在牛糞上，怎不令人惋惜！

政治指導員回答我的提問：「凱豐怎麼把方紀關在瀋陽呢」？那是八路軍乘著蘇聯紅軍開進東三省，我們黨的大批幹部與國民黨部隊爭奪領導權，高崗、林彪、凱豐、羅榮桓等，分別擔任東四省的東北局黨、政、軍領導。凱豐的太太到第二年從關內調來，沒有多久，方紀發現凱豐愛上了文工團的演員，年齡比他小二十多歲，可以做凱豐部長的女兒了。黨組織對下面的幹部搞重婚，生怕影響不好，一定會干預的，唯有對高層幹部不敢碰，惹不得，聽之任之。真正的帶頭人是高崗。

方紀鬧著要離婚，但黨組織不許，理由是剛到新開闢的根據地就鬧離婚，怕影響不好，怪就怪在凱豐另外搞女人，怎麼不怕影響不好？方紀氣不過，慢慢得了個癥症，經醫生診斷，其實就是神經病，去年凱豐離開了滿洲，就把他的妻子扔在我們這裏，比扔掉一塊抹布還乾脆，而且特別關照，要保密，又說是怕傳播出去影響不好。不過東北局人事處答應每月支付兩百元人民幣作為這個瘋女的生活費。指導員問起：王同志為啥對方紀這麼關懷？

我說：「在方紀沒結婚前我們就認識，她與凱豐的婚事比封建婚姻還要野蠻，完全是運用組織壓力強迫配對，沒想到來到瀋陽碰巧看到了這一齣悲劇。是不是同意我看看她？也許能測定她的神志還有幾分是清醒的」。

得到賓館指導員的允准，我把方紀領出那間充塞著臭味的黑屋。她認不得我了，我親切地連叫了兩聲她的名字，她才回應說：「你是毛陳」（我在寶雞時的化名，證明她的記憶蠻好。）我邀請她到東北旅社的餐廳吃飯，方紀走出黑屋，大概從玻璃窗裏見到自己的面影，她招呼我慢著慢著。她折回去，重新整理一下衣裳，並且搓開手指梳理頭髮（可憐，她連梳子都沒有）。我重新審視她，沒有愛情的女子容易衰老，當初那麼美麗的方紀，現在活像一個祥林嫂，頭髮不再蓬亂也不能掩蓋蒼老而憔悴的面容！我在餐廳裏叫了幾個菜，她像餓煞鬼一般狼吞虎嚥，似乎好多天沒有吃飽，只有從吃相難看上判斷，才像是精神異常的樣子。

在就餐時我問：「你想回家嗎」？

「我提出我要回家，這裏不答應」。

「你的老家還有父母姐妹嗎？」 「爸爸不在了，媽媽還在，還有一個哥哥在天津市工業局」。

「還記得你老家的地點嗎？」我繼續測試她的記憶力。

「怎麼不記得？」

「我能給你什麼幫助呢？」

她木呆的眼神突然閃出一絲智慧的火花，欣喜地說：

「你能送我回家嗎？我媽在天津」。

我十分有信心地對指導員說：「方紀同志的神志可清醒咧。要求我送她回天津老家，為什麼你們不答應？甩掉一個包袱不是很好嗎？」

指導員苦笑著說：「一個神經病患者，放到社會上她要是胡言亂語呢？就是怕影響不好」。我生氣地說：「又是那個影響不好！你們寧願養著一個瘋女，只是為了給黨的部長遮醜！犧牲一個女人，去保護一個首長的名聲。如果你的妹妹是方紀同志，你將心比心，就會覺得你做了凱豐的幫兇角色！」

指導員臉紅脖子粗地為自己辯護道：「上級關照下來，不這麼做也不行呀！」我拍拍胸願意承擔責任，希望儘快回老家，對公對私都是上策。

我從朝鮮回國以後，仍舊關注方紀的命運，只是從安東乘火車回到上海，沒有在瀋陽停留，我寫了封信給東北旅社政治指導員，他回信告訴我：最後請方的哥哥來到瀋陽，護送方紀回天津老家，你所說方不像有神經病，她的哥哥也是這麼說，他氣憤地辱罵凱豐耍了詭計，這樣，凱豐就可以逍遙自在地亂搞女人了。

跨過鴨綠江

朝鮮戰爭第二個戰役告一段落，慰問團趁著戰爭空隙過了鴨綠江。我們分別乘俄國的嘎斯汽車駛向崇山峻嶺。戰區的時間表是白黑顛倒的，志願軍的行動都在夜間，只因美軍完全控制了天空，敵方的轟炸機多半是從航空母艦上起飛。這樣，慰問團的活動不得不晝伏夜出，頭一課就是學習夜貓子的生活。

我們不知開到什麼地方，反正天亮了就得停下來，由志願軍一名副官領著我們步行到一個廢棄了的礦洞裏。華東分團在行軍中稀稀落落，美國飛機在剛剛天亮時就出動了，敵機的轟炸更使得團員們驚慌緊張，有幾位六七十歲的老人掉隊落後得好遠。

愈是緊張，走得愈是慢，鑽進礦洞的時候太陽已經高高掛起。想看看志願軍什麼裝備，什麼樣子，除了那位志願軍的副官，什麼都沒見著。

我們蹲在礦洞裏，怎麼進行慰問呢？直至第三天，有三、四名戰鬥英雄來到礦洞，看來是他們慰問祖國來的親人。先由團長歡迎戰鬥英雄，講得熱情洋溢，接著由戰鬥英雄報告打勝仗的事迹。礦洞裏黑黑的，只點了一支蠟燭。不能做記錄，過了沒幾天，就慢慢淡忘了。

至今還能記起，志願軍的生活很艱苦，吃的伙食是裝在乾糧袋裏的炒麵粉，不分一日幾餐，饑餓了就抓一把炒麵粉吞進嘴巴，供應的小菜是鹹菜、鹽巴，偶爾分配到祖國運來的食品罐頭。吃這種罐頭本應是喜事一樁，只是一個班分到一罐，一個人吃到那麼一點點，反而把食欲吊起來了，好事倒變成了埋怨。慰問團是受到優待的，我們吃的東北鍋盔，它像鐵鍋那麼大，又像鐵鍋那麼硬，牙齒差點就沒法啃得動。比起十幾個人分到一隻罐頭，我們就是天之驕子了。

戰鬥英雄報告戰爭事迹，似乎只有勝，不會敗，慰問團裏個別的人士偶爾問起有無打敗仗的情況，對方語塞，避不作答，這個提問的團員在英雄離開後，受到難堪的批評，我記得一句重話：「這是有失慰問團的身份，我們是來打氣，不是洩氣來的！」

我回國後寫了一本《赴朝慰問記》，在《勞動報》連載，勞動出版社出版，其中也迴避了上述的對話，必須遵循「氣可鼓而不可泄」的原則，怎麼能在公開出版物上給前線將士說洩氣話呢？

像這樣的話：「你想不想家呀？」也會勾起思鄉之情，在軍隊裏，說話要特別小心，就怕影響士氣哇！

我們窩在礦洞裏，儘量想走出礦洞，到前線親自去體驗一下戰鬥生活。志願軍總部終於滿足了這一要求，四、五天以後，由那位副官通知我們：將老弱殘病留下來，挑選精壯年輕的團員組成小分隊，指定王若望任分隊長。副官帶領我們走出洞穴，再三叮嚀防空要緊，安全第一。我率領七名男女隊員，都在二三十歲左右，其中有一位歌唱家，還有一位交大的女同學。四五十歲的團員則留下來，他們前去後方醫院慰問，於是兵分兩路，他們那邊佔了四分之三。

小分隊步行至某個加強連的駐地，連長是新四軍的營長，名叫徐文彬，調至志願軍反而降了一級，他給我

的印象：年輕有為，幽默活潑，他歡迎小分隊的幾句開場白就不同一般：

「加強連是個打衝鋒部隊，祖國親人來了，這是我們的光榮，也許會使『加強』變成『加弱』，大家注意相互幫助，讓強弱摻和，一樣打衝鋒」！

值得自豪的是：我們小分隊終於參加了一次加強連阻擊李承晚部隊的戰鬥。美中不足的是小分隊沒有武器，連手榴彈都沒有，我們的任務只是負責捉拿俘虜。

第二個美中不足：對方不是美國兵，而是南韓的國民軍，當我們快速奔往望子山，好容易做到沒有掉隊的，徐連長先把我們隱蔽在低窪的『死角』，只讓我們旁聽密集的機槍聲和打炮聲。前後不足十分鐘，敵兵就後退了。徐連長抽空來照拂我們：「幸而上來的是南韓的李承晚部隊，要是美國兵佔領這個山頭，他們的火力就不得了，這是你們碰上了好運氣」（在《赴朝慰問記》中，描述小分隊親自參加瞭望子山戰鬥，那是作家的移花接木，這兒寫的才是真實的。如照實寫出，豈不長了美帝之志氣？故不能說真話也。）。

這一場戰鬥結束後，我們的歌唱家引吭高歌，唱了三支拿手的歌曲慰問戰士。

夜晚，朝鮮的天空星光燦爛，可以欣賞美國飛機撒下許多「天燈」徐徐降落，（天燈是懸有小降落傘的照明彈）與天際的星星相互輝映，煞是好看。也是我們車隊運輸最繁忙的時候。

白天，美國飛機沿著迤邐的羊腸小道撒下了無數的三角釘，它是一項破壞汽車輪胎的新發明，三角釘成幾何形，共有五個銳利的箭簇般釘子，隨便扔在地下即有三個釘子在下，兩個釘子朝上，汽車壓過三角釘，便會刺破輪胎跑氣。

開頭幾天美軍的新發明頗見功效，我方運輸司令劉居英想出了對策，發動婦女拿著掃帚掃去三角釘。對付的辦法有了，美國方面卻繼續扔釘子，只是偵察機發現我們的汽車安然無恙，照常行駛，美軍才收起他的新發明。慰問團回國，每人都把三角釘作為戰利品帶回去，成為到過朝鮮戰場的紀念品。

罪魁禍首斯大林——

自1950年9月至1953年7月，在朝鮮半島打了整整三年的抗美援朝之戰，只打了個平手以簽訂停戰協

定，結束了這場戰爭。中共方面的參戰，雖則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但卻付出了極大的犧牲。

當時大肆宣揚「中朝人民鮮血凝成的友誼」，「中國盡了光榮的國際主義義務」等等，凡是歌頌獨夫民賊毛澤東的光榮歷史，少不了大書特書提到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和英明決策。

抗美援朝之戰，果真是中國主動參戰的嗎？中國志願軍不參戰，美帝是否拿走了東三省，將成為顛覆社會主義陣營的跳板呢？

歷史如墮五里霧中，它把真象掩蓋了幾乎有半個世紀，好在蘇聯已經瓦解，那裏的秘密檔案得以開放，如今我們才知道：挑起南北韓自相殘殺的內戰，不久又演變成國際間的戰爭，北韓這一邊以毛澤東、金日成、還得加上半個斯大林，南韓一方則有美國和聯合國部隊。而挑起這場戰爭的罪魁禍首卻是斯大林。

至於前面講到『半個斯大林』，蘇聯只是出動幾架飛機沿著鴨綠江轉悠一番，而且還得改扮成志願軍的服裝，此外還幫助了上千輛嘎斯車，斯大林死後，換了個赫魯曉夫，這筆款項仍然歸中國政府償還。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根據莫斯科解密的參謀總部檔案材料，將斯大林的面目暴露無遺，這裏只能引用檔案材料的實錄：

當斯大林詢問金日成是否已經作好入侵南韓的準備，他聽到的回答「還沒有」時，斯大林大發雷霆責備了金。

金只得坐到斯大林辦公室門外，直至改變了自己的回答。

1950年繪製的一幅機密的地圖，地圖上顯示北韓部隊入侵南韓的路線，斯大林選用紅色箭頭標出應在三日奪取漢城，七日內攻下南韓。

金日成為什麼對進兵南韓遲疑不決，他知道僅僅以朝鮮人民軍的兵力打進南韓完全沒有把握，希望斯大林給毛澤東施加壓力，拉上中國的軍隊，可操勝券。誰知毛澤東有點猶豫，在莫斯科參謀總部的檔案裏，記載了一條：「1950年2月，金再次來到莫斯科，與蘇聯總參謀部作戰部長尼古拉·拉莫夫洽談，金告訴斯大林，他還沒有準備好，因為毛澤東還沒有回到兩個朝鮮的問題上來。斯大林告訴金：必須在五月作好一切準備，不能再晚了」。在這次會見後，推遲至六月二十五日，毛澤東才答應出兵，為了掩人耳目，改稱人民志願軍（引自1993

年8月9日《世界日報》轉載《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譯文)

抗美援朝戰爭持續了三年，最後半年，雙方戰戰停停，戰爭處於膠著狀態，志願軍最高兵力達一百三十五萬人，大陸各大軍區的部隊採取半年一個周期輪換，讓所有的部隊親自接受炮火的洗禮，據說這是為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練兵。

志願軍的死傷統計：死亡共十五萬兩千人，二十三萬傷病員。僅赴朝慰問團華北分團就被敵機炸死相聲演員常寶坤和程樹堂二人。失蹤者兩萬一千七百人。聯合國部隊和朝鮮人民軍共死亡三萬三千二百人，受傷十萬三千人(註：上述雙方死傷統計引自九五年二月出版的《新聞自由導報》)。

這場戰爭於一九五三年在板門店雙方握手言和，雙方議定八月五日至六日對等地交換戰俘，聯合國交出七萬五千八百二十三人，其中北韓人七萬零一百八十三人，中國人五千六百四十人，不願遣返的志願軍官兵四千七百零四人，佔百分之八十三。四的戰俘不願回歸祖國。這個數字使中共十分難堪。衆所周知，眷戀故土是中國人根深蒂固的意識，這麼多人在這生死離別的時刻寧願選擇遠適臺灣，如果不是對中共統治深惡痛絕，他們決不會放棄與家人團聚的機會。這個數字也給那些宣揚中國人民意識淡薄的論點一個有力的反駁：只要給人民提供自由選擇的空間，人民肯定會選擇民主與自由。在國際監督下雙方交換戰俘，正是絕無僅有選擇的難得的機遇。

後來的事實證明：那些義無反顧拋棄了家園的人有福了，據曾經在志願軍中做過戰俘營醫生的沈元津的見證：「不願返回大陸的軍人，到了臺灣後這些年，多數已富了起來。近年很多人願意回去看看老家，帶了很多美金，腰纏萬貫，回到老家，受到歡迎」。

沈先生也講到「志願軍戰俘回到大陸後，即集中在遼寧昌圖縣集中學習和審查，當然會用揭發批判、鬥爭的方式來進行，處理之後多數回到農村」(引自1993年8月15日《世界日報》「朝鮮戰爭時的北方戰俘營」)。

遣返大陸的戰俘倒霉了，本來，這一小部分人堅決回歸祖國，按常理應該嘉獎他們的愛國主義和對黨的忠誠吧，沒有！中共領導反而把他們集中起來進行批鬥和洗腦，這樣違反人道，還有一套大道理：上前線的只能「馬革裹屍回」，做了戰俘就是在敵人面前低頭了。

沈元津先生沒有交代那些在昌圖集中營挨鬥的一部分所謂「表現不好者」的去處，在《王若望自傳》第二卷418頁曾講到：「抗美援朝停戰後，從南韓放回來的兩萬多志願軍俘虜，回祖國後竟被流放到北大荒種棉花大豆，——只是從美軍俘虜營轉入國內的勞動集中營吧了」(原文談到這一部分遣返回國的戰俘，數字偏高，應予糾正)。

中共的黨史和歷史教科書裏，還在把「抗美援朝」之戰作為偉大、光榮、正確的功績載入史冊，其實中國人死傷二十五萬一千人的代價，不過是替斯大林、金日成火中取栗，對中國人一無好處。我們就有責任還其本來面目，特別是中共當局至今還在傳播「美國亡我之心不死」之類謊言。

紅色恐怖慘案實錄

我們從戰火連天的朝鮮戰場上回國，正遇上國內殺聲四起的殺中國人的鎮反運動的高潮。

我剛踏進自己的家門，妻子李明萬分遺憾地告訴我：「你要是早回來十幾天，你的表弟的兩條命或許有救，你的舅媽從鄉下來到上海，專門求你去救救她的兩個兒子呀！」

我不安地問：「怎麼啦？兩個表弟，怎麼能一同完結？」

李明眼裏有淚水，對我說：「舅媽幾乎嚇瘋了，來到這兒，是一個晚上，外邊下著雨，她沒帶傘，渾身濕淋淋的，頭髮蓬亂就像一個瘋女人，一進門就給我叩頭，哭泣著，哀告著，她把營救她孩子的希望寄托在你身上，我對她說，剛不巧他去了朝鮮，我不知道幾時能回來。不過你不知道共產黨的事情，路歸路，橋歸橋，若望說話未必管用。她絕望地撕扯濕透了的頭髮，就在這裏，她喊出了叫我揪心的呼天搶地的哭喊：『這是天不幫忙吧，我的孩子怎麼辦呢』？」

遭鎮壓的表弟名叫恩嘉，只因恩嘉參加了國民黨的地方部隊忠義救國軍任連長，按照解放軍朱總司令公佈的入城守則：國民黨各級軍官，只要放下武器，到指定地點登記，即既往不究，並保證給出路等語，恩嘉信以為真，故主動向縣政府交出武器進行登記後，便回家等候安置，並不躲藏。沒料到他還是被抓，只經一次公審大會，便在會上與忠義救國軍司令張少華等十多名反動軍官同時執行槍決。他的弟弟耀嘉，在一個鎮上任三青

團的協理員，跟他哥哥一樣，在解放後第五天就向反動黨團登記處進行登記，當他發現哥哥仍然被抓，他嚇慌了，才明白到政府去自首登記，並不能救自己，人總有逃生的本能，他趕快離家潛逃，當地政府還是從他躲藏的丈人家捉到了，同樣判了死罪，只是沒有召開公審大會，哥哥的罪狀是參與反共部隊攻打新四軍，據說有血案；弟弟的罪狀是出身反動家庭，國民黨反動骨幹，畏罪潛逃。哥哥死時二十九歲，弟弟死時二十五歲，弟弟是在哥哥被殺一個星期，被槍殺在同一刑場。他們的父親前往收屍完畢，從此得了神經病，每天幾十遍重復說著一句話：

「耀嘉若是不逃，他不一定死哪」！還算好，他發神經病總算沒說出反對共產黨的話，如果有人告發，他也會判刑坐牢。

這時，全國的報紙都以大小標題登載各地召開公審大會宣判處死多少反革命的消息，上海市郊縣的鎮反運動如火如荼，里弄、機關紛紛傳言某某人被捕，某某人被殺，一片紅色恐怖的緊張情緒充塞著每個角落。

我剛從朝鮮前線歸來，上級佈置我們要到基層做慰問報告，不知怎的，總是提不起勁兒來。特別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次，去到奉賢縣作報告，當地的領導鄭重地介紹做報告的會場：下午幾點還要在這裏召開反革命分子公審大會，並預先說出有多少人槍斃的數字，王同志吃罷飯，順便到這兒來看看我們的鎮反吧！言下顯得頗得意的樣子。

我馬上想到，我站立演講的台中央，也許就是宣讀執行死刑的反革命分子的地方，我感到渾身冰涼，倒吸一口冷氣，我拒絕了他的盛情邀請。在我做朝鮮戰場的報告，介紹志願軍如何英勇殺敵，頭腦裏總是揮不去無產階級的子彈殺死我的兩個表弟的可怕景象，我講得無精打采，前言不答後語，好在台下的聽眾都是奉命而來，他們對臺上所表演的一切是好是賴，只知道用鼓掌或喊口號來表達；在我講完以後，接連召開公審大會，聽眾也許是同一群的愚民。

我聯想起 1937 年 8~9 月間，我從國民黨牢獄回到故鄉，表弟恩嘉和堂弟壽昌皆願意跟隨我們一同去延安參加革命，火車票都買好了，進了車站卻被一同出獄的難友呂恒和陳君益竭力阻止。在本書第二卷第一部中的「節外生枝」一節中談到這件終身憾事，當恩嘉懊喪地發出懇求的呼聲：「勿要忘了我們呀」！如今那呼聲仿

佛是赴死的告別！當各人的人生旅途來到十字路口上，他因沒有一步到位就走上了人頭落地的下場，回想當年我也有一份責任，心頭感到特別沈重。我對這個案子的憤慨，覺著連三青團的區級幹部都判死刑，實在違反了朱總司令的入城守則，可見全國開展的殺氣騰騰的鎮反運動，不知濫殺了多少無辜的生命！

直到下一輪的政治運動，我本人也成了打擊對象，反右鬥爭才使我開了竅，開始懷疑給恩嘉定罪的幾條罪狀，恐怕也是摻假的，由於沒有辯護律師，又沒經過法律程序，只是轟轟烈烈開一次公審大會便一錘定音，哪能不錯殺人呢？朱總司令頒佈的入城守則，寫得多麼寬宏大量，仁義禮智信呀！可惜聯繫實際，完全不是那麼回事！，所謂南轅北轍，比一張廢紙還不如：前幾節中講到我們剛剛解放上海便強佔民族資產階級的交通銀行；「自報公議」逼得資方人士傾家蕩產；很多人跳黃浦江或跳樓自殺。

我娘舅一家的悲劇並沒有到此為止。

他家中還有一個小兒子名複嘉，他兩個哥哥一同槍決那年，還只有十七歲，上大學沒他的份兒，只好到工廠裏打工，後來他被調到安徽銅陵有色機械廠做鍛工。第二年有一名青年工人被鍛壓機壓壞了手，而這個青工是跟複嘉在同一台設備上，廠方保衛科幹部的階級警惕性很高，他們不去過細檢查這起工傷事故是不是機械故障或是操作工人本人的疏忽，首先確定這是一起政治事故，果然從複嘉的檔案袋裏找到了證據。那裏面明明寫著他兩個哥哥一同遭中共鎮壓的材料，這便成了懷有血海深仇階級報復的鐵的證據（註：檔案袋制度是中共控制每個人命運的資料袋，本書第二卷中「一張表格定終身」一節，我與徐春來的婚姻被破壞，就壞在檔案袋裏的一張表格上。）(138~139 頁)。

於是複嘉莫名其妙地被公安局上了銬子帶走了，對他採用刑訊逼供，廠黨委和保衛科的一份報告就成了起訴書，法院就判了他無期徒刑，據說還是寬大處理，沒判死刑，理由是那個致殘的青工只截斷了一隻手。一宗冤案就是如此構陷的。

複嘉宣判以後，廠黨委還把他的案例作為生動的階級鬥爭活典型，在工會系統大會小會展開傳達和學習。就在教育工人如何仇恨隱藏得很深的破壞分子的運動中，一位老師傳心裏犯嘀咕，覺著複嘉是無罪的，但是當時高壓空氣造成的輿論一律，根本容不得第二個不同

的聲音。直至複嘉坐牢三年以後，這位老工人由於良知的衝動和提醒，他決定挺身而出，先說服只剩下一隻手的青工，二人一同向法院為複嘉鳴冤叫屈：他就是發生工傷事故站在機器旁的證人，他證明機器出事故的時候，複嘉並不在現場，受傷的青工也願意證明這一點。法院派人下廠開了調查會，證實那起事故與複嘉無關，乃宣佈無罪釋放，不過三年冤枉官司已經吃完了，他不會要求法院給他一點兒賠償——中國法律上偏偏沒有這一條，反而感激法官英明仁慈哩。

表弟複嘉的絕處逢生，他不過是千萬件冤案中絕無僅有的幸運兒。要是沒有狹義心腸的一位師傅挺身而出，複嘉注定會老死獄中。

這樣，我們就更深一層瞭解鎮反的打擊面多麼廣大，死者長逝矣，但活下來的家屬皆受到各種不堪忍受的株連，他們中的男女老少被稱為「反屬」、即反革命家屬的簡稱，就像印度的不可接觸的賤民階層，屬於黑籍戶口，例如：與耀嘉結婚的女子，生了一個孩子，不滿一歲，就成了寡婦，她還年輕，她的父母親戚為她操心，介紹了幾個歲數大的光棍漢，他們聽說女方是反屬，一律搖頭，她連改嫁的權利都被剝奪了，至今還是個寡婦。

鎮壓反革命第一波，令我刻骨銘心的大冤案，還有株連很廣的「工福會」案，它原是解放前的赤色工會，這個名稱太嚇人，後接受劉少奇的批評：「工會必須關懷職工的切身福利」，乃改名為「工人福利會」，簡稱工福會，這麼一改，果然見效，本《自傳》第一節「侵入交通銀行」中就提及朱俊欣、湯桂芬等工人領袖，發動了一波接一波的大罷工，稱得上功勳彪炳了。

歷史似乎倒轉了，中共剛奪取了政權，不出三年，工人領袖一變而為反革命，「工福會」被定性為國民黨的特務組織。這時，「工福會」領導人劉長勝、劉寧一都不敢站出來說一個「不」字！

解放後榮任上海總工會副主席的朱俊欣，往後轉任「失救會」的主任，解放前他在工人心目中幾乎是革命黨的符號，他的出身成份又是無產階級，卻在無產階級先鋒隊勝利之日，一下子成了國民黨的特務。

朱俊欣一家和我還有一層特殊的關係，他不僅是我的先後兩個單位的頂頭上司，並且同住一幢公寓，做了五年的鄰居。

有一天朱下班沒有回家，第二天沒回來又沒打電話，他太太情知有變，原來公安人員抓人並沒通知家屬。我通過有關人士，打聽到老朱並未關進監獄，而是軟禁在新康大樓。朱大嫂帶著兩個孩子哭著向我求情，那種慌亂、悲苦、急迫、無奈的心境，仿佛她哀求救命菩薩似的。我怎麼回應呢？這時我才理解劉長勝、劉寧一當初為什麼不能為朱俊欣說句話，一來陷於瘋狂的黨領導，聽不進任何忠告；二來怕連累自己呀！

二十多天後，司法人員派人員通知家屬，要她到停屍間料理丈夫的後事。朱大嫂沒有去成，一聽說朱俊欣從七樓跳下，她立刻昏厥了過去。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俊欣之死還沒過「五七」，房管所派人要收回原居住的公寓房子。市政府官員好狠心呀，人死了，還逼著孤兒寡婦掃地出門，還有理由威脅家屬，說什麼：「上頭有指示，自殺的行為就是用死來反黨，不能再住進這樣的公寓」。過一些日子，朱的女兒領我去她的新居，原來是有門無窗的汽車間。

我的悲憤，我的無奈，我從未哭過，在如此境遇裏忍不住嗚咽了。

設計救人「罪」一條

鎮壓反革命的浪潮正席捲全國，我所在的柴油機廠也不例外。這一天我批閱楊浦區公安局信封的特急件，公函內附著一個人的半身照片，我認識此人是本廠工藝科技術員，名喚陳錦華，三十歲上下。

其中說明批捕的兩條罪證，說陳在國民黨行政院資源委員會供職，他在西南聯大上學期間是三青團的骨幹分子，在報上寫過反共文章，根據中央公安部第幾條，像這樣的人應當作為社會主義的危險敵人依法處理。

按照行文的語氣，此人的罪行多半是死罪。外面集團式的懲治反革命，公審大會的緊張場面，共產黨殺人殺得近乎瘋狂！我看這張照片上的人頭不久就要落地，我不是憐惜人才，而是憐惜生命，趨使我不能容許這個聰明的年輕人變成一具死屍！如果我手中沒有這個權力，只能徒呼奈何，既然公安局批捕的公文需要廠長簽名，就不能貿然蓋上我的「橡皮圖章」。

我必須徵得黨委書記的同意，從人性的角度去打動他，我還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急需人才，像陳某這樣的知

識分子在我們廠是不多的，忽然把他抓起來，難免引起科室人員、知識分子幹部的震動和不安——

刁書記不以爲然地直搖頭，他把公安部第幾條念給我聽，教訓我道：「我們不能對階級敵人手軟，基層黨委的責任只能幫助公安局發現敵人，而不是扯後腿或扯皮呀」！

回想起關於廠長負責制的那場爭論，最後的結局是廠長與黨委書記平分秋色。不過由於黨委權力更高的傳統根深蒂固，理性和人道主義往往鬥不過「黨性」。

看來我難以說服刁書記，不得不退一步改用緩兵之計，我說：「我們要對陳錦華和他的家屬負責，先把陳的歷史弄清楚，更重要的一點，他進了吳淞廠以後的表現如何？這樣來幫助公安局正確區別誰是真正的敵人」。

我說服保衛科長如何徵集陳錦華的材料，必須站在愛護人才的角度，不要誇大，不要發揮想象力估計此人將來會怎麼樣，而是有一說一，不做結論，結論由上級公安局去做。

宋元田科長爲難地說：「查詢他的歷史問題，只有與他本人談話，公安局捕人的公文卻不許洩漏給被告，這是一條紀律呀」！

我說：「正是這條紀律，我們辦案繞過被告本人，不得不以猜想和道聽途說冤枉許多人。你說是不是？這一回你並不把公文的內容給他說明，只是技巧地用關心的語氣核査幾個問題，比如說，你不妨問他當初如何進行反動黨團登記的」？

宋元田照辦了，他向我講：陳是無顧忌地講他年輕時候確實寫過一篇反動文章，刊在學生會辦的刊物上，那上面兩處罵共產黨是共匪，那文章也罵國民黨腐敗，指國民黨也會被共匪打倒。陳說：「我在進行反動黨團登記的時候，保存了好幾年的那本學生會刊物已經交上去了」。

我憤憤不平地說：「你看，怎麼能把這號人當作反革命呢？要是我等因奉此蓋上圖章，豈不葬送了一個技術人員的一生」？

宋科長大夢初醒地說：「是呀，就憑他自動交出那份反動刊物，這就是對我黨表忠心嘛！區局抓住這一點就作爲反動的罪證，那是完全不講政策了」。

「你就起草一份報告給區公安局言明真實情況，我們憑這份事實材料說服刁書記，也說服區局自動收回成

命」。宋科長知道我平時好動動筆頭，要我來寫這份報告，我說：「還不如以保衛科名義寫，你們寫好了給我看過，再交黨委」。

保衛科的報告交上來，我藉此機會又教訓他一番：

「你要知道，在當年的國統區裏，把共產黨罵成共『匪』是流行的口頭語，就像我們罵蔣介石叫『蔣該死』一樣，不這麼說反而有親共嫌疑，區分局連這個情況都分不清，恐怕不知會冤枉多少好人呢，俗話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社會上鎮壓一個人，就會連累一家人，而且造成共產黨殺人不眨眼的壞印象，它的後果是負數，而救人一命呢，那就是積德，是行善，這樣的保衛科長才是好科長」。這篇議論其實是爲我的兩個表弟的慘死而發泄心頭之怨。

刁書記看了保衛科的報告，他的人性終於戰勝了黨性，加蓋上廠黨委的圖章，送交楊浦區公安分局，果然扭轉局勢，這件案子也就不了了之。而陳錦華始終蒙在鼓裏，壓根兒不知道刀子曾經駕在他的脖子上。

我爲他的重生感到慶倖。

沒料想公安局對陳錦華依然窮追不捨，直至他的保護傘王廠長離開上柴廠，1957年我也被劃爲右派，區公安局又翻出四年前的老賬，還是將陳逮捕，這時殺人如麻的鎮反高潮已過，殺頭之罪總算免了，判刑六年，押送安徽白茅嶺農場。聯想到從香港回國的五金行老闆，他在三反五反中弄得傾家蕩產，鎮反運動開始，他也解到白茅嶺，他和陳錦華遭到同樣的命運，四十年後，我從他女兒口中才知道她的父親同樣冤死在勞改農場。

跳槽「華東局」——

上海柴油機廠的產量總是上不去，百日競賽的時期，吳梅生總工程師早就提出鑄工車間是生產中的瓶頸，他沒跟我去哈爾濱學習「什麼索夫工作法」，其實合理工作法的要領就是保證供應充足的零部件。

於是，我就動用基建資金，擴建翻砂車間的場地，二十天就提前完工了。對提高生產起著關鍵作用，在廠長負責制的職責範圍內我完全有權這麼做。沒想到這麼一件小事，竟掀起軒然大波。

華東工業部把我叫了去，很不禮貌地指責我違犯了財政紀律，我跟他說明擴建翻砂車間，不到兩個月，即能收回全部基建資金，並且改善了翻砂車間的灰土飛

揚，使工人在工地上可以自由呼吸，工人的健康是不能用金錢來計算的。

財務處長似乎被我說服了。沒過幾天，工業部長馬天水又通知刁書記和我兩人去見他，談的還是違犯財政紀律的小事一樁，只是他講話比較和氣，強調「擴充廠房不是不可以，但是按規定要事先向工業部申報；基建資金的使用按規定專款專用，財務處審查下來，你把這兩條規定全犯了。我找你來就是商量怎麼善後」？

我有點負氣地回話：「怎麼善後？我願接受批評」。

馬天水板起面孔說：「財務處要我們嚴肅處理」。

我說：「財務制度也不是死的，一切服從提高生產，應該根據實際困難通融辦理嘛。你領隊帶我們到哈爾濱學習了蘇聯的什麼索夫工作法，上柴廠的均衡生產，鑄造車間一直是瓶頸，正是學習了哈爾濱機車廠的什麼索夫工作法，立見功效，明明是功勞，財務處卻認為是違章，你做部長的應該公正的評理」。

刁書記在一旁說：「王同志怎麼這樣說話呢？毛主席教導，有事不向上級報告，就是犯了自由主義。擴建翻砂車間，你連廠黨委都沒有打招呼，我看犯了自由主義之外，還犯了獨斷獨行的毛病」。

刁書記本該跟我站在一起的，想不到此人又在一旁火上加油。我處在完全孤立無援狀態。

我只得承認理屈詞窮，想辦法給自己找臺階：「我寫一份檢討書吧，給我一個將功補過的機會，徵得財務處長的同意，允許把擴建翻砂車間的兩萬元經費，在今年年底補足」。

談話完畢，我跟刁書記乘廠車一同回廠，在路上兩人一句話都沒有，我對他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從此加深了廠長和黨委書記之間的裂痕。我心裏想的是，這個廠長不能幹下去了，我沒法跟這樣背信棄義的人共事。

我把我和刁書記一同去工業部見馬天水部長的情況跟吳梅生作了介紹，並說出我不幹這個廠長的意圖，總工程師吳梅生勸我別走這一步，他戀戀不捨地說：「我們相處得很好，你這個領導很愛護工程技術人員，這一條是有目共睹的呀！他還舉出我上任不久就救下了工藝科陳錦華的一條命。」

當我一想起來到上柴廠進行一系列改革，和職工關係親如家人，何必為一件小事和領導賭氣呢！我要吳梅生不要對外聲張，這樣的事最後還得由工業部作決定。所以原來的辭意也就打消了。

大約兩個星期以後，馬天水以華東工業部的名義，發出一個內部通報給所屬工廠，其中有上柴廠廠長王若望寫的檢討，馬天水在後面批示曰：「上柴廠不經工業部同意，擅自動用基建資金，這是違反了財經紀律，現將該廠的檢討書通報各廠，引起大家注意」。

這個通報加強了我跳槽的決心，我只能遺憾地對吳梅生宣告：再見了！我的上柴，我的總工程師！

我寫了一封信給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夏衍，向他提出我願意轉到文藝部門，其中還提到我在山東根據地出版過小說集，幾天以後，華東局宣傳部同意調我至文藝處任職。時在一九五四年四月。

跳槽成功，我轉入華東局宣傳部，任文藝處副處長，黃源任處長(三十年代主編《譯文》月刊)；副處長還有一人，即《紅日》的作者吳強。

華東局離我的住宅只有一條馬路，上班下班非常方便，日常工作審閱華東五省的文藝刊物和處理作家隊伍的問題，這兩項工作富有彈性，高興幹發現問題就多一些，放任自流倒樂得清閒。形成這個風氣，多半因為夏衍部長對文化藝術寧鬆勿緊的態度，幾年以後，夏衍得了個「自由主義」文人習氣的美名，做他的部下倒是開心的。

華東局的首腦饒漱石，副書記譚震林，上下級隔了兩層，我與首長很少接觸。可是我跟饒的夫人陸瑾女士有較多的溝通。

陸瑾是北大的學生，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北平爆發了一二九 ~ 一二一六連續兩次的抗日救國運動，陸是學生運動的領袖，她帶頭衝出軍警包圍圈的照片，曾作為《大眾生活》的封面風行於世，陸瑾成了抗日學運中一顆燦爛的明星。饒和陸在巴黎結婚，回國後帶回他們的小女兒，起初姓饒，父親出了問題，改稱母姓，連下一代都不敢使用爸爸的姓。

「三反五反」是大陸陷共以後的頭一起政治運動；一九五三年底發動「高饒事件」則是第二波的政治運動，頭一起是發動群眾鬥倒鬥垮資產階級，第二波則是誅戮黨內的開國元勳。筆者曾以《高崗、饒漱石、劉志丹之死》一文揭示毛澤東謀殺之謎(附錄一：刊於一九九四年十二月號《北京之春》和《傳記文學》以及《王若望文集》)。

(下接第 45 頁)

並非一個人的遭遇

(上篇)

王友琴

顧文選，男，浙江杭州人。1956年考入北京大學西語系英語專業。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並被判刑五年。1970年在「一打三反運動」中被作為「反革命犯」判處死刑，1970年3月5日被槍斃。顧文選活了36歲。

顧文選被殺害時，正值所謂「一打三反運動」的高潮。「一打三反」是文革中由政權機構直接逮捕、判刑和槍殺人最多的「運動」。

文革中，對被判處死刑的「反革命犯」，都「立即執行」。「立即執行」的最主要的意思還不僅僅是死刑執行的時間問題，而是不准上訴，連走形式的上訴都不准有。實際上，在中國古代皇帝時代，判處死刑，都允許申訴並要經過上級司法機關的批准。文革的死刑判處方法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即使中國當局允許閱讀文革時代的檔案記錄，我們也不可能看到顧文選的上訴書或者他為自己生命的辯護。

我們也不可能看到顧文選的遺書。在文革時代，監獄當局不會讓一個被判死刑的「反革命分子」寫下遺書也不會保留他的筆記書信，也不允許被判死刑的人在公眾前講話。文革後被揭露出來的一個案例是，被判了死刑的遼寧省女幹部張志新，在1975年4月4日被押往「公審大會」會場的時候，先被切斷了喉管。這樣的措施，目的非常明顯，就是絕對不准他們發表臨死的聲音。

筆者也無法查閱關於顧文選的官方記錄。北京當局現在仍然不准許人民查閱文革時代的紀錄。不但不允許查閱文革時期權力機關的文獻檔案，也不允許查閱當時的權力機關判處的案件記錄，甚至連一般圖書館裏有的文革時代留下的資料也不准借閱。

筆者也未能訪問任何曾經認識顧文選的人。在筆者書寫「文革受難者列傳」諸篇的時候，對受難者，可能的時候，都儘量訪問受難者的家屬、同事、朋友或者認識他們的人。他們之中除了極少數人之外，一般都願意為歷史寫作提供資料。然而，顧文選在大學時代就被劃成「右派份子」並且被判刑，他沒有結婚，也就不可能找到他的妻子兒女以瞭解他的生平往事。筆者訪問過和他同時在北京大學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學生和教員多人，他們卻都不認識他。

由於上述障礙，關於顧文選，雖然筆者多年努力，卻只是搜尋到了一些有關於他的零星的文字記載。這些文字材料包括：

一份1970年發出一份有顧文選在內的55名「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材料，1998年出版的北京大學歷史書上關於他在1957年的活動的一小段，1957年《人民日報》上和顧文選有關的兩句話，以及1957年顧文選發表在北京大學學生刊物《廣場》上的一篇文章。

通過這些零碎的材料研究一個文革受難者，簡直就象考古者通過一些從地下發掘出來的殘破竹簡和史書裏的片言隻語研究年代久遠的歷史人物。

對於收集到的為數甚少的與顧文選有關的文字記載，筆者都作了盡可能的進一步的材料搜尋，並且在本文中加以盡可能清楚的說明和解釋。對與顧文選命運有關的其他人物，包括和他一起受難以及迫害了他的人和歷史事件，也作了盡可能清楚的調查和介紹。這樣通過周邊材料作「案例研究」的方法，多多少少也像是在作古代人物或者事件的研究。

筆者發現的關於顧文選的這些文字記載，僅僅體現了他一生的幾個片斷。但是這些片斷正巧是他生命中的一些關鍵片斷。因此，通過這些片斷，能拼裝出他的經歷的一個大輪廓。同時，儘管我們只能瞭解到顧文選生命輪廓的粗略線條，這些線條卻和從 1950 到 1970 年代的一系列悲慘的歷史事變緊緊糾結在一起。可以明顯地看出，是最高權力當局發動的幾次所謂「政治運動」決定了顧文選的命運。

下面是顧文選一生的一系列橫斷面。這些片斷在時間上由晚至早反向排列。這是一個逆時間的、關於受迫害的個人和群體的命運的回溯。

橫斷面 I：顧文選在文革中被處死

- 一份偶然得到的資料

筆者第一次知道顧文選這個名字，是因為看到一份關於 55 名「反革命分子」的「通知」。

這份材料是由一位舊書收集者偶然發現而提供給筆者的。

這份「通知」，首頁上半部分印了兩段「最高指示」——當時把毛澤東的話稱為「最高指示」。這兩段「最高指示」都是關於「鎮壓反革命」和「鞏固革命專政」的。凡是公文，甚至個人的通信，都以毛澤東的語錄開始，是文革時期的特別的行文體例，在文革中盛行了至少五年。

首頁的下半部分，是通知的全文：

為了加強對一小撮反革命勢力的專政，狠狠打擊現行反革命破壞活動，進一步搞好首都革命秩序，最近再公審宣判一批現行反革命份子。現將顧文選等五十五名罪犯的材料發給各單位，請各級革命委員會，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組織革命羣眾認真討論，提出處理意見，速告市公檢法軍管會。

此材料只供內部討論，不准張貼。

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

一九七零年二月十一日

這份「通知」的其餘部分就是 55 人的名字和「罪行」。

- 文革以什麼判人死刑？

在這份「通知」中，顧文選的名字列於五十五人之首。關於顧文選，「通知」上面是這麼寫的：

現行反革命叛國犯顧文選，男，三十六歲，浙江省人，系反革命份子，北京市清河農場勞改就業人員，因反革命罪被判過刑。

現行反革命犯周鴻東，男，三十七歲，遼寧省人，資本家出身，系反革命份子，北京市清河勞改就業人員，因反革命罪被判過刑。

顧、週二犯頑固堅持反動立場，經常散佈反動言論，惡毒攻擊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刑滿就業後多次策劃叛國投敵，於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偷越國境，叛國投敵，並出賣了我國重要情報，後被引渡回國。

就憑這不到 100 個字的敘述，「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以「反革命罪行」判處顧文選和周鴻東死刑。

在這份材料上，顧文選被列為 55 人中罪行最為嚴重的人。把他判為「現行反革命犯」，所根據的「罪行」是兩條。

一是他的「反動言論」。

材料要群眾討論對顧文選的「處理」，卻沒有給他到底說了什麼「反動言論」，只是籠統稱之為「惡毒攻擊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這個罪名當時普遍運用。「專政機關」的工作人員乾脆將此簡稱為「惡攻罪」。經過文革，特別是經過「一打三反」，「惡攻」變成了一項正式而普遍運用的大罪罪名，就像「謀殺」「強姦」「搶劫」一樣，而且比這些更嚴重，犯了後幾項罪的人屬於「刑事犯」，犯了「惡攻」的人，在監獄中作為「反革命犯」以區別於「刑事犯」。「反革命犯」受到更加嚴厲的看管，而且也更可能被加重判決。

另外，必須注意到，所謂「惡毒攻擊」，絕不是顧文選曾經在公眾場合正式表達過他的不同意見。這份材料顯示了文革當局認為不須證明的法律原則是，私人談話中說的話被「揭發」出來，就能成為死刑的根據。

同時，儘管「惡毒攻擊」會被判處死刑的大罪，其內容卻從不被宣佈。當時還有一個特別的詞語，叫做「防擴散」。

「惡毒」是個形容詞，根本無法設定怎樣的「惡毒」才能算是「惡毒」的標準。實際發生的是，一個精神病人的胡言亂語，一個玩笑，甚至一個口誤或者筆誤，只要其內容和毛澤東、共產黨、社會主義、文革有悖，都可以用「惡毒攻擊」來形容和歸類，緊接著就可能變成重罪以至死罪。

雖然無從瞭解顧文選的「惡毒攻擊」的內容，但是筆者調查過和顧文選一同列在 55 人中間的另一個人聞佳。她被列在第三十九名，是 55 人中最為年輕的，被判決的時候是二十歲的姑娘。文革開始時，聞佳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初三的學生。聞佳被判 18 年徒刑。判她如此重刑，所根據的「罪行」是什麼呢？1966 年夏天，聞佳和其母親因為她早已經死亡的父親的「問題」，被掃地出門，從北京驅逐到四川農村。後來她到北京想要申訴，因為無處居住，不幸遭到強姦。在 1968 年底的寒冷的冬天，她來到她的中學校中，從窗戶爬進一個封門不用的廁所裏，準備在那裏絕食而死。她在廁所裏被「校衛隊」發現。被抓起來受審訊時，她在絕望中，說出了反對文革和毛澤東的「反動言論」。她被學校「革命委員會」的人「扭送」（這是當時對此類情況的專門用語）到了「專政機關」。

在「防擴散」理論下，聞佳的「反動言論」從未被公佈，除了審訊她的人，沒有人知道她到底說了什麼，也無從知道法庭是以什麼標準定的這樣的重罪。由於她說了從來沒有向公眾說出的「反動言論」，一個 20 歲的年輕女性被革命時代的「公檢法」判決 18 年的監禁和苦役。

在 1966 年夏天，聞佳 16 歲的時候，她被同班的紅衛兵稱作「狗崽子」，在教室裏遭到「鬥爭」。在「鬥爭會」上，她的同學動手打她，她的眼鏡被打碎。她和她的母親被掃地出門驅逐到農村，家裏的東西都被砸壞或者沒收。一個年輕的女性遭遇了如此多的摧殘，她當然會有怨有怒。當她在絕望中表達了這些怨怒，儘管根本沒有其他聽眾，她就被判了重刑。

筆者曾經到聞佳的中學訪問了該校的人事幹部。毛澤東死了兩年半以後，由於鄧小平的新政策，1979 年春天，釋放了大批聞佳這樣的「惡攻」「反革命犯」。聞佳出了監獄後，無處可去，曾經到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找學校當局希望為她「落實政策」（這是當時給

文革受害者一些幫助的說法，全稱是「落實黨的政策」）。中學校當局告訴她，如果被判刑前是大學生，可能由原大學分配工作，但她是中學生，中學當局沒有權力安排工作。據當時和聞佳談話的學校人事幹部說，聞佳看起來健康狀況很差，精神有些不正常。

聞佳得到這樣的答復，就離開了，以後也沒有再去那個中學。這個中學不管給她「落實政策」，但是 1968 年正是這個中學的領導把她送進了拘留所。筆者也未能找到任何人知道聞佳離開後去了什麼地方。希望有讀者能告知她後來怎麼樣，在哪裡能找到她。

把「反動言論」當成重罪甚至死罪，在「一打三反」之前就有，只是在「一打三反」中，變成了普遍應用的不容質疑的法律。被殺的所謂「反革命」，就這個 55 人的材料來看，他們的所謂「反革命行爲」，主要就是「反動言論」，而且，是一些私人談話中發出的言論。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上冠冕堂皇地寫著中國公民享有「言論自由」，甚至在文革中修改過的新憲法中，雖然去掉了「遷徙自由」，卻依然保留有「言論自由」。然而，在實際上，言論被當作判處死刑的根據。回顧歷史的時候，需要注意到這樣的矛盾，即一個時代的寫在紙上的憲法，和實際生活中執行的法律，差別可能有多大，以及這種差別有多可怕。

顧文選的第二條罪狀是逃離中國，在材料上被稱為「叛國投敵」。在共產黨宣傳中，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但是在 1950，1960，1970 年代，普通人民根本不被允許得到護照出國。如果他們想要離開中國，只有秘密離開。秘密離開中國是十分危險的事情。他們可能在中途被打死。如果不被打死，這也竟然可以成為判處死刑的「理由」。

在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這樣殘酷的執法。在德國有過「柏林牆」。在 1989 年柏林牆被推倒以前，試圖偷越「柏林牆」的人，有一百多人被哨兵打死，這是非常兇殘的事情，因此在柏林牆被推倒之後，下令開槍射擊的東德領導人被法庭起訴。另外，也有一些人，是在越牆的時候被抓住了，他們因此被判刑。筆者認識一名當時的東德大學生，曾經因越牆逃往被抓住而被判刑一年。也就是說，他們被判的徒刑，是離死刑相當遙遠的徒刑。由是，當我們回看往事的時候，我們不能說，這

樣的重刑是別處也發生過的事情。這是文革的特殊的殘酷。

站在文革當局的立場上看，把「惡毒攻擊」和「叛國投敵」作為死刑罪，對建立他們的權威有很大好處。死刑是最高的懲罰，有極大的威震力。把二者設立成死刑罪，最大可能地禁止了任何人對毛澤東和文革的任何非議，不但不能採取行動反對，連私下的議論也不能做，同時也最大可能地禁止了人們對中國以外正在不同的方向上發展的世界的嚮往，使得他們絕對無路可逃。文革需要在一個嚴禁不同思想的對外嚴密封閉的條件下才能順利進行。

在這 55 人中，最普遍也被認為最嚴重的「反革命罪行」，就是這兩項。文選不幸兩項都具備，就成為 55 人中的第一名，最大的罪犯。顧文選被判了死刑。這份材料發放二十天以後，顧文選被處死。因為時間如此靠近，所以他的判決書裏，不可能與這份材料有不同的內容，這份材料的內容應該就是判決書的內容。

在這份材料上的 55 人之中，根據瞭解，被處死的除了顧文選，至少還有田樹雲、孫秀珍、朱章濤、王文滿、沈元。他們的主要「罪名」，也都是這兩項。這樣的死刑標準是文革時代的重要特徵之一，也是文革的特徵性罪惡之一。

顧文選在 1970 年 3 月 5 日被槍斃。筆者未能找到他的死刑判決書。實際上，據筆者的調查，在文革中判刑，被判刑的人以及家屬都沒有收到判決書。這裏能知道顧文選被處死的日子，是因為和他一起被處決的人中有遇羅克。他們都是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的「公審大會」後被殺害的。遇羅克有一個非常支持他的家庭。他的家人記得他在 1979 年 3 月 5 日被殺害。這樣我們才知道了顧文選被害的日子。

和顧文選一起列為「同案」的周鴻東，筆者未能發現任何關於他的經歷和背景的記載，也未能找到知道他的人。希望讀者中的知曉者能夠提供有關他的資訊。

在文革後很多年，仍然有人認為文革是一個「大民主」。這種看法的「根據」是，普通人可以對各級領導幹部「造反」。且不說當時的「鬥爭會」等形式是多麼野蠻和違法的手段，也不說可以「造反」的內容僅僅是攻擊那些人「反對毛澤東思想」，這樣的看法無視顧文

選這樣的人被殘酷殺害的事實，無視聞佳這樣的人被判重刑的事實，創造了一個遠離事實的文革神話。這是令人震動的事情。

• 判處死刑不引用法律作依據

應該注意到，在「公檢法」給顧文選定罪的時候，他們沒有引用法律條文，也就是說，他們沒有說顧文選是犯了哪一條法律。

判處任何刑罰，都應該說明法律依據。不然，這變成了隨意性的懲罰。對社會中的每一個個人，一定要告訴他，有哪些法律存在，這樣，才可以讓這個人知道哪些事情是不可以作的。當這個人作了的時候，也才可以懲罰他。這些是人類文明社會已經實行了幾千年的制度。但是文革摧毀了這一原則。

在俄國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一書中，描述了在史達林時代，逮捕了數字龐大的俄國人，把他們槍斃，或者把他們送到勞改集中營去。審訊手法是殘酷的，判決是極其快速的。判處了很多人重刑和死刑一律是根據 1926 年頒佈的刑法法典的 140 條中的一條。這一條是第 58 條。這條刑法可以濫用，以致索爾仁尼琴說，天下的任何思想、行動或者不行動，都可能在「刑法第 58 條」的重手之下被懲罰。（見該書第一卷第一部分第二章。）

在蘇聯不承認有「政治犯」。這「第 58 條」被列入刑法的「反對國家罪」部分。一方面，這「刑法第 58 條」的文字被寬泛地解釋。另一方面，只要是和「刑法第 58 條」沾邊的人，一律都被重判。就這樣，這條「刑法第 58 條」害了無數俄國人，在被害者的判決書上，千篇一律地寫著「根據刑法第 58 條……」。

在「刑法第 58 條」下所作的大規模的逮捕和判刑以及判處死刑，當然是大規模的迫害，是草菅人命。但是，應該注意到，史達林至少還有一條「刑法第 58 條」，他也還認為判刑時需要一條法律來作依據。

可是，當顧文選被判處死刑並且被槍決的時候，文革的當權者根本沒有說他們的決定有任何法律依據。他們顯然也不認為需要法律依據。

在對法制的破壞方面，文革中的毛澤東比史達林走得更遠。他利用年輕的紅衛兵來執行大規模的迫害，而不僅僅是用專業執法人員，而且，他根本就不認為應該先制定一條法律，然後根據這條法律來判決刑罰。同樣

是踐踏人權，同樣是由最高統治者決定人民的生死，毛澤東不願而且也不必經過使他的決定先成爲法律條文這一步驟。他不費這個麻煩。

也應該注意到，在「反右派運動」時代，法院判決「右派分子」徒刑的時候，判決書的行文是有所不同的。中國人民大學的學生林希翎的判決書裏是這樣寫的：

綜上所述，特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第十條三款之規定判決如下：被告程海果反革命罪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刑期自一九五八年七月廿二日起算至一九七三年七月一日刑滿），並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一一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59）中刑反字第四五一號。

（引自香港《七十年代月刊》，1983年9月）

在這個判決書裏，判決的根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第十條三款」。不管這個「條例」本身是否合法，至少在1959年判決一個「反革命犯」還要引用某個條款。在文革時代，「公檢法」判決了大量的「反革命犯」，但是他們不引用法律條文。這是一個很大的改動。這是文革的「繼續革命」的內容之一。

在是否引用法律作爲判罪依據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文革前和文革中、史達林的大清洗和毛澤東的文革的某種不同之處。這些不同之處顯然相當重要和值得注意。

- 公檢法三合一判刑

從這份「通知」可以清楚看出，當時判決死刑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

在北京市，早在1967年2月，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建立以前，公安部和北京衛戍區司令部就發佈佈告：奉國務院、中央軍委命令，由北京衛戍區司令部接管北京公安局，建立軍事管制委員會。牟立善任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劉傳新、王更印任副主任，並對市公安局所屬機構一律派出軍代表，實行軍事管制。

那時正是所謂「一月奪權」的時候，文革後還有人認爲那時「群眾」真的可以「奪權」，其實最有實權之一的「專政機關」（這是當時所用的術語），連表面上的「群眾」奪權也沒有過。

不但公安局被「軍管會」，而且「軍事管制委員會」很快就一統管制「公檢法」三個部門。

司法系統有公安局，檢察院，法院三個部門，是人類社會法制史上最重要的發展和進步之一。可是在文革時代，這三家不但都被「軍管」了，而且，從「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這個名稱，也可以顯而易見地看出，三者已經合而爲一。「公檢法」在這裏已經成了一個「單位」，而不是三個獨立的單位。不但合三爲一，而且由軍隊管制。

在民主社會，立法、行政、司法三者獨立，這是建立在權力的分工和互相制衡的原則上的。在文革前的中國，就整個國家而言，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不存在「獨立」的司法系統。但是，在司法系統中，在機構設置上，這「公檢法」三者還是三家，分別稱爲公安局、檢察院和法院，而不是一家。三家有明確的分工。公安局偵破案件，檢察院提出起訴，法院作出判決。到了文革，三家公然合併成了一家，「公檢法」成了一個詞。這是貫徹毛澤東的文革思想的結果。

在1968年，毛澤東發動所謂「造反派」奪權，然後他決定新的權力機構的名稱叫做「革命委員會」。他不但制定了名稱，還規定了這個新的權力結構的形式。毛澤東說：「革命委員會要實行一元化的領導，打破重疊的行政機構，精兵簡政，組織起一個革命化的聯繫群眾的領導班子。」

在文革後，仍然有相當一些人還在肯定文革「反對官僚制度」的正面貢獻。其實，一方面，毛澤東從來沒有強調過一般意義上的「反對官僚主義」，更沒有在文革中致力於採取有關的措施讓人民少受官僚主義之苦，另外，他所說的「打破重疊的行政機構」，實際上作了的，是取消了像公安局，檢察院，法院三家分開並且獨立這樣的社會組織形式。這樣的結果，是取消了審判方面的法律程式，在製造對人的迫害方面大大提高了效率。這是一種多麼可怕的提高效率啊。

文革前，法院張貼死刑佈告或者一般徒刑的佈告，佈告上都寫明審判員或者法院院長的名字。這多少也是一種文革後才開始說的所謂政治「透明度」的體現，另外也多少體現了法院院長的責任。但是在宣判顧文選的時候，不但公檢法合併爲一，而且「軍事管制委員會」是一個集體名詞，不署個人的姓名。這種大名詞，也在相當程度上使得被判刑者面對一個集團，無處可以對話

申訴，又使判決他人死刑者更加高高在上，老百姓不知道他們是誰，他們也就更能殺人懲罰人，無所顧忌。

文革前，判處死刑，被判的人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上訴。但是在「一打三反」中，中共中央的文件明確說明：「按照中央規定殺人由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批准，報中央備案。」這樣的做法在「一打三反」之前就實行了，在「一打三反」中更加體系化。法律的這一程式方面的改變，是一項很重大的改變。司法系統就在這種改變中被進一步「一元化」了，而且，就以這樣不正式的方式宣佈出來。

上文寫到的在 1967 年被任命為北京市公安局軍事管制委員會副主任的劉傳新，後來成為「軍管會」的第一號人物，執掌北京「公檢法」工作，一直到毛澤東死去和「四人幫」被關押。劉傳新原為南京軍區某部軍副政委，掌管北京的「公檢法」長達十年。直接受過他的迫害的人的數字，十分巨大。

據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教授譚宗級的文章《「五一六通知」評析》說：「僅北京市的幹部、群眾，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冤獄而死的即達九千八百零四人之多」。（見《十年後的評說》，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北京，1987 年，頁 21）筆者曾經詢問譚宗級教授這個數字是哪裡來的。譚宗級教授沒有告訴筆者具體出處，只是說，這是從中央文件裏引用的，絕對可靠。

死於冤獄的就有 9,804 人，這已經是一個巨大的數字，那麼還有曾經被關進過監獄沒有死的人，也會是一個非常大的數字。劉傳新作惡之多，由此可見。另外，據說他不但大量抓捕北京人，而且把文革前北京市公安局的幹部也大批關押和送到農村勞動，有幾千人之多。

1976 年毛澤東死去以及「四人幫」隨之被逮捕，中國的上層權力擁有者發生了大變化。在文革中被劉傳新關押迫害過的一批老幹部重新回到權力位置上。1977 年 1 月 27 日，劉傳新被免去北京公安局長的職務。他被「隔離」在東交民巷他居住的院落裏受「審查」。1977 年 5 月 18 日，他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天要開「聲討劉傳新大會」的通知。半夜裏，他在一棵樹上吊自殺。

劉傳新自殺，當然首先是因為他的失勢，也很可能是由於懼怕他用於別人身上的殘酷做法，在那些人恢復權力之後會用到他自己身上。但是他懼怕的人中間，不

會有顧文選這樣的人物。這不但是因為顧文選已經被殺死，也因為顧文選本來也只是一個沒有權力的普通人。

劉傳新可以算是政治迫害機器中的一種典型人物。他是像前蘇聯的葉若夫、貝利亞一類的人物。這些人在史達林時代主持秘密員警工作，權傾一時，冷酷無情。在他們的指揮和領導下，無數人被槍殺或者流放。但是中國的劉傳新這一類的人物，還沒有得到清楚的記載與分析。

在「公檢法」合併而顯得「精兵簡政」的同時，實際上建立了新的機構，從中央到地方，有「三辦」和「六辦」兩個新的辦公機構被建立起來。「三辦」專門負責「一打三反」，「六辦」是專門負責「清查 516」的，那是「一打三反」之後的一個「運動」。後來這兩個「辦」又被合稱為「三六辦」，存在了非常長的時間，直到毛澤東快死的時候還存在。在這方面，毛澤東根本不在乎「重疊」不「重疊」。他要的是「一元化」，即權力的高度集中。在這方面，他徹底打垮了人類歷史上人們經過探索試驗而建立起來的關於權力的平衡和制約的思想和方法。他的這種思想，至今未能得到清算。

同時，這個材料還告訴我們，當時作這樣的判決的過程，在「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的作用之外，有「革命群眾」「討論」的部分。也許這種由「群眾」來討論，是有些人認為文革有過「大民主」的根據。但是從這份材料本身，也可以看出這種「群眾討論」的功能是什麼。首先應該注意到，顧文選的主要罪狀是「反動言論」，但是材料中沒有介紹他到底說了什麼「反動言論」。上文提到，當時有一個特別的說法，把這種「反動言論」列作「防擴散材料」，一律不准復述。如果真的是要「群眾」來「討論」對顧文選的處理，那就應該告訴大家他到底說了什麼「反動言論」。如果真的相信群眾，就不必怕什麼「擴散」。不告訴「革命群眾」顧文選到底說了什麼，卻要群眾「討論」對他的處理，這根本不是真要群眾來參與定罪過程，而是恐嚇群眾，逼迫他們再也不敢講任何可能當局不准講的話，不敢說任何可能會被指控成「反動」的言論。為了免於受到顧文選那樣的懲罰，也沒有「群眾」敢對顧文選被重判提出異議。

- 「運動」殺人

顧文選是在「一打三反運動」被處死的。所謂文革，主要就是由一系列的「運動」所組成。大量的文革受難者，就被害死於一個接一個的「運動」中。

根據筆者的調查，文革中殺害人最多「運動」是兩個：1966年夏天的「紅衛兵破四舊運動」，1968到1969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網站上絕大多數的受難者都死於這兩個「運動」之中。

1966年，「紅衛兵」直接毆打和打死了大量的普通百姓。「清理階級運動」也主要是通過所謂「群眾專政」來作的：在各個工作單位都建立了「專案組」和「牛棚」，關押虐待「有問題的人」，造成了大量死亡。「一打三反」則是在前一階段「群眾專政」的基礎上，由「專政機關」即「公檢法」來逮捕、監禁和槍決所謂「反革命」。

1970年1月31日，毛澤東批示「照辦」，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反革命活動的指示》，編號為「中發〔1970〕4號」文件。這一《指示》，與2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的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鋪張浪費的指示（中共中央發出的1970年5號和6號檔）相結合，統稱為「一打三反」。

「一打三反」前，就有一批人被逮捕與被殺害。比如，林昭在1968年5月在上海被槍決（見「林昭」條目）。筆者調查過的另一案例是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洪恩。陸在文革前就患有精神分裂症，曾經住院治療。文革中，他說的有些話，一個精神病人說的話，也被當作「反革命言論」，並且被判死刑。陸洪恩在1968年4月28日被槍決。「一打三反」，是在被捕與槍決的人數方面，大大提高了規模。這是一個專題運動，「打擊反革命」是主題中的主題。在全國範圍內，逮捕了一大批「現行反革命」，並且對其中的一部分人判處死刑。由於「公檢法」的介入，迫害與殺戮在這一階段變得更加體制化也更加兇惡。

就北京市來說，在1987年編輯的內部印出的《北京文革『大事記』》中，摘錄了1970年10月，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給「中央」的一份報告。報告的題目是《關於認真執行政策深入開展「一打三反」運動的情況報告》。其中說：

「一打三反」運動以來，全市又查出叛徒、特務、反、壞份子4823名，其中6月以後查出的約佔四分之一；清查出外地流竄來京的反、壞份子934名，其中6月以後查出的佔三分之二。同時，破獲反革命和較大的刑事犯罪案件3138起，破獲一批通敵叛國、陰謀暴亂的大案要案，抓獲了一批陰險狡猾的反革命份子，現行反革命案件下滑，兇殺、搶劫、縱火等嚴重破壞社會治安的犯罪案件減少。」

讀這一報告，需要注意到，在「一打三反」中被「查出」的這4823名北京本地人和934名外地人，是在剛剛過去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揪」出了8萬多「階級敵人」的基礎上（見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在1968年11月的報告），又追加上的。

關於「一打三反」，文革通史《大動亂的年代》（王年一，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333頁）只做了簡單的記敘：

據統計，1970年2月到11月共十個月挖出了「叛徒」、「特務」、「反革命份子」184萬多名，捕了28·48萬多名，殺了數以千計的人。

該書沒有提供數位出處，該書作者說書中這類數字都是從中共中央檔上抄下來的。筆者查找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件選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人民出版社，北京，1982年，內部發行）之後，沒有發現有這樣的數字。顯然，即使在文革後，這些材料不允許普通人知道。不過，該書中「中共中央轉發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康生、謝富治問題的兩個審查報告的批語（1980年10月16日）」有這樣一段：

此件和關於康生、謝富治的兩個審查報告，可先傳達全體黨員，經過適當時間再向黨外宣佈。

兩個審查報告各有七個罪證附件，因為很多內容涉及黨和國家機密，這些附件只發給省軍級參閱，不再往下傳達。

中共中央 1980年10月6日

由此推測，很可能這些「一打三反」中逮捕人、槍殺人的數字，就在這「七個罪證附件」中。謝富治長期擔任公安部長，這些數字與他直接有關。王年一有特權能看到這些「只發給省軍級參閱，不再往下傳達」的檔，所以得到這些數字並在他的書中引用。

「一打三反」是由當時新建立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主持領導進行，由「公檢法」判處死刑，被處死者不是由群眾組織如紅衛兵在「鬥爭會」上被亂棒打死的。也就是說，雖然不准上訴，沒有經過正常的審判過程，但是既然政權所做，應該有一個文字記錄，殺了多少個人應該是有準確數字的。

王年一書中只能用「數以千計」這樣一個對死刑判決來說很是太含糊的數字，這不是因為當時沒有記錄，就是因為文革後的人也沒有認為應該仔細統計。

另外，「數以千計」也遠不是一個在數量級上準確的數字。從各地都大批槍斃人的密度來看，全國被槍斃的人不可能只是數千人。

至於這些數字為什麼在文革被否定之後，仍然是「黨和國家機密」，也是需要解釋的事情。在1980年，鄧小平胡耀邦主持為在文革中受害的人平反，但是他們不願意讓普通人知道整體情況，以免引起對整個制度和統治當局的懷疑，應該是原因之一。

橫斷面 II：顧文選被判刑

在上述「通知」中，寫到顧文選「因反革命罪被判過刑」，是指他在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後受到的處罰。

《陽謀》是一本關於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歷史的書。這本書的一個特點是，除了書面資料的引用，其中也包含了作者丁抒通過採訪收集的第一手資料。

丁抒曾經訪問了北京大學的「右派份子」黃繼忠老師。他從黃繼忠那裏瞭解到的關於顧文選的情況，寫入書中：

「鳴放」時，北京大學西方語言系講師黃繼忠曾主持召開控訴大會，由該系在肅反中無辜被鬥爭的學生顧文選等上臺控訴。黃被打成「極右派」，送清河農場勞改。

顧文選成右派後，無處伸冤，天真地跑回杭州家裏找媽媽。結果被抓回北京，判處五年徒刑。刑滿釋放後，他留在清河勞改農場「就業」，永不能回到社會。有一天，他去看望也在清河農場勞改的原來北大的老師黃繼忠。對黃說：「我恐怕以後不能常來看你了。」

此時顧文選已經絕望，決定出逃。他設法逃到了蘇聯。哪知蘇聯更不把他當人，克格勃將他像畜生似的裝進麻袋，弄到莫斯科審問，然後又送回遠東，引渡回國。一九七〇年「一打三反」中，顧文選被槍決。（《陽謀》，丁抒，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社出版，330頁，1995）

據丁抒的書，黃繼忠老師也在1957年被定為「右派份子」，並且被「勞動教養」三年。他和顧文選在同一勞改農場，他和顧文選有過師生關係，而且他們也一起在北京大學被劃成「右派份子」，由於這些原因，所以顧文選決定逃亡的時候，來向他告別。但是黃繼忠當時並不知道這是告別。他後來聽到顧文選被判死刑的消息，才知道顧文選來看他的時候，實際上已經決定要逃亡。當時，顧文選是來向他作長別的告辭的。後來這告辭成為生死的告辭。

黃繼忠在1979年主持了給顧文選開的平反及紀念會。黃繼忠畢業於燕京大學，1950年代是北京大學西語系的講師，喜歡唱歌，業餘當過北京市教師合唱團的團長。他在八十年代到了美國，曾在伯甯頓學院任教，有英文著述發表，後來退休。他在伯甯頓學院的美國同事和前房東知道筆者想要與黃繼忠老師聯絡後，認真幫助查找他離開該校後的住址。但是其時他已經病重垂危。2001年，黃繼忠去世。筆者沒有能有機會訪問他。這也在此提醒我們，經歷過這一段歷史的人們，在留下他們的見證詞以前，就已經去世了。

對被劃成「右派份子」的人分六類「處理」：一類開除公職，勞動教養；二類撤銷職務，監督勞動；三類撤銷職務，留用察看；四類撤銷職務，另行分配；五類降薪降職；六類作「中右份子」處理，免於處分。（1957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在國家薪給人員和高等學校學生中的右派份子處理原則規定》，轉引自《大逆轉》，159頁，明鏡出版社，香港，1996。）

對被劃成「右派份子」的學生，不存在公職的問題，但是有學籍。對學生的處理有四類：開除學籍，勞動教養；保留學籍，監督勞動；保留學籍，校內勞動；免予處分。

處理分成六等及四等，對於控制被劃成「右派份子」的人，是有效的方法。右派份子本來就是因為他們的思

想，而不是行爲。也就是說，他們的「罪行」是不具體，不實在的。但是這種「處理」方法，提供了機會來收集他們的新的「罪行」。如果他們不服，就可以把他們爲自己申辯的話和所謂「認罪態度」也當作新的「罪行」。這樣，其他人就必須接受定罪，以免再被加重處罰。

當時身據高位、在報紙上發表言論後來又在報紙上被點名批判的「大右派」，得到的懲罰，反而比顧文選這樣的大學生爲輕。「第一號」右派份子羅隆基，原任林業部長，成「右派份子」後撤了職，但是仍然住在原來的大房子裏，直到文革前夕去世。儲安平原是《光明日報》總編輯，成爲「右派份子」後被撤職，每月還有100元生活費。但是大學生「右派份子」，即使不像顧文選那樣被判刑也沒有被送去「勞教」，如果被開除學籍並在城裏有個工作，每個月只有二十多塊錢工資。對於這樣的特別的處罰方式，也是需要加以研究的。

《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沒有記載顧文選如何被「處理」，但是記載有別的學生被逮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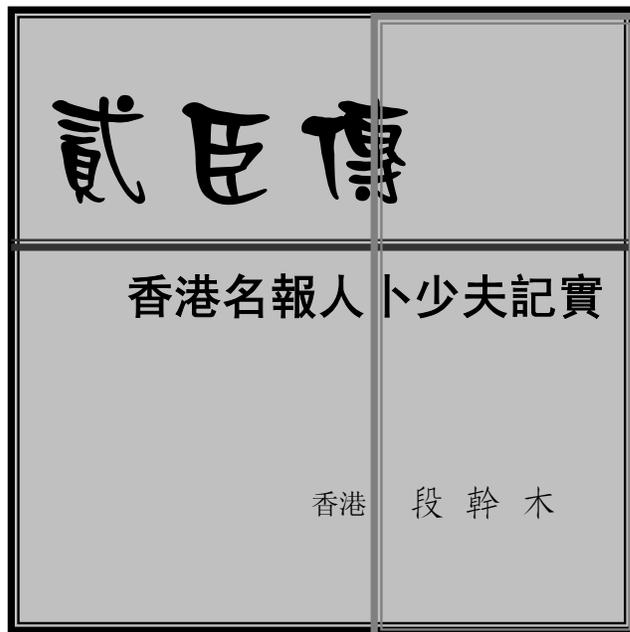
1957年7月27日，全校大會揭露和批判錢如平（數學系三年級學生）攻擊黨和社會主義的言行，並當場宣佈將其送交公安機關法辦。（521頁）

中國人民大學的女學生林希翎，曾經在1957年5月23日和5月27日，也就是顧文選講話前兩天和後兩天，到北京大學演講。林希翎後來被劃成「右派份子」並且被判刑15年。據說當時的公安部長羅瑞卿，親自佈置了對林希翎的逮捕。

對於大學生作這種殘酷的懲罰，配合了「切實糾正」所謂「溫情主義右傾情緒」（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通知》強調了這一點。）

身居高位的五四時代的詩人郭沫若在《人民日報》（1957年7月7日）上發表詩作：「右派猖狂蠢動時，溫情哪許一絲絲」。從文學的角度看，這樣的「詩」根本就不像是「詩」。最重要的是，這種「詩」協助迫害，離開五四文學精神不知道遠到了哪裡。

而且，實際發生的事情，不但是「一絲絲」的「溫情」都沒有，而且用了非常恐怖的手段，那就是在學校發動同學老師「批判」「鬥爭」「右派份子」之後，又把他們中間的一些人關進監獄或者送去勞改農場。顧文選就是其中的一個。



卜少夫，名寶源，筆名邵芙、龐舞陽等。江蘇江都縣人，清宣統元年五月初四日（一九〇九年六月廿一日）生於鎮江。父善夫，業中醫，初懸壺於鎮江，後遷南京下關，父親去世後靠兩百多畝祖田收租過日子。寶源兄弟六人，兄寶珊（毓瑚），三弟寶鼎（力夫）、四弟寶南（乃夫，筆名無名氏）、五弟寶戩（早殤）、六弟寶椿（幼夫）。幼時入讀南京下關基督小學、聖公會道勝學校，同學有胡漢君、應家秉等人。民國十二年，畢業於天津北洋大學機械系的長兄寶珊患肺癆去世，翌年五月父親去世，因而對中醫失去信心，不願繼承衣鉢，且自感寶源似一家錢莊店名，姓簡名繁，失去平衡，故自動易名少夫，弟弟們也跟著改名爲力夫、乃夫、幼夫。小學畢業後，先後肄業於南京益智中學、華中公學、青年會中學、上海無線電專科學校。中學時代曾獲南京中學生演講比賽冠軍，主編校刊《雪花》報、《活躍》週報等。民十六年加入中國國民黨爲預備黨員。民十八年，考入座落上海吳淞炮臺灣之中國公學（校長胡適），一學期後由同學陳時章誘導，轉入中共創辦、設於虹口寶樂安路之中華藝術大學（校長陳望道，民十九年八月被查封，民七十八年十二月復校）中文系，教授有夏衍、沈西苓、陽翰笙、錢杏村等人，魯迅經常蒞校演講，同學有張愛萍（中共建政後官至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等，結識不少左傾文學青年，向報紙副刊投稿，寫新詩、散

文、小說，曾在新月派詩人邵洵美刊行之《現代文學》月刊發表〈藍色的病〉〈春天坐馬車〉等日本「白樺派」新感覺小說，又投身話劇運動。於就讀一學期後，先後兩次東渡，短期留學日本。民十九年，任嘉興《民國日報》編輯主任，投身新聞事業。因出身紈褲，從小腹有鱗甲，恃強凌弱，民廿二年九月與友人陳堯聖去南京夫子廟吃茶，嫌人力車夫跑得不夠快，用手揮扇骨毆打車夫脊背，用力過猛身體前衝，把車夫壓倒在地，他撲在車夫身上，幸自己眼鏡未打破，然白夏布長衫已撕破。

剿匪總部情報科員

同年前往南昌，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機關報《真實報》編輯主任，參加由蔣中正委員長發起之新生活運動，兼任南昌行營轄下之怒潮劇社、革命青年同志會機關刊物《青年與戰爭》週刊編輯，與萬子霖、陶滌亞「都是同一運動中獻身奮鬥的青年」，又加入國民黨復興社，兼任豫鄂皖三省剿匪總部及南昌行營調查情報科（軍統的前身）科長鄧文儀之秘書，自言：「直到南昌軍機燒毀，發生徐培根案，鄧文儀下臺，戴笠接收調查科，我才離開南昌到南京，為拔提書店翻譯《墨索里尼傳》」。

民二十三年，任南京《新民報》編輯兼副刊主編（社長陳銘德），又主編《新聞學》週刊。二十四年夏，任南京《扶輪日報》採訪主任；七月七日，與徐天白（品玉，筆名白雲、二無、少夫人，是年夏畢業於南京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由政府分配到上海警察局任機要秘書，長年佩槍）訂婚。十一月一日，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內發生「刺汪案」（行政院院長汪精衛遇刺受傷，兇手為南京晨光通訊社記者孫鳳鳴，幕後主使者為李濟深、陳銘樞、胡漢民），是日在現場採訪四屆六中全會新聞，與各報記者被軟禁五小時。二十五年春，任南京新京日報（前身為京報，創辦人陳立夫）採訪主任（社長石信嘉），兼為該報撰寫〈人物特寫〉；同年與包天笑、謝六逸等聯名發表《上海新聞記者為爭取言論自由宣言》，旋第三次負笈日本，入讀明治大學新聞專攻科，同學有宋越倫。在學期間擔任江蘇同鄉會（中國國民黨在東京之分支組織）會長。

二十六年春，留日同學會在東京公演話劇《日出》（左翼作家曹禺編劇），卜少夫任舞臺監督。自八月份於明治大學畢業回滬，八·一三淞滬戰爭爆發後撤至香

港。二十七年初任荷印吧城（今雅加達）僑報《新報》香港特派員，四月任立報（社長成舍我）副刊〈花果山〉主編，秋，以戰地記者身份，北上採訪武漢保衛戰、崑崙關大戰與滇緬戰役。民二十八年元旦，與徐天白在香港銅鑼灣利園山袖海堂結婚，男女方證婚人為許地山、成舍我，賀客有張光宇、丁聰、馮亦代、葉靈鳳、戴望舒、路易士（文化漢奸）等。在港期間，與日本浪人打得火熱，卜氏本人亦常與友人談及「差一點落水當了漢奸」，僅因條件談不攏而倖未加入汪精衛的「和運」。

婚後，徐天白與少夫約法三章：一、不得再與任何人戀愛。二、不得與正式有夫之婦尤其是黃花閨女發生曖昧關係，人知之，敗汝行；人不知，喪汝德。三、不得帶花柳病入門。然其徵歌選色、偎紅倚翠一如既往，天白有言「丈夫丈夫，一丈之外即非我夫！」，友人張九公當面調侃卜氏「是流氓，是酒徒，是色鬼！」

民三十年，任貴陽中央日報資料室主任，兼編副刊〈前路〉，期間奉召至陪都重慶入中央訓練團新聞事業專修班受訓，妻徐天白任貴陽花溪女中國文教員；同年出版《戰地記者講話》。三十一年十二月十日，繼趙效沂為重慶中央日報總社採訪主任，妻徐天白以黃苗之介紹入財政部任職。

十二月廿七日晚去中央社串門，由編輯傅劍秋處偷看到中央宣傳部之「宣傳指示」，知悉中美、中英新約業已草成，定於翌年元旦正式，旋於是日凌晨親自寫下獨家短訊一則。此獨家新聞見報後，美國駐華大使高思（Clarence E. Caus）立即向我外交部提出嚴重抗議，指責中國政府疏於保密違反外交協議。外交部部長宋子文聞訊大發雷霆。廿八日晚，陶社長召開編輯會議，卜少夫自請處分，「惟以記者立場，我無錯誤，亦無責任」。稍後，最高統帥將「新約泄密」案交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張道藩偵訊，卜應訊時拒絕供出消息來源，陳博生認為：「這傢夥太莽撞，連帶害了許多人」。

貪圖名利 洩露機密

民卅二年一月十一日，中英、中美分別在重慶和華盛頓簽訂「關於取消英國在華治外法權及其有關特權條約」、「關於取消美國在華治外法權及處理有關問題之條約」，正式宣佈英美廢除在華特權。下旬，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作出裁決，認為採訪主任有聞必錄，登載與否責在編輯，將總編輯袁業裕交付軍法審判，卜少夫則罰

俸三月。稍後，陶百川懇請葉楚傖出面保釋袁氏，不了了之，陶百川則引咎辭職，由胡健中繼任社長。同年，任中央週刊社編輯。民卅三年，繼胡春冰為重慶中央日報總社編輯主任，繼陞副總編輯。

民卅四年一月廿日，與在重慶志同道合之年輕記者十人，共同發起創辦中國第一本新聞雜誌，每人湊出法幣五千元作為資本，相約主動以筆名供稿，不支稿費，而由經理部門記錄每期稿酬，積累作為增資。卜氏被推為總編輯，黃綿齡為總經理。依路透社中國分社經理趙敏恒的建議，刊物宗旨以內幕新聞為主，在刊頭宣示「天地間皆是新聞，新聞中另有天地」。八月，抗戰勝利，由於各創辦人工作有變動，不能群聚於陪都，而是分散於世界各地，所以原有總編輯、總經理輪替之議無法實行。九月五日，由重慶復員南京，此行任務為籌備南京中央日報復刊。九日，中國戰區日軍投降典禮在南京中國陸軍總司令部舉行，與徐鑄成等應邀觀禮。同月，南京中央日報復刊，任總編輯；十月十五日，《新聞天地》渝版結束，由渝遷滬，出版第八期；十一月，改任上海申報副總編輯兼副刊〈自由談〉主編，專管國內外之新聞採訪與報導；同年妻天白任職上海美國新聞處。卜少夫於副總編輯任內，曾率領上海記者團訪問臺灣，指揮採訪南京制憲、行憲國民大會及在上海舉行之第七屆全國運動會，更就近利用申報職務上之便利，網羅部份年輕記者為《新聞天地》撰稿，使雜誌內容豐富多采。

民卅五年，兼任上海中國新聞專科學校教授、復旦大學新聞系副教授，講授〈採訪學〉、〈副刊編輯學〉等課程，學生有何錦玲、劉昌平、馬克任等人，嘗替吳嘉棠至聖約翰大學新聞系短期代課，學生有沈彬、華嚴等人。卅六年秋，應廣東省政府之邀，與京滬新聞界周培敬、羅寄梅等七人暢遊海南島、香港，歷時月餘。同年第一次去北平、瀋陽採訪，辭去兩校教席，《新聞天地》月刊除上海直接印行十三萬份外，尚有瀋陽、濟南、重慶、廣州四個航空版。卅七年一月，《新聞天地》自第卅一期起，由月刊改為半月刊。卅八年三月，由第五十九期起，再由半月刊改為週刊。同年四、五月間，與馮有真、吳紹澍、費彝民等在四馬路大西洋西萊社吃晚飯，交換對時局的意見，卜少夫堅決主張到最後關頭隨政府撤退，曰：「如果誰相信共產黨的話，誰便死無葬身之地。共產黨的目的，祇是為了奪取政權，共產黨那一套，永不適合中華民族！」

五月上旬野火逼近上海時，夏衍勸他留在上海迎接「解放」，他仍辭去申報副總編輯職務，十五日挈眷搭乘中航班機飛往香港。十九日，黃綿齡於結束《新聞天地》滬社業務後，乘坐最後離滬之「中興號」客輪前往基隆。廿七日，上海陷共，申報易名為「解放日報」。上海版《新聞天地》自卅五年三月至卅八年五月出版至六十九期，由報導國共內戰消息迅速準確而一紙風行，銷量由七千份增至十二萬八千份，外加臺北、北平、瀋陽、重慶、蘭州、濟南、廣州等地印行的航空版，號稱發行二十萬份。六月三日，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發佈第一號令接管新聞天地社。

免費乘機 免費印刊

卜少夫從上海攜卅萬港幣赴港，氣勢如虹，那時這筆錢可以買下一整條橫街的房產。六月十八日，《新聞天地》在香港復刊，其後在臺北、北美、西歐、東京設立辦事處或發行點；八月，六弟幼夫由香港前往臺灣，入中華日報從事採訪，四弟乃夫滯留杭州侍奉老母。卅九年夏，正當海南島棄守之時，由港赴臺，表示《新聞天地》堅定反共立場，願與國家同患難共存亡，《新聞天地》遂由最高當局批准交國民黨的《香港時報》印刷機構東南印務出版社承印，此後數十年從排字、拼版，到紙張、印刷、裝訂，卜少夫分文未付。

由於《新聞天地》的通訊員廣泛分佈於大陸各省大中城市，故五十年代初期，該刊的大陸政經軍事報導遠勝於中外的官方通訊社。然而，隨著雷厲風行的鎮反、肅反運動的開展，為《新聞天地》撰寫航訊的筆桿子陸續被捕被殺被關，其報導與評論重點逐漸由大陸轉向臺灣。到《七十年代》、《爭鳴》等政論刊物面世後，《新聞天地》在香港報攤極為罕見。《新聞天地》在臺灣非但未能暢銷，賣刊收入連辦事處的經費都無法維持，所謂內銷乃是每週空運幾百本到臺北，由駐臺辦事處分寄黨政機構、國營事業、傳播媒介以及達官貴人，從贈閱過渡到訂閱，且動員公司商行刊登廣告，動輒以揭露隱私迫使對方就範——自動掏錢贖稿或者為卜氏飲宴付鈔。卜少夫需索的層次比一般臺灣報刊高出一籌，其需索對象多數是政府高層機構，迫使他們在每年預算中留出一筆可觀的「政令宣傳費」。卜少夫的理由是：他辦《新聞天地》在香港孤軍作戰，與共匪針鋒相對，功在

黨國，黨國豈可不照顧他？在反共旗號下卜少夫混了四十年，公私兼取，黨政通吃，於是行政院僑委會、新聞局、國民黨中央海工會、文工會盡皆源源不絕地爲他輸血。民五十九年因向港府疏通開闢港臺航線有功而受聘爲華航顧問後，享有長期免費機票服務優遇，故半個世紀往來港臺數百次，自詡「我若意志不堅中途變節，對於反共事業的震撼遠遠超過美國與我國斷交，遠遠超過徐蚌會戰的失敗，我有此自負，也有此肯定」。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三日國軍棄守羊城，中國國民黨南方工作組組長沈之岳奉令主持爆破廣州海珠大橋，成功後潛返香港。當時香港政府與澳門政府都以鉅額獎金通緝沈之岳，而沈卻在公共電話亭中打電話給卜少夫，約卜到一家飯店喝茶，「我接到電話大吃一驚，乃約好時間地點，且以彼此左手拿報紙爲見面信號……他竟然信任從未謀面的我，我沒有出賣沈之岳，亦從未對人談起這段事……我們在九龍漆咸道飯店的咖啡座談了三十分鐘。他並無任何事交辦，告訴我還要逗留兩天。我勸他速離開，不要用正常交通管道。後來我才知道，他還是正式通過啓德機場移民局檢查，乘民航機回臺北的。以後來往中，我從未問他爲何那次要與我見面？我想，唯一的原因是向我表示有膽、有勇氣，讓我認識他，要我替他宣傳。四十年來，我從未向任何人談及此事」。通常香港警方不會協助中共追捕國特，然此案非同小可——是役沈之岳飛穗指揮國防部保密局技術總隊副總隊長胡凌影用四百箱黃色炸藥炸毀了廣州最壯觀的海珠大橋，死傷平民五百，沉毀中外船舶百餘艘，造成災民三千，那時英國已決定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故對鄰近地區鉅大傷亡案的主謀自然不能置若罔聞。

民國卅九年七月，《新聞天地》推出英文版半月刊，因營業收入不夠挹註印製成本，於半年後停刊。四十年三月七日，卜少夫與成舍我、左舜生等十四人發起創刊《自由人》三日刊，旨在同「第三勢力」對抗，出任該刊總經理，總編輯爲成舍我。同年八月，卜少夫赴日本治遊，自辯曰：「我不敢自況是蔡松坡先生，時代衝擊與拂逆，每每引起無限惆悵，寄豪情於聲色，蓋有其難自遣之痛」。一日去苗劍秋家遊宴，驀地驚艷，必求一夕之歡，代價爲三百美金。酗酒倒地不起，入赤坡山王醫院急救，療治兩個月勉強帶傷返回香港。東京之行，本欲對聯合國軍司令麥克阿瑟作一專訪，又想透過盟軍總部，在南韓的中共志願軍戰俘營中開闢《新聞天

地》的銷售市場，麥帥未見到，反留下一筆風流孽賬。

民四十一年，獨子凡生於香港。四十二年七月廿九日，蔣總統「召見中央黨部秘書長張其昀及第一組主任唐縱，聞有申斥之聲，據（秦）孝儀兄言，這與日來《自由人》《新聞天地》及英文《中國日報》所載孔祥熙、宋子文被開除黨籍一節有關。昨天把周宏濤叫去，也是爲此，並怪他不先報告。後來陸軍侍從武官文立徽兄告我，據副官言，蔣公夫婦一天沒有講話，連吃飯時都悶不作聲」。九月，《新聞天地》受到當局處分，不准其結匯，一時對主力內銷臺灣之《新聞天地》影響甚大。

爲了立功贖罪，民四十二年十月三日（第二九四期）至十二月十九日（第三〇五期），《新聞天地》連載八萬字演義體文章《第三百六十一行買賣》，作者爲自始即參與「第三勢力」活動之焦大耶（本名朱淵明）。文章雖對有關人士姓名第二字代以x字，但一般關心時事的人都能確認當事人全名，諸如張發奎、張國燾、許崇智、劉震寰、上官雲相、張君勱、左舜生、翁照垣、陳濟棠、王正廷、易君左等一百多人，且牽涉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顧問、名記者何義君與美國特使吉塞埔。作者對屈膝於美元的國府前軍政大員嬉笑怒罵、冷嘲熱諷，將他們見利忘義、賣主求榮的嘴臉描繪得神形畢肖，躍然紙上，自然得罪了不少政客。其中，身任「自由戰鬥中國」同盟副秘書長的立法委員、李宗仁秘書程思遠以誹謗罪入稟香港法院控告《新聞天地》，「儘管《新聞天地》所載確有其事，可惜無法找出有力的舉證。我政府當局甚表同情，行政院長陳辭公也接到報告，卻礙於法令規定，政府沒有這筆預算在財政上作實際的支持，《新聞天地》不敢打這場官司，祇好賠錢了事」。

「爲了《新聞天地》刊載《三百六十一行》這篇揭發第三勢力當年在香港活動的長篇連載，其中牽涉到程思遠，他控告《新聞天地》毀謗，時陳誠任行政院院長，主張《新聞天地》與程法律周旋到底，因之纏訟近兩年，所有法院律師等等費用相當浩大，在一次老總統詢問《新聞天地》近況時，我隨便提出，老總統對《三百六十一行》這篇文章印象深刻，亦認爲由於《新聞天地》揭發，第三勢力未能在港成立而瓦解，對國家有貢獻，於是當面關照秦孝儀（老總統召見時，祇有秦一人在旁作記錄）。秦孝儀事後即通知陳建中，陳與我聯絡後，由黨部補助《新聞天地》……」。

民四十三年，任香港聯合書院新聞系教授。四十五

年八月，與岑才生、唐君毅、陳孝威等廿二人隨香港文化新聞工商界訪問團赴臺，一行獲蔣總統暨夫人在士林官邸設茶會招待，並由蔣經國親自陪同乘軍機飛往金門前線實地視察。四十六年一月，香港第一次舉辦以反共為主題之「圖書與作家手稿展覽會」，作為《新聞天地》代表之卜少夫被籌委會推選為理事兼義務秘書。七月，新聞天地社出版袁昶超著之《中國報業小史》，由成舍我撰序。秋，前往馬尼拉，在菲律賓發行《新聞天地》航空版。

同情漢奸 引薦入臺

一九五七年，引薦汪偽中宣部次長胡蘭成去臺北中國文化學院任教，「少夫自發的為我聯絡，我遂有臺灣之行」，胡蘭成在臺恣意招搖，文化界人士鳴鼓而攻，其漢奸歷史被揭露無遺，遂被迫辭職黯然返回僑居地東京。

民四十七年，陸鏗在中國大陸第二次入獄，罪名之一係昔年與卜少夫、丁中江等人創辦《新聞天地》。民四十八年五月，香港新華社掌管新聞宣傳戰線工作的金堯如到北京出席中共外事辦公室港澳工作會議，在匯報中總結經驗時以自己在一次社交酒會中請友人引介向卜少夫碰杯為例，認為「若不顧場合，不顧耳目，不顧他人處境，一味以單純的任務觀點執行上級指示，急躁冒進，唐突佳人，壞了好事，又害人匪淺……」。主持會議的廖承志副主任也加以肯定，他說做國民黨人的統戰工作不能單從我們的需要出發，必須照顧對方的政治環境和不利條件，否則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不僅是對卜少夫一人而已。在座的陳毅副總理兼中央外辦主任也加了幾句話，他說，統戰工作的目的是爭取對手又化敵為友，團結起來，共同工作，為和平解放臺灣而努力。所以不能抱單純的利用觀點，要看大處遠處，作長期規劃，後會有期嘛！總有一天如魯迅所說的『相逢一笑泯恩仇』嘛！陳、廖二位對卜少夫先生亦表示聞名已久，甚為重視。廖公說，卜少夫是個大記者、名報人，抗戰期間活躍於戰場上。他的《新聞天地》還在辦嗎？對他既要重視，也要保護」。事實證明，陳毅、廖承志對香港新華社所作的指示，以長期規劃統戰利誘卜少夫，是收到了全功的，在共產黨眼中，貪財好色、嗜酒如命之徒，遲早都會落入他們的彀中。事實確是這樣，在港臺新聞文化界中，縱情聲色恣意淫樂者，無出卜少夫之

右。卜少夫的小學同學胡漢君對他的評價是「朝秦暮楚，水性楊花，（情婦）不是以十計，而應是以百計」。他的結髮妻子揭露他六十年代「竟向一個賣笑之酒妓動起真情來……留臺七八個月返港，容色黑瘦憔悴，一日夢囈曰『darling，你在臺北可想我？』……後更在其辦公室中發現彼姬來信一束，說明少夫去信並贈送金錢衣物手錶種種，少夫無言可以自辯，惟頻呼痛苦不已……向一賣笑婦人輸其真愛，我欲哭無淚……一向拈花惹草我素不禁阻，惟獨欲重新青春一番去談情說愛，何況是人盡可沽之酒妓，此非風流，毋乃下流」。「對歡場撈女，他特多同情，不論她是因何墮湮，或是她貪圖享樂自甘下賤者，皆視同姐妹」。同時又將臺北皇后酒家的紅酒女貂蟬認作紅顏知己。「對歡場女兒往往表現得一派癡情，擺出一副認真神態，他所喜歡或有過特殊關係的，就不喜歡朋友去碰她。當年他在臺北有一個酒家的紅顏知己海燕，頗有情深一往之慨，我作了一副嵌字格對聯贈他：『海枯石爛從來少，燕叱鶯啼盡可夫』，把倆人名都嵌入，卜少夫見後不以為忤，反而擊節讚賞」。更有甚者，上門去找臺北名妓、老鴿何秀子，「不僅與別人暢談何秀子，還藝高膽大的來寫何秀子，更令人拍案叫絕的是用何秀子做《新聞天地》的封面」。說起他的喝酒打牌，更是末流的酒品牌品，嚴靈峰說：「大家想要瞭解他，最好同他喝酒或是搓幾圈衛生麻將。他如果同你拼酒，一定先要你乾杯；打起麻將來，他的牌品和技術都不太高明」。徐渠成為文曰：「卜少夫打牌，贏了肚子痛，輸了要打到天亮。」

如此花天酒地，不務正業，自有報應：民四十八年九月十三日，《自由人》三日刊停刊。同年與張國興、李秋生、徐訏、馬義等人作印度之遊。五十年八月，代表香港文化新聞界出席陽明山第二次會談。五十二年一月，友人賈亦棣因丁中江案牽連，被港府羈押於港島摩星嶺道政治犯集中營，卜少夫在臺北《聯合報》撰寫香港航訊〈軍火間諜案的牽連與控訴〉，賈亦棣獲釋返臺後，應卜之約，在《新聞天地》第八〇六期發表〈中共特務和我同囚在香港集中營裡〉一文。民五十三年訪問炮火下之越南西貢。五十四年六月，為籌措《新聞天地》經費，創辦《旅行雜誌》，任社長兼主編，因而常獲多家航空公司贈與免費機票至世界各地觀光旅行，「甚至一年中有大半年在外面過」。同年秋，任香港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委員（主任委員

張發奎)。

冒名頂替 居然獲獎

五十五年秋，向《聯合報》總編輯劉昌平自薦出任《聯合報》香港特派員，「我請他推介一位香港特派員，他說我自己來替你們作吧，我可能是面有猶豫表情，他又說：講私人關係，我們是師生；但講工作，你是總編輯，我是特派員，該怎麼樣就怎麼樣，你不必介意」。這同十四年後運動僑選立委席位一樣，都是出於經濟利益的考慮，藉以彌補吃喝玩樂的鉅額支出，自己有家刊物不去全力搞好，反而為別人打整份工，這正如他的舊上司陶百川所說「捨己之田，耘人之田」。

民五十六年，香港左派掀起文革式暴動，高叫「收回港澳，解放臺灣」，到處放置炸彈，宣稱要炸死白皮豬（英警），嚇死黃皮狗（華警），弄得香港人心惶惶，有辦法的人千方百計移民歐美，股市下跌，美元跳升，生產萎縮，市面蕭條。「對臺灣來說，香港萬一被中共攫去，立即威脅臺灣。基於唇亡齒寒的道理，臺北《聯合報》當然需要這類新聞，那時《聯合報》的採訪主任是採訪政治新聞的于衡，他與卜少夫、歐陽醇私交不錯，常為《新聞天地》寫臺北政壇的內幕新聞，賺了《新聞天地》不少稿費。基於這點香火緣，于衡便把美聯社、合眾國際社、中央通訊社從香港發出的消息加以改寫，一律冠上「本報駐香港特派員卜少夫」之名。事實上，卜少夫與《聯合報》駐港記者王會功從來沒有撰寫過香港暴動的消息。那時候我負責與卜、王兩人聯絡，他們不但不知道新聞，連已經在報上刊出的舊聞也不清楚，最後無計可施，我祇好與香港《工商日報》的突發新聞記者梅元欽聯絡，從他那裡得到不少當日發生的重大事件新聞，這些新聞依例也一律冠上卜少夫之名。從版面看上去，似乎卜少夫出生入死在香港採訪暴動新聞。其實，真正冒著生命危險採訪新聞的是《工商日報》梅元欽，他曾經在若干採訪場合被左派暴徒襲擊，被左報記者圍剿。他與其他香港非左報記者一樣，每天早上出去，不知道晚上能否回來，因為左派暴徒都把他們視為「國民黨喉舌」與「港英走狗」。那時候卜少夫仍然經常出入舞榭歌臺，照常打麻將與吃喝飲宴。有一天晚上，香港因暴徒放火砸搶，並爬上港督府貼『造反有理』標語，使香港市面入黑之後陷入死寂蕭條中。而那日晚上，卜少夫則與《快報》社長鄭蔭泉等人在酒樓豪飲後

僱不到回家的計程車，差一點露宿街頭。但是，那天晚上的香港新聞在臺北《聯合報》第三版出現時，仍然是『本報駐香港特派員卜少夫』專電。

「于衡為了表示他處理新聞得當，同時也為了討好卜少夫，居然在香港暴動結束後，替卜少夫申報『嘉新水泥公司』設立的嘉新新聞獎。于衡甚至特地打電話給主持新聞獎的人，請他們重視《聯合報》的表現。果然，那一屆新聞獎頒給了卜少夫，並請卜少夫到臺北領獎狀及獎金。

「卜少夫得獎的消息在港臺兩地傳出後，一片譁然。知道內情的人向嘉新公司反映，認為《聯合報》于衡不但欺騙讀者，也欺騙了嘉新新聞獎的評審人員；香港方面更是吵翻了天，幾家報社的記者公開發表聲明，指證卜少夫從來沒有到過任何一個暴動現場採訪。快報社長鄭蔭泉並指證，香港最危急之夜，卜少夫正在酒樓打麻將飲宴，差一點回不了家。

「卜少夫自知此獎不好領，因此在頒獎典禮上宣佈捐出獎金給新聞系學生當作獎學金。也就因為此事，《聯合報》以後再沒有報領嘉新新聞獎，而卜少夫再也不提他此一『光榮事績』。當然《聯合報》上層的人對卜少夫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時隔多年我去香港，香港新聞界還對此事有十分激動的反應，尤其是在暴亂中多次冒生命危險採訪的《工商日報》記者梅元欽最為強烈，他甚至因此憎厭《聯合報》，並禍延我這個在《聯合報》工作的老朋友，與我從此斷絕往來」。

應世本錢 不知所云

「一九六七年港共在香港暴動，港府頒佈戒嚴令，一時風聲鶴唳，謠言四起，老總統關心留在香港的一些反共人士安全，特邀請了錢穆、左舜生、胡家健和我回臺北，並在陽明山官邸以茶會款待我們，一方面徵詢我們的意見，一方面也安慰我們。茶會前後，建中兄對我說，香港局勢不會擴大惡化，他認為中共不會讓香港成爲一個死城死市的」。所以，卜少夫在《新聞天地》的「每週評論」欄連續發表〈左派造反的慘敗〉〈香港左派敗得慘！〉〈毛共坐視港共就死〉〈港共將與江青偕亡〉〈港共夢幻的破滅〉〈看港共的垂死掙扎〉等義正辭嚴社評，還以本名在《新聞天地》發表〈毛共暴亂中的呈現〉（第一〇〇七期）、〈奉勸費彝民兄〉（第一〇〇八期）、〈大公報〉社長費彝民當時任港九同胞反對

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委員、儼然暴亂的指揮官)、〈掃蕩匪巢擒匪首〉(第一〇一四期)等文,又在第一〇二四期發表〈香港暴亂前後〉,揭露毛共幕後支持港共之陰謀與猙獰面目。卜少夫的善於做戲,表現於他在《新聞天地》第一〇一〇期撰寫的《我接到兩封恐嚇信——警告偷偷摸摸寄發無頭信的毛共鼠輩們》一文中:「我卜少夫行不改姓,坐不改名,我反共,我要打倒毛澤東,我要打倒共產黨!」在民國五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出版的第一〇一三期《新聞天地》上,他則轉過身來向總統蔣公表忠心曰:「公開在戰鬥、赤膊上陣的忠貞人士、本乎良知良能、愛國情操,克盡神聖天職,也不介意政府作什麼安排或什麼獎勵。愛國反共是自動自發的,是每個中華兒女的本份,如存有交換條件、存有期待保障,那不是真正的愛國、真正的反共」,進而呼籲「臺灣的精神、物質以至軍力支援,共同保衛香港,此其時矣!」直至十三年後他回憶這段經歷時還說:「六七年在香港發動大暴亂,到處是炸彈,一時風聲鶴唳,謠言四佈:民兵要來了,解放軍要來了……于右任老先生來信勸我先回臺灣避避鋒頭,我回信祇有十個字:出門二十步,便是一大海。因為那時我住在銅鑼灣海濱高士打道,隔一條馬路對面的現在海底隧道以及新填地那塊大土地,都是維多利亞海峽的一片海水」。

對於卜少夫的作秀,不畏權勢的剛直人士從未被矇蔽過。曾跟隨美國空軍轟炸日本本土、親涉緬甸叢林十四個月,直至波蘿遍地的香港左派大暴動一直出生入死實地報導的元老記者曾恩波,就對卜少夫從來不假以顏色——自民國五十五年至七十七年,在曾氏出任港九教育新聞文化影劇界慶祝雙十國慶籌委會主任的廿二年期間,都堅拒把卜少夫安插到在希爾頓酒店舉行的慶祝雙十國慶酒會以及新年春茗、九·一記者節宴會的主席臺上。

民六十年前往美國舊金山出席世界中文報業協會年會,斯時聯合國已通過決議排斥中華民國,按納中共為會員國。卜少夫在友人所設晚餐上邊喝邊談,醉後情緒激動,大罵聯合國的姑息氣氛和尼克森的忘恩負義。在《新聞天地》上也作了類似表態。民六十四年三月十日,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中正以榮譽獎狀頒贈予資深黨員、《新聞天地》社社長卜少夫。四月五日,蔣公病逝臺北,卜與余鑑明等十餘人回臺北參加喪禮。同年六月廿三日,申報的老上司潘公展在美國逝世,卜少夫發表

〈為潘公展先生憾〉一文,提及「民卅八年三月上海已人心惶惶,湯恩伯在佈置大上海保衛戰了,潘為公子在九江路都城飯店舉行婚禮,飯店裡的花籃已無法容納,擺滿了附近兩條街人行道,車水馬龍冠蓋雲集,那個排場可說為淪陷八年勝利三年大上海一件盛事,足以笑傲王侯。這種踵事浮華不顧時局多艱的舉措,頗為不智。他遠在上海陷共前一個月——四月初就悄然離滬走避香港,他之早走,影響了一部份人心,也引起不少人的攻擊(我是五月十五日從龍華乘飛機廣州),他當時在上海的地位與所負的責任,應該留到最後,他也不愁不能撤退。對這兩件事,總統多少有些不悅,因此廿多年來,有各種各樣機會,也從未想到有這位同志……直到他一瞋不視,卻從未有機會踏上我們反共復國的聖地——臺灣的土地」。對此,幼夫的軍校同學陳賢文直指是「誹議」。此時《新聞天地》幾乎在港九報攤絕跡,其發行最主要是寄贈臺北黨政機構、國營企業以及海內外的舊雨新知,經費來源端賴每年三次分別在香港、臺北舉辦的壽宴和報慶的募捐。《新聞天地》的十一位創辦人之一、參加過兩次緬甸戰役的老記者樂恕人,一九七八年坦言「在經營上,新天本身是一個爛攤子,沒有成為企業形式,一切由卜少夫決定,一切也沒准;多少錢進來,多少錢出去,祇有他一個人知道,另外說到內容,讀者對近十幾年來的評價是很低的,一般批評是不充實、不精采,好像每一期拿過來,信手翻翻,無啥意思就扔開了」。另一位創辦人陸鏗,被中共特赦釋放後於一九七八年四月卅日出境到了九龍,在旅館放下行李第一件事就是找一本《新聞天地》,「打開一看,祇皺眉頭,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很少像樣子的文章,有些『文章』簡直不知所云,甚至無法自圓其說,天哪!何至於如此?……少夫坦承這些年來確實沒有辦好,精力也沒有集中,有時連稿子都沒有過目」。連心慈面軟的老立委、名作家陳紀滢都拋出金玉良言:「盼望少夫於遊樂之餘,多把精神放在您那應世『本錢』的刊物上……近若干年來,不但內容無所改進,即文字上也不可讀,這完全是缺少經營之故」。民六十五年三月十日在新天撰文《海外兩重人格的人》,指責「五類心智畸型的人」是投機無恥的「文娼」,說「最無恥是這類人,過去反共,後來恐共,現在又媚共,而媚共又不敢挺身而出彰明昭著,卻躲躲藏藏,扭扭捏捏,醜態真令人作嘔。主張雙方和談,有意無意在為中共做統戰工作。(待續)

敬請訂閱歷史文化季刊 — 《黃花崗》雜誌

一年四期

本刊新電話：718-898-9100

榮譽訂戶(包括寄費)為 \$100.00

普通訂戶(包括寄費)：美國為 \$22.00；加拿大為 \$26.80；其它地區為 \$39.80

是的，我願意作為《黃花崗》雜誌的榮譽訂戶

是的，我願意作為《黃花崗》雜誌的普通訂戶

附上支票 \$ _____

我的郵寄地址是：

(姓名) _____

支票抬頭請寫：

(街名) _____

THE MODERN CHINESE

(城市) _____

(州名) _____

(郵編) _____

HISTORY STUDIES, INC.

(縮寫：MCHS)

(電話) _____

(email) _____

《黃花崗》雜誌 地址是：

P. O. Box 425

New York, NY 10163

U.S.A

因最近有不少讀者來信來電詢問如何直接向藍天出版社購買辛灝年先生的——《誰是新中國》一書，本刊特回復如下：

1、《誰是新中國》定價：38 美元；直接向藍天出版社購買，八折：**30.40 美元**；美國銷售稅為 2 美元，其它地區免稅。

2、郵資自付：美國為 **2.81 美元**；歐洲空運為 **9 美元**，海運為 **3.31 美元**；亞洲空運為 **9 美元**，海運為 **4.46 美元**。

3、美國藍天出版社 (BLUE SKY PUBLISHING HOUSE 英文縮寫：BSPH) 信箱：

P.O.BOX 425

NEW YORK, NY 10163

4、郵購者請寫明地址、電話和要求，支票抬頭請寫明 **BSPH**。

黃
花
崗
雜
誌
免
費
代
購

可
聯
係

誰
是
新
中
國
訂
閱



辛灝年在首場賞評會上即興講評歷史劇《走向共和》

《走向共和》賞評會十月五日在紐約舉行會場爆滿氣氛熱烈



《黃花崗》雜誌社社長馬佩華致詞



《黃花崗》雜誌編委李剛博士主持了賞評會



馬佩華向與會者介紹中共刪節的《走向共和》版本



《黃花崗》編委陸耘介紹《走向共和》被禁的背景



紐約各中文報紙電台的記者們雲集採訪深受感動



電視記者現場採訪賞評會並於當晚播出新聞

長篇歷史電視連續劇

走向共和

賞評會



專制中國的一道閃電
 共和思想的一片霞光
 痛斥改良的一陣狂飈
 呼喚革命的一聲驚雷

談歷史 論國事 為我中華

《黃花崗》雜誌社 中國現代史研究中心 聯合舉辦

在二零零三年十月五日黃花崗雜誌社
 在紐約舉行了首場走向共和講評會

廣告設計：應祖揚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P. O. Box 425
 New York, NY 10163

NON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NEW YORK, NY
 PERMIT NO. 5135